世纪档案 中国新文艺大系参考书系

1966

我们那一代的回忆

徐友渔／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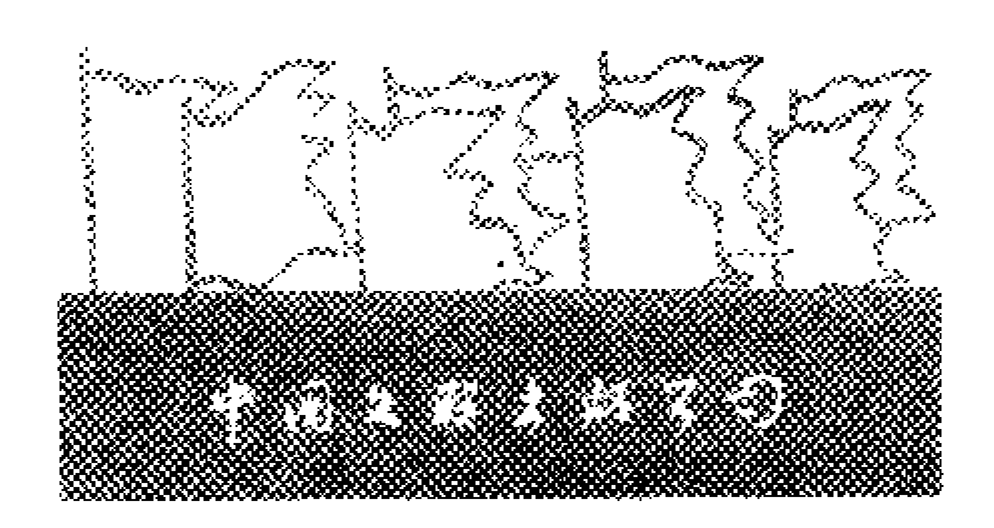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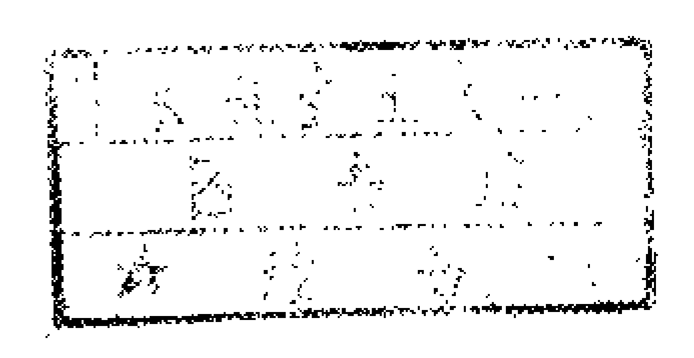
1966

我们那一代的回忆

■ 徐友渔／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徐友渔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10

（世纪档案·中国新文艺大系参考书系）

ISBN 7-5059-3153-9

Ⅰ.19… Ⅱ.徐… Ⅲ.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Ⅳ.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7616 号

书　　名	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
编　　者	徐友渔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曹利群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新燕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10.75 印张
插　　页	10 页
版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14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153-9/I.2384
定　　价	21.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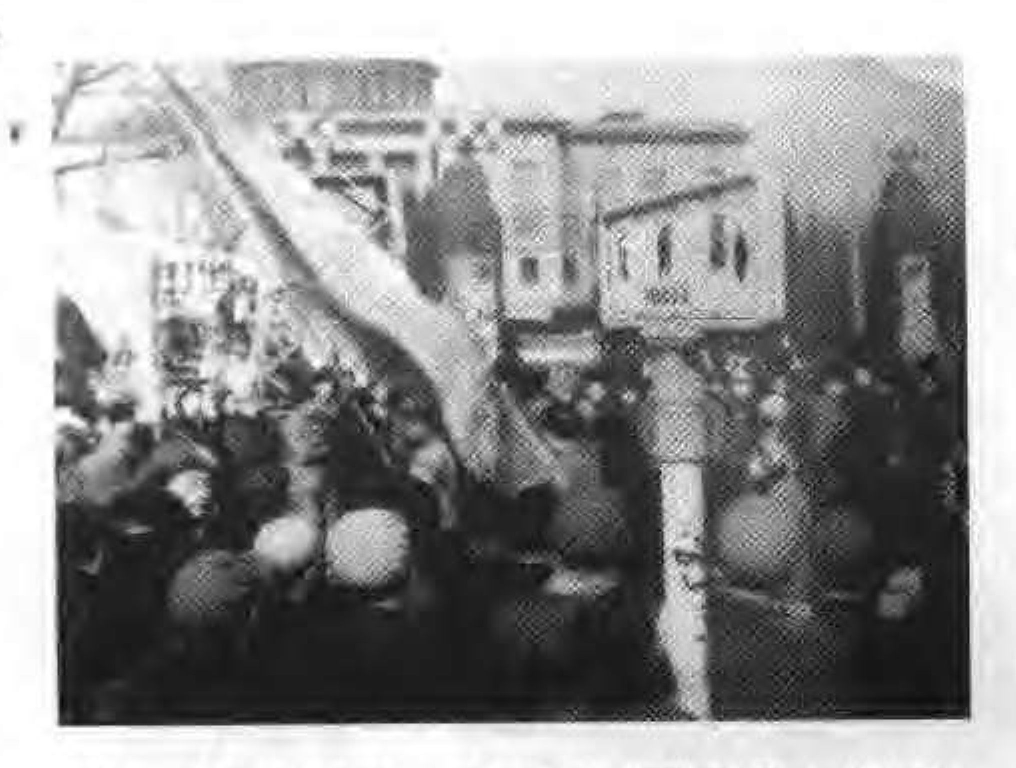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毛泽东向红卫兵招手致意。

红卫兵向毛泽东欢呼万岁。





1966年8月24日，红卫兵将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前的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



红卫兵在散发传单。

串连来京的红卫兵。





戴满毛主席像章的青年。



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出发串连前在天安门毛泽东像下宣誓。



天安门广场上迎接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



北京的红卫兵在街头游行。



在戈壁滩中行进的一支红卫兵队伍。



随处张贴的大字报。



被上海"文攻武卫"组织抓起来的所谓"犯人"。



中共上海市委的办公大楼内被红卫兵和造反派贴上大字报、涂上标语。



红卫兵在给"黑帮分子"剃阴阳头。

云南农业学院造反派批判其院长的大会。





红卫兵在批斗佛寺僧人。

手持长矛、棍棒的武斗人员。





武斗胜利者在押出“战俘”。

上海“工总司”攻占柴油机厂“联司”据点时的情景。



目录

目录

尤西林

文革境况片断

一、崇高的红色

1966年6月12日晚，我和多数同学都通宵未眠。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以及北京四中的呼应倡议书，通过中央广播电台激情的播音，一遍又一遍地震荡在夜空中。特别是女一中的信的开始部分关于我们这一代青年使命感的表述，是那么纯真而深沉，每一遍朗读都激动着我。这封信末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却是我感到陌生的一种称呼与感情。我感到生疏而突兀。据我所知，这是当代中国首次恢复使用这一古老祝辞的文献。此后10年中，"万寿无疆"成为中国大地上最响亮的语词之一。

在教室日光灯下，我奋笔疾书，给在陕北医疗队的母亲写信。记得我写了当时的消息与气氛，写了我的决心，告诉母亲，我决心放弃高考去黎坪山区当农民，改造与锻炼自己。教室另一端，一群同学在起草响应书。我只看到了XX颓丧与消沉的脸，他学习成绩优秀、但却较世故自私。他似乎是唯一回宿舍睡觉的人。

清晨，新的一天广播又在重播昨晚的信息。似乎一直未停播过，那雄浑的、激情的播音使我的心潮一直澎湃不已。去食堂的途中，茶水灶的墙上贴着两张大红纸，围满了观看者。我挤了进去，看到了墨迹未干的如下文字：

毛主席“七·三”批示全文

学生负担过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邀请学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执行。如何，请酌。

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一定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

这段批示的后一段“今后的几十年……”是此前我从未听说与看到过的。30年后的今天，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

些黑亮的大字与红纸都是那么鲜亮，一种我从未瞥见的历史的鸟瞰般的深广视界一下子展现在我眼前。我如同一个长期被蒙骗者睁眼看见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泪水霎时涌满了眼眶。与此并贴的一张红纸上赫然是这样一行字：

建议党中央与全国人大，将《东方红》定为国歌。

这是与“七·三”指示有某种区别的另外境界，但此时这两种境界融合一体，成为一片崇高的红色光芒。

“七·三”批示的后一段文字我至今可以背诵。其中，“任重而道远”、“历史使命”、“一辈子艰苦奋斗”诸字样也许已经命定地化入了我的灵魂深处。它们赋予我崇高气质，也促成了我不宽容的批判态度。

二、被褫夺了的道义根据

我是在一个街角大字报上看到著名的“谭立夫讲话”的。谭氏流畅洗炼的言谈并不能掌握我的心，作为一个非“红五类”的知识分子子弟，对他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咄咄逼人气势乃至血统论特有的血腥气息，我敏感而戒备地沉默着。这是一种我自幼即感受到的歧视、压迫性力量。但我在沉默服从中并不屈服。即使这种压迫以我所信仰的社会主义的名义出现，我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压迫是不公正的”这个古老的道义信念。

谭氏讲到了对“黑五类”的过火行为，他突然激昂地以

如下理由反问：不错，抄家、体罚是伤害了人，甚至出了人命——但那些抱怨与控诉者是否想到，在江西、在陕北，我们多少无辜的父母兄弟姐妹被残杀，甚至许多尚未出世的孩子被杀害……大字报在此段话后有一个括弧：（全场寂静）。寂静，是听众被慑服的场面。我在那一时刻也被震撼了。谭的讲话在此反问中闪射出正义的光芒。于是，血统论血腥的压迫通过一个逻辑的混淆褫夺了被迫害者内心守恃的道义根据。

这是当时在中国大地上千百万善良无辜者之所以垂首接受虐待的主要原因。不是皮带、军靴与棍棒的外在淫威，而是一种虚假的道义观念建立起了血统论统治。

恢复、或者夺回道义根据，成为反抗血统论最为内在的斗争。

这种斗争最低水准，也是最为普遍的形式之一是渴望人道主义的理解与沟通。1966 年 12 月在北京安定门串联接待站我曾住宿一周。一个清秀的东北女生每天都要清扫与帮厨。在选举临时班长的那一天，接待站的军代表提议选这位女生担任班长，她突然脸色煞白，惊慌地连声说“我不行，我不行”。在我们热情地赞同之后，她低垂着头耳语般吐出了一句话：“我出身不好。”全场突然寂静下来。寂静中那位朴实的军人（一看便是农民出身的班排级军官）不高的山东声调依旧热情：“出身有什么，都是革命师生嘛！”那姑娘突然双手掩面，泣不成声，只能断断续续听见她一遍一遍地重复着：“都是革命师生……革命师生……”

我曾目睹并亲历过血腥的血统论迫害。“革命师生”这一最广外延的一般名词对于那姑娘意味着什么，我完全明

白：那意味着承认她是一位合法的学生、一个正常的人，而不再是贱民。30年后的今天，在我追忆此一情景时，那姑娘“都是革命师生”的呜咽仍使我的心震颤不已。

三、当代革命者

“革命者”自50年代后已成为一个历史性名词，取而代之的是“建设者”。即使是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革命者”所唤起的也不是手戴镣铐、肩担道义的形象。一个深刻的现象是，“革命”与“革命者”在革命胜利后的新中国一方面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词之一，另一方面却也成为越来越抽象的语词。然而，“文革”恢复了“革命者”的真实涵义。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为“文革”残酷的压迫与反压迫斗争所复活了的当代革命者观念，并不同于建国以后流行的抽象革命观念，它已成为当代中国反抗不公正乃至专制（如在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事件中那样）的资源之一。

当血统论残暴的压迫袭来时，我活生生地看到了革命家列宁所说的三类人：安于奴隶地位的奴隶，处于奴隶地位却渴望爬上奴隶主地位的奴才，为改变非正义奴隶制而斗争的革命家。列宁的上述话在“文革”时代曾广为流传。起初，我只是从人格角度理解这段话（我特别蔑视那些狐假虎威的“红外围”）。

大约是在1966年9月，我读到了北京一个被残酷折磨的女教师郑兆南给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充溢着一个女革命者宁死不屈的抗争正气，我特别注意到了

信末这样几句话（大意）：“短短的一个多月里，我从自己亲身所遭受的折磨压迫中真实地体会到了先烈创业的艰辛，以及做一个革命者的不易。”“革命者”一词在此具有了沉重而现实的内容，在此语境中，我第一次明确地与历史上的“革命者”沟通了。

1966年11月初，我在大串联途中参观了武汉“二·七”纪念馆。我久久伫立在林祥谦塑像前，想象着他被捆在电线杆上流血的身体，这景象与我领着大片沉默的人群向杀气腾腾的红卫兵总部前进的图象融合为一体了。那是大约10天前的事。在我们这个西北地区红卫兵发源地的高干子弟云集的中学里，某些红卫兵毒打人从6月以来就已无人敢过问了。那天被打的是一个患小儿麻痹而瘸腿的初中女生，据说她父亲是右派。面对着几个无言地抚摸她的女生，我突然在楼道内叫了一声：“讲理去！”我连叫了几声后扭身便向楼外走，我身后响了几声同样的叫喊。在走向那平素已令人生畏的红卫兵总部途中，陆续有人加入这请愿评理的队伍。我还记得自己有些发冷（我内心有些怕），但那黑压压的跟随着、簇拥着我的弱者们（女生居多）使我空前真切地体验到了这样一种境界：为大多数人挺身而出（像丹柯、林觉民那样）是美好崇高的……现在，我与那同样为着成千上万江汉工友及其妻儿而宁死不屈的坚毅面孔会面了。我感到分外亲切。我从“舍己为群”这一角度进入了“革命者”的内涵境界。

自幼每年清明参观烈士陵园，我几乎只当作春游，而串联路上，凡有烈士碑处我就去默哀看望。在南京雨花台展览馆，我在女烈士郭纲琳一方白手绢上绣的大雁与“起来”的字样前一直出神到闭馆。在那个血腥的年代，最能抚慰与鼓

励我的就是那些为着群体牺牲自己的烈士了。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证实着理想的至高无上与一种超越一己利害的可能。我此后的执着习性，无疑与这一时期的经历有着深刻联系。

从南京继续向东。在复旦大学校园一篇大字报上我抄下了这样一种分析：北大的“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之可能如干柴烈火般燃遍全国，并不能归结于领袖个人的号召力或大字报本身，而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特权阶层与广大人民矛盾的总爆发。无论这一分析的结论是否正确，但从方法论角度，这是我所见到的第一篇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用于社会主义自身分析的文章。这种分析使“阶级斗争”与“革命”、“革命者”在当代中国获得了真实的内涵，它与意识形态喉舌所宣传的虚假阶级斗争观念（地富反坏右）有着深刻的区别。“文革”研究者至今不甚懂得，“文革”中不仅有两种红卫兵，也有两种阶级斗争观念。一个多月后在学校一次辩论会上，当我阐发了特权阶层以权力为中心的财富与社会等级本质、又指出了今日二次革命的性质后，那些身穿将校呢制服的老红卫兵（北京的“联动”、西安的“红色恐怖队”）吼叫着跳起，眼射凶光。我第一次看到了这些素以阶级斗争为大旗的人在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反击后是如何对“阶级斗争”、“革命”这些字眼表现出反感的。

从此，被褫夺了的道义根据重新扎根于被压迫者心中了。革命，从历史传说复现为活生生的当代现实；“革命者”，从一个人格概念推进为切实的斗争生活，并且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社会实在内涵。

四、"毛主席"的不同含义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文革"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浮面现象。流行的"文革"研究将之归于M.韦伯所指出的"charismatic authority"而硬结化。但仔细反省当时似乎无可怀疑的个人迷信狂热，其实却以不同的社会阶层利益为前提基础，众口一辞的"毛主席"实质有着不同甚至对立的含义。

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血统论压制的"造反派"把毛泽东作为永生不背叛民众的革命家领袖，作为反抗特权阶层压迫的正义带头人。这就是为什么"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首歌在那一时代一旦唱起，在场者几乎无人不流泪的原因。这是一首表达30年代左倾路线统治下斗争受挫、革命处于低潮时苏区军民渴望新的领导的歌曲。优美而深沉的旋律反复回荡飘扬着一种悲壮与忧郁、憧憬与期盼的情绪，它把理想激情与压抑抒情融合一体，成为造反派将自己反迫害的伸张正义斗争提升到革命意识形态水平最具合法性亦最具革命境界的艺术形式。应当公正指出的是，这首歌并无个人崇拜的那种迷狂或献媚（与"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那类庸俗欢腾的歌曲有深刻区别），词曲都很朴素真挚，在缓慢坚定而细腻的节奏中，一种革命者的尊严感与纯正感油然而生。所谓尊严感，这特别是对那些将一己抗争提高到反抗特权统治、建立理想社会理念(idea)框架的人而言。在这种尊严感中，"毛主席"具有

“革命战友”的意味，此中基本没有后来史家所反复断定的个人崇拜意识。

有一种红卫兵对毛泽东的拥戴崇拜实质也以自身既得利益为立场。在那种似乎完全是理想观念性的革命欢呼与流行的“朴素阶级感情”表白语中，蕴含着对自身利益的肯定与守护，以及将此种既得利益升华到普遍观念的自豪。这种普遍观念以历史记忆中的血泪仇与闹革命为道义根据，使自己像业已腐朽的罗马帝国的战士那样，依然能在观念上保持着对“一小撮地富反坏右”的阶级专政合法性与自信心，被神圣化的毛泽东将上述普遍观念聚集为人格化的象征。因此，当毛泽东号召“二次革命”以推翻“吸工人农民血”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伟大领袖毛主席”与可亲的“江阿姨”便从崇拜的对象转化为攻击的对象。这表明，不应高估抽象的个人崇拜，起支配作用的是实际的利益。

对于广大民众而言，个人崇拜似乎是更为真实的事情。然而，只要仔细辨析，其中仍然有着特定利益的驱动。跳“忠字舞”最欢腾的学生或工农，与在胸脯上鲜血淋漓地佩像章的人，不仅是理论思维最无力者，也是人格自我意识最薄弱者。在那个政治化的时代，围绕个人崇拜所发明创造的诸种表演形式，都是表演者表白炫耀自己，并借此占据社会生活重要位置（引人注目）的手段。

对于表演者而言，如同整个“文革”时代风尚一样，这种欺瞒他人同时也具有自我欺瞒或自我夸饰与安慰的性质。1966年8月，不知谁将一个教室后墙上毛泽东诗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中末句改为“敢教日月换旧天”，红卫兵迅速将本班全部出身非“红五类”的学生关押

起来，禁止饮食，打骂训斥。第二天，一个女生偷偷向旁边的人供认了是自己所为。霎时，这群被关押的“狗崽子”（多是女生）竞相撕打起这个女生，人们挤成一团，义愤填膺地高声辱骂着这个“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反革命”，争先恐后地打着……这是“文革”中极为普遍而典型的一件事。被打的那位女生十几年后将此事告诉我的一位朋友，讲时泪水盈眶。我听后想到《圣经·约翰福音》中耶稣对那个行淫女人所说的话：“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罢，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与那些激昂打人者形成了鲜明对照。打人者真是出于对“伟大领袖”的崇拜感情么？她们的高声叫骂表明，这里含有一种表白与洗刷，是借清白自己，以摆脱自己不利地位的表演。因而，在“文革”中，打人最凶残者中往往有“红外围”。

我自己，同时（通过观察）还有那些具有理论思维与纯正道义感的人，在“文革”中从未卷人“忠字舞”的欢腾或“交红心”的哭喊诉白。我们沉默而沉重地站在巫术发作般的人群中，即使努力酝酿，也无法迸发出那种站出来与跪下去的冲动激情。我事后在日记中认真反省自己“阶级感情仍不够深厚”，不如工农民众，因此更坚定了投身山区与工农结合的志向。但有一点是当时就很明确的：我无法那样表演，那里有一种损害人格尊严、让人恶心的东西。

五、前后“文革”：辩论与暴力

“文革”阶段划分是一个甚为复杂而巨大的课题。1968

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无疑是一个大的转折点。但其间又可有多种划分角度。例如，以 1967 年“一月革命”（“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为界限，此后“文革”的暴力色彩越来越浓。

1966 年秋冬，辩论这一“文革”活动形式可谓达到了顶峰。无处无人不辩论。这是一个至今未曾研究的奇特社会现象：人人都政治化与观念化了。口才与讲演，理论与观念成为某派势力兴衰关键所系。除了红卫兵“破四旧”与抄家的血腥掠影之外，这一时期基本是一段观念辩论史。

至今记得，1966 年 9 月的一天傍晚，钟楼南大街口人山人海，一个交大女学生站在果皮箱上批判西北局与陕西省委，接着另一个干部模样的男子站上去反驳，双方都有意识地在煽情，但却决无吵骂。相反，由于有意强化逻辑论证，语言及表述都很有些斯文气。围观听众似乎都进入了这种逻辑论理过程。于是，台下也发生了小型辩论。几十年后回忆此种场景时，我特别思索了两个现象：1）某些显然属于下层社会的“闲人”（西安俗语，无业游民之谓）也攀附性地力图介入辩论，似乎为了表明他们也有“水平”（这是“文革”辩论文化所产生的重要人格价值观念），他们本来粗野的语言也滑稽地规范化了。2）辩论至凌晨，观众热情不减，上千辆停放的自行车无一人看管，却无任何偷窃丢失之事发生。是否小偷也卷入了这种全民政治文化中了呢？

但从 1967 年夏季开始，暴力逐渐取代了辩论。不再是口才或理论水平，而是身材臂力与格斗勇气，成为各派兴衰的一个重大因素。社会底层的武术团体、甚至流氓帮伙，逐渐成为各派拉拢的对象，这些人将自己的语言、习气逐渐带

入“文革”社会。特别是这些流氓与以某些红卫兵在草莽豪爽、蛮横自负方面很快接近起来，形成了深刻影响“文革”的痞子文化气质。如果说，“文革”初期红卫兵挽袖子、叉腰、抡皮带，出口“他妈的”、“老子”，还笼罩在工农革命的红色传统之中的话，“文革”中期以后那些胳膊粗大、眼神阴鸷、口操黑社会术语的流氓打手便完全显示出“文革”与痞子社会深层关联的一面。因此，“文革”初期的学生组织与后期的工人组织有着重要的区别。

这似乎是历史上早已有之的规律性现象：刘邦、朱元璋终究以武力夺取了天下。切不可轻视这些人，他们所带入主流社会的习气，至今仍影响着中国社会各个阶层。

毁家纾难

拓路，男，1947年出生于陕北战争中。父母均在30年代加入共产党，伯父系刘志丹的陕北游击大队长，被俘后头颅割下悬于绥德城门示众。与那些盛气凌人的高干子弟有别，拓路极谦和。他周日常去农村画画，有时还将农民画友接到自己宿舍食宿。1966年8月初的一天凌晨，他拉响了全校的紧急集合电铃，待我赶到大操场时，已有数百人围住了他。他文弱的身体上有伤痕，衬衣被撕破，依然戴着红领巾与穿着草鞋（这是“红卫兵”诞生之初北京师院附中与北大附中最早的装束，8月10日后，便改为红袖章了）。他在向人们宣讲某些人如何组织庆安公司的工人围攻殴打交大请愿学生，并号召同学们去建国路（省委）参加交大静坐。一

声断然而雄壮的呼叫声顿时响起："同学们！请不要上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当！向党和政府请愿静坐是与我们红卫兵保卫毛主席的神圣职责背道而驰的行为……"这是一个西北局领导干部子弟，校红卫兵发起人之一。一阵叫骂与嚣闹之后，只有两三个人随拓路走出了校门。

8月下旬，西安市红色恐怖队在获悉拓路父母有历史问题之后，抄了拓路的家。当我陪拓路赶到他家时，只见一片狼藉。我只记得拓路将打碎了的盛猪油的坛子坛片上的油脂刮满一饭盒带回学校。不久，拓路的自行车与半导体收音机也作为"浮财"被校红卫兵总部没收去了。

大约10月初的一天夜里，西北局一干部来我校传达中央为军事院校"假左派"、"伸手派"平反的文件，校内已将全体非红五类子弟押往陕南秋收劳动（我和拓路等三人是唯一抗拒不离开的"文革"战斗组成员），只有数名巡校的红卫兵集中在收发室听传达。我们无权听传达，呆在宿舍中。拓路突然抽搐起来，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我急忙冲出校门口大声告急，谁知红卫兵雀然跃起，笑骂着"反革命罪该万死"直奔我们宿舍。待我赶回时，红卫兵已撞开门，拥在门口又笑又骂……从此，拓路患了不定期发作的癫痫。

此后不几天，拓路父母被押解回陕北老家劳改，他父亲临走前将拓路妹妹（拓路仅兄妹二人），一个才6岁的女孩送到我们宿舍。当时，拓路还未恢复，躺在床上，对父亲很冷淡。拓父起身将200元递给拓路，儿子闭目侧过头去，轻声说："我不要叛徒的钱。"在门外，拓父将这钱伸手递给我，混浊的泪水在眼中打转："我没有叛变，是脱党。钱是给亲亲（拓路妹）用的……"后来，我们才知道，拓路父母

的历史问题之所以处理突然严重升级，是我校红卫兵将拓路参加交大静坐一事通知了拓路父母单位，才株连其父母的。如不参加静坐，拓路本可以同老红卫兵中相当多的人一样，即使父母真有问题，也可安然无恙。

拓路妹妹因经常在外玩耍时受恫吓威胁，不久又转寄养他处了。

又不久，拓路的户口被我校红卫兵也转回陕北父母处。一个晚上，红卫兵数人以打手 XXX 为首，闯入我们宿舍，威逼要遣送拓路回陕北原籍，并称有文件依据。一番争执后，决定双方同去西安市两派红卫兵司令部裁决并查阅文件。大约半夜时，我被“嘭”的一声撞门惊醒，灯已拉亮，只见 XXX 与两名红卫兵动手卷拓路床上的被褥。对着我惊讶的目光，XXX 若无其事地说道：“拓路已经同意走了，现在在火车站等着，让我们来运行李。”沉吟了片刻，似乎从 XXX 游移的眼神中省悟到了一件可怕的事，我猛然翻身跃下架子床，闯至拓路床前：“不行，让拓路本人来拿行李！”“老实点！你家里也有麻烦，你是不是也想让抄你家?!”XXX 凶相毕露。争闹声引来了其他宿舍的人。XXX 骂骂咧咧地挤出去了。我不再敢熄灯，朦胧至凌晨，睁眼看到正在铺床的拓路背影时，一阵亲切感与辛酸涌上。听完我的叙述，拓路淡淡笑了笑，“这小子，耍了这一手。”他告诉我，红卫兵司令部无人裁决此事，XXX 无奈只得与他在火车站前分手了。他的语气突然沉重甚而庄严起来：“老二（我的绰号），我在火车站看到了一张大字报，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主席是少数派，反对势力很大。”顿了一下：“我必须今天就去北京。你中午叫醒我。”然后便钻入了被窝。

11月初，我们在动身“大串联”时将全部粮票与钱留给了拓路。拓路没有资格串联（不给他开介绍信）。在我们走后，这所学校几无一人了。拓路每天在外看大字报，义务替一些大专院校印刷传单、抄写张贴大字报，参加辩论会……这意味着他终于保卫与坚持了自己参加“文革”（“革命”）的权利。他经常至深夜返校，翻墙回宿舍。每天去火车站吃不要粮票的5分钱一碗的粥。在最冷的时候，他把我们留下的三件毛衣套起来御寒。

1967年当我们也终于成立了自己的“红卫兵”时，拓路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但当天中午便在食堂被“老红卫兵”们扭打撕下（拓路是“黑五类”中最黑一类）。第二天，拓路戴着一个新袖章时，我发觉那袖章有些奇怪，凑近看时才知道，那袖章被用线密密地缝在棉衣袖子上了。

近30年后的今天，拓路在海南一个古建筑修缮公司工作。他由于对理论研究没有兴趣，插队后不久便脱离中国当代思想潮流了。然而，甚至是在德沃夏克《新世界交响曲》那奋进的小提琴齐奏声中，我也会清晰地看到拓路以及许多我熟悉的青年理想主义者的身影。作为理想主义者，他们并非因个人身受压迫而反抗，亦非为既得利益而喧嚣，而是为着“人类绝大多数人的幸福”（我们那一代人精神根基中一个关键性观念）与最为普遍的道义观念而无私献身的。拓路为了“反修”与反抗压迫而毁弃了全家。当我后来第一次听说“毁家纾难”这一古老成语时，一种透彻身心的感动并非来自儒学教义，而首先想到的便是拓路。

个人的特定行为涵义（meaning）总是局限的，但其真诚纯洁的意向却是超越了苦难乃至异化扭曲的。正是拓路这

样--些人物的精神榜样，激励与支持着我们这一代最早觉悟的中国知识分子以真诚无私的彻底性追究，从插队与做工时代的民众基层体验走向理论研究，从“9.13”事件后的反省思考开始对极左路线根本批判与进入真正民主富强的现代中国设计。1980年，我与一位朋友在西北大学与李泽厚一席长谈中，我对其刚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末章关于“五代知识分子”的评价，表示了赞同与发挥：在那邪恶与崇高交织时代中所成长起来的“老三届”，只有他们才在理想境界与创造魄力上堪与20年代知识分子相匹敌。于是，我向李氏讲了一句话：“那些真诚者即使不断反省与自我批判，也是一以贯之的。从1966年百万热血青年狂热欢呼的天安门广场，到1976年百万沉默民众的天安门广场，这10年历史辩证法，至今无人去写它。”讲这话时，我想到的正是千百万拓路这样的精神范型的行进历程。这种毁家纾难的精神不仅通于过去的先行者，也融向未来的接续人，它是属于真正形而上品级的，因而是不朽的。

尤西林　西安某中学高中学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教师。

徐友渔

我在一九六六年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文革”的序曲早在1965年底就已奏响，只不过全国人民（很可能包括像刘少奇这样身居高位的人）都未能参悟到毛泽东的深谋远虑，以为又是一场一般的意识形态争论而已。当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由于党的权威机关报《人民日报》没有转载此文，它并未引起我们的注意。当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时，我们也没有想到它有多大来头。姚文元从来都写一些盛气凌人的批判文章，这次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正如毛泽东后来指出的，姚的文章没有点出“罢官”——即毛在1958年的庐山会议

上罢了彭德怀的官这个要害)。《人民日报》发表此文后，随之而来的是大批学术文章，讨论"清官"和"贪官"的历史作用。我们只看学者、教授们各抒高见，并未感觉到有何异常。那时报上大块头文章之多，连我这个理论迷也看不过来。后来报纸上揭发批判说，这是彭真等人为了转移争论的政治方向而导演的闹剧，他们企图把政治斗争引向学术论战。而我的感觉是，多数人认为反对姚文元观点的文章更有道理。

对于学生，更受注意的是 1965 年 12 月发表在《红旗》杂志第 13 期上的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实际上是一篇充满杀机的政治声讨文章，但学生们根本看不出来，我们早已习惯"为革命而学习"，"为革命而锻炼身体"，"为革命而……"这样的句式。戚文标题使大家以为文章想谈的东西与自己关系要近一些。班主任也教导我们，戚本禹那么年轻（当时不到 40 岁）就能写出这么有革命内容、才华横溢的文章，大家应该以他为榜样，现在抓紧时间为革命而学习，党需要更多像戚本禹这样的人。

随着报纸上的升温，大家感到这并不是一场我们可以置身事外的学术论战，一场在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即将来临。形势不容我们旁观，而学校党组织和领导也凭丰富的政治运动经验，知道这是看行动的时候了。谁也不能落后，到运动后期要坐下来评定各级领导，以及每个人在运动中的表现。做什么呢？开始大家写点讨论清官、贪官的文章，但这只是少数会写文章的人才能做的事。后来，决定上街去教唱革命歌曲，这似乎是真正关系文化革命的事。我们一个班五十来人，分成四五个小组，事先把歌曲抄在大纸

上，用木架支起来，这是给观众看的。有的时候，还油印许多小张歌单。我们敲锣打鼓地去闹市区，停下脚步来学歌的行人还真不少。尤其是有油印小歌单散发的时候，人们更为踊跃。我们早已在学校学会了那些革命歌曲，上街之后，由一两个嗓音好的同学教唱，其余同学扮演学唱者的角色，这样，行人跟起来就很容易了。

这种教唱革命歌曲的活动持续了很久，后来我们将其发展到农村，农民学唱歌也很积极。说实在的，他们的文化娱乐生活过于贫乏，大多数人家中没有收音机。对他们来说，学生唱歌之美妙，和他们偶尔有机会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演唱节目相比，也没有多大差别。农民的主动性比城里的群众略逊一筹，我们在农村活动，一半时间是教唱歌，一半时间是为他们演唱。

我们常常是中饭之后出去，天色渐晚时才一身疲惫地回校，嗓子已经哑得说不出话来，但是大家极其满足和兴奋。这有两个原因，一是认为自己总算为革命做出了贡献；另外，我们是在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也就是说，是在当群众的先生。对于一直当惯了学生，从来只听任别人教育的我们，这是一种新的、令人振奋的经验。

多年的革命传统教育，已在我们头脑中形成了关于革命青年学生的固定形象。那就是雕刻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上的图象，以及画报、宣传画中几乎一成不变的形象：一群学生，男同学有的戴眼镜，有的披围巾，女同学短发，长裙；他们手持话筒，或挥洒传单，在街头巷尾宣传革命道理；工农群众、商贩店员则若有所悟地倾听着。这是宣传中典型的“五·四”运动和“一二·九”学生运动中

的革命学生形象。今天，我们不是和前辈完全一样吗？

由于多年来反复不停的灌输，使得我们认为，人生的光辉时刻，不是在实验室里，也不是在领奖台上，而是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天安门广场上的游行示威，红军长征中的浴血奋战，抗日时期敌后根据地的青纱帐，只有在这些场合，青年的精神才会成熟，思想才能升华，一个人才能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十多年的课堂学习，似乎离这种理想境界十分遥远。我经常想，我们这一代有些不幸，为什么不生在大革命的时代，为什么错过了“五·四”大游行、长征、抗日战争，等等？可是突然间，机会和幸运降临到我们头上。在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包围封锁之中，在苏联背叛了社会主义原则之后，中国掀起了挽救人类命运的大革命。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的十月革命可能都会为之逊色。虽然克里姆林宫的红星不再闪光，但“文革”的火焰将在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燃起。使命感和幸福感交织着，巨大的兴奋与喜悦的浪潮在心中澎湃，几乎使人透不过气来。

有一天，在教唱革命歌曲，撒完传单之后的返校路上，一个同学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天天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却不革自己的命呢，这不是只说不做吗？”看我们大惑不解的样子，他解释说：“你们难道还没有看出来，我们的名字包含了多少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这些名字寄托了我们思想落后的父母想让我们升官发财的希望！”大家一想一议，果然是这么回事。比如某人叫“Z良富”，这不是想当有钱有势的上等人吗？另一个叫“王宗光”，这不是典型的光宗耀祖的思想吗？大家为自己的新发现而得意，并且觉得再让那些可耻的名字和自己联系在一起就是对

革命的背叛。于是发出倡议，几分钟之后就在学校喇叭中广播出来，每个班的同学聚集在教室中，正式宣布自己革命化的新名字。

这种名字寄托了多少革命的理想啊！我有个好友叫“闵仕”，仕者，官也，关起门读书为当官。看来反动的父亲贼心不死，还要他成为骑在老百姓头上的达官贵人。他更名为“闵为民”，以示为人民服务一辈子的决心。我的名字似乎没有剥削意识之嫌，但我仍将它改为“徐锋”，以示我学雷锋的决心。班上一位同学马上指出，改后的名字与学校某位女同学名字相同，这使我颇为丧气。我班有位女同学将自己姓名改为“S金猴”，典故出自毛泽东的诗句“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这是歌颂革命造反的好名字，可惜要称这位颇有风度的女同学为什么金猴，总是难于启齿。折腾到后来，这件很革命的事也不那么严肃认真了。那位“王宗光”更名为“王革命”，我们纷纷称他为“忘革命”。前团支部书记L是头脑最清醒的人，他拒绝卷人这场闹剧，而且做得十分高明。他的名字叫“L宝来”，有人分析说，他的父母希望他获得金银财宝，因此这名字非改不可。但他提出一个别出心裁的解释：“什么是宝，毛泽东思想是第一宝。”这确实是当时流行的口号。他宣称，他的名字意味着盼望、迎接毛主席的红宝书，这是最好不过的名字，有何改动之必要？

这件事只闹腾了两三天，由于习惯的巨大惰性，革命的名字不能叫开去。但革命过程从个人名字扩展到街道名称，店铺名称。革命学生威风凛凛，市民百姓哪敢不从？成都市的中心街道“盐市口”更名为“英雄口”，最繁华的“春熙

路”改为“反帝路”。这些更名得到官方认可，路牌、汽车站名也随之改过来。在“文革”期间，人们一概使用新的名称。

许多人都在以锐利的目光搜寻革命的目标，挖空心思在现存一切事物上发现问题，以便对之采取行动。他们自然不会放过学校中最大的目标——图书馆，他们将其形容为封资修思想的藏污纳垢之地。这时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中冒出一个英雄人物P，他自称博览群书，而且有觉悟识别香花毒草。他在图书馆干了一整天，在书架前泛泛浏览，把他认为有毒的书籍取下。最后汇集了一大架子车，拉出学校处理。我不知道这些书的下落如何，一说是拉到一个地方集中起来烧掉了，一说是卖给废品收购站，然后送到造纸厂重新打成纸浆了。我亲眼看见这一大车书被拉出校门，心中一阵阵发痛，一阵阵悲哀。我不论思想上多么激进狂热，从来没有失去对书的感情。

二、大批判和斗“黑帮”

1966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第二天，全国报纸都转载了这篇文章。此文把北京市的高级官员邓拓、吴晗、廖沫沙描绘为一个反党小集团，说他们以谈古论今、讲故事、发议论的方式含沙射影地攻击党。这使我们大吃一惊，原来阶级斗争果然是如此尖锐复杂，惊心动魄！这些身居高位的老党员，居然

在伪装下向党射出一支支毒箭!

紧接着，好像从一个模子中出来，全国每个省都复制出一些类似于“三家村”的黑帮分子。他们的反动言行都差不多，均是利用讲故事、说笑话、谈古论今讽喻时事，攻击大跃进失败了，批评由于领导人的失误，全国形势十分不妙。四川揪出两个黑帮分子，一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作家)，二是《四川日报》总编张黎群。各地领导人以为，抛出几个下属（按照政治运动的惯例，首当其冲的是知识分子，尤其是舞文弄墨的作家或掌管宣传、文教的官员）就可以表明自己是革命的。这一招在以前的政治运动中有效，但这一次不灵了。

这种复制活动远不是到省一级为止，每一层领导机关，每一个单位，都揪出了一批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连我们一个小小的中学也不例外。我校有个地理教师L，学识渊博，文笔流畅，教学之余，他常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内容全是介绍地理知识，或曰“赞美祖国大好河山”。对他的揭发批判十分离谱，本来，谈论山川湖海与政治完全无关，但那些运动中的积极份子可以任意发挥他们的想象力。L谈台湾海峡，他们说他随时怀念蒋介石，L谈风浪潮汐，他们说他妄图卷起反共巨浪。我十分纳闷，为什么工作组不出来制止这些过份荒谬的批判，这不是把神圣的文化大革命弄成一场滑稽戏了吗?按照当时的逻辑，每天都会发现惊人的反革命大阴谋。比如，当时有一张流传很广的毛泽东照片，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人们招手致意。突然，一天传来北京的紧急呼吁，要求不要再张贴这张图片。因为画上毛挥手的阴影落在他胸前，像一把张开的叉子直刺他的喉咙。

这说明，暗藏的敌人对我们伟大领袖居心何其恶毒，反革命宣传何其阴险狡猾！

在“文革”中，我险些做错一件大事。我爱看各种杂志，当我看了姚文元评“三家村”的文章之后，突然想起当时一份著名杂志《新观察》，上面登有署为“马铁丁”的杂文，我认为其内容和风格与“三家村”的文章完全一样。我找来给同学们看，他们纷纷点头称是。我们把这个线索报告给工作组，由他们特许，我们从图书馆调出全套《新观察》，后来又持校党委介绍信到四川省图书馆借到更多的资料。我和同学们去找材料，找到之后，他们细细翻查，把一切署名“马铁丁”的文章交给我，由我仔细查看其内容，找出其中含沙射影攻击党的蛛丝马迹。这一查，果然令人大吃一惊，因为马铁丁的文章非常之多，论题和调子与“三家村”文章如出一辙，这些文章大多发表于1962年或者这一年之后，而按照姚文元的分析，这正是全国处于困难阶段，反党分子猖狂进攻的时机。

我至今也不知道马铁丁是谁，是不是确实在使用委婉笔法批判“三面红旗”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这些文章明显地挖苦嘲笑现实生活中愚蠢可笑的东西，那一类东西的特点是主观主义、盲目瞎干、自欺欺人。所幸的事，这场浩大工程的结果并未公之于众，也未向上级报告。具体是什么原因，我记不清了。“文革”中，学生的模仿性行为相当普遍，有时其后果是可怕的。学生往往会按照上面作出的示范，自发地揭穿反对毛泽东的“大阴谋”。

这种大批判、大揭发很快就在学校形成高潮。开始是工作组部署的，但马上就一发不可收拾，整个学校成了大字报

的海洋。学校还专门开辟了大字报专栏，但根本不够用。墙壁、走廊贴满了大字报，最后只能在食堂里牵上绳子，形成许多空间。大字报首先针对我们的校长D，她是地主出身，1949年前为中共地下党员。从1963年大抓阶级斗争时起，她的背景使她开始失势。上级调来了X取代了她的党支部书记的职位，X的丈夫是市委官员。D的罪名很多，主要是“推行资产阶级母爱教育方针”，因为她赞成并提倡苏联教育学家的理论，认为教师应该像母亲那样关心学生，用一片爱心给学生温暖，学生才会接受教育。她的另一项罪名就很可怕了，即说她“招降纳叛、营造反动复辟根据地”。我国的政策一直是，本人成份有问题或家属出身不好的人，是不能到许多重要部门工作的。教育系统像一个垃圾站，把这种人收容起来。学校中自然会有不少政治背景不好的人，这既不是校长自己去招来的，更不是招来形成反党队伍的。学校总务处有个W，他曾为国民党营级军官，后随部队起义投降共产党，当时许诺他们归顺后就是革命军人，职务、工资等待遇与解放军同级官兵一样，但这一诺言根本没有兑现。他在总务处打杂，地位比一般教师低。“文革”一来，不但他这个“反动军官”的历史被重新抖落出来，而且与他毫无特殊关系的D校长成了包庇他这种“牛鬼蛇神”的“大红伞”。

我校教师中，挨大字报最少的是政治教师，她们全是党员，在学校一贯很红，是工作组的依靠对象。挨大字报最多的是外语教研组的老师，其中大部分是从前苏联专家的翻译，他们外语都不错。因为后来中苏交恶，他们派不上什么用场，而且他们政治上都有问题，即使还需要人，也有党培

养的新人取代他们，于是他们改行到中学教书。但是，他们受攻击最多，却源于自相残杀，你今天揭我，我明天批你，你今天写我一张，我明天回敬你一张，主要内容是翻历史和家庭问题。平时穿着入时、风姿绰约、受人尊敬的女教师，现在纷纷成了“资本家太太”、“地主老婆”，等等。在“文革”中，有一个专门称谓某些妇女的极难听的词，叫做“臭老婆”，指那些本人尚无大问题，但是丈夫是坏蛋的女性。如王光美就是被称为刘少奇的“臭老婆”。这个词后来成了一个政治身份或待遇。比如，某校一个女教师，一贯进步，找不出什么大问题。运动初期她贴了当教授的丈夫不少大字报，后来她看清楚了，不愿再贴。别人动员她时，她拒绝了，横下一条心表示：“我不写了，充其量你们把我打成臭老婆！”外语教研组有一教师 X，被称为老牌国民党分子，历史问题很多，按道理他应是众矢之的。但他可能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什么顾忌都没有了，同事写他一张大字报，他可以回敬好几张。他很会写，题目取得很别致，标题旁画些花边，很引人注目，文字也极其犀利。别人招惹不起他，他反而受攻击不多。

我们学生一边观看老师们相互攻讦，一边自己写大字报，但往往只是凑篇幅，没有什么要紧的东西。我们只能追求数量，以求攻击的火力不停。后来，我们干脆把所有老师排成队，三天或一周攻击一个，一定要有大字报贴出去。有人以为我会写那个批判过我的作文的语文老师的大字报，但我没有在此时报复他。但我后来被叫去替工作组归纳整理揭发材料时，发现他写过材料给工作组，他说我校副校长居然一直对我不错，可见不是好人。我读到这份揭发材料时不胜

惊骇，作为一个普通学生，与我交往都成了证明他人有问题的证据！这一发现对我打击之大，使我颓唐了好几天。我那时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学得烂熟，他在书中引用中国俗话说："谁个人前无人说，哪个背后不说人"。他教导人们，不要怕别人风言风语，不要怕误解、委屈，要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地工作。凭他的这番教导，我勉强使自己振作起精神。

除了大字报的文字讨伐，另一种升级的斗争形式是开批斗会，这比在大字报上被批判严重得多。大字报使你名声狼籍，当众出丑，而批斗会则使你当面蒙受羞辱，而且往往伴之以皮肉之苦。如果说一个学校大约100名干部、教师中有90名左右挨大字报的话，那么被批斗的范围大在10至20人之间。批斗会由工作组精心策划组织，批斗的时间、地点、会议规模，都由他们事先决定。更重要的是谁发言，集中攻什么问题。我发现，运动中整人有两个层次。第一是贴大字报或大会点名这样的批判，使你自感有罪，抬不起头，见不得人，因而急于表白，急于立功。另一种方式是，他们精心挑选出一些人，准备在运动后期作组织处理（如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下放劳动，甚至逮捕法办）。对这些人，大字报的批判和开会斗争的目的是要落实成为一份材料，最后报到上级，根据材料定性，并确定惩罚的程度。一般而言，这种书面材料的准备比较严肃认真，以防受害者翻案。斗争会表面上是大轰大嗡，实际上每一次都有明确的目的。开始是施加心理压力，让你感到自己民愤极大，而且所有的罪行都已被掌握，从而摧毁你的抵抗能力，然后要你逐项承认他们事先确定的问题。一切揭发、斗争，都是为了诱使你承认你不

愿意承认的罪名，以及他们怀疑你犯过，但尚未确切掌握的罪行，并要你自己提供对于那些罪行的证据。所以，斗争会之外，有时会辅之以忙碌的调查活动。这是一场复杂的攻心战，主持者往往经验丰富，他们会先布下迷魂阵，使你弄不清他们的意图，猜不透他们到底掌握了多少材料。有时旁敲侧击，让你心惊肉跳，自己乱了阵脚。如果你态度顽固，他们会在僵持不下时抛出一点你自己认为谁也不知道的材料，使你感到隐瞒毫无用处，还是彻底坦白为妙。当然，抛材料是最为复杂的艺术，抛的东西太轻，起不到震慑作用，抛得太多，又会让受害者摸到你的底牌。因此，斗争会的关键是所谓“知情人”。而谁敲边鼓，谁唱主角，何时张，何时驰，主持者都调度有方。

以上只是我开过几次批斗会，听工作组布署战略的一点体会。全部斗争手段，以及定案的程序和标准，肯定复杂得多，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对D校长的斗争会是校性的，会开到中间，以Z（高三学生，后为保守派红卫兵头头）为首的一些出身好的学生为了表示他们朴素的阶级感情已经使他们义愤填膺，冲上台去对D拳打脚踢。D是体弱多病的妇女，而Z会武功，她怎么经得住打？殴打之中，D戴的高帽子陷下来把她的脸全罩住了，这样她不但连些微躲闪都不可能，而且显然连喘气都困难。那种打法，不但是我从未见过的，而且根本是想象不出来的。那简直不是打人，而是打一个非生命物体，人打畜牲都不至于那么残忍。最后，他们把她从台上踢了下来，我吓得不敢再看下去。我不能想象，任何皮肉之躯怎么经得住这种暴打。那一段时间不少教师被打得脸发肿发黑，完全变了

形，根本认不出他们是谁了。我从未想到，人，高尔基说应该用大写字母来拼写的人，他们的脸和身体可以扭曲成那种模样。

三、"破四旧"

所谓"破四旧"，指的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如何破，中央没有说明。但在8月下旬，当北京的红卫兵杀向社会、摧毁文物古迹，焚烧艺术品工艺品，抓、打、监禁甚至杀害所谓阶级敌人和黑帮分子时，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代表毛泽东讲话时是大加称赞的。《人民日报》在8月22日一天同时发两篇文章，大叫"好得很!"并要广大群众加以支持。"文革"之后，人们一提起红卫兵，就联想到那些惨不忍睹的场面，在人们心目中，红卫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简直是青面獠牙，洪水猛兽。应该承认，在"破四旧"时，情况确实如此。

我从1966年7月份起到10月份4个月内，由于不是"红五类"出身，完全不能卷人运动。对于"破四旧"，我只有零星观感，而不能述其详。我当时十分反感，也有些恐惧。这并不是因为我未能参加进去而不肯有溢美之词。我当时认为，破四旧，首先应检讨和纠正自己头脑中的旧东西。而且，文化革命关乎文化，理当充分讲道理，怎么变成了最蛮不讲理的，无法无天的土匪行径?

我完全怀疑那些无法无天的举动果真是出于革命义愤。比如，有一天我走在街上，一群站在路口的红卫兵叫住一位

走在我前面不远的年轻女性，叫她跟他们走一趟。那位妇女大惑不解，但脸色已经变得苍白。我那次故意停下来，站在一边，想看个究竟。过了几分钟，她从他们的执勤站中出来了，裤腿从底部被剪到上端。她根本无法行走，甚至无脸见人。这是当时最流行的破四旧方式之一：剪小管裤。这算什么革命，这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侮辱妇女吗？

在破四旧中，最令人胆战心惊的莫过于抄家了。一个城市中成千上万的家被抄，这显然是破天荒的。那时学生中一般都有这种心理，每当从学校回家时，离家愈近愈感到不安。快到家时，远远望去一大堆人围在那里，心中愈感不妙，甚至不能决定是否再朝前走。当然心中也怀有一丝侥幸：“可能抄的不是我家！”走近一看，如果不是，则顿时释然。但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终于有一天会发现红卫兵光临到自己家中。我那时已没有父母了，不存在家被抄的可能，但几乎每天回去，总能看到院里或近邻总有一两户正在被抄，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一下子笼罩了全身。有时，半夜里突然被一阵闹声惊醒，分不清敲门声到底发生在哪里，心想，该不是他们弄不清楚，错抄到自己家里来了？

抄家的名单一般是派出所或居委会提供的，他们掌握着居民的档案材料，指点红卫兵行动。有时，也有别的因素搀杂进来。比如，有时某家的情况模糊不清，属于可抄可不抄之列，但如果一个穷苦人出身的邻居平时与你有隙，或者嫉妒你家住房宽敞，想使你倒霉之后挤占你家一两个房间，这时他就会分外积极，主动把祸水引来，甚至谎报情况。在那段时间，我曾见到红卫兵贴过一张告示，宣布被他们抄了的那家不属抄家对象。但这显然属于绝无仅有的一例，在那不

讲道理的时候，根本不存在该抄谁、不该抄谁的标准。只要红卫兵愿意，哪会有抄错的？

被抄家会蒙受巨大的损失和痛苦，但不仅于此，还有十分痛苦的事情等着你。这就是，你必须到学校去报告你的家被抄了。你有义务讲清楚，为什么家会被抄，你对这件事的态度和认识如何。我本来以为我的班上出身不好的同学占少数，除了出身好的和不好的，大部分家庭都没有问题。但那段时间只见一个又一个同学几天前还若无其事，突然间就哭丧着脸，躲在一边羞于见人。我马上就可以判断此人家被抄了。我很奇怪，怎么运动一来，那么多家庭都有了问题？

有时，抄家会伴随着斗争会。我校高三一个男学生 L，工人家庭出身，曾主持抄家和批斗会，将本校一位同学的母亲活活打死。这位同学上高一，据说她的父亲是资本家。她的母亲在批斗会上力图与红卫兵讲道理，结果遭来棍棒毒打。在打人时，他们令该同学和她父亲、弟弟妹妹站在一边观看，不准离开。他们一直站在那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妻子被打得倒下，直至被打死。他们亲眼看着，既不能抢救，也不能哭喊。在场观看的人很多很多，他们也就看看，看看一个活人被打死。

8 月底，我曾到过一座天主教教堂，观看被破坏之后的场景。那是在成都市平安桥，一个地处市中心但异常安静的地方。我校红卫兵和九中红卫兵前一天共同抄了这个教堂，我第二天去看是怎么回事。刚走进大门，几个修女从跟前走过，她们身罩长袍，只露出脸的正面。我记不清那些眼神是惊惧还是无动于衷，总之显得颇为奇特。她们走动很快，但没有一点声音，宛如一群幽灵在我面前飘去。进厅堂去一

看，遍地是金属片，五颜六色的玻璃，以及撕坏了的书籍。厅堂前方有一拐弯楼梯，拾级而上可以到达一个平台，那里原来安放了一架其大无比的风琴，但现在已经完全砸坏，只剩一个空壳。地下闪光的金属片和散乱的琴弦之多，令我惊讶。我当场就在那里遐想，它本来是一架多么庞大而富丽堂煌的琴，用它来演奏弥撒曲，那声音该是多么宏大和雄浑。但是，它不复存在了，对这么一架罕见的琴，姑且不谈它的声音多么不同凡响，就凭它珍贵的价值，也难以想象还有什么人下得了手向它砸去。耶稣像早已打得粉碎，但漏掉了角落里的一尊小像。耶稣骨瘦如柴，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面部表情又痛苦，又庄重。不知他是否正凝视着我，凝视着人间的苦难？昨天，不知他是否亲眼目睹了这一幕？我生长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度，从不熟悉宗教，对教堂、对耶稣不存在特殊感情。但那天的气氛，杂乱中有庄重，破坏中有谴责。我的心出乎意料地混乱和沉重。我心里闷得慌，不知想哭还是想叫。我转身走了出去，耶稣受难的形象留在脑海中久久不能消失。

我的朋友 M 的家被抄了，红卫兵冲到他家，发现四壁空空，根本没有什么好抄的。M 当时在场，他对红卫兵说："我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你们抄得对。你们看还有什么要帮忙的，我可以协助。"他这种无可挑剔的态度，使红卫兵无话可说。其中一个头领说道："你这种态度还差不多，不然，你免不了挨揍。"他们把 M 的父亲捆起来，在抄家的过程中一直强迫他跪在一边。抄家结束时，掴了他几个耳光，然后扬长而去。

我和 M 的父亲很熟，很关心和同情他在"文革"中的

遭遇。因为M说过他父亲曾任国民党的少将，我以为会看到一个身材高大、威风、严厉的人。但第一次到M家去，我简直被他家的凄凉、破败震惊了。那是一间大约8平方米的破房间，除了两张小床，一张桌子，几个破箱，房间里几乎没有家具。房门前的屋檐下，一个煤炉，一张破桌，就是他们的厨房。房间里很暗，我定睛看了好一会，才发现M的父亲是一个脸色死白，身子伛偻，说话、行动哆哆嗦嗦的老人。他刚见到我时眼神很惊恐，我们谈话时，院里一有人高声吆喝，他就显得很不安。后来，我和他逐渐熟悉，他的话也多了起来。

他是三十年代的留法学生，到巴黎后，读书之余也卷人政治活动。他是站在国民党一边，在巴黎的中国学生游行、集会时，常常与共产党人辩论、争吵。他学成归国后做了国民党的大官，但不属于嫡系。在国民党败退时，他留了下来，准备投降共产党，然后和共产党一道建设国家。但没有想到，他被逮捕了，判了8年刑。他似乎始终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我是真心诚意向共产党认输的。你看，在西方国家，不同党派的政治家为了掌权也闹得一塌糊涂，但大选结果一出来，失败的一方就承认败局，与赢家握手。如果愿意，也可以在胜利者手下工作。我虽有军衔，却是文官，没有和共产党打过仗，也没有贪污等劣迹。我想对共产党人说：'事实证明，你们对了，我错了，我在政治上甘心认输。以后就照你们的主张办，让我们共同建设国家！'"我觉得他的想法很有趣，照我们所受的教育，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哪能像他想的那么便宜。

抄家时，红卫兵搜出一张M父亲以前穿军服的照片，

我是在一个阶级斗争教育展览上看到这张照片的，它成了他坚持反动立场，妄图复辟变天的证据。抄家之后不久，他又被投入监狱，判刑 12 年。罪状共有两项，第一项是“一贯坚持反动立场”，红卫兵搜出的照片是证据。第二项罪名十分可怕，是“破坏生产毛主席著作”。原来，M 的父亲迫于生计，在街道生产组参加劳动，干书籍装订活。“文革”中，主要装订《毛主席语录》。有一次，有人发现待装订的语录本有几页丢失，事情被判定为有反革命分子破坏毛著的生产。生产组中，M 的父亲问题最大，于是理所当然地成了罪人。由于父亲既是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M 和他的妹妹下乡之后，根本不可能回城工作。

红卫兵抄家并不是统一组织的，如果你家有点名气或处在方便的地理位置上，那么几个互不通气的学校会分别来几批红卫兵。据我所知，最多的有被抄七八次的。遭到这种洗劫，家中恐怕剩不下什么东西了。

那些有资格去抄家的同学样子很快就有了改变。一般左右手腕上各戴一只手表，甚至戴上一排。女同学身上有许多别致的绣花手帕，这些当然都是抄来的。他们夜以继日地出击，面带倦容，声音沙哑。他们开始时趾高气扬，后来变得冷漠和不耐烦，以不屑一顾的口气提到刚抄了一个大人物的家，做出见惯不惊的样子。与我同班有个男生 Y，是专干此事的红卫兵头。他偶尔回到教室，纡尊降贵似的与我们这些正在学毛选，读社论的人聊上几句。他一会儿掏出一个金怀表晃晃，嘴一撇说：“不值钱！”一会儿掏出一件小玩意，满欣赏的样子说：“好玩！”过一会儿，与我们慢悠悠地摆谈，漫不经心地回顾说：“我上次到 L 家，好像觉得他家毛皮货

挺多似的。对，是这样的。好，明天去抄他家，到底还能拣几件像样的东西!”天哪，L就是我们的同窗啊，怎么一心血来潮这种事就决定了？我听得毛骨悚然。他脸上泛起一阵笑容，就像猫在老鼠群中，虽然并不伸出爪子，但仍能感到自己的威力一样。

四、大串连

全国大串连始于8月份，一开始是官方有计划、按步骤组织进行。我校有几个学生有幸被遴选入京，走后若干天，他们发回一封令全校师生员工激动不已的电报：“我们在×月×日××分见到了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电报在广播中反复播送，电文从一个班传到另一个班。“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在校园内激荡。大家充分分享他们的喜悦和幸福，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代表。

大串连也给成都市民带来震动，他们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北京的学生串联到了成都，他们到各个学校去煽风点火，号召大家起来造反，揭发批判本地区、本部门领导，他们将其一律称为“走资派”。更骇人听闻的是，他们在街头刷出“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大标语，有时这种标语写得更刺激人：“万炮齐轰西南局，烈火猛烧省市委”。我每天上学经过羊市街，那是成都市委所在地。一天忽然发现市委门前贴了一副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忘八多。”横批大概是“一帮混蛋”。和全市大多数人一样，我对这些东西接受不了。如果说当地党的领导在运动中犯了错误，这是可以

接受的。但“炮轰”、“火烧”，这不成了打倒吗？在中国，还从来没有见过明火执仗要打倒党的领导的事。至于市委门前那副对联，则简直是污蔑性的谩骂了。

当这些北京来的学生在街头宣传时，他们理所当然地受到诘问，甚至围攻。我想，这种抵制显然大多数出于自发，虽然马上就有揭发，说当地党委组织干部和工人围攻北京南下学生。那些学生显然有来头，他们虽然拿不出太多的证据说明西南局、省市委领导犯了大错误，但他们是一副胸有成竹、有恃无恐的样子。不知是谁发明的，人们普遍地称他们为“救世主”，“太上皇”，指责他们不作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大放厥词，妄图指导四川的运动，而不把当地群众放在眼里。人们引证《国际歌》歌词，宣称要踢开救世主，自己解放自己。

后来，逐渐有少数当地学生支持北京来串连的红卫兵。于是白天黑夜，满城都是成堆的人在辩论，中国的老百姓还从来没有这样大规模地卷入到政治争论之中。我对辩论也很感兴趣，常去观看旁听。按照当时的习惯，谁要发言都得先报告自己的家庭出身。如果有出身不大过硬的人不揣冒昧要发表见解，人们就一阵叫喊，轰得他只能缄口不言。

过了9月，学生外出串连完全乱了套，学校中许多人都走了。但学生出去串连，除了需要自己的学生证之外，还需要校文革出具证明。出身不好的人不给开证明，我不想自讨没趣，就一直呆在学校。到了10月底，一天M突然兴冲冲地来找我，叫一起出去串连。他居然弄到了一纸证明，虽然上面在他名字后面加了一个括弧，赫然注明“家庭出身系旧军人”。我犹豫再三，后来经不住M一再撺掇，只好硬着头

皮去讨证明。没想到没费什么周折，我就拿到了证明，而且管公章的人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后，还通情达理地未给我注上“家庭出身不好”的字样。

我们高兴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急忙准备背包、钱和粮票。去哪里？当然最想去北京。但听说去北京的人太多，已经下令不让再去。我们到火车站，在人山人海中奋力拼搏了半天，搞到了去哈尔滨的车票。我们想，这可能是此生唯一的机会了，干脆去个最远的地方，从西南直奔东北。另外，我大哥在东北，一般情况下要想见面是不容易的。

火车一路晚点，但我们的兴致一点不减。列车广播中，不断说这是满载红卫兵小将的火车，正在驶向北京。M 明显地心虚，他几次悄悄问我：“我们也是红卫兵吗？”全然是混人革命阵营的感觉。我告诉他，广播当然是一概而论，但肯定不致于有人一个个验明正身，把非红卫兵赶下火车的。火车愈接近北京，广播中愈是频繁地称我们为“毛主席请到北京来的客人”，这话真叫人受宠若惊。

列车是晚上到北京的，脚一踏上北京的大地，似乎感觉都与平时完全不一样。要知道，这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世界革命的中心啊！我们本来认为只是在这里换车，然后去哈尔滨。但根本不是这回事！一辆辆大客车有条不紊地把刚下车的学生接到各个接待站。当汽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时，大家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我和 M 极为幸运，住地离天安门很近，大概是邮电部的一个招待所。接待我们的干部给了我们很好的印象，对我们的招待周到细致，口口声声称我们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说一定要全心全意为我们服务，以使我们取好革命之经，然后回到各地干革命。这里吃饭不要钱，只

收粮票。

我们当然不是来北京观光看景的。我们每天早早地外出，主要去北大、中宣部、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去抄那里的大字报，这就叫为革命取经。当时天已变冷，我们在寒风中不断跺脚，不时向手掌上哈哈热气，这样抄了几大本大字报。使人颇感困难的是交通太拥挤，候车的队伍排得像长龙，有时得等两个小时才能上车。

在北京取到的经，与其说给人以启发，不如说令人困惑。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张大字报抄录了一份中央文件，那是中央批转的林彪讲话。林彪在讲话中说当前世界政变成风，中国也不例外，有人要搞政变，要杀人。毛主席日夜思虑的，就是调兵遣将，防止政变。我从未料想到，这种被誉为“重要的马列主义文件”的讲话，是这么凶神恶煞。也想不通国家的政局怎么这么凶险。这和我们历来对于上层领导的设想大相径庭。另外，林彪还说，马列主义的书太多，读不完，而且离我们太远，不必去读。毛泽东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明得多，要用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读毛的书。这种提法也叫人大惑不解，我觉得林彪的话味道不对，与通常理解的马列主义不同，难道这就是最新的马列主义？

在北京住了将近一周时，一天上午，接待站工作人员突然叫我们下午早一点返回，说有重要事情通知。我们猜想，说不定有中央首长接见，M更大胆地猜测，有可能见毛主席。我不相信，说哪有这么好的事？晚上召集大家，果然通知第二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小将。我做梦都没想到有这等好事，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

然后是仔细交待各种注意事项，第二天凌晨3点钟就起床，早餐比平时丰盛，每人还发一份干粮。来了许多军人，他们参加在学生队伍中，担负指挥和组织工作。临行前叫大家搜身，不许带水果刀，不许带照相机。那些军人特别友好，又极有经验，他们告诉我们，见毛主席第一要注意的是把鞋系好，鞋带系牢之后最好再用绳子死死捆在脚上。因为到了天安门广场会很乱，不少人的鞋子被踩掉，他们去顾鞋子，就把看毛主席的机会错过了。他们还告诫说，看到毛主席后，就应赶紧疏散，尽快离开那一带，以防身体受伤。

我们在一条大街上等啊等，冷得直跺脚。虽然不停地唱歌，集体朗诵语录，但时间仍然过得太慢，发的干粮很快就吃完了。在接见之前，一个军人又告诉我们一条至关重要的经验。他说，游行队伍后浪推前浪，在天安门城楼下经过的时间很短。很可能你一不留神，还没有来得及反应毛主席在哪里，队伍就过去了，这样痛失良机，会留下终生遗憾。他传给我们的经验是，在接近天安门时，就得引颈遥望，盯住那个身材最高大的人，一直盯着，不要间断。待距离最近时，你可以好好看上毛主席几眼，留下深刻印象，心满意足而归。

接见终于开始了，“东方红”乐曲声直冲云霄，一男一女两位电台播音员以极标准的普通话和宏亮的声音高呼口号，万众一片欢腾。林彪代表毛主席讲话后，我们的队伍开赴天安门。到了长安街，命令我们每50个人手挽手成一横排，这种队伍横列起来有10个以上，显然，靠南边队伍中的人根本无法看清天安门城楼上站立的人。队伍迟迟不能前进，原来，人们一走到城楼下就不肯再走了，要把毛主席看

个够。此外，毛主席不时要退回去休息，未见到他的人当然不甘心虚行一趟，就挤在广场上不走，而且齐声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等得心急火燎一般，这时陶铸说话了："同志们，今天是无产阶级革命大军的检阅，也是对大家的共产主义风格的检阅。希望大家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尽快通过广场！"

我们的队伍终于接近广场了，这时我的心开始剧烈跳动。我按照军人传授的经验，在城楼上人群中挑一位最高的人盯着，目不转睛，把一切最虔诚的心愿和最热烈的祝福寄托在这个高大的身影上。但到距离最近时，我发觉事情有些不对。那个个子最高的人似乎在跑动，甚至弯着身子急速地后退。这不会是毛主席，主席怎么能在天安门城楼上这般行动。突然间，我明白了，这是摄影记者！毛主席在哪里呢？慌乱中我根本无法再去辨认。我从幸福的顶峰一下子跌落到失望的低谷。

这时广场上秩序大乱，我和 M 早已失去联系，我身不由己，随着人潮涌来涌去。也好，我可能还有机会见到毛主席。等我能立住脚观察四周时，我发觉场面完全混乱不堪。许多人的鞋子都被踩掉了，有些人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把掉在地上的鞋捡起来朝天上扔。广场上空始终有一大片鞋雨，晃眼望去，像一大群蝴蝶翻飞，也像一大群乌鸦扑腾着翅膀。我感到愤怒和难堪，这哪像见毛主席的样子？我还替摄影记者担心，那鞋雨始终不断，他们怎能拍出像样的镜头来？每次检阅之后，都有一部记录片在全国放映，这么糟糕的局面，以后怎么向全国交待？

人流把我推向金水桥，近距离看毛主席的机会到了。但

我开始站立不稳，几次要被挤倒在地。而且，紧贴着我的是一个瘦弱女孩，她看来快要支持不住了。我不能见死不救，我使劲抓住她的双肩，帮她站稳。她回过头来看过我两次，这大概是一个从贫瘠地区来的小女孩，穿着简陋，皮肤粗糙。她的眼光，好像不是感激，而是惊惶。等我和她被人群冲散时，我已到了天安门广场西部。

回到住地，管理人员火速登记，安排每人第二天返回原地的火车票。他们说，这一天的接见是最乱的一次。这次共有两百万人参加，但只来得及接见其中一半的人，未见到毛主席的学生继续留在北京，等下一次接见。这一次是伤人最多的，救护车送了许多人去医院，有的人可能有生命危险。

这次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我内心有一种不安和自责。我在广场上并没有达到热泪盈眶、热血沸腾的地步。而在此之前，我看每一部关于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电影，镜头里的红卫兵莫不是如醉如狂欲仙欲死。但我那天的表现和感觉怎么和原先设想的大不相同呢？莫非是我对毛主席的感情还未达到应有的程度？我不能深想下去。

不管怎样，我也成了受过毛主席检阅的人。从此之后，我可以理直气壮地称自己为红卫兵了，我可以像一员“革命小将”那样行事了。

徐友渔　成都一中高三学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人员。

陶铁柱

“联动”与共产主义小组

文化大革命狂飙骤起，作为发动者的毛泽东却悄然离京。

为了控制各校运动形势，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负责人决定派出工作组，但工作组立即与一部分师生处于尖锐对立中。

毛泽东于1966年7月下旬突然返回北京，愤然批判派工作组的作法，指责他们镇压了学生运动。

7月28日夜，驻各校的工作组突然奉中央指示全部撤离。

第二天，根据工作组撤离前的要求，我和罗建军作为北京五十四中“坚定左派”的代表，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北京市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

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就派工作组问题作了检查。

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向东小组写信，支持他们的革命造反行动。从此，红卫兵运动像被注人了一剂兴奋剂，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8月11日，我们一群由一些中学“文革筹”头头组成的“北京红卫兵北上小分队”，开始外出串连。

(一)

1966年9月3日，北京开往莫斯科的1次特快，披着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夜色，徐徐开进了中国边陲小城——海拉尔。

我们“北京红卫兵北上小分队”已在此恭候多时了。

站台上摆满了各种颜色的油漆、毛泽东画像、用汉英俄蒙4种文字印制的反对“苏修”的传单，以及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俄蒙文版小册子。

列车刚一停稳，车门刚刚打开，外国旅客还没有来得及下车呼吸一下大草原的鲜空气，我们便或挤在车门前，或围拢在车厢附近，迫不及待地展开了我们的“反修”行动。

胖敦敦的林东红灵巧地窜进车厢，不由分说地就去张贴毛泽东画像。苏联女列车员先是吃了一惊，不知她要干什么，后来也不甘示弱，愤怒地把画像扯了下来，撕个粉碎。

“你敢撕毛主席像?!”林东红大吼着。

女列车员不懂得汉语，嘴里不断地用俄语骂着：“土匪!”

林东红只管大块大块地刷浆糊，一连又贴了两三张毛泽

东画像。女列车员忍无可忍，挥手给了她一耳光。林东红跳了起来，扑到女列车员身上，和她扭打成一团。

帅府园中学的王保尔、陈其健和女四中的严静等一群人，沿着包厢外的走廊，散发传单和小册子。外国旅客的态度不一，有的恭恭敬敬地拿在手里，装做认真阅读的样子，一看便知，他们是日本人；有的连看都不看，拿到后就像扔废纸似地扔到窗外面，一副不屑一顾的模样，估计他们是俄国人。

车下也是一片忙乱。小分队的头目、北京100中的李建军领着一帮人，用大排笔刷子和各色油漆，往车厢上刷着大标语。几个身材高大的红卫兵和几个俄国人推推搡搡，吵吵闹闹，不许他们干涉我们的"革命"行动。

还有一些人把车站变成了演讲中心，在三五成群的外国人的围拢下，慷慨陈词地发表着"反修"演说。

此时，我正站在一节车厢门口，和一位苏联女列车员进行激烈辩论。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苏联列车，不是中国列车。滚开！"

"苏联列车？可它行驶在中国领土上。我们这是在进行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你们要反对革命吗？"

我接着说，苏共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是叛徒集团，背叛了十月革命，正在欺压苏联人民。你们是列宁的故乡，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敢于起来造反，推翻修正主义的反动统治。

她则反唇相讥，说毛泽东是农民起义领袖，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反共反苏，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空前耻辱。

她拿着一份《真理报》，给我读了一段："中国领导人的反苏运动带有极大的挑衅性质，纯粹是流氓行为……"

我奋力反驳："《真理报》无真理！"

她毫不退让："中国的文化革命在消灭文化！"

外国记者像救火似地跑来跑去，镁光灯闪个没完，录音机转个不停，还可以听到他们用小打字机"啪啪"打字的声音。

列车已经停了两个多小时，早就超过了10分钟的正常停车时间。

站长又来找李建军说，"现在该放行了吧，再不放行，责任我可承担不起……"

"不能这么便宜了苏联，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大家异口同声，同仇敌忾。

"拿油漆把车厢那一面全刷上标语，上车把没有散发完的传单、小册子全都散出去！"我说。

"别再用汉语写了，写了那边也看不懂，顶个屁用！红涛（我在"文革"中用的名字），你俄语好，你就带人去写吧！"纷乱中，不知是谁提出了这个建议。

我和一些小分队员拿起油漆筒和排笔刷子，绕到列车另一面，在车厢上写满了这样的标语：

"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打倒勃列日涅夫、柯西金！"

到了下半夜，列车总算又开动了。带着花花绿绿的标语，带着斑斑点点的传单，像一只受伤逃窜的野兽，消失在大草原的茫茫黑夜中。

再有一站，经过满洲里，它将离开中国国境，行驶在西

伯利亚的旷野里。但后来听说，这趟列车并没有直达莫斯科，刚进入苏联国境，就被苏边防军扣住。苏方费了几天工夫才清除掉车上的标语和传单，有几个"失职"的列车工作人员还遭到逮捕。

回来后，我们召开了全体队员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有人批评我和李建军："你们当头头的也太软弱了，苏修打人抓人，咱们刷几条标语就算完事了？你们还有点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吗？"

大家一致决定，7日再搞一次行动，然后赴满洲里，传播"文化大革命"的火种。

6日，海拉尔市委的同志领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中共华北局书记华山。他转来了一份党中央给我们的电报。电文是：

"你们反修精神很好，注意斗争策略。"

我们一一传看着电报。华山问："你们下一步有何打算？"李建军讲了我们的计划。华山说："我代表华北局支持你们的反修行动，但这一次你们要事先请示中央。"

大家议论纷纷："反修还用得着请示中央啊？"有人对电报感到迷惑不解："又是'很好'，又是'注意策略'，是表扬还是批判？"

华山拐弯抹角，对具体问题一概不明确答复，只是坚持让我们在行动前请示中央。

我们商量了一会儿，决定边准备，边请示。

7日，在海拉尔市委的帮助下，一切准备工作就请，但到下午还没有和中央联系上。晚上，他们都去车站等候国际列车，留下我再做最后努力。

我在市委招待所给北京挂长途，要求直接接通周恩来。电话员颇为傲慢地问："你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找周总理讲话?!"我大发脾气："我是北京红卫兵，现在在海拉尔，有重要情况向周总理请示。如果你不给接通，过一会儿发生了国际事件，中央不知道，责任要由你完全承担！你敢负这个责吗?"

这时周恩来正在中国科学院万人辩论大会上发表讲话，听说有紧急长途电话，马上离开会场去接。

"您是周总理吗?"

"是啊，我是周恩来，你是哪一位?"

"我是北京红卫兵红涛，我们小分队正在海拉尔串连。前几天我们拦截了苏联的国际列车，造了苏修的反……"

"中央派华山同志送给你们的电报，收到了吗?"

"收到了。"

"毛主席、党中央认为你们的反修精神很好，你们这一代大有希望，如果你们能够认真总结经验，不但敢于革命，而且善于革命，提高斗争水平，你们的反修斗争就会取得更大成绩。"

"我们打算再搞一次拦截行动，小分队的同志们已经到车站去了，留下我向您请示。"

"我的意见，你们可以在车站上贴大字报，喊口号，不要到列车上去，那是他们的列车，你一闯，他们就说你侵犯他们的主权，这样就会发生国际纠纷，他们就会提抗议，还会发生上次他们绑架之类的事情。希望你能够马上把我的意见转达给小分队的同志们。"

我立刻给在车站的李建军打电话，向他讲了总理的意

见。他和身边的几个人商量了一会儿，对我说："现在苏联的列车已经到达，我们正在车厢上刷标语，有人在车上演讲和散发传单。我们的意见是，苏修上次绑架了我们的人，这次我们不能轻饶了他们，否则他们就会认为中国红卫兵软弱可欺。你问一下总理，他的话代不代表毛主席，如果代表，我们坚决执行，马上撤下来。再问一下，车站为什么来了这么多解放军?"

"来了解放军?"

"是的，刚才来了几卡车解放军，现在正在铁路沿线放警戒线。"

我又给总理打电话。周恩来说：

"中央今天上午讨论了你们的行动计划，我刚才的话当然是代表毛主席说的。你们能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很高兴。部队是我派去的。你们上次不是受苏联欺负了吗?毛主席让派部队去保护你们。这次我们再也不能容忍发生苏修绑架这种事情了。你们最好10日前赶回北京，我要开会欢迎你们。"

9月9日，我们小分队一行20多人回到北京，国务院派车把我们接到中南海。

第二天晚上，我们到政协礼堂，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首都中学红卫兵第二次座谈会。

穿着草绿色军装的周恩来，指着我们向在场的上千名红卫兵说：

"我来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海拉尔的反修小英雄。他们同苏修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现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回到北京来了。让我们热烈欢迎他们胜利归来!"

下面掌声雷动，我们十分激动、兴奋。

会后周恩来在会客室里单独接见了我们。他微笑着和小分队队员一一握手，称赞我们的革命精神。当和我握手时，他问："你叫什么名字?"

"红涛。"我回答说。

"红涛? 噢，我们在电话里早就认识了。你很厉害啊，用俄语和他们辩论了两个小时。你是小分队负责人吗?"

"我和李建军都是，他是正的，我是副的。"

"你是哪个学校的?"

"54中的。"

"听说你们是北京最早到外地串连的一支红卫兵，8月11日出去的，对吧?"周恩来说。

大家都笑了。

周恩来和我们都坐了下来，我们开始汇报拦截国际列车的情况，提出了当时无法理解的问题：比如，过去我们认为党内"走资派"只有极少数人，这次我们看到沿途各省市的领导都成了"走资派"，要是这样，我们党岂不是完全变质了吗? 我们还谈了对东北、内蒙"文化大革命"进展的看法。

周恩来的表情变得严峻起来。他沉思了一会儿，说："你们反映的情况很好，也很重要，有些情况中央还不知道。现在运动刚刚开始，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对有些问题，我们还要看一看，不急于下结论。你们可以把有些情况写成材料向中央汇报，交给余湛同志。"他指着坐在身边的余湛说："这就是余湛同志，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就让他来担任我和你们的联络员吧，以后有什么事情，可直接找他，让他

转告给我。"

大家鼓掌表示同意。

接见结束时，周恩来和我们合影留念，还指示新华社记者说："照片冲洗出来后，发给他们每人一张。"

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三次检阅红卫兵。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我和李建军上了天安门城楼，其他同志在西二观礼台上。毛泽东在城楼上接见了我们。周恩来介绍说："他们就是来自海拉尔的反修小英雄们的代表。"毛泽东微笑着和我们握手。

我们小分队的声誉已达到了顶峰，许多红卫兵都跑到我们的驻地——南河沿111号来打听拦截国际列车的情况。周恩来和我们合影的照片、海拉尔市委送给我们每人一双崭新长筒马靴、以及我手里那张进出边境地区证明，都让他们羡慕不已。

苏联对这次事件有何反应？我很想知道。有一天我到外交部，碰到苏欧司的老刘，他一见到我，就拍着我的肩膀说：

"你们这些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家伙啊，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大了！事情没过几天，苏联大使就来提抗议。我们绞尽脑汁，答复说，这次事件是民间所为，而不是我国政府所为，为此我国政府不能接受贵国政府的抗议。苏联大使气得不得了，'啪'地一下把抗议照会摔在桌子上就走了。你不是想了解苏联的反应吗，来看看这份《真理报》吧！"

我拿起报纸一看，苏联塔斯社在醒目的标题下报道了我们拦截国际列车的消息，骂我们是"暴徒"、"流氓"、是"一批反苏小丑"等等，还附了一张我和苏联女列车员辩论

的大照片。

(二)

1966年9月底，国际列车事件之后，我们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来到了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

10月22日，我和北京女四中的康彪回到北京。北京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横扫“四旧”之风似乎正在过去，接踵而来的是揪斗工作组和各部门党组织的负责人。

有人告诉我，蒯大富的“三司”还准备点名批判刘少奇，这使我猛然想到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就派工作组问题做检查时的情景：周恩来做检讨，刘少奇则反复说，文化大革命属新生事物，他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莫非那个时候就埋下了批判刘少奇的伏笔？

半个月后，康彪来看我，一见就问：

“听说你挨斗了？”

“是的，挨斗了。过去我斗人家，现在人家斗我。”我强打着精神回答说。

“昨天外贸部在北展召开了批斗林东红她爸爸的大会，我去看了。别的学校许多‘文革’筹委员和红卫兵头头也都挨斗了，各校还在揪斗工作组。”

“斗、斗、斗，这几天我听到的消息全是这个挨斗，那个挨斗。连我们学校的工作组长都被斗得自杀了。工作组有什么错，他们当时不也是执行中央指示吗？怎么能出了问题

让工作组和我们兜着?”我有点气急败坏了。

康彪沉思了一会儿，说：

“问题不那么简单，那帮人有中央文革和江青做后台，可能还有更大的后台。”

“更大的后台？你指的是谁？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我大吃一惊。

康彪斜视了我一眼，并不正面回答：

“不管是谁，反正我们不能被动挨打，束手就擒。鲁迅说过：‘沉默就是死亡，战斗以求生存。’我们要组织起来，同他们对着干!”

“好吧，我同意你的意见，组织起来同中央文革和“三司”这帮混蛋们对干。可是这需要有人，还需要纲领和宣言，另外还要给这个组织起个响亮的名称……”

“这就不用你去操心了，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组织，叫‘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现在就等着咱们去参加了。”

说着，她递给了我一张传单，上面写着：

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1966年10月1日在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的直接指示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的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 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两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好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贯彻，保证中央和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2. 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种反动造反组织。

3. 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中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4. 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5. 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和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指示。

……我们一定要英勇、忠实、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种工作，迎接大反攻战机的到来。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白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许多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

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子被监禁、监视和失踪……人民盼望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我们庄严地向全人类和所有的敌人宣告：我们……流鲜血、受迫害何所畏惧，我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

"这上说是在中南海怀仁堂成立这个组织的，他们怎么进的中南海？"我问。

"是中南海的革干子弟用父亲的汽车把他们偷偷拉进中南海的。"她答。

"这个组织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

"目前还是秘密的。"

"你参加了吗？"

"当然参加了，要不今天我怎么能来找你谈？！你参加吗？"

我沉思了片刻，说：

"参加！"

"那好，从今天起我们就是反中央文革这条战线的战友了。我们誓言是，活了干，死了算，绝不回头！"她语气十分坚定地说。

"联动"的成立，给处在困惑、愤怒和压抑之中的干部子弟树起了一面旗帜，他们似乎一下子看清了方向，迅速集结在这面旗帜下，以前所未有的亡命精神，在北京掀起了反对中央文革的阵阵浪潮。在天安门广场，在王府井大街，"联动"署名的大标语处处可见：

"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

"中央文革炮制了一条新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联动敲响了中央文革的丧钟!"

"坚决保卫革命的老干部!"

12月初，在北京政协礼堂又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听说江青要在这次会上宣布什么重要决定，而这个决定又和"联动"有关系，我们不少人都去参加了。

刚走进会场，我们就发现不对味儿，怎么这里的气氛一片杀气腾腾？两侧的墙壁上还悬挂着巨型标语：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坚决打倒联动!"我们个个都穿着旧军装，表情十分严肃，见面时点头示意，好像是互致问候，又好像是表示自己已经做好了决一死战的准备。看到那两条刺目的标语，都抛下鄙夷的目光。

江青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她盛赞蒯大富的"三司"和中学"受压分子"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立下的汗马功劳，历数首都红卫兵东城纠察队、西城纠察队、海淀纠察队在破四旧时犯下的罪行。然后，这位我们昔日爱戴的"江青阿姨"，话锋一转，终于露出了杀机：

"革命小将们！最近他们成立了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对这些反动的、丧心病狂的小家伙们，我们能手软吗？不能！绝对不能！对他们手软，就是对革命的犯罪！我今天代表中央文革郑重宣布，联合行动委员会是反动组织，我们要对这些反动的小家伙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这时坐在台下的30多个"联动"，好像听到了一声无声

命令，“唰”地一下子从口袋里拿出联动臂章（用3寸宽无字的红绸子制成的），套在左臂上，又“唰”地一下摘下他们的军帽，露出剃得贼亮的光头，在灯光下闪闪发亮，接着又“唰”地一下全体起立，昂首挺胸，迈着整齐的军人步伐，愤然退出会场，以示抗议。

全场被这戏剧性的场面惊呆了，鸦雀无声。江青也瞠目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好大一会儿，她才缓过劲来，大声说：“大家看看，他们竟敢公开对抗，有多么反动……”

“打倒‘联动’！”会场上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我们这些剩下的“联动”分子也终于忍无可忍，站起来退出会场。

我清楚记得1967年的元旦那一天是怎么度过的。整个北京笼罩在恐怖之中，没有一点儿节日气氛。晚上，我们在东单修女院的地下室里，听到电台里广播《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说：“1967年将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心情格外沉重、愤恨。

那一天，在中央文革的指挥下，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数十万人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大会。

那一天，王府井大街贴满了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和漫画。

那一天，彭真、陆定一和罗瑞卿受到残酷批斗。

那一天，我们还听说造反派们要更改国名，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公社”。

然而，我们那一天的全部念头却是：如何同中央文革斗

下去?

1967年1月11日,“联动”第六次“冲”公安部,这是它所组织的规模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反抗中央文革下令捕人的示威行动。

那天晚上,成千上万的“联动”分子、“亲联分子”来到天安门广场,加上许许多多围观的群众和夹杂在人群当中的“三司”分子,广场上已汇成人的海洋。

这次行动的总指挥部设在天安门西侧的北京二十八中,几个“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中学生指挥着这个注定要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被当作“罪行”或“功绩”载入史册的反抗行动。

他们在一间小办公室里,围着炉火发号施令,研究着事态的可能发展,做好了被捕的充分准备,个个沉着、冷静、坚定、义无反顾。

指挥部和广场之间的联络人员,来去匆匆,川流不息。

晚上8时许,部分人开始向公安部靠拢,纷纷质问在大门口排成几道人墙的军人和警察。

“十六条上明明规定,即使真正有问题的人,也要放在运动后期处理,你们为什么在运动初期就乱抓人?中央决议在你们这里还算数不算数?你们还接受不接受党的领导?”

“你们是无产阶级的专政机关,为什么抓革军、革干子弟,替地、富、反、坏、右张目?”

“打倒镇压中学生的刽子手谢富治!”

在广场上,“联动”和“三司”激烈辩论着,他们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对毛泽东思想也要一分为二!”

"不许怀疑毛泽东思想!"

"打倒江青!"

"坚决保卫江青同志!"

一辆"三司"的广播车像蜗牛似的缓缓开动着，叫嚷着要同"联动"决一死战。

"把这辆广播车砸了!""联动"一片怒吼。

一个身穿军装、戴着"联动"臂章的小女孩爬到了广播车上，硬是用牙咬断了广播线，又从车上摔了下来。"三司"的人对她拳打脚踢，"联动"的人前去保护。

口号声、演讲声、打骂声连成一片，天安门广场沸腾了。

11点30分，广场上突然广播了"联动"指挥部发出的最后通牒：

"最后通牒：在中央文革的唆使下，公安部近一个多月来逮捕了我大批战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郑重宣布，限公安部在半个小时之内，即在1967年1月12日零点前无条件释放我所有被捕人员，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公安部自负!"

广场上慢慢安静下来，到11点55分，终于变得死一般的沉寂。所有的人都在砰然心跳地等待着那个不知道要发生什么惊人变化的时刻——零点。

当电报大楼的大钟刚刚敲完零点钟声的时候，天安门广场响起了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人潮顿时汹涌起来，朝公安部的方向冲去。

几乎在同时，广场上响起了巨大的马达轰鸣声，数不清的卡车开了进来，从车上涌下来的公安人员和“三司”群众，不由分说地追打、捆绑“联动”分子，把他们扔到卡车上……

骇人听闻的大逮捕开始了。

未遭逮捕的“联动”溃不成军，四处逃散。但是，东单、西单、前门和美术馆一带所有进出天安门广场的路口，早已被封锁得铁桶一般，要想逃出这道封锁线，谈何容易！

我窜到王府井大街，钻进了煤渣胡同，来到了北京军区某部的宿舍。

当我敲响一家人的门，一对和我素不相识的军人夫妇惊讶地见到拿着“联动”臂章的我，什么也不问就把我领进屋里安顿下来时，已经快到凌晨4点了。

(三)

1967年4月底，毛泽东下令释放“联动”后，在外地逃亡的“联动”纷纷回到北京。

大家兴高采烈，弹冠相庆，准备以凯旋而归的英雄姿态，投入新的斗争。

但是，我们很快发现自己的看法是天真的、错误的，胜利的希望也很快化为泡影。

中央文革和“三司”对“联动”的批判和围剿一点也没有放松，“联动”的据点经常受到攻击，首都大专院校举办了“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前去参观的人川流

不息。社会上批判"联动"的势头不但没有减弱，相反在朝"广泛深入"的方向发展。

"反击二月逆流"的声浪甚嚣尘上，作为"联动"精神支柱的谭震林、叶剑英、陈毅、贺龙等人，一个接一个受到点名批判、关押，乃至严刑拷打。

围绕着对"联动"的态度，首都中学生形成了尖锐对立、势均力敌的两大派——"4·3派和"4·4派"。

但是，无论是"4·3"派还是"4·4"派，都认为"联动"是反动的或是犯了严重错误的，都明确表示要同它划清界线。"联动"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几乎被逼到了死角。

1967年6月中旬的一天，我又和住在和平里的几个文化部的干部子弟聚在了一起。

他们的父母都是文化革命前一两年转业来的部队干部。自从1963年11月毛泽东宣布"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外国死人部"以后，文化部就被列入另册，处境每况愈下。中央从"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调来了大批干部，担任文化部各级的领导职务，对文化部进行改组和"掺沙子"。

我们讨论了当前的局势，再次酝酿着成立秘密组织。

我们决定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表示我们是共产党的当然接班人。

我起草了《首都红卫兵共产主义小组宣言》。

我们首都红卫兵共产主义小组于1967年6月17日庄严宣布成立。

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发展证明，文化大革命完全违

背了反修防修的初衷，正在演变成迫害共产党人，迫害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大清洗运动，实在为亲者痛，仇者快。

共和国的元帅们、副总理们、部长们及各省市的党政负责人，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被抄家、被批斗，有的甚至被夺走了宝贵的生命。

普通正直有良知的人们，被戴上"保直派"的帽子受到歧视、压迫乃至关押。

我们的人民军队，正在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他们的枪支弹药被夺走，他们的人身受到凌辱。我钢铁长城正面临着被瓦解摧毁的危险。

中国共产党人正在遭受空前的劫难，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正面临着有组织的匈牙利事件。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我们革命干部子弟——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少年共产党人，发誓要承担起挽救党和国家的神圣责任。

……

连着好几天，我们白天睡觉，夜间出击，在天安门到和平里一带，张贴我们的宣言和刷写着"打倒戚本禹"、"打倒'三司'"、"打倒4·3派"、"英雄的老红卫兵万岁"的大标语。

我们的行动很快得到了响应，有的学校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于是，我们和他们联合起来，又成立了"首都红卫兵共产主义支部"。

我们发起了一连串反中央文革的行动，但都遭到了失

败。

8月上旬的一天，我带着数不清的问题和困惑，来到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想和刘豪做一番探讨。

他是我当时唯一敬重的大学生，因为他不但思想深邃，而且骨子里藏着一股他父亲当年参加红军的那种强烈反叛精神。

我们谈前不久召开的声讨刘少奇大会。"刘少奇、王光美他们俩被斗惨了，又是弯腰低头，又是坐'喷气式'，被打得不成样子，押出会场时，连鞋子都掉了，堂堂一个国家主席，狼狈得像个在押犯似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地说，"听说他回到办公室时，高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大声抗议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还听说，他向毛主席请辞国家主席的职务，要求回家当农民。"

没想到我的话不但没有引起他的共鸣，反而引出他的一连串质问：

"宪法?！他刘少奇10年前坚请主席反右时，想到过宪法吗？章乃器顶着宪法游行，要求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却被关押了几天，那时他刘少奇想到过宪法吗？噢，现在轮到自己头上了，他才想到了宪法——太晚了！"

他的语调突然变得凄凉起来："这不是他刘少奇个人的悲剧，而是我们全党的悲剧。假如我们党早就能认识到并切实执行宪法至上的原则，何至于会有今天国家主席要求宪法保护的荒唐事情发生?！"

他叹了口气，若有所思地说：

“唉！以后的历史将会证明，刘少奇犯了一个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他在重大的转折关头，优柔寡断，错过了扭转我党前途命运的最后一次机会。”

“这话如何解释？”我感到茫然不解。

“去年中央决定7月21日召开8届11中全会，中央委员全部到京，就是主席没来，他要求推迟会期。当时大多数中央委员都不同意推迟，如果当时刘少奇能利用主持中央工作的有利地位，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尊重多数中央委员的意见，果断决定按时召开会议，局面就和今天大不一样了，主席搞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很可能被全党否决。”

我还是不明白：“刘少奇为什么没有坚持如期召开会议？再说，全会是去年8月1日召开的，才推迟了一个多星期，为什么局势就会发生这么重大的变化？”

他回答说：

“历史和人生一样，虽然很漫长，但最关键的就那么几步。一失足则成千古恨。全会没有如期召开，是因为林彪和周恩来坚决反对，主席则利用这几天时间对军队进行了部署。”

“我想起来了，去年7月底，有的大学进驻了部队，当时我还感到奇怪。”

“所以，全会推到8月1日召开，结果就大为不一样了：刘少奇的名次从第二位降到第七位，林彪则从第六位升到第二位。”

“你看刘少奇最终会有怎样的下场？”

"你说呢?"他直视着我,"这个问题你还用请教我吗?"

我马上明白了,暗暗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中央文革最终会下场如何?"

"你读过法国大革命史方面的书吗?"

"读过。"

"你们'联动'就和吉伦特党人一样,属于最先参加大革命而又最早反对这场大革命的那批人,而他们中央文革和'三司'就像雅各宾党人那样,最终的下场是——"

"被推上历史的断头台!"我马上接了上去。

"是的,这是客观发展的必然逻辑:你们在失败中获得新生,他们在胜利中走向衰亡。总有那么一天,他们会突然发现自己面临死亡的深渊。"

我深深感到,自己该沉到历史长河之中,用一种巨人的眼光来看待眼前发生的一切了。

(四)

1967年7、8、9月,是天下大乱的3个月,局势的发展像迷宫似的,千变万化且超出了常理,令人眼花缭乱,目瞪口呆:

全国武斗的烽烟四起,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处被焚烧;

国家主席刘少奇大声疾呼,要求得到宪法保护,政府总理周恩来四处周旋,然而地位岌岌可危;

这边伟大舵手指点迷津,发出最高指示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极力遏止汹涌澎湃的武斗浪

潮，那头“伟大旗手”江青却在手舞足蹈，号召“文攻武卫”，为不断升级的武斗火上加油；

在“7·20事件”享尽了英雄凯旋的荣耀之后，王力、关锋等人，竟然也成了捕蝉的螳螂，被一脚踢出了中央文革小组，锒铛入狱，一夜之间从座上客变成了阶下囚。

到处都在激动，到处都在发疯，到处都是荒谬。

在乱中夺权的中央文革，在同外部的“阶级敌人”和内部的异己势力刀光剑影地大战了一场之后，终于喘了一口气，腾出手来又去收拾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敢摸老虎屁股的“小家伙们”了。

9月下旬的一天，身兼副总理、公安部长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三职的谢富治，来到钓鱼台找江青。

“江青同志，我们又发现了一个反动组织，他们的活动十分猖獗……”

“什么组织？头目是谁？后台是谁？”一听说又有了反动组织，江青刚才还显得疲惫的眼神，顿时放射出了光芒，她像背顺口溜似地，一口气提出了3个问题。

“这个反动组织叫‘首都红卫兵共产主义小组’，为首的叫红涛，后台目前我们正在追查，这是有关他们情况的材料。”谢富治边说，边把一叠材料摊在了办公桌上。

“‘共产主义小组’？想打着红旗反红旗，成立反共政党吗？”江青说，一把抢过“宣言”和公安人员拍摄的揭发她30年代不光彩历史的大字报照片，仔细地看着。

“好哇，他们这些混蛋竟敢胡说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有组织的匈牙利事件，竟敢把矛头指向老娘！”江青恨得咬牙切齿，“他们是些什么人？”

"中学生，北京的一些中学生。"

"中学生?！不——对——吧?"江青拖着长腔说："中学生不过是十几岁的毛孩子，怎么会写出这么恶毒的文章，怎么会知道把文化大革命比作匈牙利事件，发生匈牙利事件时他们才几岁?！"

"这……"

"这里面肯定有名堂！要不是有他们老家伙们支持，'联动'怎么会闹得这么欢? 富治同志啊，你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低估了这场斗争的严重啊！查查他们的父母是干什么的，对共产党有什么怨恨没有。我看，他们父母肯定插手了他们的反动活动。"

"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了解过了，红涛的父亲是化工部的一个干部，其他人的父亲都在文化部工作，都是两三年前从部队转业的干部。"

"文化部?"江青的神经像是受到了什么刺激，语气变得寒气逼人，"文化部是反对我的大本营，他们和文化部有联系，这就对了！从南京军区来的那个肖望东就是反对我的，他的孩子在里面吗?"

"不在，但政治部副主任聂鸣九的孩子在里面。"

"一丘之貉，一丘之貉！表面上是聂鸣九，根子还是在他肖望东那里。肖望东后面还会有更大的后台。你们打算怎么办?"

"先把红涛几个人抓起来，然后照你的意见，顺藤摸瓜，把肖望东的幕后活动查清楚。请在这上面签个字吧！"

"对，要彻底查清，一追到底！"江青顺手接过拘留审查"共产主义小组"主要成员的请示报告，很潇洒地签上了

"同意。江青"几个字。又递给了谢富治：

"就这么办，你们一定要把肖望东这个根子给我挖出来！"

9月24日，谢富治发表讲话，称对"联动"的残余分子要继续严厉打击，决不手软。

9月25日夜，我们小组的成员小涛在家中被捕，押在"炮局"。

第二天夜里12点多，我也被捕。

入狱后，据说我是"政治大案"，隔了好久才提审。第一次提审没问出什么东西。

第二次换了一个审问员，年纪较大一些。他一见我走进审讯室，就和蔼地叫我坐到办公桌旁，满面笑容地自我介绍说：

"我姓张，你就叫我老张吧！一般的案件我不管，专管政治大案。没想到你这个小鬼的案子也要由我来过问喽！"

"这么说，我也是政治大案了？"我趁机卖乖，趴在办公桌上，笑眯眯地看着他。

"当然是大案。你的问题通天了啊，可不是我们所能做主的。你可要好好交待，否则你过不了关，我们也过不了关。"他说得入情入理，颇令我感动。接着，他话锋一转，说，"怎么样，小鬼，讲讲你们'共产主义小组'是怎么成立的，都有哪些活动？"

这我早有思想准备，我侃侃而谈我们小组成立的经过和从事的活动，但对敏感性问题一概不提。

"你是'联动'？"他听完后，好像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不是，是亲联分子，我同情'联动'。"我也若无其事

地否认，心想，参加"联动"又没有履行登记手续，你抓不着我什么。

"不是，你二月份跑到广州去干什么?"

"因为蒯大富他们乱抓人，抓了'联动'还不知足，还要抓我们革干、革军子弟。他们要抓我，我当然要跑了!"

"你们小组有'联动'分子吗?"

"没有，他们都是亲联分子。"

"为什么叫'共产主义小组'，是不是想成立政党?"

我一愣，没想到他会提出这种问题，但我马上反应了过来，断然予以否认：

"我们小组和其他组织一样，也是群众组织。叫'共产主义小组'是为了履行我们参加少先队时立下的誓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再说，我们的全称是'首都红卫兵共产主义小组'，完全是红卫兵的一部分，只不过和其他红卫兵组织有点分歧而已。"

"什么分歧?"

"他们想着夺权，我们想着捍卫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无产阶级政权。"

"'宣言'是你写的?"

"是我写的。"

"文笔还不错嘛，也很有见解。我想你的父母和你的看法一定差不多。你写时，你父母或别的大人看过，提过什么意见吗?"

我立刻警惕起来："我父母从来不过问我的事，别的大人也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干些什么。你看过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向东小组去年写的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吗? 他们写的

文章比我漂亮多了，有见解多了，连主席都写信赞扬他们。”

“知道肖望东是干什么的吗?”

我很奇怪，怎么扯到他身上来了，但还是回答：

“知道，文化部政治部主任，转业前是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

“他是哪年到文化部的?”

“1964年或1965年吧。”

“你和他联系过几次?”

“联系过几次？我根本不认识他，怎么可能和他联系?”

“不认识，你怎么会对他的情况知道的那么清楚?”

“我是从街头大字报知道这些情况的。”

“小鬼，不要怕嘛，联系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是老干部，出了问题，责任该由他负，和你们毫不相干，你们还年轻嘛!”他紧咬着不放。

“老张同志，咱们共产党人可是最讲实事求是的。我不认识，只能讲不认识。违背事实，昧着良心，讲认识了，对你了解案情有什么好处吗?”我一步也不退让。

最后一次审问给我一种草草收场的感觉。一天夜里我又被带到审讯室，照例由老张审问，他照例提出“宣言”——肖望东——江青这三个问题，我的回答像背书似的，照例和原来没有什么两样。

听完我的回答，老张凝视着天花板，愣了好大一会儿神，叹了一口气，说：

“唉！你们这些小鬼啊，不老老实实在家呆着，出去反什么江青，反什么中央文革，你知道这样做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会给我们带来多大麻烦吗?”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不知他用意如何，没有敢多说话。

他接着说：

“我们搜查了你的房间，发现你的知识面还不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的书都读。你的俄语也不错嘛！你用俄语写的日记和读书笔记，我们都看了，你的思想早就出岔子了嘛！所以——”

“所以什么？”我终于忍不住了，情不自禁地问了一句。

“所以，我们认为那篇宣言完全有可能是你自己写的，没有别人插手，可人家就是不信啊！”

“人家是谁？”

“是谁？我明白告诉你吧，是中央文革首长，是陈伯达同志和江青同志！”老张狠狠瞪了我一眼，又旁若无人地继续说：

“为了证实那篇宣言和大字报确实是你写的，你得再给我们写点东西。”

原来如此！我心里踏实了，马上说：

“请出题目吧！”

“写两篇，一篇写对匈牙利事件的看法，另一篇写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题目你自己定。”

没过几天，我交出了洋洋万余字的两篇文章——《我对匈牙利事件的几点看法》和《我为什么反对瞓大富》。

文章交出后，再也没有理我的事了，提审也和我绝了缘。

长时间的狱中生活，使我的身体渐渐垮下来，每天下午发低烧，身上还长了一个大脓包，看守带我到公安医院去检查，证明我是结核病复发。

一天下午，我又被带进久违了的审讯室，老张目光和蔼地让我坐在桌子旁边，桌子上放了一些点心。他笑嘻嘻地说：

“吃吧，小鬼！”

我也顾不上琢磨这是什么意思，狼吞虎咽地吃个净光，然后抹干净嘴巴，看着老张。

“你的病复发了，我们已请示过上级，让你监外就医，明天你爸爸妈妈就可以接你出去了。你这个小鬼啊……”

1968年2月，我出狱了。

11年后的一天，在“五七”干校一直受到“隔离审查、监督劳动”的我，突然被叫到校政治处，他们向我宣读了北京公安机关发来的平反文件：

“……1967年间，红涛等同志对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反党分子及政治小丑蒯大富大搞法西斯专政、迫害老干部等倒行逆施愤恨不满，并进行了勇敢的斗争，这是正确的。但却遭到江青的打击迫害，她于1967年9月26日指令将红涛同志关押审查。现决定予以彻底平反。”

此后，我开始走上工作岗位——到某省省委办公厅工作，踏上了新的政治舞台。

陶铁柱　北京54中初中三年级学生，老红卫兵，曾因反抗文革而入狱，现为杂志编辑，并从事翻译工作。

肖　文

文革回忆

已过了不惑之年的我们，经历过的许许多多欢乐或痛苦已成如烟往事。人的一生中，也如历史进程本身一样，那些难忘的时刻并不多见。“文革”中的一些经历，就成为这不多见的时刻被深深的刻地脑海中。

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

北京101中学，是一所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生活在这所学校，可以感受到比其他学校更加浓厚的革命气氛。每个学生进校的第一天主要作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听学校领导讲校史；第二件事是参加劳动，继承先辈的革命传统，永远不脱离工农群众。这一学校教育的主旋律，在第一天就深深地印在每个学生的脑海中。

据说，这一主旋律还是周恩来总理定的音。这所学校的前身是建立于革命根据地的干部子弟学校。解放战争中，学校随部队步行从张家口进入北京，1958 年以前，只招收干部子弟。周恩来总理一次到学校视察工作时指示，不要把 101 中办成贵族学校，干部子弟不要搞特殊化，不要成为八旗子弟。此后 101 中改为面向全市所有学生招生。

老校长王一知是革命烈士张太雷的遗孀。她虽不主管日常教学工作，却办成了两件事：一是举办贫下中农子弟班。每年从北京市郊区农村贫下中农子弟中招收一个班学生进入这所被老百姓视为的“贵族”学校中学习；二是举办半工半读班。从 1965 年开始，在初中和高中各招收两个半工半读班。半工半读班的学生除与普通班学生学习同样的课程外，每周还有 5 个下午在校办工厂劳动。所以半工半读班的学生录取成绩比普通班学生的成绩还要高。渴望成为“真正接班人”的同学，都以能够进入半工半读班为荣。

每天清晨，嘹亮的起床号把同学们从梦中唤醒，在校乐队“祖国颂”的雄壮乐曲声中，同学们以军人的速度从各自的宿舍汇聚到操场，开始了一天紧张的锻炼、学习、生活。当时的口号是“为革命炼就一身钢筋铁骨”，“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先辈浴血奋战打下的江山，靠我们这一代来捍卫，来建设；先辈们未实现的共产主义理想，靠我们这一代去实现！”这是我们当时刻苦锻炼、勤奋学习的原动力。学校的校风是团结向上的，学风是紧张严肃的，业余生活是活泼多样的。在风暴席卷之前，谁会想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正统治着学校，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牛鬼蛇神”人还在，心不死，还隐藏在我们周围呢？

文化大革命运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爆发。

1966年6月1日上午第二节课后，各班同学从教室中井然有序地来到操场，体育组德高望重的王老师站在教室楼前的台阶上整队，准备做课间操。操场边的稻田中传来几声蛙鸣，蔚蓝的天空中飘着几朵白云。

广播操的乐声没有像往日那样响起，扩音器中一阵嘈杂的议论声过后，随即传来一个男同学激动人心的讲演："同学们！同学们！你们没有听说北大发生的事情吗？你们还能坐在教室里安静地读书吗？和我们近在咫尺的北大校园已经沸腾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燃烧起来了！所有关心国家大事的同学们，不能再麻木不仁了！走啊！同学们！到北大去，声援北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操场上整齐的队伍即刻混乱了，同学们三人一群，五人一伙，议论纷纷。学校的主要领导神色不安地在一起商量了一会儿，教务长走上台阶，对着麦克风大声说："同学们！请安静！大家关心国家大事是好的。但是，上级领导没有通知停课，同学们要遵守学校纪律，照常上课。要到北大去，学校不提倡，也不阻止，但是，不能耽误正常的学习时间！……"他的话还没有讲完，刚才在广播室讲演的几个同学已经来到操场，他们手中拿着写好的大标语："声援北大革命派！""群众运动万岁！"一个同学抢过教务长手中的麦克风说："哪有那么多'但是'！革命就是要打破常规，'群众运动万岁'！要革命的同学们，走啊！到北大去！"说完，这几个同学径直奔校门而去，部分大胆的同学跟随其后。校领导们不知所措，想阻止，又不敢阻止。犹豫不决的同学，一伙儿一伙儿地跟了上去，很快汇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激昂的口号声打破了

圆明园上空的宁静，自发的游行队伍走出101中校门，往南行进几百米就汇入了“文革”群众运动发源地——北大的“文革”激流中。

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送了北大聂元梓等7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到北大参加声援的同学为自己超前的革命行动兴奋得彻夜难眠；没敢去北大的同学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反省和批判自己；更有一小部分有政治敏感性的同学在北大“革命派”的启发下，行动起来。

第二天一清早，操场上见不到往日生气勃勃的锻炼场面。“快到食堂前看大字报去!”很多同学从床上爬起，来不及刷牙洗脸就跑到食堂前面。告示栏上，出现了全校第一张大字报。“看王一知执行了一条什么教育路线?”大字报认为王一知是101中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代表。很快，在第一张大字报旁边，出现了第二张大字报。与第一张大字报的观点相反，第二张大字报认为学校是存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但王一知恰恰是革命路线的代表，她创办的贫下中农子弟班和半工半读班就是证明。

同学们三五成群地争辩、议论。早饭的铃声响了，大家拥入食堂，边吃边争辩，越辩越激烈。忽然，一个同学跳上餐桌，发表讲演，“王一知搞半工半读是为自己脸上贴金，是为了掩盖她推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既然是半工半读，为什么还学普通中学的文化课? 为什么还照样参加高考?”半工半读班的同学几乎成了集体的“保皇派”。只见高一(5)班的卡玛丽达（美国朋友韩丁的女儿，从小生长在中国，不但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而且“国骂”运用纯熟。）一个箭步跳上另一张餐桌，指着对方同学说：“你们就（他

妈的）像伊索寓言里的那只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现在说我们是修正主义，忘了你们当初是怎么羡慕我们，千方百计往半工半读班钻吗？你们想上还上不了呢！”下面一片哄笑。

辩论从食堂转到校园，又从校园转到教室。夜深了，宿舍里还有同学在争论不休。第二天起来，很多同学发现自己的嗓子已嘶哑得说不出话来。辩论暂告一段落，食堂里里外外贴满了大字报。内容不仅限于王一知和她的半工半读班，矛头几乎指向所有学校的领导，有些还指向了本班的班主任。其中有些大字报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摆事实、讲道理，认为学校虽然受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但是革命路线还是占主导地位，不分青红皂白，把什么都说成是修正主义不是马列主义的作法。但是，在这样的大字报上，马上被写满“保皇派！”“折衷主义！”的批语。

受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的影响，我校也成立了以干部子弟为主要成员的“东方红”、“红卫兵”、“红旗”等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在《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令下，红卫兵小将向学校中的“牛鬼蛇神”发起了横扫的攻势。群众运动骤然升温，最初多少带有一些理性色彩的辩论早已不够味儿，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激烈的“革命”行动。几乎所有的学校领导和部分老师都被当做牛鬼蛇神揪了出来，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集中在这些隐藏在我们身边的“阶级敌人”身上。挂黑牌、游斗、剃阴阳头直至皮鞭抽打。一位美术老师，据说是历史反革命，一群同学批斗抽打后，仍不解恨，又把他拖入校园的喷水池中，抽打一阵后，把他的头浸入水中，再抽打一阵，再把头浸入水中，这样反复多次，

终于听不到他的呻吟。待从喷水池中拖上岸来，这个“历史反革命”已浑身冰凉、停止呼吸了。围观的同学大多数毛骨悚然，对这种“革命”行动十分反感，但没有人敢于上前阻止。回顾一下当时的心理活动，围观者和打人者都应该深深反思。当时流行最广的是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革命不是绘画绣花、不是作文章”，“矫枉必须过正”等观点。多年来对“人性论”的批判，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宣传，是这种过激行为的理论基础。然而，这种灭绝人性的行为在和平时期大范围内发生，而又无人敢于制止，难道不应该更深地挖掘一下民族的弱点和劣根性吗？

血统论与“对联”

1966年入夏后，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浪潮，也随着天气的升温而愈发高涨。

7月以后，天气闷热起来，学校里同学之间以往的远近亲疏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看得出来，干部子弟们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已不太与班里其他同学在一起，而是单独地形成了他们的一个“阵营”。他们在神秘地议论着什么，一些消息灵通人士传来只言片语，说是党和国家已经处在危机时刻，毛主席身边也有野心家要篡权，老一辈革命家和干部子弟的父母们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江山随时有变色的可能。一旦红色政权变色，千万人头将会落地，无数工人和贫下中农又将回到旧社会的水深火热之中。现在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正在猖狂地活动，配合党内的野心家准备卷

土重来。一旦复辟，学校里的集中表现就是革命干部和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与地、富、反、坏、右子女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必须划定阶级界线。在这场斗争中依靠的对象必然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称之为“红五类”）。斗争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他们的社会基础——地、富、反、坏、右（称为“黑五类”）。在学校里，“红五类”的子女必然是革命的依靠力量，“黑五类”的子女必然是革命的对象。

这所学校以干部子女占多数，阶级路线已经贯彻得很彻底了，可算作“黑五类”子女的只是极个别，除“革命干部”子女（父母在解放战争前参加革命，并无红头文件规定，大概是约定俗成吧）外，多为一般干部子女和知识分子子女。然而，在当时的气氛下，只要未被划在“红五类”中，便都被推到了“黑五类”一边。对学校里的阶级划分虽然没有中央文件，然而有形的人群划分和无形的政治压力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红卫兵组织只允许“红五类”子弟参加，非“红五类”统统被排斥在外。

在这所被称为“革命大熔炉”的学校中经过熏陶、熔炼的学生，无论什么出身，在“文革”的号角吹响时，他们对地、富、反、坏、右，对资产阶级堡垒同样无比憎恨，对伟大领袖同样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正当同学们满怀革命激情准备对资产阶级口诛笔伐时，一些同学忽然发现自己不仅被剥夺了口诛笔伐的资格，而且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他们感到委屈、压抑、不理解，于是，被压抑的一方有人开始小心谨慎地向另一方提出质疑。高中×班5个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酝酿写一张大字报，内容是：一、解放已经17年，

我们出身虽然不好（这是我们无法选择的），但是，我们与你们一样，都是在红旗下长大，受党的教育，我们同样也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为什么把我们视为革命的对象？二、党的政策只讲过，“有成分，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并没有把出身不好的人当作革命对象。毛主席、周总理、马克思、恩格斯出身也不是“红五类”，但他们都成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怎么理解？

8月3日晚上8点多钟，大字报还在抄写中，突然，教室里人多起来，班里几个主要的干部子弟出现在这几个非“红五类”同学面前。他们身着军装，腰系武装带，给人一种威严感。

“你们几个人在这儿干什么？”

“写大字报。”

“写什么？为谁说话？”

“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说话。”

“无产阶级？先看看你们是什么出身吧！能有无产阶级感情吗?！××你爸爸是地主！×××你爸爸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你爸爸是小业主！×××、×××你们俩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

“我爸爸是共产党员！”“我爸爸也是共产党员！”

“你爸是共产党，你爷爷是什么？你爷爷的爸爸是什么？就算你爸爸是共产党员，也难说不是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

“党的阶级政策是有成分，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

“政治表现？你父母受过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压迫吗？参加过革命战争、上过战场吗？我们的老子流血牺牲把江山

打下了，你们的老子才来拥护共产党！能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感情吗?!"

几个非“红五类”哑然了，一时确实无言以对。于是干部子弟们轮番地讲述他们父辈的光荣历史，以及他们父辈的战友如何英勇杀敌、负伤、牺牲的壮举。一时间，他们声泪俱下，周围的人眼圈里也闪动着泪光。无产阶级感情这时得到了升华。他们激动地喊起了口号。几个非“红五类”，被围在真正的“无产阶级”们树起的拳头中间，在震耳欲聋的口号中，他们是如此的卑微和胆怯，同学们愤怒的眼光向他们射去，好像他们不是十恶不赦的黄世仁，就是杀害革命烈士的刽子手。

辩论会变成了批斗会，这几个仅想争得革命权利的学生变成了被批斗对象，只有招架之功，已无还手之力。后来连招架的力气都没有了，面对嘲笑、谩骂、训斥，已无真理可辩，更无道理可讲。教室里的人越聚越多，走廊里也挤满了各年级、各班的同学们。许多人为干部子弟们嫉恶如仇的“阶级感情”和强有力的攻击性语言鼓劲、叫好。批斗会持续到夜里3点多钟。这几个被围攻了七八个小时的同学，真有一种活到头了的感觉。身上的背心、短裤都被汗水湿透了。他们精疲力竭，他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有什么罪？但就好像做错了什么，有什么罪一样，在众目睽睽之下，灰溜溜地消失在学校楼外的夜幕中。他们不敢回宿舍，摸到一间没人的房子里。幸好里面还有几张木床。几个人一下子都仰面倒下去，在黑暗中没有一句话。

第二天，学校教学楼门口贴出了一幅大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鬼见愁"。这幅对

联据说是从北航附中抄来的。学校各处的墙上一夜之间贴满了“红色恐怖万岁!”的大标语。类似昨晚的批斗会，在宿舍、教室随处可见，低年级中更为普遍。与此同时，“红五类”们纷纷穿上了绿军装。不论男女，腰系一条军用皮带。军装是用来表明身份的，皮带是用来打“黑五类”的。学校的大门口有人用桌椅搭成了两个门，一个门十分宽敞，另一个门是用两张课桌压一条板凳搭成的，上面写着“狗洞”。白天有身着军装的“红五类”在此把守。出校门先报出身，出身不好的人，必须从狗洞中钻过去。

许多出身不好的同学都感到从未有过的压抑和不解。难道毛主席、党中央不知道这些事吗?难道党的阶级政策就是“对联”中写的那样吗?

现在已不是让不让你革命，而是你已变成革命的对象了。8月3日晚上被批斗的5个同学中的一个回到家中，反复思考，怎么想也觉得自己没有错。有错的是“对联”。他和另一个同学一连几天在一起分析“对联”的错误根源和严重后果，起草了一份批判“对联”的大字报，准备贴到国务院接待站去。当时“对联”正值气盛时，大字报的措辞是十分慎重、严谨的。

一天晚上，他们拿着大字报来到国务院接待站门口。接待站前面贴满了大字报，大部分是为“对联”叫好的。忽见大门口一个操着南方口音的男子，在大声讲演，“我刚从外地来到北京，没看到几张批判资产阶级的大字报，到处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同志们，我认为这幅对联明显是错误的，它转移了革命斗争大方向，不利于文化大革命!”还没等他说完，一大帮身着绿军装的人

冲上前去，把他掀翻在地，皮带不由分说地落了下去。嘴里骂着："这小子肯定是狗崽子！想为狗崽子喊冤叫屈，你找错了门！打！"

在这种"红色恐怖"下，大字报是贴不出去了。但是，他们不甘心，又把大字报带回了学校。另外几个同学看了以后，也认为一定要贴出去，出出这口恶气。但是如何落款，如何贴呢？他们商量了很长时间，决定落款为"红育"，因为他们不承认是什么"黑五类"、"狗崽子"，他们是在红旗下成长，是党培育的一代新人。大字报贴出时间定在12日夜里，因为那天晚上学校大操场放电影，大礼堂不会有人。

夜里，5个人按预定的计划，悄悄地来到礼堂。礼堂里没有灯，借外面路灯的余光，他们摸到礼堂西北角曾贴出过学校重要大字报的位置，按事先的分工，有人放哨，有人刷浆糊，有人递大字报，有人贴。当时的感觉很难形容，既像电影中的地下党，又像是贼。

贴完大字报，5个人迅速撤离了学校。

过了几天，他们回到学校。到礼堂一看，"红育"的大字报得到了铺天盖地般的大字报的回报。有的是咬牙切齿地咒骂，有的是比较客气地批判。这时，他们已没有恐惧和不解，而是得到了一种极大的心理满足。因为他们对挨骂已不在乎了，在乎的却是在一片"对联"的赞歌声中，他们唱出了一声引人注目的反调。

在所有批判"红育"的大字报中，有一篇让他们惊愕不已，至今仍记忆犹新。这篇大字报的口气颇有一种《人民日报》"社论"或"评论员文章"的味道，说是要与"红育""商榷"："出身不好的人，不能拒绝别人说自己是狗崽子，

只有承认自己是狗崽子，才能作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能不是狗崽子。”

“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是（他妈）什么狗屁道理?!”几个人同时骂了出来。

当然，并不全都是批判和谩骂。有几篇署真实姓名的大字报，对“对联”的错误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判。在当时的气氛下，他们敢于站出来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对联”，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不怕别人查出身背景，其中一人是贫下中农子弟班的同学，查他爷爷的爷爷也是贫农；另一个同学的爷爷是人人皆知的老革命。不久，不同意“对联”的同学，以这两个同学为核心，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有人从外面抄来了陈伯达和江青8月2日的讲话，讲话指出，“对联”不全面，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这种“血统论”不好。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但是，这篇讲话马上被捍卫“对联”的大字报覆盖了。

在此同时，毛主席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也公布了，信中说：你们的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的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毛主席亲笔写信对红卫兵表示支持，证明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是绝对正确的，自然，红卫兵捍卫的“对联”也就成了正确的。

后来，“八·一八”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并且带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成了红卫兵的红司令，

中学里以"血统论"为基础成立的红卫兵更是有了尚方宝剑。他们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不仅把学校里的"资产阶级"、非"红五类"及其子女打个落花流水，而且"杀"向社会，抄家、破"四旧"，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打个人仰马翻，把北京城搅了个天翻地覆。

"联合行动委员会"及反"联动"斗争

在红卫兵们打着"造反有理"的大旗、"横扫千军如卷席"、"万马奔腾战犹酣"时，中央文革青睐的对象转向了以"三司"（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为代表的、矛头直指刘、邓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三司"发起了对"血统论"的批判。老红卫兵中间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举起"破私立公"的旗帜，拉出一支"造反派"队伍，对红卫兵纠察队乱抄、乱打、乱砸的一些过火行动进行严肃的批判。另一部分血统最高贵的"高干子弟"则敏感地觉察到，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并不是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而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已造到了他们父母的头上。一些中学的老红卫兵串联起来，在北大附中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

12月26日，北京展览馆举行"红卫兵破私立公誓师大会"，正当"西纠造反派"（"西纠"——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的代表在台上认认真真地检讨前一段的行为时，十几个身着呢子军装、臂带红缎子或红呢子袖章的"联动"成员冲到台上，抢过话筒大喊：

“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

“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

“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刽子手‘三司’！”

“江青别太狂了！”

一时间会场大乱，台上和台下一片叫喊声，——“打倒‘三司’”！——“打倒‘联动’！”——“踢开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的人没有好下场”！——揪出‘三司’后台”！——“揪出‘联动’后台”！在两派对立的叫喊声中，“二踢脚”噼噼啪啪满会场乱飞。这座俄式风格的高贵典雅的剧场，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烟花爆竹、“二踢脚”的洗礼，顿时烟雾腾腾，满目疮痍。在一片混战中，“联动”成员们并不恋战，他们披着呢子军大衣，昂首阔步，率先撤出会场。

当造反派们走出会场，寻找自己的自行车，准备回校时，发现凡是新车，全部不见踪影，俱被一扫而光。

几天后，在工人体育馆一次中学红卫兵造反派批判“血统论”的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到会，对红卫兵造反派表示热烈支持。康生在会上宣布：“有个什么‘联合行动委员会’，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他们是一小撮反革命，要抓起来法办！”江青说：“红卫兵小将我们是支持你们的，但有一小撮人自视血统高贵，他们是什么东西！”

1966年12月底和1967年1月初，“联动”组织了三次冲击公安部的行动，许多“联动”成员被公安部抓了起来。

中学反“血统论”的力量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迅速发展起来了，各校纷纷成立了与老红卫兵对立的红卫兵造反派。

我校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为骨干，成立了“毛泽东主义公社”。许多被“血统论”压抑的非“红五类”子女加入了“公社”，终于有了参加“革命”的权利；老红卫兵中的一些人出于破私立公、继续革命的思想，也加入了“公社”。

校园里展开了打油诗之战：

山上青松山下花，
花笑青松不如她，
有朝一日寒霜降，
只见青松不见花。
回敬：
病树一株立山尖，
遍地梅花喜开颜，
今朝全国东风起，
花开树倒猢狲散。

× ×

浪迹京城忆“西纠”，
故人生死各千秋，
散伙已在数日后，
六爷忍作“三司”囚。
回敬：
“西纠”之子忆“西纠”，
为虎作伥死遗臭，

“三司”奋勇扬千帆，
联动“二爷”坠沉舟。

×　　×

谁说青山不老？
谁说“三司”不倒？
我们就是愚公，
要把“三司”挖掉。
回敬：
青山越长越茂，
“三司”革命不倒，
群众才是“愚公”，
定把“联动”根刨。

×　　×

满天炮轰满天仇，
“三司”本是拉物猴，
留得“西纠”豪气在，
三年归报“三司”仇。
回敬：
炮轰瘟神谁人仇，
“三司”举棒奋金猴，
留得“西纠”豪气在，
还当刘邓乏走狗。

×　　×

想当年小将可爱造反有理，
看如今血统高贵什么东西！
——一落千丈

许“三司”乱抓人，就被公安部抓起来了。不反毛主席、林彪就不是反革命。‘联动’提出‘打倒公安部，火烧谢富治!’是因为对公安部下级公安人员不满。公安人员让红卫兵跪下承认错误，踩他们的头，打他们。‘联动’冲公安部是反革命，‘三司’冲中南海就不说了?!‘联动’火烧谢富治就是反革命，‘三司’炮轰周总理只不过是过火一些?!‘三司’就是逐步升级，搞完部长搞总理。‘联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央‘文革’是毛主席的参谋部，给参谋部提点意见没什么！北大附中红卫兵给江青写了很多材料，让江青不要偏听偏信。江青说，有人攻击我偏听偏信，你反革命言论我听你的干什么?

联动的基础是反‘三司’。‘三司’是从来不考虑出身的，光看表现。‘三司’是混蛋一撮，恨不得把老干部置于死地，成为他们的天下。为什么在‘破四旧’时他们没有动静，而现在抄老干部的家他们那么起劲?而且把密件往街上贴，他们干的事是间谍十年也干不了的。好多出身不好的人也参加抢‘黑材料’，谁知道受家长什么指示?”

今天校园里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是对“联动”思想的深刻批判，抄录如下：

“外出串联回北京几天来，我们耳闻目睹了一些触目惊心的事情。我们当初的一些战友当年有智慧、有魄力的勇敢的闯将，如今被糖衣炮弹击中，他们到周围农村打猪、偷鸡摸狗、偷摩托、下馆子，把抄家抄来的瑞士表自己带上，在办公室里炒肉吃……什么骇人听闻的事都做了。他们都是干部子弟啊！他们不批判刘邓路线，却大肆发泄对中央文革的

不满。他们组织‘联动’，扬言炮打‘三司’！他们竟造起了毛主席的谣，说什么毛主席最近不在北京……他们追求的是什么？是干部子弟的特权！‘对联’是特权思想的代表作，在这副对联盛行一时的情况下，一部分子弟思想中毒芽势如破竹般地生长起来，长成参天大树，几乎遮住了毛主席的光辉。……‘老子生来就红’，‘自来红是我们的烙印’，‘你们他妈的狗崽子，老子就是要你永世不得翻身’！‘敢把老子怎样’！这些东西在他们的脑子里占据统治地位，自以为血统高贵，可以为所欲为，可以骑在人民的头上当人民的老爷。他们要名、要钱、要吃、要玩、要骂、要打……就是不要思想改造，就是听不进毛主席的话，他们已经脱离毛主席的轨道，其中有些人快要变成花花公子了。他们的弱点被阶级敌人利用，站在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对立面，已走到了危险的边缘。我们要大喝一声：‘同志！你走错了路！’千万不能做为资产阶级路线殉葬的金童玉女，要做毛主席忠实的红卫兵！”

校园中，“联动”占据着学校老师的办公室，毛泽东主义公社和其他一些组织分别占据着原来的宿舍。中央文革宣布“联动”是反动组织之后，我校造反派于1月16日组织了一次砸“联动”行动。经过精心策划，当天傍晚，毛泽东主义公社的人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冲进“联动”占据的老师办公室，与“联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联动”打电话调来了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的援兵，公社一时反被围困。周围一些学校的造反派闻讯赶来，经过一场混战，终于一起端掉了“联动”的一个“据点”。

中学红卫兵造反派成立的基础是反“血统论”，但是他

们也确实被中央文革当了枪使。成为中央文革清除敢于公开干扰他们既定目标的反对力量的工具。

以上是"文革"留在脑海中印象最深的几个片段，如实地记录下来，只希望这些记录能为后人研究"文革"提供一些真实的素材。

肖文　北京101中学高中学生，现为北京某大学教师。

安文江

我不忏悔

一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登上城楼接见红卫兵。“文化大革命”进入狂飚突进的红卫兵时期，中国顿时成了烈焰遍地的非理性世界。

“八·一八”核辐射炙热了中国。到处是“三忠于”、“四无限”的口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赞歌和“拿起笔作刀枪……滚他妈的蛋!”的呼啸。上海市委为控制形势，率先在人民广场支持成立上海红卫兵。复旦党委闻风而动筹建红卫兵大队部，以持保守态度的党团员为主干，当然排除了已在串联亮相的造反派。我们则针锋相对筹建造反派红卫兵，后因观点有别，分成“红革会”、“红三司”、“东方红公社”

三伙。这是学生队伍自解放以来的第一次公开分裂。

保守派红卫兵比我们更迷茫、更痛苦。他们敏锐地感到中央文革以越来越鲜明的态度冷落他们而支持造反派。像是孝顺的儿女得不到母亲的理解，他们产生了绝望的情绪。为了表白他们的忠心，一反温良的常态而宣泄积聚的忿懑与绝望。于是，复旦的保守派在炎热的8月发起了癫狂的“打鬼运动”，粗暴地揪斗了一批“牛鬼蛇神”。

在球场的乒乓桌上，苏步青教授被保守派押上台，主持大会的是我们年级的团支书，一位质朴善良的女同学。她声嘶力竭地声讨、斥问。突然把一瓶红墨水喷洒在苏教授谢了顶的头上，随即把他推到在台上，责令他在晒得冒泡的柏油路上作狗爬……我被她的突变震惊了。

现在回想起来倒也可以理解，他们满腔赤诚捍卫党，结果落得个“保皇派”。“我也造反给你们看看！”这是潜意识。“文革”中的各派学生像被疯狗追逐的人群，跑慢了就有被咬而得狂犬病的危险。于是你追我赶，你用纸帽，我用铁帽；你叫火烧，我喊打倒；你说一个，我说一堆……什么是非、原则、政策，统统失去了约束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

我就在狂潮中“脱颖而出”，且不可收拾。

1966年8月24日，校内贴出未公开发表的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最高统帅明确尖锐的表态给我们注射了兴奋剂，复旦园的造反派热泪横流，纵声欢呼。恰逢赴京上告的造反派代表某同学从北京返校，她作为上海代表荣登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八·一八”大检阅。我们把她的上天安门看作造反派的胜利，把毛主席和她握手看作伟大领

袖对我们的巨大支持。当晚，大礼堂泪花盈盈，口号震天，震耳欲聋地回荡着杀气腾腾的战歌："……谁要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把国骂谱成歌唱遍全国是历史的荒诞，但当时的我们却感到难以名状的痛快。）我是大会主席之一。深夜11点多，1400多个激情难抑的红卫兵应上海戏剧学院少数派的请求，高举精心裱装的《炮打司令部》，高唱"造反歌"冲向上海戏剧学院。通宵的大辩论使几位誓死保卫司令部的藏族班学员昏厥过去，多数派则把更多未昏厥的藏胞抬上了担架。这就是震惊上海的"八·二五"事件。返校途中。教师蒋某失口错呼了口号，更给"八·二五"增添了恐怖色彩。

我是"八·二五"上海首次大串联的领队，又是上海戏剧学院大辩论的主持人，我有些惶恐不安。第二天的《解放日报》以鲜明的标题报道戏剧学院多数派"坚决捍卫'十六条'"的消息。虽然没点名，我们实际上被指控为践踏"十六条"的暴徒。8月26日晚，复旦保守派在大草坪召开4万人大会，约请了全市各高校代表，声讨"八·二五"事件。×××市长出席并讲了话，他说这一事件"掺杂着两类矛盾"。我在会上被多次点名。在这种声讨气氛中扬名，我很紧张，很惶悚，我做不到坦然。可是，×市长讲话和毛主席大字报所形成强烈反差又支撑了我。绝对信赖伟大领袖是无可置疑的，而伟大领袖支持造反又是不容怀疑的。我怕个屁！于是，我们在宿舍楼前贴出对联"不怕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既然毛主席站在我们一边，那么，反对我们的群众无疑是保皇派，反对我们的领导必定是走资派。在当时，这似乎是一加一的算式。失去脑袋的我觉得自已有着颗

最红的脑袋，这正是悲剧的根源。

在文化广场的一次演说中，我慷慨陈词："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是少数派！少数怕什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暂时虚伪的多数我们不稀罕！有毛泽东思想指引，革命的少数发展为明天的多数是历史的必然！"何其雄壮哟！遗憾的是我们果真成为多数，荒唐的历史又一次挑唆我们沿着极左的轨道迅捷滑行。在同一次演说的结尾，我大声呐喊："有毛主席撑腰，我们就是最强者！白色恐怖，我们不怕！反革命帽子，我们不怕！拎着脑袋干革命，砍头不过碗大的疤！"何其壮烈哟！遗憾的是我们徒有满腔赤诚，脖颈上只顶着被极左控制的灵魂。"拎着脑袋干革命！誓死保卫毛主席！"在1966年确乎发自由衷。有人以为红卫兵造反是颈后长着反骨，怀里包藏祸心，这是曲解。我没有统计数字，但是绝食、武斗中高呼"毛主席万岁"献出生命的肯定要以万计数。他们是得不到历史公证的所谓"烈士"，是献给上帝的无辜供品。后人可以鄙夷，可以抨击。但是，请不要怀疑他们沸腾的忠诚。

二

1966年9月，我怀揣战友们拼凑的百余元钱，瞒着父母赴京串联。火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我好不容易在座位底下占得一席之地，身边还躺着位捷足先登的女红卫兵，外语学院的。挨挨蹭蹭的谁也没有心动过速的异常。车过泰安，气温陡降，我们还合盖一件风雨衣，这幅图景今天看来挺粉

色的。但是当时的我比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还柳下惠。伊斯兰教徒到麦加朝圣似的虔诚"净化"了我们。

我在北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等，参加了关锋接见，又经人大附中、清华大学几名高干子弟的疏通登上城楼，参加了"九·一五"红卫兵检阅。当"东方红"乐曲骤然响起，毛主席身穿绿军装，臂佩红卫兵袖章在林彪、周总理陪同下向我们步步走近时，我的每根神经都在抖颤，每个细胞都在扩张，眼泪哗哗地滚下来，我身后一个女红卫兵幸福得昏死过去……接见完已是黄昏，我以百米冲刺的高速奔进电报大楼。楼厅里正播送"凡拍发毛主席接见内容的电报概不收费"的通知。太好啦！我一口气连写4份，每份电文都长400多字。我要让复旦、定海、妈妈和兄嫂及宝山的贫下中农分享我的幸福！若干年后，在四川甘孜地区，我目睹一长串佛门弟子三步一拜叩得满头鲜血的情状，我才理解这种"幸福感"所包容的愚昧。

进京的另一条所得是高干子弟向我透露的大量小道消息、内幕新闻以及各大专院校大字报揭示的真假掺和的材料。对党的崇敬感，对大人物的崇拜感层层剥落了。我冲腾着幻灭的激愤和由此引发的要厮拚的冲动。与此同时，中央文革越加鲜明地支持红卫兵造反，强调"造反有理"、"红卫兵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警告各级领导"不要干预他们的革命行动"。

蛊惑、诱骗在光明正大的幌子下进行，本就缺乏辨别力的我们格外有恃无恐。在小说《雾》中，我把红卫兵比喻为西班牙斗牛。"斗牛是悍勇且又可悲的。斗牛士用大红布挑逗它，撩拨它，它野性勃发喷着鼻息低着脑壳高翘弯角，冲

撞、踢趾、搏杀。结果是长矛戳人背脊，短剑穿透心脏，在狂热的欢呼声中訇然倒下！”这是我的自画像，也是一代红卫兵的群像。

正因如此，回沪后我以百倍的狂热投入狂潮。

组织并主持上海造反派首次大集会……

发起复旦团委门前的静坐活动……

支持、协助徐景贤、朱永嘉在市委后院造反……

组织、参与抢“黑材料”活动……

发起、组织上海“红三司”总部……

我成了不能自控的向左剧转的陀螺。

11月，重建“红三司”总部，我被一致推举为勤务组负责人，人称“安司令”，下辖大专院校中专技校等红卫兵近10万人。狂飚推我上涛头，我三分疑虑三分得意四分自信。

那时候，当头头无需看档案查阅历级级报批，关键看“文革”中的胆、识、才。这三者我似乎都不缺，尤其是口才惊人。呱哒呱哒，不用片纸可以说上三四个钟点且绝少破句。这也许得益于“四清”运动的锻炼。

那时候，当头头也简单，关键在你本身的感召力、凝聚力。这一点也不难。封建宗法观念体现在红卫兵组织里是对头头的绝对服从，这是愚盲、迷信的扩展、下移，是丧失独立人格的红卫兵对强权的不自觉依附。有些红卫兵以见到安司令为荣，可见他们瞳仁里的安司令也有一轮光圈。我不再是真实的我了！理当悲哀的我，彼时彼地却很得意，自以为挺伟大的。我自己弄不清我是谁了！想起西方哲人的一句话：“什么样的民众产生什么样的领袖。”推而论之，要是没

有8亿人民的崇拜爱戴，毛泽东同志的个人迷信也不会那么严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从某种意义上说，神化的毛泽东是中国人自己种出来的。红卫兵本着“反修防修”的目的，高呼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但是无论是思想武器还是行为方式、组织形式都有着封建主义的深刻烙印，这就决定了红卫兵运动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性质和它必然溃灭的命运。

可怕的是崇拜的偶像被当成了万能之神！我在崇拜大偶像的同时也被当作小偶像被人崇拜。

三

1967年1月，上海发“疟疾”。自然界的寒潮使它抖索，政治上的夺权风暴使它高烧。我也在“一月风暴”中从沸点跌向冰点。

1月1日，我指挥近千名“红三司”战士浩浩荡荡冲进上海市公安局，宣布接管市局和各分局。何以有偌大狗胆？一有元旦社论的指示：“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二有中央首长的具体指示，“公安机关是地地道道的黑窝子”（江青）；“大多数公、检、法机关都是死保当地走资派、镇压革命群众的。不把原来的那一套坏东西彻底砸烂，就永远跟不上毛泽东思想”（谢富治）。三是夺权态势的推动。《文汇报》被造反派接管后，毛泽东高度赞扬：“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此言一出，风暴骤起。“工总司”、“红革会”、“炮司”、同济

"东方红公社"、交大"反到底兵团"……以"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气势先后接管华东局、上海市委、市政府、港务局、铁路局……巍巍机关成风化岩石，沉沉乌纱似秋风落叶。这就是震撼世界的"一月风暴"。陈丕显、曹荻秋望风兴叹；张春桥、姚文元弹冠相庆！我们"红三司"岂敢落后又岂肯落后。

下午4时许，王洪文带一批其他组织的头头闯进公安局，要求和我们联合接管。我心里明白他们无非是想"利益均沾"，但还是佯装大度地表示同意。公安局联合接管委员会成立，我任主任委员。妈妈听说后吓得语无伦次，我却傲然一笑。

"文革"进行到1月，上海已成三强鼎立之势：市委机关联络站，上海工人造反队，造反派红卫兵。"机联站"的秀才摆出"上海文革小组"的架势发号施令，人少权大；"工总司"得毛主席肯定，张春桥撑腰，势力日盛；惟有大学红卫兵已成强弩之末，我已敏感到有失势、失宠的可能。中国知识分子在历次大变革中的使用价值就是当吹鼓手。随着运动的发展，造反派到了夺权阶段，抢大印，插派旗，排座次的内讧也趋向白热化。我们红卫兵比"工总司"多一点虔诚，但在"一月风暴"中同样沾染了进京后的刘宗敏、牛金星的气味。"红三司"接管公安局的动机之一就是亮旗子，争头功，有明显的山头主义。

傍晚6时许，王洪文等人又匆匆赶来，一个个拉长嘴角宣布退出联合接管。王洪文责令我"两小时内撤出"。我躁火蹿了几丈高，骂他"变色虫"。王洪文冷冷一笑，甩下一句："不撤就对你们采取革命行动!"我们就唱："滚滚滚!

滚你妈的蛋!"当时的王洪文只不过是工人造反派的头头，红卫兵们不太买他的帐。但他两小时内的突变使我不能不想到促使他急转弯的幕后人物。我估计是张春桥，其他人没有左右王洪文的能耐。不久，朱永嘉从丁香花园急匆匆赶来，把我拽进厕所，好意地劝我撤退。他说："春桥表了态：不支持。"又责怪我："这么重大的行动怎么能不向他请示!"我的情绪大跌。张春桥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上海工作，他的表态等于最终判决。我能不懊丧吗？张春桥整人的手腕我早有所闻，扶徐景贤疏郭仁杰，拉王洪文打耿金章，完全是亲我者贤、疏我者贼那一套。8点差一刻，公安局门口贴出了大字报："张春桥同志指示：对'红三司'接管公安局，一不支持，二不反对，三不表态。"这是不表态的表态。这对我是迎头一闷棍，我心里想到了完蛋！垮台！坐牢……甚至想到了潜逃。但我装得镇定自若，一边电令复旦、交大、师院、政法学院派人增援，一边把在局的其他组织头头和代表约近50人请进会议室，向他们介绍情况。介绍会变成辩论会，唇枪舌剑的斗得很激烈。好在我有政法"红三司"提供的关于公安局领导支持"走资派"的材料和公安局内部造反派提供的关于黄赤波、杜蔚然的真假掺和的、从政治言论到生活作风的第一手资料。4小时的辩论中我始终占着上风。"工总司"的一位代表当场撕了"工总司"证件，说："我支持你们!""财革会"头头说："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代表说："北京红卫兵愿作你们的后盾!"我却没有兴奋的感觉，我明白，决定胜负的关键在北京。

公安局大院里挤满了"红三司"战士。对组织的忠诚，

对头头的信赖，使他们无需思考地站到了张春桥的对立面。隆冬的子夜，北风凄厉，成千的红卫兵正唱着如泣如诉催人泣下的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第二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其中一段话是："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应当像上海的革命造反派那样，在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下，进一步联合起来，把文化大革命和生产的领导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掌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自己掌握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及时明确的仲裁啊。我当时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尤其是"自己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一句不啻是最明朗的肯定。彻夜不眠的上千红卫兵狂呼："我们胜利啦!""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也感动得涕泪横流。上午，"工总司"等27个造反组织主动上门承认"有个认识过程"，表示要发出支持我们的《联合声明》以挽回影响。下午，张春桥亲自召见，回避昨天的"三不指示"，说："我的态度嘛，一句话：我支持你们。"事后才明白，当天深夜，他就"红三司"接管公安局请示了中央文革的其他领导，答复是"要坚决支持。"我压下心中的不满，即令下属组织马上把"春桥同志支持我们"的标语刷满全上海。

坦白说，在公安局问题上，我与张春桥、王洪文的矛盾根本不存在原则是非。接管公安局是"一月风暴"的组成部分，是大乱上海的错误行动。实质上是为张春桥实施坐镇上海掀起全国性夺权风暴服务的。不久，张始而反对继而支持的反复造成了造成派内部的公开对立，又暴露了他以我划线的偏窄心理和文过饰非的诡诈嘴脸，这是促成我们日后炮打

张春桥的原因之一。

13日中午，我赶回复旦，针对“红革会”在公安局接管问题上站在王洪文一边，炮制了《向红革会某些负责人大喝一声》的大字报，指控他们“制造分裂，排斥异己”，“学市侩争名夺利”。次日，“红革会”贴出《是谁制造分裂》的大字报，指控我们是“脑袋开始发修的投机商”。随即，我们又贴出《分歧从何而来》的反驳大字报。红卫兵开始第二次裂变。因为上海三大红卫兵组织的头头都是复旦学生，马立新、劳元一、周谷声和我。复旦因此被张春桥称作“藏龙伏虎之地，虎豹豺狼之窝”，被徐景贤称作“上海的晴雨表”。复旦园的内战很快波及全上海。我是挑起这场内战的祸首之一。

红卫兵运动在1967年1月达到峰巅，也开始了衰败。在中央文革小组等一伙的眼中，大学红卫兵完成了“历史使命”，渐渐失去使用价值，甚至成了某种累赘。于是，在两报一刊上再看不到《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而是“要斗私批修”、“要向工人阶级学习”的教诲。也就是说，你们到了革自己命的阶段。始乱之，终弃之，大学红卫兵是可悲的；但这种被弃使我们没有在极左道路上滑得更深更远，其中一部分开始自省，这又是红卫兵的大幸。

四

1967年1月28日，复旦大学爆发了震惊全国的“炮打

张春桥事件"。我作为组织领导者之一，不久被押上批斗台，我的生活与思想也发生了急转弯。命运替我划了条黑色的孤线。

1979年，有人称这一事件是"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先声"。我觉得，不承认这一事件对"四人帮"的冲击，以及客观上有助于群众对"四人帮"的认识固然有失公允，但是过高的溢美之辞也不符合我们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从没想过要去充当反"四人帮"的英雄，就像我从不认为自己是红卫兵暴徒一样。我之所以炮打张春桥，原因有二：

一是对张春桥劣性的直觉与敏感。任何东西隔远了看有一种"朦胧美"，走近看或钻进去看往往大失所望。我这人至今还相信自己的第一印象。对聂元梓、蒯大富以至张春桥，一接触就没有好感。1月中旬，在一次张主持的联席会议上，他突然提出让上海戏剧学院的赵某参加会议。赵是"红三司"发起人之一，后因有私自抄家侵吞抄家物资等行为经张春桥默许关进了地牢。出来后，他拼凑个"上三司"在上海到处张贴"立即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上海新市委"。高级马屁拍得正是时候，昔日阶下囚成了今日座上宾。我很反感，觉得张是搞培植亲信宠纳小人的一套。加上接管公安局时，张的"三不指示"以及12日接见时的文过饰非，我觉得此人不坦荡、不磊落，没有左派味。

二是怀疑一切的理论驱使。上海人民公社（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前身，张春桥取的怪名）的成立标志着上海运动的新阶段，"走资派"倒了以后，狂劲尚足的红卫兵寻找着新的宣泄口。愈演愈烈的内战是其一，把矛头指向新政权中的可疑人物是其二。"怀疑一切"成了最时髦的口号。当时，对

张春桥的怀疑还没有充足的材料，可是疑窦一开也就该挨炮了。张不是旧市委的文教书记吗？旧市委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他就一身洁白？他老婆文静不是有历史问题吗？亲不亲，阶级分。他老张屁股没坐歪吗？这么追下去，确实不干净的张春桥也就露了部分真相。

三是对“文革”中极左恶行的本能反叛。我这个人受家庭影响和西方书籍熏陶，人情味很重。这是我在“文革”中不参加武斗、不参加抄家的内在原因。我一边在狂涛中冲浪，一边在浓雾中迷茫……在理性灰飞的浩劫中，我看到的血泪、尸体实在是太多太多。跳楼的外文系教师裸露的白骨，上吊的化学系教师暴突的眼睛，苏步青头上淋漓的墨水，谢希德胸前沉重的木牌……交织成一幅毛骨悚然的恶梦。我厌恶暴力，同情弱者，因为我本就是孤寂的弱者。可是我又在弄潮的位置。尽管我自己不参与武斗、抄家，但这也只是“君子远庖厨”的伪善。这是想摆脱又无法摆脱的痛苦。巴金先生一度被押到我校劳动，住在与我相邻的房间里，每天拿长条帚清扫厕所。我曾以中文系学生的身份私下找他交谈过两次，听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地谈他的身世和创作。我心里驱不散对他的敬重。18 年后，我写了颇得好评的散文《“清洁工”巴金》，发在《星火》上，我是诚挚的……另一次，我去参加上海师院“红三司”女红卫兵 E 的追悼大会，她是在外地串联宣传最新指示时被流弹打死的。我作了半小时声泪俱下的讲话，号召大家向她学习。但内心却有个声音在叫：“不值！不该！”她父母成份不好，主持人居然不让他们上台。我一拍桌子责令主持人去请。但她的爸爸摆摆手，她的妈妈摇摇头，我的心也铅一般沉……尚未泯

灭的良知与“文化革命”潜意识的对立和抗争在炮打中寻到了喷发的裂隙。

这三大因素再加上“毛主席对张春桥有看法，迟迟不发上海公社成立的报道”这类小道消息的鼓动，还有听说“红革会”、“炮司”正准备搞张春桥后不甘落后而沦为新保皇派的山头主义考虑，扭合成我奋而炮打张春桥的动力。“四人帮”垮台后，有人攻击我们打张是“争权夺利”，这是无聊！而参加过炮打的一些人又摆出先知先觉的面孔，这同样是无聊！起码，我自以为既非跳蚤亦非龙种。对前者我冷冷一笑，对后者我淡淡一笑。反正我就是我，不是英雄也不是臭虫！

1月中旬，我们复旦率先贴出了一批言词含混但所指明确的大字报、大标语：《怀疑一切的革命精神万岁》，《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警惕反革命两面派》。接着又贴出针对徐景贤等机关联络站的大字报，企图从这里撕开口子再攻背后的张春桥。复旦伤风，上海感冒，来看大字报的人比南京路上的还多。张春桥一伙慌了。大约是22日下午，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负责人召集上海各群众团体头头开会，一个个点名要大家就复旦大字报表态，我虚晃一枪说：“没有材料证明张春桥有严重问题，我就承认他是革命左派。”而周谷声、胡守钧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说“相信群众嘛，你们紧张个屁！”当天晚上，“机联站”二把手郭××把我请到家里吃狗肉，他劝我：“头脑不要发热！不要摔了跟头还不知道怎么摔的。”又透露：“徐景贤和我想让你进市写作班子，春桥、文元也没意见。不过，你现在还没毕业又当着头头。毕业后再说吧。”我不是傻瓜，这块诱饵我不会吞。郭××

个性耿直，向来直来直去，那天说话却弯弯绕，我估计他是替张春桥、徐景贤当说客。1月26日，“红革会”、“红三司”、“炮司”三军倒戈，直接把矛头戳向张春桥：《再问张春桥二十个为什么》，《警惕中国的赫鲁晓夫》，《我们不保》……从全市涌来看大字报的人把大字报区塞得水泄不通。三路有轨电车出现通车史上第一个高峰。下午，张春桥应约到友谊电影院会见600多“红革会”战士，遭到长达6小时的围攻、训斥。同日，复旦“红革会”派兵奇袭丁香花园，绑架了徐景贤、郭××，并关押在复旦外文楼。28日夜，张春桥以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身份命令解放军某师郭政委，动用全副武装的吉普车2辆，三人摩托18辆冲进复旦园，要用武力解救徐、郭二人。并对骚动的复旦红卫兵实施武力警告。这显然是火上加油的败招。内战未息的三派在高压下迅即结成了“反张神圣同盟”。原本在观望犹疑的学生也在枪口下呼出了“保卫复旦园”的口号。深夜召开的全校大会群情激昂，吼声震天。那一天阴雨霏霏，可我浑身燥热。“妈的！把枪对准我们红卫兵等于对准伟大统帅毛主席！”我的几个朋友劝我不要急于表态，再看看发展动态。我说：“不行！张春桥动枪，我们起码得动口、动笔！”我急匆匆赶到大礼堂，和两天前还在打内战的“红革会”头头紧紧握手。在会上作了《再问张春桥八个为什么》的鼓动性发言。会开了两个多小时，调门越来越高，火药味越来越浓。最后，大会一致决定：1月30日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性炮打张春桥的誓师大会，会后举行反张示威游行。口号是：“万炮齐轰张春桥！”

当时我很乐观，得意地认为，就凭我们的大示威足以使

张春桥下台。但是，我完全估计错了。29日凌晨，“工总司”、同济“东方红公社”等宣传车开进复旦，大量散发油印的《中央文革特急电报》。电文措词十分严厉，其中第五条云：“希望复旦的同学们，帮助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我们将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后果应当由制造这次事件的某些负责人和幕后的操纵者负责。”这是整个“文革”过程中，中央文革发给红卫兵的唯一的特急电报。当天，徐景贤、郭××坐车驶出复旦，上海其他保张组织变相占领复旦园。

我们对特急电报的真实性心存疑问，总觉得中央文革不可能用这种方式，这种语气对待革命小将。我们没有意识到随着“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红卫兵已是过山后的拐杖。已经失宠的我们纯粹是自多情。30日，我们赴京核实电报真伪并伺机告状。先到北大找聂元梓，聂借口离不开会场拒绝见面。再到清华找蒯大富，蒯司令说电报是经江青、康生批阅后拍发的。他说了句聪明话：“历史要为现实服务。上海能乱吗？张春桥能倒吗？”我茅塞顿开！上海已成夺权样板，张春桥是“一月风暴”大功臣。现实需要他，他就倒不了！这就叫“一切从革命利益出发”！我够蠢够愚够天真的了！

其实，反思我所见过的政治斗争，有哪一次没有舆论一律、味道浓烈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当时，我没有这份认识，但是，心冷了。人心一冷，脑壳也降温，这是“自我回归”的开始。

然而，“文革”不需要自我。谁要我就得准备受批判！

2月3日回到上海。等待我们的是刷遍上海的大标语：

“坚决反击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坏头头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绞死劳元一!”“砸烂周谷声!”“油炸安文江!”

先在全校大会上作检查，我用了三个小时。郭××指示将我的检查录音翻印成册由大家评点，结论是“不是检查而是辩护词”。接着在文化广场召开近8万人参加的全市性批判会。押上台的是我、劳元一、马立新、周谷声，主持人是郭××、徐景贤、王洪文等。然后，我被勒令到各高校巡回挨批，先到上海财经学院，再到华东政法学院……好在是“红三司”占绝对优势的院校，战友们对我很文明。上台前先打招呼：“说得过火处别放在心上，批判嘛。”在复旦更是“惺惺惜惺惺”，大家心照不宣，除极少数看风派，极个别对中央文革怀着真诚感情的同学，谁也没想要和“坏头头”划清界限。在“红三司”整风会上，大家还叫我作动员报告。郭××气得骂：“怪事一桩！让安司令作整风动员报告，整谁的风嘛!”要在政治上搞垮一个人很容易，要在政治上搞臭一个人却很难！这大概是有某种规律的。

其实，我自己把昨天的我打倒了……我失去许多我也得到了许多；我糊涂了不少也明白了不少。吃大亏换来个大明白：我没有脑袋!

虔诚的教徒有宁静的心境。癫狂的白痴没有痛苦的神经。我虔诚过，我癫狂过。一旦清醒，接踵而来的便是痛苦。这种痛苦由于找不到新的精神支柱，看不清前行的目标而格外深切。希望的幻灭，理想的失落，被愚弄的激愤，被诱奸的耻辱把我压进思索、寻觅的炼狱……

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小刘曾在3月初来看我，他忿忿地说：“你还忙乎些啥啊！老子算看透了！红卫兵是啥玩意?

抹桌布！打狗棍！我们傻不愣儿的造反呀夺权呀，到头来肥了谁?！中央文革一帮酸秀才呗！北京的老红卫兵除了蒯大富他们几个既得利益者还在闹腾，谁不是透心凉的！”他还向我透露了不少消息：清华附中卜大华一伙公开反江青，北京公安局一次就抓走了120多名；有10多个高干子弟窜到凭祥越过国境线到越南参加抗美斗争；有一名老红卫兵绝望得割动脉自杀……他凄苦地笑着说：“完啦！我们毁掉的东西很多，包括我们自己。”这句话激起我强烈的共鸣，在我耳廓里震响了很久很久……

但是，小刘是高干子弟，这使我很难接受他的许多尖锐的观点。他甚至毫不隐讳地批评“毛主席晚年糊涂了”，说“母鸡司晨天下必乱”等等，这在当时我是绝对接受不了的，我还不敢往更深层去想。也许是我多一点工农子弟朴素的阶级感情，也许是我对某些高干子弟有不可名状的反感——

1966年5月29日，创造“红卫兵”一词的是清华附中的高干子弟，最早抡铜头皮带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是高干子弟，最早杀向全国串联播火的是高干子弟……他们耳聪目敏，他们悍勇敢斗，他们有恃无恐。他们最早感悟到“亡党亡国”的危险，于是最早喷发“誓死捍卫”的激情。他们具有“八旗子弟”的至尊心理，于是高呼“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革命儿接班”，要害是接班。他们认为自己是父辈打下的江山的当然卫兵，于是傲岸地宣布：“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他们不乏虔诚和忠贞，也不乏桀骜和狂悖。当“文革”进入揭批资反路线阶段，狂流倒灌，野火反窜，乌纱纷纷坠地，大院阴风凄雨时，他们震惊地发现自己的父辈一夜之间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自己由当然

的“红五类”沦为“黑七类”时，他们像钱塘大潮汹涌而兴急遽而退。于是，他们最早撕毁红卫兵大旗，最早发起对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冲击。待十年浩劫过去，他们中的一部分在磨难中挺起了脊梁，一部分忙于营修失而复得的楼园，也有相当一部分声色犬马利用昔日的权势、父辈的威望，以十倍的疯狂向社会讨索青春失落的利息——这是一页某些人不愿或不敢过多翻阅的历史！我认为，他们的功过是非放在中国这块宗法观念浓重的土地上剖析，不难作出公正的判断。遗憾的是这一批红卫兵的重要群体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特别是在揪“三种人”时，大概因为退潮早而被遗忘。有一位豪门千金，曾是狂暴地揪斗殴打老舍、曹禺等文化名人的组织者之一，这一条放在一般老红卫兵头上，够得上“打砸枪”吧？但是，报刊上出现的是对她的绝对正面的吹捧。我毫无将谁揪出来的用意，上帝最能原谅受骗的修女。但人人平等是必须的，这是民主政治的标记！“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不得人心的封建体制的残余。

炮打受挫后，张春桥指示复旦“重新组织队伍”。受命主持复旦工作的郭仁杰组织了旷日持久的“反逆流斗争”。我在六号楼阁楼上单身独宿，在迷蒙中寻找自己失落的脑袋……

1967年春天来了，复旦园还在凛冽的寒风中哆嗦。郭仁杰假传圣旨说毛主席曾明确表态：“中央文革特急电报有杀劲”，还说炮打张春桥“这笔帐一定要算”。（后来揪郭仁杰，张春桥说他没传达过；而郭的笔记本上明明白白记着“春桥同志传达……”）当时，我如堕冰洞，害怕在其次，主要是困惑。我搞不清自己错在哪里？又不敢怀疑“最高指

示”。第一次怀疑毛主席受了骗，可是“洞察一切”的导师会受骗？我糊涂了，心里空空荡荡的。3月底，我和几个同学悄然离开复旦到南方去游山玩水。全国大串联时，我们满怀政治热情留校闹革命，亏了。现在，憋在复旦挨整当然没有“忘情于山水之间”洒脱与超然。

现在想想，我在“文革”中真该当一个消遥派。在人人皆疯时，唯独逍遥派没疯——因为他们没有疯的资格。逍遥派基本上是被极左路线排斥在红卫兵之外的所谓“黑五类”、“狗崽子”。于是，他们有条件、有时间走南闯北游览名山大川，或者躲在家里啃书本读外语，寄托被遗弃被歧视的灵魂。浩劫过后，“两派都应否定”，唯逍遥派不存在否定问题。因此，一查档案，他们最清最白。提拔干部，选派出国，他们成了最理想的人选。我同年级同学中有几位处、局级领导干部，没一个“铁杆保皇派”，也没一个“响当当的造反派”。别以为我当官不得发牢骚。不是！当初，一腔赤诚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工农子弟迄今还有相当一批人被沉重的档案袋压着。这使我想起，第一批国民党战犯大赦是在他们关押十年之后，他们得到了安置或当了什么委员之类的。宽容得到报答，豁达得到赞赏。红卫兵造反至今已有29年，对他们20岁左右时的过失何以不能给予更多的理解与宽容?！历史的恶作剧叫人啼笑皆非。我们党有魄力对沈醉先生等实行统战，我想更该对红卫兵统一统的。

我们一行偷偷溜出校门向南进发。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四川、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但是，南国春光，秀山碧水不但难以使我宠辱皆忘，相反刻下了无法抹去的悲怆。又一次失落，又一次幻灭。

江南没有向我展示她的明媚秀色……广州白云山衣衫褴褛的乞丐向我伸出污黑的手指；平陆动物园门口，人民的警察用皮带抽打一位用石子丢过猴子的游人；阳朔的农田上蹒行着人拉的木犁；安顺饭馆内刚挥去嗡嗡叫的苍蝇又围上一大群要饭的孩子；川江岸边古铜色的纤夫拽拉着逆流而上的破帆；庐山脚下一群冷漠的看客围观着一具倒毙的尸体……懂事后第一次走出大上海，看到如此的贫穷、寒伧、凄苦的图景，我给震懵了！从小到大，唱的是"社会主义好"；学的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推崇的作品是"童子面桃花开了"，"地球像颗红玛瑙"……我心中有一股想吼叫想骂娘的冲动。想起闻一多的诗：

> 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
> 我会见的是噩梦，哪里是你？
> 那是恐怖，是恶梦挂着悬崖，
>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
> 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
> 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
> 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 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
> ……
>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写于军阀混战时的《发现》竟和60年代的我产生共鸣，我惶悚，我困惑。我发现自己确是个十足的书生，以前的20多年像浮在虚幻的云中，脚没有踩踏在沉甸甸的黑土地

上。

还有更令人心悸的场景。

在贵州安顺碰到上海建材学校分配去贵阳的同乡，他说了许多当地的落后、愚昧。在黄果树竹楼里，不少人家把毛主席像供在佛龛里点火跪拜，他们不相信毛主席是真实存在的人，而是菩萨；到重庆，恰遇“反到底”和“红成”械斗，当天又听到《红岩》作者罗广斌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在武汉，数万人在政府大院外静坐绝食，已有一名饿毙；……在九江我听说赣州打派仗，被俘虏的冶院女学生被押送到农村，最“革命”的惩罚是蹂躏其身心……

这就是“全国山河一片红?”这就是“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收获最大最大最大?”这就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

天真的我当时还害怕看到幕后的答案，努力用“局部的”、“暂时的”自解自慰。可是活生生的现实是空洞的理论压不住的，我开始怀疑“安司令”的价值。

斗牛罢斗，陀螺减速，我在迷雾中求索。

六

4月底重返复旦园，我有一种回囚笼的感觉。樱花开了，白得像雪。草坪绿了，青得像船。同学们都说我黑了，瘦了，消沉了，我只有苦涩地笑。

郭××找我：“你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立新功。”我心里想：包袱能放，轻装做不到了，许许多多的问号沉甸甸地压着我。

同学们在礼堂里用掌声欢迎我，我上台只说了5分钟，其中3分钟是请大家起立为罗广斌默哀。至此，我还能说些什么？

冷眼向洋看复旦，复旦一片压抑的沉寂。坐镇复旦的郭××指挥棒失灵，“反逆流”阻力重重。为了控制学校运动，他炮制“共产党员造反联络站”，扶持所谓“轻舟派”，提出“归口闹革命”；出版《新复旦》，把我们比作阎王，提出：“打倒阎王！”造反派红卫兵不甘沉默，针锋相对地提出：“让联络站见鬼去吧！”“保护革命小将！尽快解放一批头头！”于是，“保郭”与“倒郭”成了复旦的主要矛盾。其实“倒郭”是假，反张是真，一股再次炮打张春桥的暗流正在沉默中汇聚、运行。校门口柏油马路上刷着两行石灰水写的大字：“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正是复旦人情绪的典型反映。接着，有人贴出《复旦园里新资反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的大字报，“倒郭”由地下转入公开。

红卫兵是可悲的。我们没有意识到随着王洪文、徐景贤们的崛起，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退潮的颓势，再抗争也徒劳。

郭××是可悲的。他心怀被张春桥冷落、在市革会被排斥的怨愤却又秉承张春桥旨意挥舞大棒。一次喝醉酒，他对我大发“良弓藏，走狗烹”的牢骚。不幸而言中，最后他被张春桥甩出来含愤自杀。他有所醒悟却为时已晚。

张春桥们扶植的红卫兵只有一类，即死心塌地护卫他们的陈敢峰之流。陈是同济大学“东方红公社”的头头，以看风使舵出名。“文革”初期，陈丕显同志养病。他说：“陈是毛主席肯定的红小鬼，不能动！”聂元梓到上海煽风点了陈

的名，陈敢峰马上表态："和上海头号走资派血战到底！"1月26日，他打电话向我摸底准备炮打，他接管的铁路局已在北上列车两侧刷上"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一到，他最早组织宣传车到复旦狂呼："坚决拥护张春桥的正确领导！""誓死保卫中央文革！"上海人称他为"陈看风"毫不冤枉他。可怕的不是投机者的存在而是他们被赏识重用。我想，假如陈敢峰不上大学，他只是个聪明的福建农民；假如他不搞投机，他只是个一般的技术人员……结果呢，青云直上，"市革会"常委、"红代会"主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直至当了林彪死党王维国的妹夫，锒铛入狱一命呜呼！历史上，投机而得善终的为数寥寥。所以，做人还是率真坦诚为上。陈敢峰被重用对他本人是上火炉，对我却是个教育。我由此看透了张春桥一伙的尊容。卒子往往是主子的镜子！

上海"红三司"仍认我为头，但我消极怠工，大权旁落到他人的手里。我很悠然。

复旦"红卫兵师"成立，我是常委兼管宣传，但我不管不问神游物外。我很坦然。

新我没有找到，旧我决不继续。这是一段空空落落迷迷沌沌的转型期。

大学五年级，按惯例7月分配。我只盼着早点分配，走向社会，对复旦已毫无眷恋之情。回想1962年8月第一次跨进校门时我那种欣喜的感觉，像逝去的幻景。5年，一场迷梦，一场恶梦。

可是，中央决定，大学生暂不分配，继续留校闹革命。又是一桶迎头冷水。继续一年？两年？天晓得。

我第一次产生对不起妈妈和哥哥的疚愧。我们班 70% 的同学享受着助学金，而我这个经济条件偏下的没提出过一分钱的申请。总觉得党和政府送我上大学不易，能克服的就不该伸手。这份觉悟大大高于某些党员同学们。为了每个月 15 元 5 角的伙食和杂用费，妈妈扳酸了指头，刚刚从师院毕业的哥哥作出了牺牲。原想读了 5 年走上工作岗位，让妈妈脸上多一丝笑意，让哥哥少一些拮据。而今还得“革命”，且是我渐渐厌倦甚至厌恶的“革命”。

我只有一种选择：混！

忘我的狂热消淡，自我得失的盘算增长，当时还有腆颜，现在想想倒是跨跃前的后缩，未必不是进步。

我是汪洋中的一滴水，基本成分是 H_2O，和别的水没本质区别，但主客观原因使我 1966 年跃上涛头，1967 年又跌向浪谷。也许，我的跌宕幅度大些，但红卫兵的际遭是类似的。狂热——迷茫——震惊——压抑——自省——清醒——抗争……是大多数红卫兵的共同心迹。

复旦没有平静过，校内的“反逆流”、“倒郭”斗争、“打杨”战役、“红复旦”成立，校外的“上柴”、“联司”之争，对“市革会”的冲击……时阴时雨，就是没有晴天。从押上文化广场那天起，我再没写过一份大字报，偶尔也到一些高校走走，上台发一通很应时的讲话，但“文革”初期的热情锐减。五角场饭店倒不时光顾，没有酒量，一杯啤酒下肚，晕晕乎乎蹒蹒跚跚回校园，真有点宠辱皆忘。毛选不太读了，报纸不常翻了，有时敞开鸭嗓唱几段京剧样板戏，声音倒像野狼嚎。

1967 年 11 月 4 日，空四军组成所谓军训团进驻复旦。

他们给学校的公开信中称："我们军训团的全体同志，一定拜你们为师，恭恭敬敬地向你们学习，做你们的小学生。"我心里明白，这只是挑在刀尖上的假面具。红卫兵挨整的新时期到了。像无汁可榨的甘蔗渣，红卫兵是进垃圾筒的时候了。他们进校3个月，我这个兼管宣传的"红卫兵师"常委一直与他们藏猫猫。作为军人，他们无愧是长城的砖石，作为人，他们也不缺七情六欲。但是，空四军作为林彪的直控部队，又受制于张春桥，他们进复旦是狼外婆敲门。果然，进校不久，他们秘密成立了"安文江专案组"、"胡守钧专案组"，为开刀准备砧板了。

1968年1月25日，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张春桥亲临会场，发表了长篇讲话。看来，他对揍复旦炮打耿耿于怀或者说心有余悸，他说："小资产阶级影响，修正主义影响，不知不觉地侵蚀到我们革命造反派队伍里来，它可能变幻形式，花样很多的，变成很漂亮的毒蛇，很叫人喜欢的毒蛇……我们要准备垮台，有了这个准备就不至于垮台。说不定哪一天又要分裂，有思想准备就不至于分裂。我希望把复旦大学这个顽固堡垒完全、彻底地占领过来！"有神经的人都听得出话中暗藏的杀机，文笔很精的张春桥居然在贺词结尾处使用这等冰冷的语辞，这绝非疏忽。

但是，我没有参加这次庆贺大会，尽管作为革委会成员，我理应上主席台亮相。有人说我"闹情绪"，这也不算冤枉我。在复旦革委会筹备时直至徐景贤出面平衡班子组成，我始终在常委席，但成立当天突然降为委员。军代表老魏解释说："你应该清楚，你父亲有历史问题！"我直视着他说："当然，我知道。而且我也知道姚文元同志的父亲，春

桥同志的父亲都是历史清白的'红五类'!"这句话是挖苦，姚父姚蓬子是鲁迅骂过的汉奸早已不是秘密，张父张开益出身地主任过军阀军职我是听市委某同志私下议论的。魏代表拍拍我的肩头说一句"要正确对待"就走了。我心想：我够正确的了。我祖父是木匠，30出头因拇指砍伤得破伤风去世，祖母28岁守寡至今，把年幼的女儿送给一户村夫当童养媳，自己携儿子到上海当佣人。我父亲16岁当工人，以后当海员，40年代中期因轮船公司裁员，失业回舟山，迫于生计当了年余税收员，挂过没子弹的驳壳枪，在西安事变解决的定海庆祝会上，他和游行者一起的确喊过"蒋委员长万岁"……历史问题?!哈！蒯大富说得妙："历史要为现实服务。"张春桥等人在我入阁校革会问题上仅仅是执行"阶级路线"吗？我心里明白：只要在张某人统辖的上海，我安某人绝无出头之日。所以，谋官而不得的情绪本人没有，由此遭人议论或者怜悯的忿懑情绪倒是有的。新闻系某君劝我："会还是去开，否则老张会怎么想?"我说："他想他的，我躲我的呗。"掩饰自我充当人生大舞台的演员，比如说满脸嗲笑地上台对张春桥说："您好!"这需要高超的技艺。我没有，至今也学不会。为此吃了许多亏，还是学不会。

在这一年中，我过得稀里糊涂，也不想多说。震撼全球的武力镇压"上柴联司"前夜，我接到总部电话，说可以去"前线指挥部"观战，我提不起劲来没有去。第二天凌晨我去"市革会"，只见大厅里躺满伤员，才知道张春桥策动、王洪文等人指挥的这场血战是何等激烈，何等残酷。这是上海唯一的一次大规模械斗，组织者竟是"工总司"（实际指挥者是张春桥为首的"市革会"）。对"联司"，我的观点是

模糊的。我不是支联派，“红三司”的多数持反联态度，支持“东方红”。但对他们反对“市革会”，隐射张春桥又觉得快意。第三天，张春桥说：“砸‘联司’当天，我陪同毛主席坐车跑了趟南京路。主席说：‘看起来，上海市民挺高兴的嘛。’”意思是说，毛主席支持砸“联司”，这一笔历史血债谁又敢算。不过，我怀疑他扯虎皮，因为毛主席一贯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文化革命”演化为血流成河的惨剧显然有悖他的初衷，他是覆水难收了。

不久，以“红革会”为首，复旦园掀起第二次炮打张春桥运动。这一次，口号更激烈，但逆转得更快。我在二次炮打中只充当了热情的观众，幕后的鼓吹者，没有公开跳出来疾叫。是胆怯？是保张？不是。教训使我明白：材料再多，没有中央表态也没用。只要张有“现实价值”，什么“历史问题”、“现实问题”都压不倒他。我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量，以为打倒“走资派”成立红色新政权有我们群众运动的大功劳。其实，我们只是被少数人作为“运动群众”的对象而已。如列宁所批评的：知识分子的叫嚣声比他们的力量大千百倍。我们却把口气当作力气，想推翻一切，创造一切。智者的无知！

毛主席说：“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人民日报》说：“对于红卫兵小将也必须作阶级分析。”“如果不能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任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自己的头脑里泛滥，那就有被阶级敌人利用的危险。”毛主席随即发表“要斗私批修”的著名号召……温度越降越低，态度越来越严，直到 1968 年 7 月大学红卫兵们被贬斥为“臭老九”，工宣队捧着仿造的芒果杀气腾腾地开进了复旦园。红

卫兵运动进入了没落期！说句刻薄话，红卫兵真叫祸人开始祸己告终！“狗”打跑了，打狗棍的最好归宿是灶膛！

当然，那时的我全没有“打狗棍”的清醒意识，只有涩辣的敏感。敏感积多了变成不满。不满积多了变成牢骚。牢骚不敢发作便退稳、逍遥。

安文江　上海复旦大学学生，造反派组织头领，因“炮打张春桥”事件而受迫害，现在深圳某高校工作，作家。

劳　班

峥嵘岁月

——成都武斗亲历记

一、武斗和流血事件

1967年5月6日，成都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六血案"。这件事发生时我在现场，它是我自运动以来亲眼目睹的第二次最大的武斗事件。我看见的第一次大武斗发生在四川国营棉织品一厂，时间仅在两天之前。两次事件都是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

川棉厂是一个有数千名职工的大厂，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妻子在那里当党委书记，因此保守派力量十分强大。从5月1日下午起，该厂的造反派与保守派发生了冲突，全市的造反派赶去声援。武斗一直持续，到5月4日晨达到高潮。我去那里时，战斗已经进行了好一阵，保守派被赶出了

各栋大楼，最后固守在一栋主楼上。

我不明白造反派为什么非要拿下那座大楼不可，那是极其艰难而危险的。那时尚处武斗初期，双方均未使用火器。因此，攻楼的过程完全和古代攻城一样。保守派把所有的楼道堵死，进攻只能用长梯架在外面墙上进行。进攻者力图顺长梯爬进窗口或爬上楼顶平台，防守者则从窗口和顶层居高临下地砸大石块，甚至水泥预制板。梯子不断被掀翻，被砸断。进攻者接近窗口时被木棍戳翻或被石块砸倒从高高的梯子上摔下来。战斗延续了两三个小时，从不间断。从长梯上摔下来、砸下来的人不知有多少，场面极其惨烈。

久攻不下，进攻一方只好改变战术，他们艰苦地捅开楼道的堵塞物，从下面层层攻上去。最后，只见一个窗口飘起一块白布，防守一方投降了。从大楼里走出上百名投降者，他们高举双手，在长长的人墙中穿行，遭到辱骂和唾沫袭击。我看见我校一个女同学高举双手走在战俘队伍中，颇为惊奇。

在保守派业已失败之后大约半小时，他们的援军到了。支援部队基本上由退伍军人组成，大约有近万人。他们身着一色工作服，大头皮鞋，步伐整齐，落地铿锵有声。造反派全是游兵散勇，但人数要多几倍。支援部队列成方阵在人丛中穿行，如入无人之境。最后，双方在河边一大块空地旁聚集起来，形成对峙局面。

保守派阵营前排有一层盾牌保护，他们之中靠前的人还手持短棍。造反派一方则是一锅大杂烩，既无组织，也没有防御工具。河边地方全是鹅卵石，两边对扔石头，石块像冰雹一样落在人群里。这时我站在造反派阵线前列，没扔石

块，而是作仔细观察，不时地躲开飞来的石头。保守派显然训练有素，他们把石块扔得很远，就像战士在训练中扔手榴弹一样。几乎每一分钟都有人被击中，那些满面鲜血的负伤者被迅速抬下战场。虽然整个武斗始终是一片混乱，但不知有谁在组织，某些必不可少的事情总有人在做。比如，人们在长达好几个小时的战斗中能吃到热乎的食物，受伤者有人救护并被送医院。

相持局面只维持了大约 20 分钟，造反派阵营有几个十几岁的小孩，他们捡起破木板当盾牌冲过去，背后是雨点般的石块掩护他们。他们被打回来几次，最后还是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保守派终于未能坚持住，开始退却了。俗话说，“两军相逢勇者胜”，事情正是如此。保守派节节抵抗的退却很快就变成了抱头鼠窜，这是灾难性的，他们背对着进攻者，既不能还击，又不好保护自己。造反派在山呼海啸般的吼声中掩杀过去，获得大胜。

“五·六事件”的起因与过程大致与此类似。这一事件发生在一三二厂。这是一个大型的军用飞机制造厂，职工上万人。国防工厂属于保密单位，职工的家庭出身及本人政治面貌都极纯正，工厂自然是保守派的天下。厂中有少数工人（可能是临时工和辅助工）是造反派，他们遭到压制，于是向外边的战友求援。风声传到市内，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在许多大街上都有公共汽车在等人（成都市公共汽车公司是造反派——工人造反兵团的大本营）。我跳上一辆车，很快就到了离市中心 10 多公里的现场。

与川棉厂武斗不同的是，进攻者虽然也是赤手空拳，守卫者却是全副武装。当时中央有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冲击国

防工厂。像一三二厂这种高级别的保密单位，厂当局有开枪卫厂的权利。保守派卫厂队伍由退伍军人组成，他们前不久从中印边境复员到地方，个个勇悍异常。进攻者人多势众，他们无组织，手无寸铁，但仍然勇猛地冲向对方。防卫者且战且退，不时朝进攻者开枪，射手们枪法极精，几乎每枪必中。在死伤者较多时，进攻的人会暂时止步。这时双方僵持，手持自动步枪的卫厂队员在大楼里，大树后严密监视。进攻者不顾伤亡惨重，仍一波接一波地进攻，最后占领了主楼。

这时我见到了最悲壮无畏的场面。进攻者冲到主楼顶层平台上，挥舞大旗以示胜利。就像电影里苏联士兵攻占柏林后在国会大厦上舞动旗帜一样。但从旁边一栋楼上传来枪声，对方可能不允许这种宣告他们最后失败的举动。射手弹无虚发，挥舞大旗者捂胸捧腹，应声倒地，红旗随之跌落。但马上就有人拣起旗帜，继续挥舞。但接着再响一枪，又一人倒下。这样连倒数人，我在好几分钟内不见旗帜复立。这是精神上的较量，它当然不是力量上的抗衡。最后，还是有人毅然重举红旗，枪声没有继续下去。一队守卫者组织有方地持枪冲出包围，向外撤离。厂区内喊声动地，战旗纷飞，人们欣喜若狂，欢呼胜利。

在这场冲突中，我校一初中女生 H 胸部中弹身亡，她属于“成电东方红支队”，哥哥是一三二厂工人，她死时年仅 17 岁。一名高中女生 J 失踪。

J 是与我同派组织的头头之一，我与她很熟。据同去的目击者说，当大树后射出一枪击倒她前面一个小孩后，她从掩护物后从容地走出来，平静地向持枪者说：“我是去抬伤

员的。”她背着那小孩走了，对方没有射击，但此后再也未见到她。

这次事件死者50多人，伤者大约数百。过了两天，造反派以车载尸在全市游行，场面极为悲壮和隆重。保守派被声讨，在市内到处遭到攻击，这次事件导致蓉城保守派彻底覆灭。我们忙于处理死者后事，并设法打听J的下落。

许多人都不知道，我派“红成”（“红卫兵成都部队”）头头在此事件中持一种特殊立场。打保守派，声援造反派，他们不能公开反对。广大战士自发地去参战，他们无法阻止。本组织死伤严重，他们要追悼，抚慰，可能还要把这当成光荣的资本。但他们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反对冲击一三二厂，因为中央命令明明摆在那里，不准冲击就是不准冲击，没有含糊的余地。但另一派就不同，他们具体怎么看，我不知道，但他们肯定感觉到了道义上的压力。如果自己的战友正遭到攻击，难道可以坐视不救？川棉厂、一三二厂事件，以及静坐军区事件，都有这种因素。而“红成”头头甚至怀疑事件中有人搞鬼，在事件过程之中和之后，他们都暗中派人作了调查，想弄清是否有坏人混在造反派中冲击军工厂。我不知道他们得到了什么结论，但我知道他们曾向中央报告了自己的看法。

“五·六事件”之后，中央发来一电报，说要进行认真调查，追究开枪凶手。开枪者的下场完全随政治局势而变化。当造反派掌权时，他们被逮捕法办，判处徒刑。当造反派失势时，他们被宣布为护厂有功。现在看来，他们开枪是有法可依的，他们肯定不是罪犯。但似乎也没有任何方面说那些进攻者有罪，说那些死者罪有应得。文革中死了那么多人，

都是一笔糊涂帐。

J失踪之后，我们紧张地寻找了一个多星期，一直不知下落，我们想她必死无疑。正准备开追悼会（有人已经写了悼文），她突然出现了。原来她抢救伤员之后，跟着撤离者走，深入到保守派在农村的根据地，想看个究竟。她后来受伤，由部队救护，治愈后返回学校。大家见她之后又惊又喜，庆幸免去了一场悲剧。

大约从6月份起，我们学校中武斗连绵不断。开始是我们要求对立面的“八·二六”派搬出新教学楼，因为两派共用一楼，诸多不便。我们让他们使用小一些的旧楼，他们拒绝。我们的理由是人数比他们多几倍，但问题在于双方之间不存在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在争吵中，我们一些人强行把她们赶到旧楼，因为她们在场的全是女生，我方也只能是由女同学动手，她们又推又拉，没有伤人。后来，我校“八·二六”撤出了学校。客观地讲，我们一派确属以强凌弱。

过了不久，另一个学校的“八·二六”派出一支极精悍的武斗队在夜间袭击我们，施行报复。当时武斗初起，还未养成战斗的习惯，我听说外边有人侵人，跨出楼去，指着他们大声斥骂。这时一个人冲上前来，二话不说，举起弹弓就射。弹弓距我的脸不到一尺，我感到重重一击，眼冒金星，昏倒在地。我很快醒来，继续投入战斗，他们寡不敌众慌乱地撤了。但我方有一人被弹弓击中眼球，十分危险。我们用车将他送往川医抢救，川医是“红成”的天下，但眼科例外，对立派居多。医生见是“红成”派武斗伤员，显得不甚高兴，我们十分担心他们是否会认真医治。幸好，这位同学的眼睛没有失明。

到了8月份，“红成”派在市中区的据点被对方全部除去。我校靠城区西边，形势岌岌可危。这时，“红成”一派发动北上告状，主力大部离蓉，我们的处境更为恶劣。我校常常完全被对方围困，电话被截断，夜间受到骚扰和攻击。那段时间，我几乎没有认真躺下睡过觉。幸好同学们勇敢无畏，精诚团结，渡过了一次次危机。在武斗中，什么办法都想出来了，有人在容易破门而入的地方安上电网，有人从化学实验室中取出硝酸钾自制手榴弹和燃烧弹。一晚，在试制中不慎引起爆炸，操作者伤势很轻，但爆炸的巨响使手持棍棒、石块的围攻者知道我们拥有“超级武器”，不敢贸然进犯。我们最常采用的战术实际上是唱空城计。在预计激战即将来临之际，我们令广播员高声播送通知：“请‘一月风暴’战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每位队员带上乐器，紧急集合，准备马上演出。”我们力图给对方造成一种印象：我们正在用暗语下达作战命令，宣传队是指武斗队，乐器代表武器。我们希望对方知道我们已有准备，并且正在作紧急动员，因而放弃进攻。

在武斗期间，我们几个头头深感责任太大，有些担当不起。万一有同学死伤，我们如何向家长交待？特别是，我校学生大部分是女同学，她们固然勇敢坚强，但万一战斗中被俘，遭到对方组织当中流氓的凌辱，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毅然提出，武斗期间，解散队伍，各自回家。同学们大多不服从，我们只能尽力说服。有人提出，回家无事可干，闲不住，还是得来。我的解决办法纯然带有个人特征，我提出，回家看书去！我当即决定，打开图书馆（它实际上早已被盗不知多少次了，书已从原馆移到一间小房子里），每人各取

所需，待局势正常后返校恢复活动，并将书归还。我找到前校长，要她同意让大家拿书回家。她对我作出决定的动机非常理解和支持，但对同意我们开门取书犹豫不决，不敢作出决断。我觉得不能拖延了，立即下令行动。其实，我去找校长完全是多余的，她被打成黑帮，能有什么权力呢？我这么做，不过是力图把这种特殊情况下的行为和一般偷抢区别开而已。

运动后期，对立派中有人整我，他们大造舆论，说我带头偷书，往自己家中搬回一立方米的书。我将所取之书全数交回（其他人也都交回），并将收据小心保留，以防有人仍用此事和我过不去。下令将学校的书拿回家，这是我在“文革”中干过的一件确实授人以柄的事，但我至今不悔。在我有权管辖的范围内没有发生伤亡事件，没有家长来找我们哭诉，这就够了。

二、层出不穷的“间谍”案

文化大革命越来越与文化无关，越发像一场政治斗争。在我们小小的一个中学生组织中，一年之内竟发生了三起“间谍”事件。

当我们要求我校“八·二六”从新楼搬到旧楼时，我们的真实动机是，“红成”总部与我们联系日益频繁，经常来人，我们不愿让对方知道动静。也有人提出另一个理由：两个组织在一起，有利于他们搞间谍活动，刺探我们的机密。这种忧虑不是没有来由的。“八·二六”显得对我们组织内的

事情十分了解，甚至在他们大字报中多次披露，说“一月风暴”（我所属组织名称）的坏头头干了什么事情，说了什么话。他们的揭露确有其事，我们很早就怀疑他们在我们内部有暗探。

在强迫他们迁出之前，两派在会谈室举行谈判，双方自然有一番唇枪舌战。我未参加谈判，中途突然有人跑来向我报告，说大事不好，有人捅了漏子。原来，我方谈判代表见久久不能说服“八·二六”迁出，便指责他们赖着和我们在同一栋大楼，是为了便于搞间谍活动。正在这节骨眼上，“八·二六”谈判代表接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搞间谍活动的不是‘八·二六’，而是‘红成’，我就是他们派到你们组织里的间谍，我可以出来作证。”我们的一号头目 M 是我方首席谈判代表，听到对方念了这么一张条子，感到莫名其妙。他建议休会，回来问我们是怎么回事。

我半天没有反应过来出了什么事，这时 W 出现了，我才恍然大悟，和他一道向 M 禀报事情缘由。

在我们组织中，还有我的一个同班同学 C。他没有当头头，但由于是高三学生，聪明能干，在组织中颇有发言权。他看了大量的侦探小说和谍报活动回忆录，可能是想小试身手，曾向我建议说，既然对方肯定在我方安了内线，我们也应采取相应行动。不然，人家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要吃大亏。另外，在与本校“八·二六”的一次小冲突中，有人抢到对方头头的一个笔记本，他仔细翻阅了，上面有刚去川大开会的记录，里面赫然写着，以后时机成熟时要揪“红成”在中央的后台周恩来。这自然是极为重要的情报，虽然由于它来路不正，我们不能将它作为炮弹攻击对方。鉴于历来的

想法和这次收获，C重提派间谍之事，我没有怎么认真考虑就同意了他的主张，似乎还正式委任他为谍报工作的首脑(他于是就成了“××战斗队”队长)。他派W和另一个人去“八·二六”那里，他们谎称自己观点有改变，不满“红成”的主张，愿投奔对方。这两人曾送过一份情报回来，说某天“八·二六”一中分团开大会时，头头讲过一句什么话。这句话固然可以成为我们攻击他们的把柄，但公开出来岂不要暴露我们的间谍活动？我们没有利用它。后来再无报告，而且C也没有从事其他情报活动。他显然是闹着好玩，我们早把此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现在好了！W报告说，与他一道当奸细的那个人在关键时刻阵前起义，反戈一击，他问我们怎么办。

我真想臭骂C，派间谍本身就没有什么必要，派了又不管理。等大家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却突然事发！真是偷鸡不成倒蚀把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那次我们的对手出乎意料地反应迟钝，居然同意第二天再继续谈，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喘息之机。我方骨干加紧活动，叫那位反水奸细的好友去劝他，叫他不要令“红成”一方太难堪，同时又晓以厉害，说“一月风暴”战团内部那么多打手，你把人逼急了，他们不揍你才怪呢！在软硬兼施之下，这人同意连夜离开成都，和W一起去外地游玩，以脱离这是非的漩涡。第二天继续会谈时，“八·二六”方面没有证人出场，自然不再提间谍之事。一场大祸终于得以避免，战团头头们心有余悸，一致决定，再不搞这种瞎胡闹的事了。

这件事结束不久，就发生了第二起间谍事件，这一次可

不是闹着玩了，它有极其复杂的背景。

一天下午，大家吃过中饭正在午睡，突然被一阵打斗声吵醒。原来，一队陌生人趁我们不备，偷袭上楼，打斗发生在一间教室。我们纷纷赶去，偷袭者人少，情况不熟，显然很惊慌。但他们始终对准一个目标，想把一个人抓走，并抢走他的挎包。这人身体瘦弱，但奋力反抗。眼看我们就要封锁楼道，他们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他们才慌忙撤退。退却时他们还竭力带走那个人，但反被我们抓获一人，其他人逃出我校。

对方千方百计要抓走的人我并不认识，袭击者全带重庆口音，他们怎么跑到我们学校来搞武斗，真是奇怪！过了几个小时，我知道了一切详情。原来，那间教室里住着七八个不寻常的客人。他们是重庆大学学生，属于与“红成”相同观点的“八·一五”派。他们肩负着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搞省委干部的材料。我校离省委很近，他们早就来联系借住，但未讲明工作性质。最初接待他们的不是我，我们的人一口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给他们安排了一个教室。我本来不认识他们，但一听就知道他们工作的重要性。原来，每一大派的头头都在考虑最后掌权的问题。当时权力机构由三方面力量组成：造反派、军队和被“解放”出来的“革命干部”。因此，物色站在自己一边的干部是至关重要的。要选择得准(别推举一个什么叛徒、特务或黑线人物!)，就得搞干部的材料，以便决定以后推举谁。有足够的材料，还可以否定对立派推荐的人。“红成”也有一个“省委支队”，专做此项工作，我校高中不少女同学就在其中协助大学生。

“八·一五”的人见事情闹大了，只能把事情原委告诉我

们。原来，袭击他们的是重庆的对立派“反到底”，又称“砸派”。对方不知怎么打听到，那天他们多数人外出，便来偷袭。想抓走他们一两个人，抢走他们的材料，掌握他们的一切活动。那天他们只有一人在家，躺在床上休息。他不愧是精选出来的良材，以有病之躯，抵抗住了二十来人的劫持，得到我们支援后，在慌乱的打斗中居然头脑十分清醒，指挥我方人员擒住对方一人。

那个俘虏自称是一般战士，奉命行事，不知内情。他自然被暴打一顿。我在旁边观察，发现他很有心计。刚开始他鼻子上挨了一拳，鼻血流淌，但伤势并不重。他马上脱下白衬衫拚命擦拭，当成都警备司令部来人解决此案时，他展示出一件到处是血的衣服作为我方虐待俘虏的罪证。

那帮人在逃离时，还抓走我方几个人。看来，事情要在警备司令部主持下，反复谈判才能解决。那个俘虏就在我住的房间休息，他身体极壮实，但显得是受了重伤；不吃不喝，只是呻吟。

第二天中午，我正在熟睡，突然又被吵醒。我一下反应过来：对方的人又来了，要抢救他们的战俘。我翻身跃下床，向他扑去。他一个伤员，没有什么行动能力，我想把他按住，再令人来看守住他，以便我去指挥战斗。谁知他一反常态，以豹子般的力量和敏捷，一步跃上窗台。我扑过去抓他，只碰到他衣裳后襟。他纵身跳下楼，我探头去望，遭到一阵石头袭击。

这次，对方来了很多人，但他们并未大打出手，接住那名战俘就撤了。我一下就明白过来，对方是很厉害的一帮，与他们比，我们什么也不懂。显而易见，那个俘虏是个头

目，他前一天坚决要完成任务，竭力抓走那个“八·一五”战士，他坚持到最后，才被我们抓获。其实他伤势一点不重，但为了麻痹我们，便整天呻吟，不吃不喝，所以我们没有捆他，也未派专人看守。对方第二天来袭击的目的只是为了救出他这个重要人物，他们早在我的窗下设置重兵，掩护他跳窗而逃。

“八·一五”的那帮大学生又来与我们磋商，他们感到事情极为蹊跷。对方如何知道这里住着一个省委支队，知道前一天是偷袭的好机会？怎么知道战俘在我的房间？第二次袭击配合得如此之好，外面的进攻者不但知道我们的内部情况，而且显然还事先与那个俘虏通了气。结论十分明显，我们内部有奸细，而且正在活动！面对这个结论，我们“一月风暴”的头头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他是谁？我们把自己的情况向“八·一五”的人作了详细介绍，和他们长时间分析，但一点眉目也没有。

又过了几个星期，“八·一五”的支队从我校撤走，临别前，他们的负责人向我们说明了事情的起因和结局。这完全是一个离奇的惊险故事，而且发生在我们眼前！

原来，他们的行动早在重庆就被人注意上了。据他们说，主持这项特殊工作的是刘结挺、张西挺（一对夫妻，两人均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副主任，支持“八·二六”派和“反到底”派）的心腹干将T。他派了重庆某中学初一学生L与他们接近，装成与他们半路相逢的样子。L年轻、活泼、热情，自称为“八·一五”派战士。她一下子就与这帮大学生混得很熟，并认其中一位与她同姓的人为干哥哥，从此与他们形同一体，随他们一道住进我校。这位L我也认

识，她笑口常开，讨大家喜欢。她每天没事就与我们的战士和头头打得火热，甚至参加我们的大会。她说自己好玩，爱游泳，每天中午之后出去，其实是去报告情况，领受任务。整个劫持、袭击事件，她都在替对方工作。"八·一五"的人也不是傻子，他们较早就对这位来路不明的小女孩有怀疑。事发之后，尤其是第二次袭击之后，他们判断奸细不是出在"红成"内部，而是在他们之中。于是加紧了对她的监视，最后将她抓了起来，逼她供出了一切。他们将她带往"红成"总部所在地川医，叫她指认出每一个混进学校，企图搞情报的砸派人员（成都的对立派不容易干这事，因为有被同校同学认出的危险）。她将功赎罪，十分合作。她最后结果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第三桩间谍案实在是一件荒唐和令人心酸的事。

有一段时间，"八·二六"派经常利用我们的言论攻击我们，他们甚至对我们几个头头之间的矛盾也知道得一清二楚。谁告诉他们的？对于内部有间谍的忧虑和恐慌，又不期然而产生，并且蔓延到全战团。

不知为什么，有人开始怀疑到F头上。他是高一的男学生，工作积极，与我们关系较密切，但有时说话神经兮兮的，有些人不喜欢他。人们往往忘了他的姓名，而叫他的绰号"陶铸"。

有人举出他的行为中几个令人生疑的问题，我们曾叫人去盘问过他，他的回答既不清楚，又有矛盾。

有天上午，我们几个头头正在开会，突然闯进来几个同学，他们声称，已经有确凿证据证明F是间谍，这事可交给他们办，只要他们一施加压力，F必招无疑。我们几个人忙

于商议事情，匆匆点头同意。过了一阵，那几个人来报告，说F全招了，他确是对方派来的奸细。我们听了报告，甚为高兴。但又过了一阵，有位战士跑来报告说，F挨了打，正寻死寻活地哭闹，坚持非见本支队的头头不可。我赶忙跑去，他一见我，抓住我的手就放声大哭，说他冤枉，他被那帮人屈打成招。看着他身上的伤痕，被他使劲摇动，听他泣不成声、结结巴巴的申辩，我心乱如麻，悔恨不已。

我对他好言相劝，安顿他暂时休息，再与本支队的几个头面人物商议此事。有位好分析形势的C气愤地指出，战团头头们上当了。那几个打他的人原来与他同班，运动初期是保守派红卫兵，双方成见和矛盾很深。他们知道他被怀疑，利用战团头头轻信，施行逼供，实属报私仇。

虽然以前人们提出的疑点尚未消除，但我们断然决定，撤销对他的指控，恢复他的名誉，头头作自我批评。这些事是在支队内做的，他是这个纵队的战士。打他的几个人属于另一个纵队，我们不便追究。而且，责任主要在头头身上。

我代表头头诚恳地向F道歉，以后多次对他好言相劝。但明显看得出来，他再也未能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他仍然和大家一起活动、玩耍，但身上似乎少了一些元气，与往日的战友有了一层隔膜。我既难过，又惭愧，这种心情始终没有消失。为什么会发生间谍恐怖症，为什么会冤枉一个同学，为什么想不到有人会借机报复！从这个事件中，我得到了许多教训。

三、两大派谈判和张国华接见

从1967年下半年以来，中央接二连三地对群众组织发出反对派性、实行大联合的号召，把大联合当成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成都，五十军也出面，明确表示希望两派坐下来谈判，实现大联合。“红成”和“八·二六”不能不响应这种号召，虽然没有一方愿意放弃自己的立场。

“红成”组成了大联合谈判代表团，我是其成员之一。谈判代表团团长是勤务组第三号人物，成都工学院的S，他历来主管“红成”的外交事务，头脑灵活，能言善辨，长于应付各种意外事件。我们和总部头头长时间开会，仔细讨论有关事宜。“红成”对形势总的分析是，大联合对自己不是坏事。首先，在成都十多个大学中，“八·二六”只在川大一校占有优势，实行联合将承认和固定现有格局。在中学，双方大致平分秋色。在工人中，两派势力大体相当，但“红成”派自认为本派产业工人多，阶级队伍纯，联合后产生的权力机构自然会注重政治条件，因而本派将略占优势。在利益判断的基础上，“红成”对联合抱积极态度。

谈判在成都警备司令部的礼堂举行，双方代表分坐两边，中间是五十军一位首长，他们的政治部主任，他始终主持会议。这种局面，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谈判时美国代表居中调停一模一样。对方的团长也是第三号人物L，他的助手Z居第二。Z是一位足智多谋的人物，智商极高，“文革”前以又红又专把团支部搞成全国先进典型而闻名，

现在在北大，是个很不错的数学教授。

谈判一开始就不顺利，充满火药味。“红成”派的工作人员开始安置录音设备，“八·二六”派马上提出抗议，要求军方加以制止。“红成”派称，会谈期间录音是在预备性会议时谈好的，但“八·二六”否认此事。双方争吵了很久，最后军方表态，希望“红成”让步，我方听从了。事后证明，这一让步非常明智。“红成”原来的设想是，“八·二六”派一贯好搞分裂而不愿联合，因此自己在谈判中肯定占主动，如果“八·二六”坚持不联合，可以在事后揭露他们，这就用得上录音。但事实上，谈判过程中“红成”几次处于十分狼狈的境地，如果放录音，肯定对自己不利。

谈判很快就接触到实质问题，“八·二六”派要求“红成”放弃打倒刘张的口号，“红成”坚决拒绝，声称谈判应当求同存异，一方不得要求另一方改变观点，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强加于对方。“八·二六”派则强调，联合应该是革命的联合，因此联合是有原则的，如果完全不顾原则，那么联合就没有意义。而刘张问题就是根本性原则之一，这不仅是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对待党中央决定的态度问题。

我不赞成打倒刘张，但同时认为大联合应当高于两派的政治分歧，因此我的观点不影响我在谈判中为“红成”服务。我甚至抱了一大堆幻想，希望在谈判中以自己的诚意影响双方谈判代表，促成联合。然而，事后证明这纯属一厢情愿。

谈判很快就变成了辨论，“八·二六”派猛烈抨击“红成”打倒刘张，说“红成”不拥护中央的“红十条”。“红成”派说，我们拥护“红十条”，但不能把“红十条”归结

为刘张这两个人。我们和你们一样，认为“红十条”是两派大联合的基础，我们同意将拥护“红十条”写进大联合声明中。“八·二六”指出，宣布拥护“红十条”和打倒刘张是矛盾的，在大联合条款中，必须明确写上“坚决拥护张、梁、刘、张的正确领导”一语。“红成”反唇相讥说，为什么在整个“红十条”中，你们单单对这一句话感兴趣，为什么不把其他话也写上去，这是不是对中央指示采取各取所需的实用主义态度？“八·二六”派分辨说，我们当然也拥护“红十条”中其他各条。“红成”说，好，为了表示双方不折不扣、全面地拥护“红十条”，我们同意将它全文抄在联合声明中，这就足以解决双方分歧了。但“八·二六”坚决不同意，在他们看来，抄全文不但可笑，而且和空洞地承诺拥护“红十条”是一回事。

军方主持人在谈判中尽力持不偏不倚态度，虽然平时他们是支持“八·二六”的。他们显然急于促成大联合，不理解或不支持“八·二六”的谈判方针。在最关键的问题上，他们表态了：“可以不谈刘张问题搞大联合嘛！”“红成”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反复声称“坚决拥护警司首长的建议”，“八·二六”在这一点上显得有些被动，但他们显然早就拿定了主意，坚决不同意。他们坚持，绝对不可以绕开刘张问题谈联合。

谈判陷入了马拉松式的争论，持续多日而毫无进展。军方代表不愿会议毫无成果，当他们看到把双方捏合在一起完全无望之后，提出下列建议：大联合谈不成，是否就一些次要问题达成协议。比如，关于在学校建立正常秩序，各校允许少数派返校，以促成复课闹革命等问题。

双方对这项建议无反对意见，“红成”为了表示有诚意，抢先抛出一个协议草案，其中允诺保护少数派的民主权利，同时似乎漫不经心地提到，所有返校学生都得承认各校现存的权力机构，以维护校园秩序。

实质上，这是“红成”最关注的问题。他们在谈判中想达到的首要目标，就是巩固在十多所大学的现存权力。如果实现了这一点，谈判的目的就实现了一大半。为此，我方精心研究了这个问题，提案中故意将承认现存权力机构这一点写得不明显，期待对方的疏忽。

对方果然没有看出问题。双方在条文措词上争执了几个回合。“红成”都慷慨让步。眼看协议就要达成，对方代表中终于有人感到事情有些不对，提出异议。但他们大多数人并未洞察到实质，自己一方在签字与否问题上争执起来，这时我方大喜。但对方首席代表L不愧有民主作风，也不缺乏应有的警觉，他几次请求休会，以求内部达成一致。经过充分研究，他们完全看清了“红成”的目的，拒绝了协议草案。

整个谈判，以毫无结果告终。

两大派的联合没有谈成，各学校的谈判却在分头进行。我校的谈判遭到对方坚决抵制，他们在每一个程序性问题上都固执己见，尽管我们作全部让步，也没有谈起来。我后来理解他们的立场，双方人数十分悬殊，大联合意味着吃掉他们。运动搞了这么久，大多数同学都希望结束派别斗争。而且，大联合毕竟是中央的号召，一般人对于派别利益也不是那么斤斤计较。因此，我们学校两派谈不成，每个班却在分别谈。全校24个班，有将近20个班完成了联合（都未提刘

张问题），“八·二六”的头头处境十分艰难。后来，他们找到了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红成”打了他们的人），把人全部撤离学校，强行中断了大联合进程。我为未能实现联合深感遗憾，但也清醒地看到，此事不可强求。我实际上已预感到了，失去这一次大联合的机会，以后“红成”会在更不利的条件下与对方联合。

在校内谈联合期间，接到总部通知，成都军区政委、四川省革委会筹备组组长张国华准备接见中学“红成”代表，叫我们预先准备。被接见代表共有十来人，我校就有 4 人参加。M 和我作为战团负责人出席，另有两人以总部工作人员名义参加。在中学生中，我们的经验已大大超过其他人，因此，整个筹备工作完全在我们指导和组织下进行。我为会见定的基调是：谈我方联合的愿望，反映各校基本状况，为复课闹革命作准备；绝对不谈派性斗争，不要在张政委那里告对方的状。我告诉他们，最大的政治好处，莫过于张对我们有良好印象，从而支持我们。借此时机去告对方一状，张肯定不爱听，他也不可能偏听一方意见而断是非。尽管如此，会见时还是有人激动地述说他们学校“八·二六”如何欺负人，还把被打断了的眼镜架显示给张看。对这样的言论，不但张不耐烦听，连 M 和我都不耐烦听。

我对张的了解比我的同伴多，我父亲未逝世前，我给他念报纸，就知道张是政府派驻西藏的军政首脑之一。在达赖喇嘛逃离拉萨之前，张经常与他以及其他西藏上层人物打交道。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军人外交家或军人政治家。见面之后，我这种印象更深了。当然，他首先是一个军人。在接见我们时，他极其准时，而我们却因啰啰嗦嗦地商量事

情，居然晚了几分钟，让他等我们。他与四川省第二把手、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显然不同。梁一开口就让你知道他只是一个善打硬仗的武夫，胸无城府，不善辞令。张是善于在复杂条件下应付局面的人。

向他作汇报由我开头，我介绍了成都地区中学“文革”的情况，“红成”一派各个组织的状况。在汇报中，我强调我们不打算作大学生的附庸，而力图紧跟中央的战略部署，准备把精力花在大联合和复课闹革命上。接着，M汇报了我校情况。张显然对我们的汇报发生了兴趣，他详细问到了我校干部和教师的状况。我们对他谈了我校D校长的情况，认为她可以重新出来作领导（后来，我校对立派攻击我们在张政委面前谎报情况，美化走资派）。我和M看张听得兴致勃勃，邀请他到我校去看一看，他说以后有时间再说。可能他确实太忙，以后未来我校。

张确实对大联合和复课闹革命感兴趣。当时中央一再号召联合，“八·二六”派的抗拒姿态使他们在政治上十分被动。正在他们开始动摇犹豫之际，他们的盟友，西南局联合指挥部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大概是“论革命的大联合”，把他们一派既愿意紧跟中央搞联合、又必须坚持革命原则的立场阐释得义正辞严，头头是道，他们队伍中困惑不安的气氛为之一扫。真不愧是大手笔，文章写得像中央一级报刊的社论。我们知道，文章作者为H，她以前就是西南局第一号笔杆子。在接见时，张出示了那篇文章，明确表示它的观点是错误的。他指出，不管它道理讲得多好听，否定大联合就是不对的。看得出来，他对情况有足够的了解和敏感，他知道这篇文章坚定了“八·二六”派抗拒联合的决心。一般而

言，首长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最为难的就是需要表态，因为任何表态都会被某些组织马上拿去大作文章。关于H的文章，张作了主动的、明确的表态。

张的外交技巧实在令我惊讶和佩服。接见中，一个代表突然问他："张政委，你对我们打倒刘张态度如何?"我瞪了此人一眼，这是一个很不得体的问题。我想张很难回答，因为任何正面回答都将支持一派而伤害另一派。就算张自己有看法，他也不便直说。而如果他明显回避，就显得他没有气魄。总之，这是个使人为难的问题。但只见张略略思索一下，便从容答道："我看呀，你们还是不要动不动就提打倒刘张。"当社会上知道张的表态后，两派都没有意见。"八·二六"的解释是，张政委已经说了，叫你们不要打倒刘张。"红成"的解释是，张政委劝我们不要动不动就打倒，意思是说，打倒刘张不能轻率从事。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要打倒他们，我们是先提意见，他们不听，后来才提出打倒他们的。

总的来说，我们的汇报还是相当成功，张很满意。会见结束时，他意犹未尽，又约我们过几天再去见他一次。我们如约又去见了他，每个会见者都很受鼓励。可惜，整个"红成"不会按我们说的去做，张对大联合的期望并未实现。

张国华政委于1972年初因病逝世。这时林彪事件已经发生，梁兴初被指控"上了贼船"而遭贬。张的骨灰于1972年2月运抵北京，这时正是尼克松访华前夕，但周恩来仍在百忙中亲自去机场迎接。

劳班　成都某中学高中学生，现为社会科学研究人员。

解　全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

文化大革命在动荡的思想状态中来临

文化大革命前，我正在读高中。当时，我正处在一种精神危机之中。学习目的不明确，感觉不到人生的意义，缺乏信仰，是我苦恼的主要根源。

当时的宣传号召“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学雷锋的运动正在蓬蓬勃勃地开展，在强烈的意识形态的氛围之中，我也认真地把《雷锋日记》读了若干遍，甚至还读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的确也是我从内心深处产生出来的问题，我渴望解决这个问题，并为之冥思苦想。读《雷锋日记》，尽管他的事迹使我感动，却解决不了我的思想实

际。在新社会长大，没有吃过旧社会苦的我，没有他那种朴素的阶级感情以及对共产党的感恩思想，自然也无法让自己树立起雷锋式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我也不明白怎样才算“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文化大革命前，我常去四川省图书馆看书，一次碰到学校一位思想较活跃的老师，我谈起自己安身立命的苦恼，他说我缺乏阶级观点，向我推荐《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可是读这本书，更是觉得距离自己的思想状况远了一些，如飘风月影，落不到实处。

我为自己的这种思想状况感到着急。一次在成都春熙路旧书店里，偶然买到关锋的《试论雷锋世界观的形成》。此书从哲学的角度对雷锋世界观进行了一定新的探讨，仅此一点，在当时已足够独特了。我把这本书视为珍宝，反复阅读，想从中找到答案。在当时状态下，我需要有更加理性、更加彻底、更加深刻的东西来说服自己。也许，越是真诚地渴求一种信仰，越是不可能轻易地皈依。

关锋在这本书中写道：“一个人虽然关于某种世界观的知识没有足够多，但他确是用这种世界观的指导原则来指导自己的行为，那么，我们就应该说，他基本上树立了这种世界观。”当时我反省：这段话是否击中了我的要害？树立世界观、人生观是否并非主要是学习知识的问题？我觉得关锋说得有些道理，也许，我所缺乏的只是实际的锻炼。于是在学校组织到农村劳动时，我分外认真、卖力，并有意多与贫下中农接触。然而，我发现自己的苦恼仍没有解决。其实，关键在于我的思想中还活跃着另外一些东西。记得那时读过一本《科学家奋斗史话》，我对这本书的印象很深，其中一些话对我影响很大：

“科学的精神，第一是渴求知识，探究真理，了解宇宙。”

“真正科学家的动机，应该比追求生活舒适更上一层，他还应重视生命而使之丰华。”

“科学家认为了解自然和宇宙，才是他们最高的目标，至于实际运用，只不过是副业罢了。”

这些思想与当时的革命人生观教育有着明显的矛盾。骨子里，我感到这些思想与自己更亲近，但在现实中，自己又无法把这些思想与正统的意识形态融合起来。我在日记里抄下了上述几段话，并辩解地自我评论说：

> “我是从这个角度来接受这些思想的：人的生活包括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两方面，其中精神生活占主要地位，而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又是追求真理，满足‘理智感’。也许，我这种理解已经不属于‘为科学而科学’的范畴了，就算这些话是那些‘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家说的，我的理解已经经过了扬弃。试问，把精神生活看得比物质生活更重要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摘自1965年10月5日日记）

这种思想冲突直到读了《马克思传》、《恩格斯传》、《回忆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等书后，才得到了缓解。马克思恩格斯成了我崇拜的英雄，而这种崇拜，又能与现实的意识形态取得某种协调。以前我所崇拜的，还有科学家爱因斯坦，作家儒勒·凡尔纳等，但在当时的气候下，已缩回潜意识。当时，我特别喜欢恩格斯青年时代说的这段

话：

“我的心中经常在发酵和沸腾，我那有时不冷静的头脑还在不断地燃烧，我竭力探求一种把心灵中的渣滓清除出去并使热力变成熊熊火焰的伟大思想。”

我把这段话抄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中，觉得它也微妙地表现了我的状态。当时，马克思与恩格斯使我崇拜的，主要是一种追求真理、献身于真理的精神，以及博览群书、高瞻远瞩的胸怀。

那时候，还读到李锐所著的《毛泽东青年时期的革命活动》，很欣赏里面的一些话。毛泽东青年时期在读书笔记中写道：“一个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对于这段话，印象颇深。特别是，毛泽东青年时代所推崇的一句格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我请一位书法好的同学，将其录上，他书写时，我请他把顺序改为“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因为我觉得这句格言的创新，正在“野蛮”二字上，它与“文明”相映成趣。

暴风骤雨一般的文化大革命来了。每过几天都有一些新的动向，这使我的头脑特别兴奋，我经常到街上看大字报、听辩论。

大概是1966年夏天，北京红卫兵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传到成都。成都的中学也刮起了“血统论”之风，在同学中也划起了“红五类”与“黑五类”。由于我出身不好，一时感到有很大的压力。终于，一次班上开批判会，要出身不好的同学都交待家庭的历史和自己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思想。我在会上否认自己出

身“黑五类”，并说自己崇拜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什么好交待的。后来，我索性不去学校了，整天到外面看大字报，或者到四川省图书馆。一次在人民电影院门口看到有关“八·二六”事件的传单，感到很新奇。1966 年 9 月，北京赴川的学生来了，在大街上经常看见他们的游行队伍。他们一边高呼：“毛主席万岁！”一边高呼：“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当时我感到疑惑：怎么能笼统地整个“火烧”、“炮轰”呢？这不是全盘否定吗？形势变化很快，北京学生的到来，使人们的注意中心都转移了。

大串连与毛主席接见

1966 年 11 月 18 日，我坐上了北上的火车，生平第一次走出四川省。火车当然是异常拥挤，但心情却格外舒畅。

到了北京以后，住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当时游山玩水的兴趣不大，在北京待了 20 天，只去了颐和园。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最爱做的事情就是看大字报。在北京时，每天一早就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跑，看大字报，抄大字报。我所渴望的是精神食粮，了解这次文化大革命。

1966 年 11 月 25 日，我参加了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记得那天大概凌晨 3 点钟就起床了。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上街，走一走，又停一停，大街上满是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队伍一支又一支。有时带队的解放军刚刚命令大家原地坐下，未等坐稳，马上又把大家叫起来继续前进。我跟随着巨大的人流，一会儿走，一会儿跑，最后好容易才安顿下

来，感到又累又饿。接着又是乏味的等待。好在一些外省的红卫兵不断地跳出来，在队伍前面拿着毛主席语录本朗诵毛主席诗词，唱语录歌，跳大批判舞，看他们表演才把时间捱过。

大概是上午11点左右，突然人们欢呼雀跃，人声鼎沸。我知道这是毛主席来了。这时我已被挤到了队伍的最后一排。越过人头，看到几百公尺外，一排汽车正迅速驶来，我使劲地一跳，正看到毛主席乘着敞篷汽车飞快地掠过，他穿着绿色的军装，一张大脸，正面向着我这一边，表情也许是因为疲倦，严肃而没有笑容。我再使劲一跳，就只看见他迅速远去的背影了。以前看过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电影，那欢呼的场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原以为，这一时刻，我也会有什么奇妙的感觉产生，但当时却体会不到什么，没有神圣与狂热，甚至连激动的心情都没有。也许是这种万人崇拜的场面反而破坏了情绪。在我的意识里，反而产生一种不平等和不愉快之感，折腾这么长的时间，原来就是为了这样的一瞬吗？当时产生这种念头后，又有一种罪恶感，但同时也认为，对于毛主席的热爱，不应当限于形式。非要见了毛主席，才算真正热爱毛主席吗？

遇罗克的《出身论》

毛主席接见后，我继续留在北京看大字报，我的头脑喜欢新颖和丰富的信息。就在这段时间，我首次知道了遇罗克的《出身论》。

关于遇罗克的《出身论》，最初是在批判《出身论》的大字报中知道的，后来才读到全文。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感到思想解放，就是遇罗克的《出身论》。

《出身论》署名为“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它从前段时间流行的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开刀，对血统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这篇文章指出：“这副对联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文章雄辩地反驳说：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当时看这篇文章，觉得它说出了自己心中想要说出、但却未能说出，以及感觉极深、但却并不明晰的思想。这篇文章呼吁：“一切革命青年，不管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到同等待遇。”这一呼吁，对于自己来说，可以说是震撼人心的。因为它相对于当时的官方政策：“一、有成份论，二、不唯成份论，三、重在政治表现”，更进了一步，是比较彻底的、当时读《出身论》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多少有点类似卢梭式的解放作用：“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处处困在桎梏之中。”

我于1966年年底回到成都。回成都后，我参加了“八·二六”一派在我校的组织——“新锡中公社”。记得当时也不需要任何手续，只需领一只袖套而已。此时，参加属于造反派的红卫兵，一般已不过问家庭出身。但出身不好者，也很少有进人勤务组（即领导机构）的。由于组织里缺乏人写

文章，而我又爱好动笔，于是便办起了一份小报《新锦中报》，我任主编。

大概是1967年1月，我在四川大学又看到了一份张贴在墙上的小报，这份小报全文转载了《出身论》。我为此感到非常高兴。我记下了这份小报的主办者十九中红卫兵。好在十九中离四川大学不远，当天我就找到了主办人。我们谈到北京的活跃，成都的相对闭塞。关于《出身论》，我们一致觉得有相同观点的人应串连起来。

我把这份小报推荐给我校的一些同学、老师，以及一中的徐友渔等人看，大家都觉得十分兴奋。鉴于当时《出身论》还有不少人批判，我们觉得有必要写文章呼应。1967年1月底，大家在锦江中学开了一次会，成都市的中学有十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后来，大家对《出身论》的关注被“二月镇反”冲淡了。

“二月镇反”以后，成都地区的“八·二六”一派受到压制，减少了活动，而产业工人战斗军（原被称为“保守派”的组织）活动频繁。这段时间，我有时在家看书，有时则到四川大学了解动态。到了4月份，“八·二六”一派又相当活跃了，经常成群结队到北京告状。4月底，我与几位初中同学，也一起乘货车到了北京。此时，我仍关心着关于《出身论》的论战。我发现《中学文革报》又登了几篇“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文章，而另外有的报纸在对《中学文革报》进行批判。我到北京四中，寻找《中学文革报》的主办人。原以为“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就是他们的人，后来才知道是遇罗克。遗憾的是那天接待我的同学不知道遇罗克在何处，但他送给我几张报纸。

遇罗克文章的解放作用，其具体观点当然是一方面，但实际上更重要还在于他的思想方法，在于他敢于独立思考，敢于冲破思想禁锢的精神。《出身论》的锋芒所指，不仅仅是当初“联动”提出的“血统论”，而且是建国以来一直存在的一种极左倾向。

成都的旧书自由市场

1967年6月，我从外地回到成都，正遇上《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公布（当时称为“红十条”)。成都地区造反派之间的派性斗争开始逐步上升。原来保守派与造反派的矛盾逐渐淡漠。《红十条》对原来同是造反派的“八·二六”与红卫兵成都部队有不同的肯定。而红卫兵成都部队反对刘结挺、张西挺进入四川省革委会，矛盾就这样展开了。

当时，我虽然参加的组织是属于“八·二六”这一派，但我的一些朋友和亲属却是属于红卫兵成都部队。这使我在了解相反意见时，比较客观。我经常到大学、到街上看大字报，两派的大字报都看，觉得红卫兵成都部队一派的观点似乎也有一定道理。分歧的焦点，似乎集中在刘张问题上，但究竟谁是谁非，我感到自己弄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应当干什么？我觉得无所适从。

从1967年7月开始，成都地区两派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从辩论开始发展为武斗。武斗越来越厉害，不时有消息说，某一派的人有多少多少人被打伤了。当时各单位的两派

情况不一样，有的单位“红成”一派的人多，有的“八·二六”一派的人多。人少的一派一般都从单位撤出，到一些自己这一派人多的单位去。我校的“红成”也搬到四川医学院。

文化大革命要摧毁一切旧文化，但在武斗逐渐升级的时候，静悄悄地也冒出来一些渴求文化的潜流。在成都春熙路的孙中山铜像后面，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自由旧书籍市场，在这里几乎建国以来出版的任何小说以及其他书籍都能买到。在这里售出的书，有的是红卫兵抄家抄来的书，有的是从各种图书馆偷来的书，当然也有售书者自己的藏书。有的人把书摞放在地上，等待人们来翻阅选购。更多的人则把书拿在手上，到处游荡，既卖书，也买书。一旦有什么好书，人们会蜂拥而上，争相购买。热闹时，这里每天达到七八百人，交通都堵塞了。当时有许多未参加任何组织的“逍遥派”都在这里买书，消磨时光。一次偶然发现这个书市后，我也成了“逍遥派”。我似乎本能就热爱书，一看见书就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我在这里买到了不少文学名著，包括《约翰·克利斯朵夫》、《复活》、《九三年》、《悲惨世界》、《马丁·伊登》、《海狼》、《屠格涅夫小说选》、《红与黑》、《欧·亨利小说选》等等，另外还有一些哲学书籍、内部书籍，如《西欧十六—十八世纪哲学》、《人性论人道主义研究资料》等等。这些书，有很多都是以前没有读过的。我一时沉浸在这些书中，有那么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似乎从我的身边消失了。可是，书是看了一些，但思想的混乱与内心的骚动却并没有消除。而且，此时读小说，已没有像在文化大革命前，上初中时读儒勒·凡尔纳的小说《格兰特船长的儿女》、

《神秘岛》、《海底两万里》，以及威尔斯的《隐身人》、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案》等小说时那么入迷、那么无忧无虑了。当时，我是热血沸腾的青年，渴望在现实生活中发挥自己的生命力。远离文化大革命，读这些书，总感到有些与现实不协调，精神上有一种没有根基的感觉。

在家里饱食终日，当消遥派，似乎也不是滋味，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一段话，使我产生强烈的共鸣："静默，沉重的静默一天一天地压在他的心上。仿佛一切都成了灰烬。仿佛生命已经到了黄昏，而克利斯朵夫才不过刚开始生活呢。他决不愿就此听天由命！他还没有到睡觉的时间，他还得活下去……可是他没法在德国活下去。小城市的那种闭塞偏狭压着他的精神，……他活像关在市立公园笼子与土洞里的可怜的野兽，受着苦闷的煎熬。由于同情，克利斯朵夫有时去看它们，打量着它们的眼睛，看着那犷野而绝望的火焰，一天天地黯淡下去。"

到锦江中学，与初中同学一起，修筑工事，准备战斗，我觉得无聊。于是，1967 年 10 月初我再次离家外出。与前两次不同，这一次，完全是漫无目的的漂泊。

我到了杭州、苏州、南京。在徐州转车时，与徐州一中的一位女生邂逅相遇，这件事，成了我真诚投入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催化剂。在这以前，我的心一直是骚乱、动荡不安的。认识她之后，却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

那天晚上，在候车室等得无聊，我便请旁边一同候车的一位农民帮忙看守座位，去看贴在四周墙上的小报。有一份小报是批判瞿秋白的专刊。批判文章看不进去，但小报附录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却吸引了我。他的文章充满沧桑感

又富有人情味。

小报还刊登了据说是瞿秋白的词，记得有几句是：

> 廿载沉浮万事空，
> 年华似水水流东
> 枉抛心力做英雄。

我返回原来的座位，准备拿纸笔摘抄，走到原来的地方，却发现已坐了一位陌生姑娘。正当我在犹豫不知如何是好时，她把身子挪了一挪，腾出一个空位，用清越的声音招呼我在她旁边坐下。我感到诚惶诚恐，可是她大方温和的态度，流畅、丰富的语言打消了我的顾虑，我们开始畅谈起来。自然最多的话题是谈我们读过的书，读过的小说。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上车的时间已到了。我不愿离去，她也不想分手。她出乎意料地邀请我同去她在宿县的姑姑家。我们从深夜一直谈到第二天早晨，一起上了火车。在宿县，我们又有三天的相处时间。在这几天，她帮我清洗了这次外出穿是又脏又臭的衣服，还陪我到附近的小河游泳。她不会游，在岸上替我看守衣服。

三天过了，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完，但分手的时间却到了。在以前，从来没有与一位年轻的异性说过这么多的话，这是一种带着性的吸引的，在精神上酣畅的交流。

“别再游荡了，回去搞复课闹革命吧。”这是她分手时的叮嘱……

> 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

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你，
好像是昙花一现的幻影，
好像纯洁之美的精灵。

普希金浪漫诗句的意境，我却在这文化大革命的环境中体验到了，这似乎显得有些荒诞，但其实是合情合理的。尽管置身于文化大革命，但在意识深处，却永远与永恒的人性相通。

我不知道这是否算作“初恋”，但这次相遇却影响了我在文化大革命的经历。诚如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写道：

“谁要在世界上遇到过一次友爱之心，体会过肝胆相照的境界，就是尝到了天上人间的欢乐。”

我的心变得踏实了。在分手之后，尽管我们只通了两封信就因为她遇到了意外事件而中断了联系，但我却结束了以前那种骚乱不安无可适从的状态，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文化大革命之中。

第三条道路

1967年10月底，我又回到了锦江中学。学校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教学大楼前贴着稀稀落落的大字报。大楼内，新锦中公社用桌椅为武斗修筑的工事仍没有撤除，我在教师宿舍找到了间空房住下。

一连好多天，我在四川大学、成都工学院、四川医学

院，还有大字报比较稠密的春熙路、人民南路等地看大字报，了解当前的动向，思考自己能够做什么。我强烈地感到，尽管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指示已经发表，外省一些地方的群众组织响应“大联合”的号召，实现了大联合，但四川省的情况似乎完全不一样。“八·二六”派与“红成”派还在为“刘张”问题激烈争斗。很多大字报根本不是讲道理，而是互相侮辱、谩骂。“八·二六”派称红卫兵成都部队为“红卫兵蠢猪部队”，“红成”派则称川大“八·二六”为“川大八耳驴”，称成都工人造反兵团为“撬杆兵团”。在两派内部，谁要是发明谩骂对方的语言，就会得到本派群众的喝彩。武斗有所升级，已发展为使用真枪实弹。

1967年12月25日，毛主席的生日前夕，我在日记中写道：

“下午到四川医学院，‘（红成）9.15’正在开会，借军民联欢庆祝毛主席74岁寿辰为名大肆强调要坚决打倒刘张。会上大演打倒刘张的节目，大喊打倒刘张的口号。

看来‘红成’的态度还非常坚决。不打倒刘张誓不罢休，颇有些主观唯心主义。

两派的派性都很强，而这种派性公然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地存在着。假如看问题避开了派性，反而要被指责为‘右倾’。

两派对于《文汇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可以说简直没有反响，因为《文汇报》、《人民日报》的社论尽是强调斗私，强调自我批评。

> 我深感思想上的夺权是比组织上的夺权更加深刻，更加艰巨的任务。然而，我发现两派对此都不重视，只是停留在组织的夺权上。……”

我苦苦思索，从毛主席指示里寻找解释。我在1967年12月30日的日记写道：

> “毛主席在最新指示里说：‘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一再着急大联合问题，但未能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客观规律的。……大联合是捏不成一个大联合的，捏合了还是要分，所以中央现在的态度只是促进（重点号为原日记中已有），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
>
> 这段话很深刻。它说明了大联合的基本途径是两派各自克服自己的派性，而决不是依赖中央表态（重点号为现在所加）。固然，中央表态非常重要，但它只是个外因，这个外因必须要通过两派克服派性的内因起作用。”

当时，我觉得对自己的任务已非常明确了，这就是批判派性，促进大联合。我参加的群众组织是“新锦中公社”，属于“八·二六”派，但自己仿佛与这个群众组织没有多大关系。参加这个组织的同学，有高中生，也有初中生。当时，高中生绝大部分都待在家里，在学校活动的，主要是初中同学。他们在学校参加活动，一些人是由于在家里闲着也觉得无聊，一些人是由于想凑热闹。真正有头脑有想法的，

留在学校的不多，因为留在学校，的确也干不了什么。

我给他们讲大联合的事，大多数人都觉得不理解，或者根本听不进去。当时，也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同学支持我。我们在一起又把中断的油印小报《新锦中报》恢复起来。名义上此报是“新锦中公社”主办的，实际上只是宣传我们几个人的观点。此报每次只印几百份。每周出一期或二期，大概总共出了二十几期。通过办油印小报，自己的分析观察能力，以及写作能力也得到了一些锻炼。通过当时对《文汇报》、《人民日报》的研究，结合对成都地区形势的观察与思考，形成自己的观点，再把这些观点变成文章，这样做，我感到很充实，感到自己是与形势一起发展，是真正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之中来了。

记得在1967年2月15日这天，我又为《新锦中报》写了一篇“社论”，题为《论路线斗争的新形式》，强调党性与派性的斗争，是路线斗争的一种新形式，谁要是搞派性斗争，就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我提出，在刘张问题上，“八·二六”与“红成”的斗争属于什么性质，是党性与派性，是派性与派性，还是两种交叉，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容易一下子扯清楚，但是，大联合是当务之急，并没有必要在扯清楚之后再搞大联合。不管怎样，至少两派的绝大多数群众都是好的，可以在实现大联合之后再来解决两派的分歧。

在1967年2月18日这天，我看到了2月15日的上海《文汇报》社论，《党性与派性的斗争就是路线斗争》，其中有不少观点与我的文章一致，这种巧合使我十分兴奋。这种情况，我在当天的日记中有记载：

"下午收到2月15日的《文汇报》，看到里面的社论《党性与派性的斗争就是路线斗争》，高兴极了。社论指出：敌人煽动派性斗争，就是当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谁要是搞派性斗争，就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一边。现在我的信仰越来越坚定了，就是要打倒派性，大立党性！"

自己独立得出的一些观点与党的大报一致，这极大地鼓舞了我的自信，我没有了以前那种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清晰地明确了自己在干什么，可以干什么。

当时，外省已经有一些学校的学生返校复课闹革命。成都地区大联合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成都九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接连写出了大字报：《挡不住的历史潮流》，《春天里的几片阴云》，就反映了的当时的这种呼声。成都九中，早在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指示发表后不久就复课了，是全市最早复课的中学。《春天里的几片阴云》的作者张隆溪，就是在这个时候除复习原来学习的英语外，又自学了俄语。

当时，成都地区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从"八·二六"派的"成都工人造反兵团"中分出了一股势力，这就是以"杨大胡子"为首的"红卫军团"，由于人数不少，在成都张贴了很多大字报和标语，一时间，颇有影响。他们也主张"绕过刘张问题谈大联合"。但在当时，他们被正统的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称之为"分裂主义"、"山头主义"。其实，不管当初红卫军团是属于一种什么情况，他们的出现至少反映了当时成都地区一种普遍的厌倦派性斗争、反感武斗、希望社

会秩序恢复正常的情绪。

当时成都地区的形势给我以极大的鼓舞，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我相信自己的奋斗方向是对的，我决心把“第三条道路”走下去。

所谓第三条道路，是指既不同意红卫兵成都部队打倒刘张谈大联合，也不同意“八·二六”要“红成”拥护刘张谈大联合，而是主张保留刘张问题谈大联合。

我一方面宣传自己的主张，到处张贴《新锦中报》，一方面走访、串连，希望成都地区的一些坚决反对派性，主张绕过刘张问题谈大联合的组织首先联合起来，记得有时找不到同学，就一人提着浆糊桶上街，张贴鼓吹联合的《新锦中报》。我还到一些同学家里，劝说他们返校。

锦江中学的“红成（红八月）”当时住在四川医学院(四川医学院的大学生大多数都是属于红卫兵成都部队一派)。为了让他们听到大联合的呼声，一次我与另一同学鼓足勇气专程到四川医学院的大门口刷标语：

“红卫兵锦中支队回校复课闹革命!”

“红八月与新锦中公社联合起来!”

由于我们是戴着“八·二六”的袖套在刷标语，标语刚刷完，被四川医学院里的“红成”发现了，他们向我们开枪，子弹呼啸着从身边飞过，我们吓得转身就跑，回到学校，我们的行动却受到新锦中公社的一些派性强的同学的讥讽，说我们是“软骨头”，丢了“八·二六”的脸。当时我尽管感到委屈，却坚持认为是做了自己应当做的事。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的宣传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在本校，我们得到另一个主要是由高中同学组成的战斗队的支

持，学校里有不少老师，也同意我们的观点。在校外，我们也与一些有共同看法的重视大联合的组织产生了共鸣。记得当时有成都三中“红色堡垒”的同学看了大街上张贴的《新锦中报》后，到锦江中学来找我们。这一天（1967年3月11日），我在日记中有记载：

> “上午三中‘红垒’来访，谈到成都目前坚持大联合的人还未形成一股强大势力，让派性占了上风，十分感慨。我们一致觉得应当团结起来，发挥作用。当然，要在理论上驳倒派性，要从舆论上压倒派性，那是十分艰巨的。”
>
> “红卫军团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从它的政治主张来说是对的。但是，其动机却令人怀疑，似乎有不正当作法。怎样对待它呢？”

其实，为了让联合派首先联合起来，我早就作了一些尝试，我曾经多次走访九中，认识了《挡不住的历史潮流》的作者谢洪，《春天里的几片阴云》的作者张隆溪。以上两篇大字报由于当时顺应民心，写出了许多人厌倦派性斗争，希望大联合的心情，而且文笔流畅、洒脱，颇受欢迎，谈到成都地区的形势以及大联合的前景，都很乐观。但是，当时他们的心思主要放在本校的复课闹革命，对搞串连，团结其他走第三条道路的力量似乎并不热心，另外，他们也觉得社会上的组织（包括红卫军团）太复杂。

在这段时间，我还极力主张两派接触对话。在四川大学，我认识“八·二六”、“11·13”主力战斗队的一些学生。

他们大多都是学理科的，包括化学、物理学、数学等。我介绍一中“红成”的头目徐友渔与他们辩论。这种对话虽然没有什么结果，但在派性十分强烈的当时，也是比较独特的事件，它显示了我们相对开放的心灵。后来，我们又认识了数学系的萧昌建，大家的谈话就越来越有真诚探求的气氛了。萧昌建的思维敏捷，逻辑严密，使我们受到不少启发。

从1967年秋天到1968年春天，这一段时间是我参加文化大革命最认真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我积极探索、独立思考，而且有一种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尽管当时的想法与做法还很简单、幼稚，有点唐·吉诃德式的可笑；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在思想上还没有摆脱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禁锢，但所谓走“第三条道路”，毕竟还是通过自己的思索而做出的选择，它是我人生中一段真实的路程。

中央首长“3.15”讲话

正当成都地区两派的斗争陷入僵局，大联合的呼声逐渐有所加强之时，突然从北京传来了中央首长“3.15”讲话。所谓“3.15”讲话，是以康生、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在1967年3月15日接见四川省代表时的讲话。这次讲话的精神是肯定“十条”，肯定刘结挺、张西挺是革命干部，而且出乎意料地公开表态说红卫兵成都部队是右倾翻案风。这样一来，四川地区两派矛盾马上又激化了。本来在“3.15”讲话之前，成都地区的两派已经签订停火协议，武斗已有缓解，“3.15”讲话之后，武斗又重新激烈。

川大“八·二六”开会称“3.15”讲话的下达是“政策派胜利，策略派碰壁，反对派失败”。大概主张大联合的人都属于策略派吧。策略派当时亦被称作“右倾”。这次“碰壁”使我心中产生了好些疑问：“中央没有让两派联合起来再表态，这是为什么？如果可以避免一派压一派不是更好吗？”（摘自1967年3月18日日记）我对把策略派称作“右倾”不服气：“所谓‘右倾’只不过是出于对毛主席战略部署的理解，为了更好地解决刘张问题，提出保留刘张问题实现大联合罢了。”（摘自1967年3月18日日记）“3.15”讲话，在我的心中投下阴影，我苦苦反省，百思不得其解：“这几天来，心情处于动荡之中，思维矛盾着。对于当前的运动，总是不能作出圆满的解释，对于自己前一阶段的理论和行动，也在否定与肯定之间徘徊。所不能理解的是：所谓‘策略派’，好多都是出自于党性，而‘得胜’的‘政策派’，好多都带着明显的派性”。（摘自1967年3月28日日记）

我的潜意识里有一种被愚弄、被欺骗的感觉，这种感觉后来逐渐发展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当时之所以敢于怀疑，是因为我的心是真诚的，是问心有愧的。中央首长“3.15”讲话是成都地区两派斗争的转折点，也是我文化大革命经历的一个转折点。

“3.15”讲话以后，我对参与文化大革命失去了兴趣，但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思索却一直没有停止。我和萧昌建、徐友渔等几位朋友经常讨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我们的思想不断有所发展，到了1968年年底，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已经发展到否定。

当时，我们在思想上的步伐也许算是较快的。之所以能

够如此，大概是因为：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有一段真诚的、问心无愧的经历，这段经历促进我们发现了真实的自我。真实的自我成了我们观察外界的一个参照系。当真诚地信奉一种思想之时，如果这种思想本身有问题，那么，在信奉的过程中，就相当于在使用归谬法，结果必然推出这种思想的不合理。如果我们本身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自己是问心无愧的，那么，我们的怀疑就会最终指向我们自身。第二，我们有一群思想状态相近，经历相近的朋友，在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追求真理，自由探索，互相取长补短、相互激励的氛围。在这种情况下，谁要是有什么新感觉，马上为大家分享，谁要是有什么新观点，马上为大家考察和补充。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年底，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在下乡之前，我们认识了一批1964年、1965年下乡的"老知青"。与他们的交往，使我们受到很多启迪。记得他们有一种观点，对我们颇有冲击力。他们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实质，并不是什么接受"再教育"，而是社会处理剩余劳动力，把农村作为劳动力的仓库。老知青看问题的角度，促使我们在思考时有更广的视野，把思维的对象扩大到更大系统，从政治问题扩大到社会问题。

我直到1969年12月才下乡。在下乡之前，我曾几次到农村对老知青、新知青进行访问。在成都方言中，当时流行

一个“操”字，意指一种生活方式，凡热衷于某一种东西，甚至以这种东西为寄托即为“操”。当时在新老知识青年中，有“操文学”、“操思想”、“操肌肉”、“操武术”、“操工分”、“操手艺”等种种流派。我下乡的地方是四川省邛崃县山区，这儿有一伙二十中的同学，他们则自称是“操感情”。我下乡后，很快与他们成为了朋友。他们善良、朴实，热爱生活，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有一段真诚投入的经历。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的兴趣转移到对于人性的认识，以及对感情世界的探索之中。

1967年我曾在成都自由书市中买到不少书籍，后来装了两个大箱带下乡。有了这些书，我的知青生活就不是那么单调了。那时候，白天劳动，晚上沉醉在书的世界里。我的书，也借给二十中的朋友们看。每当赶集或较为空闲时，我们便聚集在一起，探讨人生，互相交换读书心得。日子过得很艰苦，但在精神上还是感到充实。正是在那个时候，我产生了这样的美好联想：

人生之路尤如漫漫长夜，四野茫茫，没有星星，也不见月亮。每一个美好的灵魂都像是一只熠熠发光的萤火虫。它们先是分散的，后来又逐渐聚集在一起。许多个美丽的灵魂聚集在一起，便是一盏幽暗的小灯了……

我们的探讨并不是就书本而书本，就文学而文学，而是紧密联系我们自己的生活实际。例如，谈了俄国作家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之后，我们就争论这样一个：同当时的俄国一样，我们也是“多余的人”吗？进一步追问：我们的探索有什么意义吗？大家比较统一的意见，可以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一句话来表达：“只为信仰，不为成

功。”

我下乡的地方属于偏僻的山区，买酱油、火柴也要跑七八里的山路，但正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生命常常反而迸发出空前的热情。白天，时间消耗在机械的劳动中，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想要把流逝的时间再追回。有一次，煤油用完了，为了多看两行字，竟又把灯芯挑出来，让它燃烧完。

尽管我们不相信自己一辈子会在农村度过，尽管我们从来没有丧失过希望，但形势的缓慢发展却常使我们感到悲观。1971 年“9.13”事件前夕，这种心情达到了顶点。那时候，我曾写了这样一首诗：

希望

我爬上长满野草的小山岗
向那雾霭笼罩的远方凝望
远方是绵延起伏朦胧的群山
暮色中多么沉静而又安详

黄昏的风吹着夜的序曲
林荫里鸟儿发出归巢的唤叫
夜幕就要不知不觉地降临
我的心充满了难言的惆怅

我悲哀地在草地上仰面躺下
头上是阴霾满布的穹苍
我多么喜欢辽阔与空旷

低沉的乌云却如铅块压在胸膛

又是一天即将过去
未来依然那样渺茫
温和的风呵，在我耳边轻轻吟唱
希望，希望，希望…………

“9.13”事件发生了，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罕。这一事件，如一声炸雷，在我的面前爆响，我预感中国将要发生巨大变化。

解全　成都某中学高中学生，文革中从事理论探索，现为某地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

申晓辉

文革日记

1966年5月18日，星期四

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关系到我国的前途问题。国际形势已成定局，以南斯拉夫铁托为首的老修正主义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再也经不住九评（在中苏意识形态论战中，中共中央于1963年秋开始发表9篇文章，评苏共中央致苏联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自注）的舆论。一个既无外债也无内债的国家，会越来越强大地屹立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今天地质部政治部主任赵承丰同志的报告，再次表明了当前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意义。有的老师不问政治，不搞革命，真成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老师的法宝。"把学生引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文化界的事，与我无关，顶多批判那几部毒草电影就是了。不过，就像报告中提到的，有人自觉不自觉地散布资产阶级毒素，唱洋歌，越洋越

好，就是不唱革命歌曲。听外国音乐，说如何动听，听反动节目也不去批判，这些问题还是要引起注意。赵主任的报告还说，文化部的那些人，还有周扬之流，根本不提鲁迅，不提毛主席文艺方针路线。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会把鲁迅提得这么高?

1966年6月1日

初中的第一个儿童节在第一传染病医院过的，没能参加本校的篝火晚会。现在的小孩比我当时懂事多了，六岁的儿童就知道学习毛选，向邓拓之流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开火，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没有任何创伤，更没有亲身经历三年自然灾害，我们这代人能接好老一辈的班吗?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一定奔赴战斗第一线，无愧于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昨天原初中同学宋××来信，谈到在32中渡过的几个节日，还有一起高喊："古巴西，洋基诺!"（意为"要古巴，不要美国佬!"——自注）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朝着胜利的方向"，一起举着小三角彩色纸旗，示威游行。我那时字写得真难看，居然也敢拿起毛笔写标语，从天安门游行回校时，实在太累了。在队伍中，我用带有河北保定口音语调小声喊："美国佬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世界的各个角落滚出去!"把他们几个人逗得笑得直不起腰来，那时动不动就去天安门：庆祝刘少奇当主席啦，"十一"、"五一"狂欢，幸亏我校离天安门近。还记得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号外发表时，我和小光上街跟着撒号外的大卡车跑了一个晚上，那时就知道瞎起哄。我们的老一辈在他们十三四岁的时候已成了红小鬼，我都16岁了还整天碌碌无为，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1966年7月27日星期三

清华附中已贴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和《再论》，其中说："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一个振奋人心的宣言书，一个向旧世界开火的挑战书！然而工作组却把它打成反革命的宣言书，听说团中央的胡克实知道了此事后，下令解散红卫兵。伟大领袖毛主席在"7.16"那天从容自若畅游长江一个多小时，30多华里。"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碰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领袖的伟大实践，对正处在白色恐怖的革命小将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下午听说谈建华日记（继雷锋、王杰的日记后另一公布的日记，谈是"出身不好"的大学生，日记内容主要是他的思想改造过程——自注）是一部反动日记，北大工作组也撤走了，我班很多人去了北大。我校又有4个同学写了《相信自己，依靠自己，解放自己》的大字报，晚上去北大的同学回来后谈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更证明我们做得是对的，和63届班几个商量明天工作，还被校纠查队赶走几次。就在我们要回去时，去展览馆听报告的玉花回来了，宣布周杰（海淀区工作队队长）被罢官的消息，我们没睡觉，写大字报，准备明天也参加大会。

1966年7月28日　星期四

今天在展览馆开大会，正式宣布罢周杰的官。我为了弄

到展览馆的票和魏晓乡等人跑了整整一个下午。先去新市委，新市委说在正义路1号，到了1号又说在团中央，团中央又说在海淀区文革队，海淀区又说在北大附中，来到北大附中后，说明了我校具体情况，允许我们去7个人。由于人选问题在班上进行了斗争，争谁该去谁不该去，各种人都说自己能代表咱们班。坐车到了展览馆，开始乱哄哄没让进，后来全让进去了。我第一次看到了江青阿姨，她身穿军服，显得高大、英俊、有精神，说话声调很高。她支持我们的行动，她说有人迫害她，靠我们这些人进行斗争，由于受迫害她不得不在会议进行中吃药。红卫兵有个代表向她敬献了水果，会场鼓掌声长达好几分钟。北大附中彭小蒙（北京大学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宣传部长，以善讲演著名。——自注），是个优秀的演说家，听说她初中是女十二中的。会后大雨倾盆，我们冒雨坐车返回学校。他们听了撤走工作组的消息后，有的人兴奋得一夜没睡。革命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了，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北大附中红旗已经拿起了磨好的快刀了，而我的刀在哪里，还不知道呢！我要找到自己的差距，跟上形势的发展。

1966年8月17日

连着两天在工人体育场做纠查工作，前天在工人体育馆斗争黑帮分子陆平、彭佩云，昨天一直在雨地里淋着。昨天刘主席、林彪、周总理、江青等都来了，中央文革小组长陈伯达做了《在大风大浪里成长》的讲话，因为在会场外，报告只能从广播喇叭中听到，也听不清楚。外地学生占了一半，大部分是天津人，看样子以狗崽子居多，他们不好好听报告，捣乱会场，使国家领导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林彪也没

有宣布最高指示就生气地走了。下午3点集合到中山公园中山堂开会，为明天将要在天安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纠查准备。晚饭发的是香肠和面包，睡在中山堂大舞台后台的地毯上，我怕把这身军服蹭脏了，尽量少翻身，要知道，这身军服是跑了好几天好几个单位才借的，借条现在还压在陆军总院护校办公室里，是我的签名，8套军服少一件我也赔不起……他们有的人睡在观众席的位子上。这一夜很难入睡，总结我们这几天革命的经历，抄马连良的家，去芭蕾舞学校、中央戏剧学校声援被压制的红五类，下一步革命的内容将是什么呢？64届三班李××是个编歌的人材，据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的造反歌，是他在上厕所时编出来的，现在已流传很广了。

1966年8月18日

夜里两点半从地毯上爬起，3点集合，每人发了一张蓝色工作证别在胸前，列队从中山公园往外走。过了金水桥在华表处停下，走几步安排一人，再往前走再安排一人，我被安排在了离东华表十几米的灰色观礼台处。5点多钟，我听见金水桥边一阵响动和急促的脚步声，有人说毛主席来了。广播喇叭传来：“×××到主席台来”的声音，我想谁这么荣幸，能在这种场面被叫到？63届4班的场长路拿着一张浅色工作证，找到大会主席团，他换了一个红色的工作证，上天安门城楼找到彭小蒙问，为什么没有我校的红卫兵上天安门？杨长路下来后说，刚才是毛主席来了。三辆黑色轿车从红观礼台后面由西边过来的，主席坐的是第二辆，主席今天穿的是军服，主席一下车一伙人就往前涌，到了金水桥，

被解放军拦住了。杨勇陪着主席上车后从天安门正中间进去了。主席今天怎么穿军服？这一消息使我又激动又兴奋，又庆幸，又扫兴。庆幸的是我当上了标兵，扫兴的是没有上成天安门城楼。一会儿天安门城楼上出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一会儿人群开始高喊："我们要见毛主席！""江青阿姨，周总理：我们要见毛主席！"《东方红》响起后，毛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先往东边走去，东边一片欢腾，欢呼声。他从东边再走到西边，西边又是一片沸腾的海洋。毛主席在西边停的时间比东边稍长些，他把帽子摘下来，挥舞着。西边的红卫兵比东边显得幸运一些。这时，广场、观礼台上的人们，还是不停地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是啊，比起那些在天安门城楼上被接见的红卫兵，我们是不能满足的。这时，一张条子传到我手中，我打开一看，也是要求上城楼见毛主席的。我觉得此时，我有把它直接送到天安门城楼的义务。我拿着条子离开我的标兵岗位。当我快走过金水桥时一名解放军拦住我，他收下条子，让我回到原位，我没有完成任务，更羡慕那些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红卫兵了。

1966年8月29日

晚上我和莫建明、齐晋宁等一行11人踏上了15次特快列车，开始了我们的广州之行。在北京的"破四旧"活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旧的街名已改了，旧的牌号也换了，连旧飞鸽车的商标也抠了。我还给家里的自行车把挂上了粉红色的毛主席语录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妈妈和我商量姥姥的问题，姥姥只不过有十几间房子，靠房租生活，但对妈妈在公安局工作是有影响的。妈妈

把姥姥送回老家，临走时，带上足以让姥姥致命的安眠药片，与其让红卫兵打死，还不如自杀的好。我们坐的是最后一节车厢，车开了一会儿，几个红卫兵押着一些老头老太太们过来了，颤颤微微的老家伙在他们年轻时剥削过人，也压迫过人，历史终究是公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这些黑五类的子女们都坐在前几节车厢，有的还坐的是软卧，能看出他们有些还是职位不低的国家干部。开始那些黑五类的亲属还有人上我们这节车厢来看一眼，后来情况恶化了，8 中红卫兵下令："你们这些黑五类也配坐着，都给我向着东方跪着！"他们真老实，头都向着车开的方向跪着，我们出去上厕所只能踩座位了。有的人干脆踩着他们的腰背过去，我这时觉得他们有点可怜，但也不敢说出来。一个胖老太太实在跪不住了，被 8 中的红卫兵解下的大宽皮带抽打，最后打得老太太想跳车自杀。我和另外一个女生把她从窗户拉进来，但她还是要跳，"西纠"的红卫兵真厉害，车到长沙市从站台上抬过来一副担架，但老太太已经没有气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活活被打死的人。

1966 年 9 月

在广亚中学已经住了两天了，广州市"破四旧"有点力不从心，主要是人也生，地也不熟，去抄家需要当地的红卫兵带路，广东话真难听懂，只好在大街上转转看看。一些挂着个体营业执照的小店铺，都被我勒令摘下撕掉，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允许个体存在呢？昨天去抄了一个坏分子的家，他把主席像画得很不像样，而且还放到床铺的凉席底下，这样对待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太可恶了。经我们研究决定，剃

个阴阳头，（“文革”中侮辱和虐待所谓“牛鬼蛇神”的惯常作法，把头发一半剃光，另一半留着或剪乱——自注）游街示众。今天和玉花去参加广州市红卫兵成立大会，突然决定让我代表北京的红卫兵上台发言，这可难住我了。在家里可以和父母辩论血统论，在学校可以写大字报唱造反歌，在班上顶多也只是表演一个忆苦思甜的小节目，在众目睽睽之中大庭广众之下，发表演讲，可是有生以来头一次。更何况，台上坐的是省委、市委的领导干部，台下坐的是各校的红卫兵代表，我可不配！想想“7.28”展览馆的彭小蒙，再想想天安门城楼上的宋彬彬（当时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之女，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时，她上了城楼，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问她的姓名，她答“宋彬彬”。毛不喜欢“文质彬彬”之意，对她说：“要武嘛！”她于是更名为“宋要武”。从此，反文尚武成了一些年轻人的特质——自注），没有任何考虑的时间和余地，我上台了。这双脚不知是怎么迈开的，嘴也不知是怎么张开的：“广州市的红卫兵，你们好，我代表北京的红卫兵向你们祝贺——”台下鼓掌给我增加了勇气力量，“听说广州市领导不让你们串联搞革命，买火车票还要证明、介绍信，这是压制革命，是办不到的，你们要造反——”随着暴风雨般的掌声，台下的红卫兵往上扔帽子，扔袖章。有的人坐不住了，站起来坐到椅子背上，借此机会我侧脸看了一下台上在座的白发老干部，也没有了德高望重的风度，他们互相疑惑地望着，好像不明白为什么被指责。我也忘记自己刚才是如何心慌意乱的，反而镇定地越说越起劲儿，讲了20多分钟。一下讲台，记者们围过来，照相、采访、做记录，把我和玉花

围得水泄不通。她也显得手脚无措，红着脸，拉我赶快撤出了阵地，我敢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大胆的一次壮举。

1966年12月26日

65届2班王安说在广州看到我在电视里讲演的镜头了，听了真让人无地自容。现在的形势可不像“红八月”时，因为中央文革对我们这些红五类实行了矫枉过正的路线。江青不像以前那样支持我们反而支持“三司”（即“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后起的所谓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之前有“一司”和“二司”，成立之后不久即被视为保守派而受到中央文革小组冷淡——自注），有必要坚决打倒镇压中学生运动的刽子手。于明德、杨长路去北大附中开会商量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事儿。今天在展览馆召开了破私立公誓师大会也许是个转折，形势会有利于我们。会开得很解气，当一喊到“打倒中央文革某些人”时，“反对乱揪老干部”时，全场一致共鸣。会后放映电影《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和《区委书记》。片尾的“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又一次受到全场共鸣。会后，我们骑着自行车，一路上高喊着：“谁说青山不老，谁说‘三司”不倒；青山就是要老，‘三司’就是要倒。”对目前的形势我们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死亡。

1967年1月

听说我们的头头于明德被公安部抓起来，我们几个一起骑车去公安部营救他。我骑自行车带着梁克新，经过新街口、新华门，又是一路高喊口号：“炮打公安部!”“火烧谢富治!”梁克新举着一面红旗，它在寒风中飘扬，它标志着我们救战友的决心和把革命干到底的勇气。当我们来到公安

部接待室时，已经有几十人了，他们一起和我们高喊："放人！放人！"男生从接待室的窗户跳进去后，从里边把门打开，女生就进去了。又黑又冷的晚上，又累又饿的我们，正好走到食堂，随便吃点剩东西继续往里走。突然黑暗中，我被几个便衣扭住两臂押到公安部大礼堂，一会儿他们都被押进来了。李震部长给我们讲话："你们不要上坏人的当。"真可笑，你们不抓我们的人，我们深更半夜跑这儿干什么？讲完话后，一个便衣干部，是个戴眼镜阿姨，审问我。我要说实话，就会被关进去的。我只好撒谎，说我有个后妈，在家受气，回去晚了不让进门，请快点放我，等等。写了一份检查，清晨过后，才把我放出来。

1967 年 1 月 21 日，里期六

我妈妈为了不让我第三次再冲公安部，一直把我软禁在家，直到现在不让我回校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今天和她吵了一架，终于让我出来了。但是学校和以往一样冷冷清清的，我们想出去，到外地去，和工农相结合。因为我校东方红把权夺了，下厂下乡要经他们的批准。多领几个月准备长征的粮票也要经过他们的批准。地院的朱成昭反中央文革可以，而"联动"的人给中央文革提意见却不成，"三司"太霸道了。听说北京家庭问题研究小组（遇罗克以此为名义写一系列批血统论的文章，此小组被冲垮，遇本人以"反革命"罪被处决——自注）写了个出身论，可能是针对着血统论而来的。城里的老兵（即"老红卫兵"，指最先发起红卫兵的人——自注）有的开始不务正业了，追求表面化的穿着打扮，将校靴、将校服，骑着没有后座的自行车，车座拔得老高，还戴着红锻子的大袖章，还有拍婆子（北京方言，指

强制性交女朋友——自注）的，真没意思。这种局面也不知什么时候结束？

申晓辉　革干出身，老红卫兵，现在北京工作，音像出版编辑。

正 本

把回忆的材料留给历史

——记“东方红公社”的成立

有位史哲曾经写道：历史总是离得愈远，看得愈清。30年，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是漫长的，而与历史的长河相比却是一瞬，我们也许还不能透彻地剖析自己经历的文革，但抛开个人的荣辱恩怨，客观真实地反映自己的身历事经，让历史去评价、后人去评说时有材料和根据，却是我们这一代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将记忆中的几个片段记录于后，以为抛砖引玉之用。

一、“文革”初期的中条山铜矿

1966年初，批判“三家村”的文章见报后，各大专院校都组织师生学习。当时，我正在北京地质学院探矿工程系读三年级。根据1957年反右的经验和报刊上的文章，以为

是“毒草出笼”，或者不过是几个文人的笔墨官司，也未放在心上。学校让停课一周集中学习讨论，大家的确觉得没有什么好谈的，往往冷场，你瞪着我，我瞪着你。政治辅导员年龄大些，更老成持重，不敢有半点差错。大家干巴巴地熬过了一星期，1966 年 5 月初就动身到山西中条山铜矿进行生产实习。我们班在胡家峪铜矿实习，这座矿是瑞典帮助设计的，设备比较先进。矿长是从矿工提拔的，天天下井到各工作面察看，对情况了如指掌，指挥生产得心应手。他为人又朴素，下班了就到工人宿舍去和工人聊天，往往是先讲一段《欧阳海之歌》上的故事，再拿矿上的事和欧阳海比较。工人很喜欢和他聊。这里的生产、生活一切照常，没有人去关心“三家村”。我们一开始是熟悉地面设备，后来要下井进行凿岩和爆破工作。按规定要进行安全考试，取得“爆破权”。我们请矿山的保卫科长讲课，这是位道地的山西老乡，一口浓重的山西话。照例要讲一段关于阶级斗争的话，他说：“阶级斗争到处都有，你们北京不是也出了吴晗、邓拓、廖沙麻吗！”大家听了都忍俊不禁。同班有叫吴汉如、陈国璧的与我最好，于是同学们戏称我们为吴晗、邓拓、廖沙麻，一时传为笑谈。实习进行了一半，6 月下旬学校要我们从速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大多数人都不理解，但也只能从命。6 月 24 日晨我们回到了学校，才离开一个月学校就变得辨认不出来了：马路两旁的大字报栏到处是大字报，操场也搭满了一排排的大字报栏，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一夜行程的困倦被大字报中闻所未闻的“消息”涤荡得了无踪迹，一个强烈的念头跃出来：一场暴风雨来临了！

二、首长的批示

北京地质学院的老院长高元贵在师生中有很高的威望，但与地质部关系不融洽。地质部派的工作队把矛头对准高元贵，自然引起师生反感，在学生中出现了反对工作队的言论。地质部向国家经委反映这一情况，任国家经委主任的某位首长在报告上有一段批示，大意是：工作队是代表上级党委领导运动的，如果赶走了工作队，谁来领导运动呢？6月28日，这一批示在院广播站反复播送。支持工作队的人欢欣鼓舞，得到了尚方宝剑。反对工作队的被认为是反党分子、右派分子，被压得抬不起头来。6月28日中午，阴云笼罩，细雨潇潇，我们北五楼230宿舍的同学都垂头丧气地躺在床上听“×副总理批示”，同室的仇水旺似有意似无意地在宿舍门外的走廊上拉二胡，一曲如咽如泣的“江河水”使气氛更低沉肃杀，有人流下了无声的眼泪。

三、工作队“南辕北辙”

中共中央“八·八”决议之后，工作队准备撤离。学校此时已分成两大派：支持工作队的院文革和反对工作队的许许多多各自独立的“战斗队”。工作队上了汽车，原准备从东门出，沿学院路南行到西四地质部，但东门路两侧站满了支持者与反对者，于是工作队的车队临时改走北门，经中关

村绕路回地质部。工作队刚离学校，学校立即贴出了大标语："工作队南辕北辙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四、"东方红公社"的诞生

学院里反对工作队的势力虽然大，但人们各自独立，几乎是一个班几个战斗队。后来各系串联，以系为单位联合，成立了地质联队、探工联队、红勘联（勘探系）、物探联队等。只有以朱成昭为首的东方红战斗队是跨系的，比较著名的有水文系的朱成昭、郑文卿，地质系的蔡新平、周永璋、田春树，勘探系的杜金山、万慧祥，探工系的张华府、张华清。后来，各系又在全院串联，准备成立全院统一的"革命造反派"组织。8月中旬的一天，在教四楼一层阶梯教室开联合大会，朱成昭在讲话中提出来"成立我们的巴黎公社!"会后给联合组织起名时，有人提出叫"东方红公社"，与会人员一致同意。这是"文革"中的第一个"公社"。"东方红公社"有两层含义，一是忠于毛主席，二是遵循巴黎公社的原则。当时的头头有朱成昭（水文系）、蔡新平（地质系）、蒋良朴（勘探系）、郭侃（物理系）、王大宾、杨雨忠（探工系）、田春林（地质系）。由蔡新平负责组织，黄瑞华（物探系）负责宣传，刘长风（物探系）负责作战参谋，我在参谋部为一般工作人员。

五、“八·二三”大辩论中的李讷和陶鲁笳

1966年8月23日，北京地质学院两派群众组织商定在广场举行公开辩论，请经委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鲁笳主持大会。“东方红公社”的主讲是蔡新平，朱成昭与陶鲁笳在主席台并肩而坐。在辩论过程中，蔡列举工作队许多事例，竭力证明工作队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斗批改战斗队”则竭力证明工作队整的学生和老师多数是“黑五类”，并大声疾呼：“东方红里的红五类，我们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应当站在一起。东方红的红五类，站起来。”但是，没有一个“东方红”战士响应他们的呼吁。在辩论中，“斗批改”喊口号，“东方红”战士跟着喊；当“东方红”喊口号时，“斗批改”战士却噤若寒蝉。形势和气氛逐渐向有利于“东方红”的一方倾斜。“斗批改”突然从外面调来一批中学红卫兵，强行登上主席台，大喊大叫，企图搅乱会场。陶鲁笳自始至终未表态，但不时与朱成昭交谈几句。这时，朱成昭站起来走向麦克风，严厉批评“斗批改”搅乱会场的图谋，说“‘东方红’不怕压，也是压不垮的。‘东方红’战士今晚出色的表现，就是一个铁的证明。在这里，我送一首毛主席的诗词与全体‘东方红’战士共勉：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当他读后两句时，“东方红”战士和他齐声朗诵，节奏整齐，声音铿锵有力，在晨曦微照的会场上震荡。接着，是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这种气势一下子压垮了“斗批改”。当东方红日

欲升之际，田春林跳上主席台：“同志们，‘东方红’战士们，当红日喷薄欲出之际，让我们高唱《东方红》，表达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无限忠诚！”于是，全体起立高唱《东方红》。四、五千人的歌声高亢嘹亮，响彻云霄。

按分工，我和刘长风在办公室留守，以备不测。晚上10点钟左右，李讷突然出现，说是要我们陪她去听辩论。这是她第二次来地质学院，仍然像上次那样，一身洗得发白了的蓝色学生装，十分朴素、沉静，没有丝毫架子，也没有丝毫做作。我和刘长风陪她到广场，离开人群有20多米。听了一阵，我到教学楼搬了一张椅子请她坐，她坚决不肯，要和我们一同站着听。她不时发些简短的评论：“蔡新平很有文采，就是软了点。”“朱成昭讲话很有气魄。”“田春林很有鼓动能力。”刘长风说：“陶鲁笳虽然没表态，但还算公正，不偏不倚。”李讷微微一笑，淡淡地说：“他不表态就是他的态度。”在大会散场之前，李讷和我们握握手，悄然离去。我们要去送她，被她婉言谢绝。会后，朱成昭正兴高采烈地讲陶鲁笳对他如何热情，怎么不理睬“斗批改”。我向他讲了李讷关于陶鲁笳的话，他立刻皱起浓眉，满脸阴沉，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过了许久，朱成昭突然崩出一句话：“他妈的，差点上了他（指陶鲁笳）的当！看来这些当权派一个也不能相信！和他们打交道要小心点！”

六、"东方红"战士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60年代的大学里，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比例很低，"东方红公社"里的"黑五类"就更少。因为所谓的"黑五类"子弟都十分谨小慎微，极少有敢于向领导提意见的。反对从地质部派来的工作队，更是他们想也不敢想的。所以当有人提出来搞红卫兵时，朱成昭坚决反对："我们'东方红'中'黑五类'极少，他们敢起来造反，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如果搞红卫兵，等于在我们内部划分等级，等于把他们孤立起来让别的红卫兵去打他们。这个事坚决不能干！"所以，我们每个人胸前只有一个4厘米宽、8厘米长的红布胸章，上面用黄漆印着三个从毛泽东手迹上临摹下来的字：东方红。

当时，在中学生中流行着"血统论"，说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中学红卫兵身着军装，臂戴袖章、腰系皮带，以出身革干、革军而傲视一切，横冲直闯；和人辩论，一旦词穷，扬起皮带就打，边打边骂："老子是红五类，就是要打你这个黑五类。""你他妈的黑五类要造反，你造谁的反！"我们因为没有"红卫兵"，往往难以抵挡。于是，搞红卫兵的事又被提出来。朱成昭也有点同意，但仍然有保留："外出行动，全体战士都戴红卫兵袖章，回校后，一律不戴红卫兵袖章。"虽然同意搞红卫兵了，但多数人不同意搞与中学生一模一样的红卫兵袖章，认为他们那样的红卫兵名声不好。有人提议叫"东方红红卫兵"，大家不同意。有人主张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或"毛泽东主义

红卫兵"。朱成昭说："叫毛泽东主义，主席可能不会同意。"我主张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我们只管叫，如果主席不同意，主席说怎么改，我们就怎么改。如果主席不表态，我们就叫下去。"朱觉得是个办法，于是第一批"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袖章很快印了出来："毛泽东主义"五个宋体字较小，在上排；"红卫兵"三个毛体字较大，在下排。据说，后来在天安门城楼上，有人把一个"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袖章献给了当时的副统帅林彪，林还把它戴在左臂上。

"毛泽东主义"的提法惊动了毛主席，他不同意这样的提法。戚本禹把这个意见转达给我们："主席不同意毛泽东主义这个提法，你们不要把自已的想法强加给主席。"这个批评太严厉了，我们只好改。以后改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五个字仿林彪字体，"红卫兵"仍用毛体。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东方红公社"成立前后所发生的一些事。

正本　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北地东方红"成员，现在河南工作，干部。

碧 峡

波澜乍起

——武汉水电学院的 1966

1966 年 6 月 12 日上午，省委工作组的李组长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动员开展文化大革命，传达了毛主席最近的一个批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集中在院体育馆里的两三千听众，轰地一下站了起来，鼓掌，发出长时间的"啊…啊…"的欢呼声。

一种与天庭豁然贯通的神圣感，抽紧了我的心。我的眼角湿润了，而且感觉到，周围好些同学的眼边也挂着泪花……

两、三个月后，我一次次回忆起工作组进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第一天的场景，努力去揣测当时还没有出现"左派"或"右派"，"革命群众"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野的老师、同学的最初心理状态。我相信，在那一天，多数在场的欢呼者，都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看作是毛主席、共产党的人，

自认为都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尽管也有些人未必这么坦然和轻松。

文化大革命的头一年，我22岁，念四年级。我的同学大多在这个年龄上下，完全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一代学生。那时大家很喜欢一首赞颂雷锋的名诗："你只有二十二岁；不对，不对……二十二岁是什么样的年龄啊？七分热情，三分幼稚……。"我和我的同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这场30年后、或许40年后人们还不得不议论的政治大动荡。

说不自觉，是因为我在6月，甚至在1966年，并不知道这场革命最终要作什么，会出现些什么。1966年春天报刊上频频发表的史学、文艺战线大批判文章，持续了两个月的批判"三家村"，使刚刚从"四清"第一线归来的师生，隐隐感到一场政治斗争的来临。特别是6月3日广播了党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新市委指派的北大工作组已接管北大党委权力。有同学在悄悄议论，是不是彭真出了问题，北大出了问题。实际上，持续已3年的中苏公开论战，早已为这场文化大革命形成了种种理论、观点，乃至后来红卫兵的文风。1965年春，"二十三条"传达到大学，令人特别注意到"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新概念。后来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我们虽然没有与任何走资派交锋，但阶级斗争的弦已绷紧，我们学到了撇开基层组织，由工作组发动群众来揭发干部的办法。从农村回来，本来我们已进入专业课学习阶段，但没法平静下来，回到学校后，我去图书馆把下乡期间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的重要文章补阅了，作了笔记。1966年1月21日，我在一则补阅日记上写下："'四清'之中发表了好几篇文化思想

战线上的重要文章，都是谈的政治。回来后得认真学习。”我已觉得中国之大，似也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3月6日，给一位正在社教中的老校友写信，说“以往的高校和社会斗争有极大程度的脱离，这种脱离是资产阶级的，是人为的。现在正在变，变得很好，大快人心。”

工作组进驻水院的7天，是不眠的一周。水院像一堆干柴，轰然起火。被意识形态斗争热浪和既单调又丰富的学生生活烘焙了数年的干柴，终于达到了燃点。同学们的狂热、兴奋程度，超过了1958年大炼钢铁时期。那些天，没有什么派不派，武昌的工人给大学生运来了白纸和墨汁，我们的洗脸盆盛满了浆糊；人与人也好像一下子亲近了很多，感情冲动，思潮澎湃，激情与热泪相融。尽管李组长仅仅是某学院的一位处级干部，但他代表了省委来领导运动，不少同学去找工作组，去述说党委领导运动的不得力，去述说自己的怀疑。尽管院党委没有靠边，但已有人写出大字报，说张院长、张书记、张副院长是“张家村”，主抓教学的张副院长，自然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特别是党委宣传部胡部长，鉴于他的工作性质，多年来在干部、学生中的不良印象及出格的言论，自然成了众矢之的。当时学生并不真了解学校的历史、人事内情，所列举的领导罪状，无非都是“抵制毛泽东教育思想”、“抵制文化革命”之类，许多都是捕风捉影。而我们心中的文化革命，也无非是一场教育革命。

有的大字报无限上纲，有的出现了谩骂与人身攻击，动不动把人名打上红叉叉……党委在公开场合，什么也讲不出来，而且有口也似难讲清白。

当然，在激昂之中，同学们也有徘徊和内心的冲突。一

个一年级同学悄悄地告诉我，他很矛盾，好像自己的父母亲被批判了似的，而且不理解为什么老干部会犯错误。我说我很理解他的苦闷和担忧，但也理解为什么老干部跟不上这次革命的形势，我内心也有疑惑。

当时，同学们奇怪地发现各系党政干部按兵不动，态度暧昧，甚至阻碍学生起来，部分学生干部跟在后面，疑窦顿生。有的系低年级同学与辅导员发生争执。个别政工干部流露出要警惕坏人破坏的言语，学生中也流传出有左、中、右秘密排队，引起强烈不满。好几次，在一些公共场所，如食堂、宿舍楼外空地，学生自发聚会、集会、争辩、述说。一些同乡、熟人，特别是文艺、体育积极分子等活跃分子在走动，原始状态的串联已在系际、年级间出现，当时还没有“串联”这个名词，原始的串联被斥之为上窜下跳。

一些不善言行的人，正在思考，把激进分子视为“四清”中的“勇敢分子”，去打听他们的出身、表现与动机。我也这么在观察、担心。6月17日、18日，出现了反复。以“工人要说话”名义出现了反击大字报，院广播站反复播送“反击别有用心的一小撮人”的声明，有人慌着撕去已贴出的大字报，有人涂去大字报上已签上的名字，有人开始作检讨……。张书记向处级干部分析形势，说1966年是“1957年加1958年的形势”，文化革命是“一场新的反右派斗争”。当时，大家完全不知道这是张书记从中南局宣教口会议带回来的精神（5月1日张书记从广州回来）。坚定分子对这一提法嗤之以鼻，认为1966年就是1966年，是毛主席领导的革命，是为了反对走资派。恰好那几天广播了南京大学的消息，批判校长匡亚明压制学生，敏感的学生反对把

紧跟院党委、保卫院党委和紧跟保卫毛主席、党中央、湖北省委并提，即反对提四个紧跟。“17、18号事件”这样就过去了，但学生中的分裂从此开始。19号是一个星期天，全院自动放假一天，不少人到华中工学院、武汉测绘学院、湖北大学、湖北医学院，从自己的老同学或老乡那里了解其他学校情况，这大概是第一次的校际串联。

运动紧张地发展，形势还没有出现一边倒的情况。激进者对工作组不满，去省委反映情况，未得到满意的答复，其中一个同学，便自己买票去北京找中央文革接待站反映情况。

7月10日，省委加强了运动指导，派来了以省委副秘书长刘真为首的工作队。学生中传开，他是当年武汉大学斗争中的工作队长，后留下当校长，是当然的左派，八级干部。我想，大概他可以镇住院党委了。

只有极少数干部知道，工作队进驻，是来执行省委关于在水电学院反击右派的指示的。干部、师生中的“右派”，早在5月中旬，就已按既定精神，暗中确定。到了10月份，学生才从转抄、油印出来的一份文件中，知道省委第一书记——也是中南局书记，有一个“七·三批示”，说武汉地区文化革命形势很好；有左、右派争夺领导权的学校，如水电学院，对这种院校，要引蛇出洞，枪打出头鸟，打击学生中的右派分子。

省委书记是在武汉大学生中深孚众望的秀才书记，大学生听过他的形势报告，读过他的好些文章，也听说毛主席很欣赏他。这时，他已到北京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副组长。我没想到水利学院的事是他一手关照的。

7月15日，公开点名批判斗争学生，有组织地炮制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地出现在校园中。记得第一名受批判的就是上京去找王任重的那个同学。另一名是一位班团支书，据说他在全班吃西瓜时（“文革”中学校仍每日发冷饮，有时是发西瓜），持切瓜菜刀威胁不同观点的同学，不几天，就以“持刀杀人”罪名将他正式逮捕。另一名同学，据说是几年前就组织了反革命集团，向毛主席上“万言书”，要篡党篡政。还有一个同学的罪名现已记不起来，大致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破坏运动。后来才知道，这四人是院党委向工作队汇报，经省委正式批准公开点名的。尽管工作队原意似乎是要控制打击面，只枪打出头鸟即可，但不出一周，全院在各级公开点名批斗的老师、学生已逾百人。一位据说是1957年漏网右派、名利思想严重、自称要超过爱因斯坦的老师跳了长江。一位从苏联留学归来的青年教师自杀，罪状恰恰是他向党组织交心，清理自己对苏共中央存在的模糊认识。一学生自杀未遂，据说吓得神经分裂了……

原定7月16日有横渡长江的活动，同学们已准备了近一个月，由于“反右”，临时撤换了许多选手。但这天中午，渡江回来的同学，带回来一个惊人的消息：毛主席检阅了革命群众，毛主席横渡长江，王任重陪游。毛主席在武汉！他一定又住在对岸的东湖宾馆，他知道一水之隔的水利学院的情况吗？

我们多希望王任重同志向他汇报武汉的情况啊！有的人拿出发下来才一两个月的毛主席语录本，哭着唱出了“红军战士想念毛主席”。这是1964年公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一首名歌，学生把自己比作受王明路线打击的战

士，而把毛泽东当作自己的救星和指路人。但批斗学生在继续，党委领导甚至亲自到会。

7月30日，“反右”戛然而止。后来才知道，王任重在北京向省委打了招呼。8月中，在电影场听重要录音，突然听到了刘少奇的声音，印象最深的是，他说你们问我这个革命怎么搞，老实说，我也不晓得……。但8月上、中旬，谁也不知道中央出了什么事。一些受了委屈的人认为，是院领导骗了省委，而省委又骗了党中央。从此对王任重产生失望和怀疑。王任重很快在中央文革失势了，他受到武汉学生的揪斗批判。但在文化革命之后，据说有人向他调查“文革”初大学生的所为，他说不要再去追究了，学生也是上当的。

运动经过了两个月，同学中的分裂已不可避免，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左派，是保卫毛主席的；不同的是，一部分人认为党中央是要在干部群众中开展一次新的反右运动，另一部分人认为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心向党内走资派斗争；一些人按照组织渠道的传达、布置来理解执行，另一些人按照自己本能的理解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

8月23日，广播台突然通知到体育馆集合，说是来了北京红卫兵！“红卫兵”当时还是较生疏的新名词，但有莫大的吸引力，同学们飞奔而去，我下意识觉得自己好像去迎接天使一般。

后来，工作队宣布撤离，成立了院文化革命委员会。在此之前，进行了两天的大辩论，其焦点自然是前一段的大方向是否正确。辩论是大民主的，但当时的少数派占不了优势，多数人还不明白北京发生了什么，武汉与北京有什么联系。选举的结果，党委与工作队内定人选全部当选，少数派

提名获票不多。我同情少数派，却盲目和无奈地在选票上划了勾。

新的院“文革委”重新抓住了“一斗二批三改革”的方向，推出一位12级的梁副院长作为走资派，批判了一批老知识分子，斗争了1957年的老右派分子，八九月之际，组织了比较讲究政策的破“四旧”。

但同时，一些人去北京看形势，其中一些于8月31日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回到学校，他们传抄了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央文件和北京大字报；我第一次读到“炮打司令部”，但还不敢真相信这是毛泽东写的。这一批人于9月初组织了“8•31红卫兵”，这是水院第二个公开命名的造反派组织。之前，在6、7月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署名写大字报，8月里一直冲在前的同学，于8月28日组织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战斗队”，自作了队旗，开始批判工作队执行的政策。后来，以他们和其他一些战斗队为核心的少数派，与武汉大专院校其他造反红卫兵同时定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并于10月26日参加成立了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这就是武汉“二司”。我院“横扫”队的头头丁家显任副司令。他是一个普通农家子弟，三年级学生，个头不高。开始，保守派和观潮派都没把他放在眼里。“一司”由各院校“文革”组织的大专院校红卫兵组成，后来被认为是保守派红卫兵。水院学生中的战斗队是自发出现的。6月初的大字报，多以个人、集体名义、班级名义签署，后因意见不一，自由组合的多了起来，开始有了集体的笔名；笔名具有战斗性挑战性，而且稳定下来，有了雏形的组织，到八九月后，形成了旗帜林立的战斗队。不同的红卫兵组织，则是同

类战斗队的聚合。水院多数派战斗队多用一些显示庞大、牢固、稳健、传统革命化的名称命名。少数派多用毛泽东诗词、语录中的名词成语以及斗争性、挑衅性的名词名句命名。文化差异显而易见。

水院里“多数派”、“少数派”的提法盛行于七八月间，到八九月，毛泽东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信，已人人皆知，少数派成了自认和公认的造反派。当时，院文革是合法的权力机构，各个组织都到院文革领取文具，开支必要款项。

9月初，水院造反派的几个战斗队，一次次到省委提意见、请愿、静坐、示威，适逢首都部分南下大学生炮轰省委，在省委门口、省委礼堂前，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发生辩论，焦点是湖北省委好，还是犯了错误。水院的造反派走向了社会，他们当时并未预料到，自己会在今后一两年，不断地影响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9月底，由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安排，由水院院文革组织，全院绝大部分师生按正常班级建制到北京串联，而且在国庆节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第四次检阅红卫兵），院文革的部分学生领袖，光荣地上了观礼台；为了保证国庆清晨的活动，有的同学幸运地住进中南海，甚至安排在周恩来总理的家里睡了一晚。到北京大串联，是水院多数学生思想发生变化的重要一役。特别在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这是10多年来想都没敢想的最神圣时刻。那时，意想不到的是毛泽东对学生的高度信任和支持，使我们一下子从传统革命的崇拜者，成了现今革命的参与者、推动者；好多人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站在毛主席一边，把文

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水利学院多数学生，来自农村和城市中下层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熏陶不如北京学生，虽然6、7、8月有一些惊人的举动，少数人也非常过激，但与北京学生比起来，思想深处还是温和的。北京之行，使人大开眼界，多数人知道了党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听说了什么是路线斗争，渐渐地自觉去跟随毛泽东路线。毛泽东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造反派红卫兵从来没有感到和伟大领袖如此地靠近，从来没有这么自豪过。

10月6日，仍在北京的部分造反派，去参加了一个重要的大会。即"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第一次听到传达10月5日发出的中央军委《紧急指示》。这个指示中心思想是不允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给被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的人平反，材料当众销毁。

10月上旬，水院多数学生已回院继续搞运动，一部分人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联和"长征"。10月13日（或是14日），省委工作队召开全院大会，贯彻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宣布给运动初期"反右"中被整的同学平反，销毁材料。但是，造反派不同意由工作队执行的平反，坚持要彻底批判湖北省委执行的"资反路线"，要"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给自己恢复名誉。当时挨过整的人多数未去参加平反仪式，当初的材料，也已被复制转移，所以工作队的行动不了了之。而造反派则利用批判"资反路线"，宣传了北京、全国形势，争得了地位，团结了观望派（中间派不赞成整群众，也害怕整群众，但又不完全同意造反派中激进分子的言论、行动），为造反派形成水院的多数，作了思想和组织的

准备。

10月的水院，对造反派来说，仍如节日的狂欢，每天都有新鲜事件出现，造反派自己装的广播，每天都播出理直气壮、时时又带着冷嘲热讽的批判文章。好多年后，一些外地来过水院的大学生，还给我提起造反派就像在播送“九评”一样的起劲。走进造反派集聚的6号教学楼，我觉得自己像走进了法国历次革命中的巴黎市府，或十月革命时的斯摩尔尼宫。

不管怎么说，1966年10月在水利学院是关键的。我们班的团支书，是院文革的委员，那时与我谈心，说他心里很沉重，没想到自己刚刚参加政治斗争，就犯了错误，而且是反动的错误。他后来一直与造反派站在了一边。院团委的主要干部，是院党委一手培养出来的骨干，他们和一批政工干部、政治辅导员，造反参加了少数派的活动。他们也成了一批核心人物。

而工作队成员，卷入了运动初斗争的中心，最早受到学生冲击与影响。我从北京回来后，与李组长聊天，他心平气和，也是心悦诚服地认为自己作错了，我觉得他是诚恳的，也觉得不能怪他什么。上级指示他，水院向他反映，他必须照办。我也与刘真队长谈过．他参加过多次造反派的批判会，参加过陪斗，他开始了解水院造反派并不是那么青面獠牙，他也认为自己的确作错了。我当时提醒他的一点是，水院的“反右”，不仅仅路线上完全错了，而且一些关键人物的关键问题，恰恰是假的，这是他和一大批虔诚的“反右”积极分子始料未及的。

他从1967年初开始支持水院造反派，后来被打成黑手，

由于和造反派搞在一起，他始终站不出来。

我们的老院长，第一书记张如屏，是黄埔前期学生，老革命，8级干部。运动以前，学生们都很尊敬他，听说他是1957年与那时的右派分子针锋相对斗争的英雄。在学生中"反右"的秘密动员，是他搞的；造反派狠狠批判他，但似乎并不恨他。有一个同学写信给他，举了一例，说苏联英雄、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当他在少年教养院时，曾被院长误认为偷了糖，他向院长保证，请他相信自己的清白，院长不信；马特洛索夫逃出了教养院。第二天一个小女孩向院长认错，院长彻夜未眠，深深感到作为教育者，自己第一次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这封信说，幸亏马特洛索夫没有因此堕落，他还成了以胸口堵住敌人枪眼的英雄。但为什么一个教育者不理解不信任自己的学生呢？为什么先生老是欺负学生呢？您难道不后悔吗？

张院长从何时后悔的，我无从知道。1967年夏初，武汉武斗初起，水院学生受到殴打，学生在汉口、武昌绝食抗议时，他捐出了自己的薪金和粮票，而且拿着老脸去找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请部队出面来制止武斗、保护学生。老革命、老院长终于和学生站在了一起。水院学生，那时还是很简单的，他们衷心希望这场革命，不是分离两代人，而是使两代人衔接得更紧。他们十分希望一个个老干部，都站出来支持自己。他后来与刘真、毛远跃（测绘学院院长、第一书记，据说是毛泽东本家侄儿），以及水院的梁副院长，其他几个干部，组成了革命干部联络会（革干联），公开支持武汉造反派。1967年"三结合"时，被结合成水院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但在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一度被打成

“叛徒”、“5.16黑后台”。70年代中，通过一些老领导作工作，他被平反。我曾去看望他，他给我讲了很多。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他从不恨红卫兵，红卫兵是想革命，他也并不记恨他一手培养出来，后来（在红卫兵走后）又批斗他的一些政工干部。他想不通的是他的某些上级领导，是多年的干部，党的历史、政策都懂的，为什么要挑起群众斗干部？我明白，他指的是抛出延安审干时已作结论的材料，置他于死地的一些恶劣作法。1970年后，水院的干部大批挨整，据说执行林彪路线的军宣队，宣布水院干部只有“一个半好人”，那一个好人，竟是运动初众矢之的的原党委宣传部长！老干部统统被打成“走资派、叛徒、黑手”，相比之下，他们应当理解1966年确实是错怪错整了一大批纯真激情的学生。

水院造反如滚雪球一样，由小变大，先后组成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岗山兵团、“八·三一”兵团、红旗兵团，我所在的战斗队属于红旗兵团，但我总感到自己仅仅是一个观潮者。11月，从正统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中造反出来一大批人，组成了红卫兵革命造反兵团，也加入了武汉二司；其头头是一位院文革委员，是运动以前知名的院三好学生。到此时，我认识的老院文革成员，已有五六人加入了造反派。另外有一大批主张批判“资反路线”，又不同意二司一些激进的言行的人，组成了“共产主义红卫兵”，参加了武汉红卫兵第三司令部。

到1966年底，我院造反派以二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为核心，占领了院广播台，元旦后，又封了档案室，接管院政治部、武装部、保卫科的权力，实现院内夺权，对外代表武

汉水电学院；对立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开始瓦解，一些人外出串联，一些人在冷静观察。到这时候，武汉二司的红卫兵，和受其影响的学生，大致已占三千学生的一半左右。

碧峡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生，现在广东省工作，科技干部。

胡发云

红鲁艺

“红鲁艺”是“文革”初期一支中学生文艺宣传队的名字。

1966年12月初，我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大串联之后，乘一艘美国登陆艇从上海返回武汉。那艘登陆艇的舰首宽宽的，像一个上大下小的梯形。前后甲板都很大，上面搭满了芦席棚，里面挤满各地的红卫兵和大中学生。舰的底舱也很大，也挤满了各地的红卫兵和大中学生。我想，当初造它的美国人绝不会想象到，它日后会派上这种用场。我不知道这艘美国登陆艇怎么会留在了中国大陆，大约是它的航速太慢，来不及开走。它每小时只行驶六七海里。于是这一段航程，成为我本来就很孤独很寂寞的串联旅行中最孤独最寂寞的一段。

到那时为止，轰轰烈烈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

半年。尽管一开始我也兴奋过，激动过，如同回到“五四”、抗战、“一二·九”那样的情景中，就像我读过的《青春之歌》那些小说一样。但很快我就发现，这么一场富于刺激性、挑战性的革命，从少年时就盼望了那么多年的革命，不是属于我的革命。这种感觉是从学校成立官办的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成立红卫兵组织，从班上那些出身工农、革干、军干家庭的同学喊出“自来红万岁”的口号时就开始了。它不仅不属于我，甚至会威胁和压迫我，因为我不是“自来红”。我父亲是一名医生，解放前还曾做过国民党部队医院的军医。尽管他唯一亲历的战争，是与日本人打的那场著名的金牛之役，以后便一直在后方医院，但他毕竟是穿国民党军装而不是八路军军装的医生。况且，当时连武大校长、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省委宣传部部长曾淳这样的共产党的知识分子都成了黑帮内奸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那个火红的夏天，我成为逃避者、旁观者，或尴尬的参加者——比如开会、游行、集体到武大去参观批判武大“三家村”的大字报。我最怕集体喊口号、唱歌或在游行队伍中扭秧歌……那会使我觉得我在做不是我真情真心愿意做的事，尽管那时我和我的家庭尚未受到什么冲击——我唯一的一张大字报是我同桌的一个女生写的，她说我和她同桌一学期却从来不跟她说话，是瞧不起工农出身的同学的表现——但我看见了在许多班级的忆苦思甜会上，那些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的同学，被人骂作狗崽子、吸劳动人民血汗长大的小吸血鬼，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许多这样出身的同学也流着泪痛骂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看到了那些级别较高的老师被剪了阴阳头，系着领带挂了高跟鞋顶了痰盂在烈

日下跪在操场上。看到了我们学校那个叫陈邦鉴的数学老师在蚊帐中用剪刀剪断了自己的喉管，从半夜一直挣扎到天亮才死去。看到了那个叫许简的政治老师，因为将自己写的一些格言警句印成一本“三言两语”，而成为我们学校头号大批判靶子。看到学校教学楼上那条“红色恐怖万岁”的大标语……

那时我已写了好几年的诗，并将它们抄录在一个红色缎面日记本上。上高中以后，我曾拿给那个很喜欢我的作文的语文老师看过，他还用红笔改正了上面的一些错别字。那些诗，大多是一些少年的情愫，如《春晨》，《夕阳的海边》，《小流星》，《小溪流》（许多年以后，这些少年之作作为我创作的一段历史记录，陆续发表了一些）。也有内容比较革命的，如《黑孩子约翰》，《敬礼，非洲兄弟》，《毕业歌》，《在退队仪式上》及写给董必武老人的诗。（董必武曾在我上初中的那所中学工作过。我读初中时，他曾为我那所中学题过词。）但还有一些诗，在当时看来是消沉、孤寂、小资产阶级情调甚至是修正主义的。如有一首《向往》，便叙说了对一个星球的想往，那上面没有阶级、战争、饥饿和瘟疫，没有国界来阻隔人们，大家信仰的是同一个主义（这首诗后来也收入我的诗集《心灵的风》）。这些诗，甚至包括前面那些诗，拿来批判，是极容易的。我想了很久，终于只撕去了其中两三首，然后将那红色的缎面日记本在家中找个隐蔽的地方藏了起来。后来，我一直庆幸自己的那一念之举，使我少年时代的一些情绪与心境得以保存下来。

8月，运动渐渐从学校发展到社会。红卫兵们常常外出

抄家或参加什么活动，我便可以不去学校了。我几乎天天独自一人到长江去游泳，到几所大学去看大字报，听辩论。不久，大串联开始了。这时的大串联还是由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或红卫兵指挥部及班级文化革命小组指派的，基本上属于“红五类”的特权。我第一次面对了与我的同龄人在一个我很看重的具体待遇上的差异。但我不能不接受它。那段时间，我的内心是复杂的。一方面，渴望成为这场革命的参与者——这种渴望与其说基于对革命的向往，不如说对某种行为本身的向往。另一方面，又保持着排斥、抵触的孤傲情绪。学校曾发生过几次关于那副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激烈辩论。这些辩论实际上主要是在“红五类”之间进行的，其他同学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即便有，也只会将结论复杂化。)有几次，我都想上台去，将我想过许多遍的话说出来。我想说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还有鲁迅、周恩来，说说他们的家庭和经历，来反证这副对联。但我终于没有上去。我知道，那是一个靠气势、靠情绪而不是靠道理说话的时刻。

到了10月，大串联已变成了所有学生的个人行为，报上已开始用“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革命师生”，而不再仅仅用“……检阅红卫兵小将”的字样。学校工作组撤走了；南下的学生开始围攻省委；从北京方面传来了一些重要说法，是关于党内的问题，关于中国的“赫鲁晓夫”；前一段学校被报斗的老师和被批判的同学，也不再成为运动的唯一焦点。在这种于我来说已变得稍微宽松一点的气氛中，10月下旬，我与另一个男生挤在沙丁鱼罐头一样的列车中去了北

京。在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在北大、清华、中宣部、中央音乐学院，我一方面为那宏大的场面，为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看作神一样的毛泽东主席，为那些惊心动魄的大字报大标语所感染所激动；一方面，仍为一种置身局外的寂寞所缠绕。就是在人海汹涌的天安门广场上，我也依然有一种深深的疏离感。在北京、在上海，我基本上独自行动，因为我希望去了解一下文学界音乐界电影界的情况，了解一下我从小景仰的那些大作家、音乐家、电影演员的境况。我看见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成了牛鬼蛇神。那次去中宣部文化部，正碰见批斗贺敬之等一批作家、诗人。那时，我几乎读过贺敬之公开发表的所有诗篇。他的许多诗，包括像《雷锋之歌》那样的长诗，我都能整篇整段地背诵出来。面他也成了三反分子。这使我隐隐感到，这场运动已不完全像我前几个月理解的那样了。北京的一些高校，已出现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中国首脑人物的大字报。但同一时刻，他们又出现在毛泽东检阅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行列中。一些运动初期因反对工作组，反对官办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反对单位领导而被打成小爬虫、反革命的师生及其他人，已被平反、解放或对他们出现争议面不再是一边倒了。这一切，与前几个月斗老师、斗同学、斗地主资本家比，已迥然不同，充满一种神秘紧张的气氛。

那段时间及其后的几个月中，对我最大的震动与改变，就是对许多人的神圣感与崇离感轰毁了。原来他们也贪财，也干一些不光明正大的事；也叛变过，也怯懦过，也斤斤计较过级别待遇甚至为此哭泣过……在心里深处，我觉得这是比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不可原谅的事。

尽管如此，直到我从那艘登陆艇上下来，踏上我的城市之前，我依然是一个旁观者。我希望参与，希望在这一场神圣浩大的史无前例的革命中，寻求青春的价值青春的证明。那是我 17 岁以来全部的教育所教给我的。我想，对于当时绝大多数都经受过这种极端统一的教育的少男少女来说，不论其当时的境况如何，这种内心的冲动是相同的。

回到学校，发现一切都大变了。学校很冷清，一条“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巨幅标语贴在最醒目的地方。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在用各种各样的观点讲着各种各样的事。再没有由校文革委与红卫兵指挥部组织的统一行动，又成立了另一些红卫兵组织。这些红卫兵组织显然区别于以前那种红卫兵，加上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红旗”、“井冈山”等各种前缀词汇。而且各个红卫兵组织还有自己独特的名称，如“红旗公社”，“生死决战兵团”，“千钧棒”，“斯巴达克斯兵团”……大的有数百人，并与校外同类组织形成序列。小的几人、十几人。还有一个“一人战斗队”。这些红卫兵组织的成员，有的是从老红卫兵（当时老红卫兵因为不加前缀并与大多数其他红卫兵组织对立，已被贬称为“三字兵”，这种改变是富于挑战性与刺激性的，它不但蔑视了几个月前那种“自来红”的神圣与权威，甚至使我联想到毛泽东主席，因为他那著名的穿军装的照片上，就是佩戴着这种只有三个字的袖章）中分裂出来的，他们大多数是其中的工农子弟，或原来是军干、革干，后来突然变成了叛徒、特务、内奸、黑帮、三反分子、走资派家庭的子女。一部分是运动初期处于中间状态的职员、手工业者、城市贫民或小

工商业者的子弟。还有一些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一向胆小文静的女生，甚至有一批是运动初期的“狗崽子”们，父母自杀、被关被斗、被报纸点名的“从里到外”都黑透了的“黑五类”。他们有的还成为一些组织中很活跃，很有实力的骨干。大多数组织都有自己的油印工具、广播器材、对外联络站及袖标、旗帜、印鉴、活动经费及成文的或不成文的几条标准观点——20年后，当我见到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及更多比他们年轻的人，以同样的热情、同样的风格组建各种公司的时候，感到又亲切又熟悉又无可言说。

那时，学校党组织已瘫痪，省委市委也处于招架、维持之中。并且，“资产阶级”这个字眼，这个多少年来只因生活经历、社会职业、经济状态甚至思想而用于特定的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字眼，已经用在他们头上，而且是主要地用在他们头上了。最先这样用的，是我们全国人民都很崇敬的毛主席。这使这个本来就严厉又含混的字眼，又有了更多的解释。我想，这对于长期置于它阴影之下的一部分人，无疑是一种宽释与转移。

我去过学校几次以后，决定不留在学校搞运动。一个原因是，半年以来，我已和学校的运动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一切于我来说已变得陌生。另一个原因，是我在回武汉的那艘登陆艇上看了一场演出。节目非常简单，就是一些歌唱毛主席的歌曲。乐队只有一把二胡，一支竹笛，一把小提琴。但那音乐，那少男少女的嗓音，还有他们之间在演奏与歌唱时的那种和谐，不知怎么特别地打动了我。或许是几个月来看

过太多的狂热、凌厉、粗暴与恐怖，此时这些音乐变得格外温馨美丽。我一直喜欢音乐，也做过音乐梦。学过二胡、小提琴、钢琴，还作过曲，参加过学校的文工团。我觉得我能找到一种更适合我的革命方式与生活方式，那就是组建一个自己的文艺宣传队——那个时期，于我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时期。

我找到我读初中时校文工团一个关系很好的同学何帆（现在湖北省作家协会工作）。他当时在华工附中读高二。如我一样，他也一直游离于学校的运动之外。他父亲是一个化工技术人员，解放前曾与朋友合开过一家药店，因而成份定为工商业。他母亲1957年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发配到一个农场劳动去了。他是一个很聪明，也很有文学、音乐天赋的少年。他的大哥是武汉歌舞剧院的民乐演奏员，曾去过日本、香港演出。听了我的想法，他也很赞同。于是，我们拟定一个招生方案，决定在全市范围内招收宣传队员。我们将招生中的政治条件定得比较宽松。我们知道，许多有文艺才华的人，往往政治条件都不好。我们希望组建一个水平上乘的文艺宣传队，所以我们说欢迎一切愿意革命、愿意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同学，包括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的同学与我们共同战斗，共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它将是独立的、不隶属任何组织。我们为这支文艺宣传队起了一个名字“红鲁艺”——它的来源当然是延安的那个“鲁艺”。尽管当时我们已经知道，一些延安鲁艺出来的艺术家们已被打成黑帮、修正主义分子，但我们还是取了这个名字。这个在今天看来已是很正统很革命的名字，在当时与其他火辣辣的名字相比，多少还有一点浪漫情调和小小的政治

忌讳。

整个策划完成后，我们便到武汉歌舞剧院及其他地方借了一些乐器，在湖北艺术学院要了一间民乐排练厅，在市委办了革命群众组织的登记手续并领到了一笔经费……真是大革命了，一切按常规不可想象的事情，都可以办得到了。只是有的顺利一些，有的困难一些而已。12月中旬，我们将几份花花绿绿的招生广告贴到司门口大桥，汉阳门轮渡码头，江汉路原《长江日报》社……那一年，武汉的冬天特别冷，雪化后冻成冰，连浆糊也结了冰。我们只得将结了冰的浆糊先放在手心，用体温将它溶化后再抹到墙上。（实际已不是墙，而是一层又一层大字报结成的板了。）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贴完一张，再去另一个地方……我们知道，我们在干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由自己决定的事。（当然，从今天的角度看，那时全国人民所干的事，其实都是由一个人或一种观念决定着的。）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们最自由、最热情、最快乐的日子。

贴完招生广告，我们又印制了宣传队员登记表，并作好其他相应准备。到了招生那天，我，何帆，还有几个原校文工团的同学早早来到湖北艺术学院那间民乐排练厅。那间排练厅大约有近百个平方，四周是花坛与冬青树，后面是一个小小的湖，湖边与花坛中有几副石桌凳。排练厅里还有一架钢琴，刚好可以用来考试……总之，一切都那样正规，如同外面没有那一场天翻地覆的震荡一样。湖北艺术学院也曾是我心中的殿堂，“文革”前，我曾多次怀着虔诚与崇敬的心情，到那里去听音乐会、毕业生演唱演奏会。我也曾做过报考湖艺作曲系的梦，但这个梦随着我考高中时，知道了父亲

的经历后结束了 我知道那时的湖艺已在乡村社队或工矿企业招收了一些连简谱也不会识的学生 我没想到的是，随着这场疾风暴雨而又扑朔迷离的运动的到来，我能以一个主考官的身份，堂而皇之地走进这座华中地区音乐艺术的最高学府。可能到这时，我才真正接受并切近了这一场运动

招生进行得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几天中有数百人来报名应考。我们计划组建一个比较正规的文艺宣传队，其中包括一个全建制的民乐队：四把二胡，一把板胡（可以兼），一支唢呐，一架笙，一支梆笛，一支曲笛，一架扬琴，一把阮，二把琵琶，一架手风琴；还有低胡及打击乐；一个声乐队（包括戏曲清唱）；一个表演队（舞蹈，曲艺，朗诵）；并提倡一专多能。

招生中，我发现，在这汹涌澎湃的革命大潮中，在这解放全人类的神圣事业中，竟有这样多的精神流浪儿。这些十四五岁到十八九岁的少男少女们历尽那么多于他们的年龄来说是太过于残酷的打击与折磨后，仍在苦苦寻找理解、温情，寻找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自已的生存之路。有的同学考完之后，也不管录取没有，便留下来帮我们做事：登记，刻钢板，买饭，收拾屋子。有的自己没考上，又去找自己的姊妹同学来考。有的则一连几天都来，在一边静静地看。也有两三个一起来的，说要录取就一起录取……从他们填写的报名表来看，这些人大多是职员、教员、小商、独劳，以及资本家、旧官吏家庭出身的，几乎没一个正宗的“红五类”。后来的接触中，又慢慢了解到，他们中有我省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的儿子，有著名物理学家的女儿，也有个体豆腐坊业

主的后代以及到那时为止依然关在监狱中的国民党军官的女儿。还有一个是已经下放到新疆，又偷偷跑回来的知识青年。

由于有各类乐器，特别是有了那架钢琴，使招生显得很正规。视唱，识谱，考察节奏、音准，在钢琴演奏下跳舞唱歌或演奏乐器，还有表演与朗诵……同学们自选的考试节目，也五花八门。从当时最时新的批判刘少奇的湖北慢板，到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从舞蹈《大海航行靠舵手》，到民乐名曲《春江花月夜》……

招生结束，一支30人的文艺宣传队成立。那时已是12月20日左右了。天气越来越冷，排练厅外面的冰雪一直没有化，但刚刚相识的全体队员却以极大的热情与温情投入到排练中。几个任务不多的同学则分头准备演出用的服装、道具、化妆品，并到外面赶制了队员们的袖标与宣传队的旗帜。袖标上的字样是“红艺兵”，上面有一排小字：“毛泽东思想”。旗帜上的字样是“红鲁艺”，下面有一排小字：“武汉地区中等学校革命造反宣传队。”大多数队员是“文革”开始以来第一次戴上袖标，而且是这么一种新鲜别致的袖标。对于这样一些漂泊了许久，承受过无数心理折磨的少男少女来说，我想这是一个温馨难忘的时刻。

我们在湖北艺术学院一墙之隔的武昌实验小学要了两间教室，作为我们宣传队的男女宿舍。我们将课桌拼成几个大统铺，各人从自家抱来铺盖行李。这30个少男少女从此就在一个更亲密的空间中生活了。和许多人的居家环境比，它很简陋很艰苦，常常连热水都没有，被子冷得像冰窟窿一样……但大家都愿意住在一起。几个月来的恐怖、高压、孤

独、自卑、身不由主、言不由衷，在这里被一种家庭式的亲情与温暖代替了，被寻找到自己的价值，被找到了存在的合理性的兴奋与自信心理代替了。况且，那个时代的少男少女从来没有这么近地在一起生活过。

市委拨给的一点经费严格地用于公务。大家的伙食、交通、医药甚至一部分演出用品，都是自费的。但这些，在那种时刻，人们想也没有去想它。大家都尽心尽力地去做一切该做的事。排练厅安了一只北京烤火炉，便总是有几个人早早起来去撮煤劈柴生炉子。舞蹈队有一个叫“小妞”的女生，眉眼肤色都黑黑的，嘴角还有一颗痣，有点像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的琼花，她总在大家还熟睡的时候就早早起来，练一会功，便去了排练厅。等我们去时，火炉已燃得旺旺的了。到了吃饭的时候，一些同学会给那些还在排练的人去食堂将饭菜买回来，热在炉子上。当时，队员们各家的经济状况很不一样，有几个特别困难的，常常连几分钱的菜也不买，只吃从家里带来的一点咸菜，或两人共吃一份菜。排完节目的人，有的趴在钢板上一张一张地刻乐谱刻脚本。另外的人马上会去印刷、装订……没日没夜的排练期间，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宣布放一天假，回去见见家里人，换洗换洗衣物，拿些日用品。可到了下午，许多人却陆陆续续回到了排练厅。如初恋的情人不愿有太久的分离。

就是在那个下午，在那个温暖的火炉旁，吃着有人从家里带来的零食，突然有一个女生讲起她的家庭，讲起她几个月来痛苦的经历，她后来哭起来，痛痛快快地哭着……接着，许多人也如她一样叙说起那些招生表上不曾写出的故事。此时此刻，并没有谁如“忆苦思甜”会那样强迫他们说

出这些。我想，大约他们需要把这些压迫他们很久的淤积倾倒出来，他们期望获得真实的理解、信任与同情。

"红鲁艺"的第一场演出是1966年12月26日。这天是毛泽东主席的生日。那个岁月，这是一个比其他任何日子都神圣的一天。演出地点在湖北艺术学院礼堂。这场演出是招待宣传队筹备组建过程中给了我们支持、帮助的各界革命战友革命同志的，也给队员们每个人发了十来张票，让他们邀请自己的家人、同学与亲朋好友来看。那天许多队员的爸爸妈妈、兄弟姊妹都来了。对于他们当中大多数家庭来说，在那种非常时期，能坐在台下看自己的孩子表演节目，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一般的艺术欣赏了。

那天的演出很成功。那时的人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什么演出，更不要说坐在这艺术院校的正规礼堂中看演出。各文艺单位早已斗得天翻地覆，电影院也没什么电影看。所以，当大幕一拉开，那气势恢宏的、经过改编作为序曲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音乐一响，我就知道我和全体宣传队员们以及台下的那些熟悉或不熟悉的观众们都被感动了。这种感动与其说来自这首歌曲中那些歌词的含义，倒不如说来自音乐本身的某种魅力。还有《在北京的金山上》那悠远柔美的旋律与舞姿，《我是一个兵》的激越与欢快，还有那个改了词的《老大爷扬鞭喜盈盈》，它原本是唱一位老大爷赶大车运送一群支边青年的，现在改为送一群红卫兵去见毛主席，但这也都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一群曾经孤独的少男少女，大家这么近地坐在一辆"大车"上，无忧无虑地在蓝天下的大路上奔驰。还有歌舞《敬爱的毛主席》，

那沙拜音，那手鼓，那维吾尔小帽和飞旋的衣裙及男演员大幅度的跳跃，以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又让人感到这是一群压抑了如此之久的少男少女的狂欢节……这一切深深地感动了在场的人们。

音乐艺术常常能说出各人所需要的东西。

演出还没有结束，就有人找到后台，一个是湖北艺术学院某组织的，邀请我们过几天与他们同台演出。一个是某工厂的，他们厂成立一个群众组织，希望我们去为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还有别的宣传队的，要来学习我们的节目……这一切都让我们兴奋。一群孤独的漂泊者走到一起来，使自己这个集体变成别人尊重别人需要的集体，这在当时实在是一种最高的享受。

第二天，许多人一反常态地抽空回家去了，他们希望与自己的家人一起，再一次分享那种欣慰与满足。在那风雨飘摇时候，这是比任何礼物都珍贵的一种东西。

就这样，“红鲁艺”成立不到一周，就一场接一场地演下去了。有时一天两场，有时一天三场。有时邀请单位会派交通车或卡车来接我们。有时那些单位没有车来，我们便背着乐器、道具，举着我们的队旗，穿过长长的街区步行而去。直到那时，我们的宣传队还没有明显的派别倾向。从我们当时的演出的原始记录看，有保守派组织，有造反派组织，也有中间派组织，还有尚未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部队及军事院校。晚场结束之后，每每会碰到这样的问题，邀请单位留我们吃夜宵，而我们又坚持不吃。双方要上车下车拉

扯半天。有时是吃完夜宵之后我们坚持要付钱，对方又坚持不收，你推我搡地又纠缠半天。

演出完后回到我们的寝室，是大家最快乐也最惆怅的时候。远离了喧嚣的世界，远离了火热的舞台，同学们常常会回到自己的心中。在这静夜湖边一隅，许多最本真的东西会翻涌上来。那个从新疆逃回的同学常在远处拉着一支凄婉的曲子。那支曲子叫《金珠玛米赞》，是藏民歌唱解放军的。但经他一拉，却让人听得心里酸酸的。有人躺在被子里，让“琵琶”（宣传队的一些人常被自己演奏的乐器命名）弹一支《彝族舞曲》——这是一些平日不能上台的曲子——听者和奏者便都沉浸在这柔丽忧郁的旋律中，如醉如痴。有时乐队的几个人也会合奏一些曲子自娱，那也是一些平日不能上台的曲子。如“江南好”、“故乡的回忆”、“二泉映月”以及当时已变成了修正主义的苏联的音乐……大家在音乐的默契与和谐中，在偷吃“禁果”的兴奋中，在一种无言的交流中被感动着。我常能看到听者与奏者的眼睛忽然湿了。

我朦朦胧胧地感到，一些队员进人了初恋的情绪。这许多冰冷的心因聚集在一起而温暖起来。

1月下旬，上海“一月风暴”席卷到武汉。大大小小的单位纷纷奋起夺权，派别之间的斗争愈来愈激烈。在那之前，我们宣传队尽管也有一些“造反造反，一反到底!”“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之类的节目，但那毕竟是空洞的，不涉及本地区派别利益的。我知道，包括我在内的全体宣传队员们，都不会倾向于保守派。因为大家都是几个月来，甚至十几年来直接的，间接的，现实的或心理的受害者。但是

对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我们也保持着距离。尽管这时，因为我们“红鲁艺”的实力与影响，已有一些较大的群众组织来串联过，希望我们集体加入他们的组织（这一点很像后来办公司挂靠某机构），但我们一直没有做这样的决定。

那时，由各级政权及军队支持的保守派群众组织，由于毛泽东主席及中央文革的态度，已处于收缩静观状态。他们虽然不再张扬，但实力依然很强。夺权斗争开始以后，使本已缓解的保守派与造反派间的冲突明明暗暗地加强了，造反派内部的冲突也加剧了。在我们的演出中，也愈来愈多地闻到这种火药味。常常会因为我们的某一句台词符合了某一派组织的观点，而受到异乎寻常的欢迎。有时会仅仅为那一句台词而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甚至要求我们再演一遍。我们到了必需选择的时候。这一点成了“红鲁艺”成立以后困扰我们的最大的问题。

1967 年 1 月 26 日晚，我们正在湖北省汽车配件厂演出（那是我们当天的第二场演出），有人宣布，说汉阳快活岭一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夺权遭围攻，有发动武斗的危险。我们当即便带上乐器道具与汽配厂的人一道乘大卡车去出事地点。这是我们“红鲁艺”第一次具有战地宣传队意味的行动。汉阳快活岭，离市区有几十公里路。发生冲突的双方大约都请求了增援，成百上千辆卡车、交通车、吉普车驰往那个方向，很快就把那条窄窄的郊区公路堵得水泄不通。天很黑，又下起了雨，谁也看不见谁，更看不见出事地点究竟在哪里。像一次战争中混乱的军事调集，数万人，也许是数十万人，被迫滞留在这暗夜的冷雨中。一些车辆企图调头回

转，于是公路便堵得更结实。雨越来越大，夜越来越黑，我们的队员们用种种方法保护着自己的乐器。大家挤在一起，品尝着战乱中那更显可贵的温馨。过了子夜，前后依然没有松动的迹象，我们便下车步行返回——那是“红鲁艺”的成员们至今也难以忘却的一夜。对于那些十多岁的孩子们来说，那是他们一生中走的最长的一段路，又在雨中，又在寒冷中，又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乐队队员脱下衣服，包裹住乐器娇嫩的部分。身体强壮的男生与弱小的女生结伴。衣衫厚实的将衣服脱给衣衫单薄的……那是一次温暖又悲壮的远征。走了不远，大家的衣服鞋袜便里里外外湿透了。从夜里一两点钟走起，一直走到天亮，才陆续回到实验小学那两间宿舍。有人病倒了，有人还强撑着去熬姜汤，有人生起火炉，为大家烤衣服，实验小学的老师们还送来了热粥……这一次遭遇让大家吃了很大的苦头，也品尝到苦难中的友情。但这次行为本身，依然具有很强的游戏色彩，大家为什么一定要跑到那个荒僻遥远的地方去，并没有具体的利益驱动。

随着夺权运动的发展，造反派组织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1967 年 2 月 8 日，《长江日报》发表了一篇代表比较激进的造反派组织观点的文章——《关于武汉地区目前局势的声明》。围绕这篇后来非常著名的“二·八声明”，全武汉的市民分为水火不容的“毒草派”与“香花派”。当然，也有一小部分人说不是毒草，也不是香花，是大白菜，因而成为“大白菜派”。保守派几乎全是“毒草派”当然是无疑的了，一部分温和的造反派组织，如当时著名的“三新”——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及中学红联、工造总司，也是“毒草

派”。这是权利再分配中很有意味的一次分化组合。以后还有好几次这样的分化组合。“三新”都是以某一所大学为基地，向社会扩张的群众组织。人数不算太多，但有较强的组织性与凝聚力。

“红鲁艺”的大多数成员也持毒草观点。这大约是“二·八声明”以较强硬的态度伤害了一些独立的、弱小的群众组织，使队员们又一次感受到运动初期红卫兵的某种作派。我们所在的湖北艺术学院最强大的组织是持“香花派”观点的二司，（全称为武汉地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相对原来老红卫兵那个司令部而称二司。）我们不得不面临与他们的冲突。在当时，这是一个谁也绕不过去的路卡。走到哪里，都会有人问你是“香花派”还是“毒草派”。为了这个今天看来极荒谬的问题，当时许多父子反目，夫妻离散，好友翻脸，甚至陌生人乘车坐船都会争吵起来。武汉的街头、广场，天天都有无数的人为了这个问题辩论到深更半夜。那时还不兴动手动脚，大家各讲各的道理，各显各的口才。这也成了许多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吃过饭，便匆匆跑到街上去，一处一处地听去，直到深更半夜，乐不思归。有一次，我见一位踩三轮的老头，将车停在一堆辩论的人群旁，一直听到结束，然后又赶去听另一堆。我想，这大约是武汉市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全民性的大辩论。很有一点罗马广场或英国海德公园的味道。

“红鲁艺”的成员们演出归来后，许多人也出去旁听或参加辩论，然后又把各种观点、事实、反映带回来。我不希望分裂，只希望能在心平气和的讨论中达到统一。后来证明我是多虑了。“红鲁艺”的成员对于这个集体的珍爱胜于观

点的分歧。经过几昼夜痛苦认真的分析、辩论甚至争吵，“红鲁艺”统一了“毒草派”的观点。我们不想为了生存，为了一个舒适的环境，牺牲掉自由选择我们思想的权力；同时，更不想牺牲掉这个我们都很珍爱的集体。这次小小的风波中，除了一个人因为强烈的“香花派”观点自己离去外很快就过去了，并没有留下任何裂痕。因为不久之后的时局变化，已使这场毒草香花之争变得不很重要了。

就在这一段时间中，“新华工”司令部派了一个姓刘的大学生多次到我们宣传队来，动员我们集体加入“新华工”，直属司令部，为司令部第一宣传队，可以驻进新华工校园内，并提供相应的物质条件。

我们要么依然保持“红鲁艺”的独立，但马上就会陷入与湖艺“二司”的冲突，从而失去“红鲁艺”这个生存之地。要么就加入“新华工”。我们已别无选择。又经过几昼夜的商议、争吵、辩论，“红鲁艺”全体成员终于通过了集体加入“新华工”的决定——在这些复杂激烈的过程中，我们依然坚持演出。我知道，只有演出，才是我们最好的存在方式。

1967年2月26日，“红鲁艺”告别了战斗生活了两个多月的湖北艺术学院，全队迁到新华工，改称“新华工司令部第一宣传队”。原来的“红艺兵”袖标改换成组成火炬图样的“新华工”的袖标。在宣传队中，只有一部分人成为“新华工”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发给了红卫兵袖标与红卫兵证。其余的人只有“新华工”袖标和“新华工”兵团证。我，何帆及很多骨干都只有兵团证。司令部还派来一个姓袁

的大学生做领队，类似党代表一样。我知道，我们又落入某种相似的制度中。但这些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已经知道了我的地位、作用、力量与价值。我不会离开，因为我喜欢这支宣传队，并依然能对它发生影响。

3月，局势急转直下。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武汉军区宣布了几乎所有的“香花派”造反派组织为反革命组织，并逮捕了它们的主要负责人。已经沉寂衰落的各个保守派组织又组建成组织严密、供给充足的一个全市性组织——“百万雄师”。“三新”及其他温和造反派组织立刻也处于劣势。如同大革命失败了一样，那时宣传队解散，各自回校复课闹革命。对于“红鲁艺”的全体成员来说，“大革命”失不失败是一回事，离开这支寻到自己精神情感依托的宣传队，重新返回学校，重新成为漂泊者是更痛苦的事。解散那天，许多人哭了。大家互相在日记本上写下许多许多离别赠言。那是我一生中所看到的最痛苦也最真诚的分别。那些离别赠言，在今天看来也是很有意味的。用今天时髦的语言来讲，是在用当时那种特殊的“话语”，叙说着自己内心的、纯属个人的真性情。当时已经有一些队员在默默相爱了，但那是一种极含蓄，甚至是极压抑的爱。但是所有的人都能感觉到。

沉寂了一段时间后，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为武汉当时的那种形势，显然与毛泽东主席当时的思想及论述是对立的），“三新”等一批原先比较温和的造反派组织，利用自己尚还合法的地位，开始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武汉军区并张扬为“工人总部”等被打成反革命的

群众组织翻案。被解散的一些群众组织又重新聚合起来，为恢复名誉作出各种努力，主要矛盾又转回到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了。斗争越来越激烈，武斗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

宣传队解散之后，队员们并没有回校闹革命，（回过学校的人也知道，学校并未复课，也没有几个人在学校闹革命）而是互相间频繁地往来，今天到你家，明天到他家。在那肃杀的社会气氛中，躲进自己所珍爱的友谊圈子。许多人已经不能离开这个圈子了。

我和何帆都回到家里。有小道消息说，大学要开始招生了。于是我开始复习功课，几个来家玩的队员于是也拿了课本到家来复习功课。但我们只复习了几天，便终止了。一是我们根本不可能静下心来，二是外面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如同《青春之歌》中所说的："整个华北，已放不下一张课桌了。"又有一些宣传队员来家，要求恢复演出，正式的理由是在这革命低潮时期我们要坚持战斗；潜在的原因是，我们希望在一起，过我们特有的那种温馨又激越的生活。只有恢复宣传队，我们在一起才能合法化。我征求了许多队员的意见，没想到大家竟都要求恢复活动。4月，我们进驻"新湖大"（今中南财经大学）恢复活动。这时，我和许多队员已在这几个月的经历、感受与思考中，有了更明确的情绪、倾向与观点。我们的节目不再是一台热闹精美的歌舞，而是有了一些观点鲜明、形式激烈的节目了。如为"工总"翻案，打倒"武老谭"（指"武汉的谭震林"——陈再道），控诉武斗等等。我们经常走上街头，为绝食的，静坐的，游行的人

们演出。我们的演出开始具有了硝烟气息，有时还充满危险。在无法进行正常演出的时候，我们还直接用大字报、大标语表明我们的观点。我当时已经有了大革命失败后继续斗争的革命志士的那种感觉：兴奋，豪迈，悲壮，甚至还有某种为正义崇高的目标献身的冲动。

随着武斗的升级，我们所在的湖北大学愈来愈多地成为进攻目标。校园里筑起了工事，一楼的窗户用砖块堵上，楼梯安了铁栅栏门，楼上准备了许多砖块石灰棍棒与食品。在这期间，我也亲眼看见过几次武斗的场面，第一次感到革命的酷烈。但我觉得，自己已经渐渐坚强起来。和几个月前，大串联中，登陆艇上那个多愁善感的少年相比，已经成熟多了。

在这种动荡又充满血腥气的状况下，我们努力坚持排练和演出。5 月，“新华工司令部”来人，再次召我们返回，说司令部正在准备创作排练一部史诗性的、像《东方红》那样的大型革命歌舞，纪念文化大革命一周年，许多文艺团体的创作骨干也集中到了“新华工”。那时，“新华工”由于它的地理位置，装备的精良，工事的坚固及人数的优势，已成为武汉地区造反派组织最后的一个根据地，被称为“解放区”。我当时曾创作过一个名叫《解放区的天》的歌舞表演节目，用《兄妹开荒》、《解放区的天》等几首延安时期的歌曲改编而成，表现武斗时期“新华工”造反派的乐观勇敢精神。每次演出，台上台下都一片激动。

“新华工司令部”成立了一个正规而且庞大的创作表演团体，武汉许多专业演员都集中在这里。当时，这里也是全国许多著名文艺团体来演出的一个小小的“革命圣地”，如

三军文工团，胜利文工团……我在这里曾见到过许多著名的作家、作曲家、剧作家、歌唱家及其他表演艺术家。也在这里见到过周恩来、谢富治，还有阿尔巴尼亚的首脑谢胡。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因为“七·二○”事件的爆发而中止。

7月19日，我们宣传队接到通知：将有重大武斗发生，校园内，除敢死队员之外，其余人员立刻疏散到华工俞家山后去。

夏夜的酷热中，在山林与稻田的星星点点的萤火虫的光亮里，数万人悄无声息地朝郊外撤离。宣传队在这撤离中渐渐走散。

当夜并没有发生武斗。其后便是一系列极富戏剧性的变化。第二天，爆发了著名的“7·20事件”。几天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7·20”为反革命事件。全武汉的保守派组织一夜倾覆。“三钢”（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翻案。各单位纷纷成立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权力再分配中再次爆发“钢”“新”之争。造反派组织以数月、数年的积怨追捕与报复保守派组织成员。又一批激进造反派组织被改组后的军区取缔。又抓了一些人，还传出有一个叫“5·16”的全国性的阴谋集团的小道消息……

“红鲁艺”最后一次大的行动是在1967年的9月初。当时，我已厌倦了这胜利后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各派火并，厌倦了中央一些扑朔迷离的口号与措施。“红鲁艺”的宣传队员们在这一年的血火洗礼中已不再如原来那样敏感、脆弱、孤立无援，而变得成熟、坚强，甚至世故、麻木。我们不再像

以前那样演出后坚持不吃夜宵，而坚持要交钱，并常常会对那个单位的伙食如何品头论足了。因为这一群孩子们已经看到那些掌了权的人是如何挥霍的（当然，与今天许多人的挥霍相比，那时的人们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的纪律性、凝聚力已不如原来那么强，因为外界对大家的压迫已变得很小了。大家已获得了独立的生活能力与信心……这一切，都曾让我感到隐隐的失落与怅惘。

9月1日，我们应邀去西安铁路局演出。经过两天艰难的行驶，到达西安时，发现这座古城正陷人血与火的内战之中。这里庞大军工企业的现代化武器，让我们看到了比武汉更酷烈的战斗。一堆又一堆在夏末的气温中变成了紫茄子般的尸体，有的还被割去了舌头，剜掉了眼睛，截掉了四肢……到处都是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尸臭……为了避免武斗的伤害，我们被安排住在远离市区的铁路线上的一节孤零零的软卧车厢中。那是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第一次坐软卧，但不是在行进中，而是在一个荒僻冷清的停车场上。四周没有人，也没有灯光，只有许许多多的蝗虫在铁路边的荒草丛中蹦跳，黄昏时，可以看到三五个铁路工人在草丛中逮蝗虫，他们有时当场就把它们一撕，吃掉它们肚子里的“早黄”……尽管兵荒马乱，我和几个同学还是去了大雁塔、小雁塔，爬上了残破的古城墙。那时，这些千古名胜，见不到一个游人。

几天后，我们只得继续西进，到达青海省首府西宁。在这苍凉旷远而极宁静的大西北高原上，我们“红鲁艺”作了它最后的几场演出，然后又返回西安。

“红鲁艺”最后的解散是富于戏剧性的。在西安，依然

住那节软卧。我，何帆及另外的三个同伴，准备南下沿宝成线去成都、重庆。我那时突然渴望过一种自由漂泊的生活。其余的人有的返回武汉，有的将去别的地方。车厢里静静的，弥漫着一种怅惘与抑郁的气氛，似乎大家都知道：这是“红鲁艺”最后的日子了。车厢蓄电池的电渐渐弱了，灯越来越暗，只剩下一丝红红的星光。女生们依偎着，但她们不再流泪。男生们沉默着，也不再叹气。10个月来，我们几乎经历了一生。有人在弹琵琶，那清丽哀怨之声，又让人想起了“红鲁艺”最初那些令人心颤的日子。那种单纯、迷醉、忘情又投人的日子，往后不会再有了。但也不会再忘记。

夜深了，没有人睡觉。车厢的灯终于完全熄灭了。这一群在风雨飘摇中走到一起来，又在风雨飘摇中分手的少男少女，各自在品尝着甜蜜、痛苦、惆怅、欢乐、紧张与梦想。

1967年9月23日，我们一行开始了西南之旅……

那以后，“红鲁艺”还有过几次临时性的聚集演出，但作为“文革”中一个完整又特殊的单位，从此不存在了。

在我准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竟鬼使神差地来了两个“红鲁艺”的女生。我们十多年没见了，她们现在一个做了经理，一个在武汉大学教经济。我们一开口，话题便是我们当年的“红鲁艺”。她们说，真是难以忘怀。

告别时，我们决定近期举行一次聚会，邀请所有能寻到的原“红鲁艺”的成员参加。到那时，或许又可以写一续篇了。

胡发云　武汉市某中学学生，现在武汉工作，作家。

沈虹光

大洪山中

在我记忆中，1966年的夏季开始得清新而愉快。我当时是省话剧团小学员，随着老同志们在宜昌地区的当阳县搞“四清”。暮春初夏，村外河边桃褪李红，金箔一样的阳光在绿茵茵的瓜苗尖尖上颤动，我跟着生产队的妇女们去河滩地上整西瓜秧，满眼景色真是温柔秀美得令人沉醉。报纸上已经有“三家村”字样，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当阳是著名的三国古战场，长坂坡就在城关，霸凌桥、关陵庙、沮河、玉泉寺都不远。剧团许团长在长坂大队当工作组长，身临其境，又有当导演说戏的习惯，开群众大会都忍不住要跟农民讲三国故事。我所在的北门大队与长坂相邻，初一、十五工作队放假，便跟着许团长去寻古探幽踏青野游，真是风和日丽看尽鹅黄嫩绿，好不快活。

与我同一队的有剧团一位编剧，绰号“夫子”，有时见他窸窸窣窣地翻着报纸，疑疑惑惑地嗫嚅：“三家村……呃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们……”当时，我不知道“夫子”出身很经不起推敲，在大学念书时又亲历反右运动的险境，他的妻子——当时在班上相当出众的女同学更是在沉浮后侥幸脱险，他们对政治运动的敏感决不是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文革”结束后，“夫子”阖家迁往美利坚，我去看他，一直到出国的最后时刻，谈起运动，他的语言都不能流畅爽利。

对“三家村”的批判从遥远的北京渐渐蔓延到我们面前来了，要组织农民批判。一次工作队在区里集训，工作队长作报告，队长是宜昌地区党校校长，北方口音，但长期在湖北做农村工作，词汇却是湖北的。他说道，要让农民批判“三家村”，先得让他们搞清楚“三家村”是怎么回事。当阳方言称“地方”为“窝雀”，队长就演示说：北京出现了三个大坏蛋，叫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要找个“窝雀”说黑话，这个“窝雀”在哪儿呀？就在“三家村”！我当时很佩服队长，认为他很会使用方言俚语。后来我们回生产队向农民宣讲就如法炮制，农民果然听得嘻嘻直笑。邻近的生产队有个地主，姓邓，驼背，人称邓驼子，方言里“驼”“拓”谐音，听见公社广播站的喇叭里天天喊批邓拓，邓驼子吓得上吊自杀了。工作队开会就说以后要注意，尽量不要死人，但死的是个地主，大家笑了一下就算了。谁能想到这就是将殃及每一个中国人的浩劫的发轫呢？

天气再热一些时剧团便接到离开当阳的通知。当地空军借了几辆大卡车送我们去随县大洪山，夜伏昼行，一路颠簸，烈日当头两天不能洗澡，衣裳后背上都是白色的汗碱印，但大伙情绪都非常高昂。剧团的老同志大多是文工团出

身，土改、清匪反霸、统购统销，每一个政治中心都配合过，并且以此为傲视没有这种经历的年轻人的资本。这一次去大洪山又是党的召唤，所以连年轻人也很激动。我们一路唱歌，经过一条清澈的小河时，大家都下了车，记得月亮已经升起，银光粼粼的河中人影翩跹，大伙嬉笑着打起了水仗。

随县大洪山是省委的“四清”工作点，是省长张体学亲自抓的。与我们同时奉召而来的还有省歌剧团和省歌舞团，在后来的大批判中我们得知，三个省直剧团到大洪山，是张体学的阴谋，他是想利用宣传工具扩大大洪山“四清”的影响，为自己树碑立传。歌、话、舞三个剧团里都有原来新四军五师文工队的老同志，由他们口中大家知道大洪五师的根据地。由五师又说到中央的李先念、陈少敏，以及由此枝蔓延的政治背景，给人感觉张体学选择大洪山作自己的工作点意义非同寻常。还依稀听说这里的老乡救过张体学，他还把刚生的儿子寄养在老乡家，这不知是真有其事还是臆造的故事使张体学更具有了传奇色彩。

一到大洪山我们就下湾子搜集素材写戏。大洪山“四清”的主要经验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农民，所以我们写的都是农民学习了毛泽东著作后的新面貌新风尚，拾金不昧，爱社如家，扶贫济困等等，简单得不能叫戏，但大家还很有激情，白天连写带排，当晚就到各个湾子里去演出。比较当时的三个剧团，数话剧团的人年龄长文化高，搞阶级斗争时话剧团老奸巨滑，平时叫做“有水平”；歌剧团的一班老演员是唱楚剧出身，转唱歌剧了还不识谱，但因为出了个《洪湖赤卫队》，有个王玉珍，因此也让人刮目。似乎歌舞团要

稚嫩肤浅一些。可在大洪山，最出风头的却是歌舞团，他们排了个大型歌舞《亿万人民跟着毛泽东》，在区礼堂给各级干部演出，气势像北京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我记得看他们演出时的震动。当时他们叫做民间歌舞团，搞民间的东西只有经年累月地在远离大城市的山间乡野盘旋，这倒成全了他们，那些编导们几乎被美仑美奂的土风民乐浸润透了。积累了那么久，一旦有机会还不喷薄而出？《亿万人民跟着毛泽东》不论政治上是否属于张体学的阴谋，对于那些作曲编舞的人来说，总还算一次实力的显示，其中有一支歌，“大洪山呀山连山，青山绿水好庄田，毛泽东思想来武装，不落的太阳照洪山，哎……”因为曲调写得尤其优美，以后在武汉还听人唱过一阵。闭塞的大洪山中当时很热闹，各地区“四清”工作队来取经，宜昌和襄阳文工团来学习《亿万人民跟着毛泽东》，纷传已久的省会离汉重选的说法这时也重提，说省里一些机关正蕴酿往这儿搬，而省商业干部学校搞迁建的师生员工的出现更使传言得到证实，一时山中真有革命中心的气氛。

北京的事件仍在发展演进，武汉亦步亦趋地紧跟。可能“夫子”那班有过历练的老同志已有察觉，而我却仍浑浑然如轻风一样快乐。学生已经放假，洪山中学的院子里很清静，我们常常乘凉一样地坐在树荫下学习，我总是借读报来练台词，每次都抢着读，尤其是《人民日报》社论，抑扬顿挫读起来特别铿锵有力，这是我显示口齿和嗓子的时候。一天学习时，会场中多了一位老成持重的年轻人，介绍说叫小徐，是上级派来的“文革”观察员。读完报大家请小徐作指示，小徐不动声色地说我是来向同志们学习的。回回如此，

以后大家就懒得问他了。

曾在礼堂听过一个很长的录音，据说是中央首长的重要讲话，有陈伯达、康生等好多人，是关于派工作组的问题，好像挺严重。礼堂人多闷热，音响嗡嗡，讲的又不是普通话，内容也奇奇怪怪，我一句也没听明白。那些农村干部也没听懂，尽在那儿抽烟聊天，弄得空气十分污浊。会后有人说好像毛主席说不该派工作组，可工作组是刘少奇派的呀？说的听的都没什么把握。大家还议论了一下小徐算不算工作组，也不了了之。“十六条”大约是有了，可我仍不觉得与己有关。

一天上午，我和几个老演员被通知跟许团长出去，到了一个较大的湾子，在一间比较像样的农舍里，我看见了大名鼎鼎的张体学省长。许团长是五师出身的干部，和张体学等很多原五师的首长熟稔。“来了！”张体学平平常常地和许团长打招呼，很随便，但一看就是大官。我们一行只有许团长敢跟他对话，其他人都傻笑着旁听。说的什么我仍然不明白，只清楚地记得张省长穿的是木板拖鞋，心想张省长好朴素。后来听别人揭发说，这次找省长是许团长探风摸底，凭着他反革命的敏感，已经知道“文革”中自己将要挨整，所以想拉大旗做虎皮仰仗省长保护。果然过几天张体学就到中学和大家见了一面，这天他穿的是一双编得很精致的黄麻草鞋。“群众运动你莫怕！”张体学点着许团长说：“提一点意见，烤烧饼，这一面烤了翻个面，只要莫烤糊了。你们可以半天劳动半天运动，半个月结束文化革命差不多了！”后来我们就是按张体学的指示做的，参加了一些劳动。

气温越来越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等等

有冲击力的词语都出现了。开始的大字报目标很混乱，一位女导演打扮比较“洋气”，便有打油诗讽刺她穿着高跟鞋去插秧，还配着漫画，画着女导演穿着高跟鞋站在田埂上，张着两只手儿惊问：“我从哪儿下呀？”另有一个女演员和搞音乐的丈夫都是党员，他们培养儿子拉大提琴，于是有大字报说“两个共产党员培养了一个修苗”。天那么热，女演员们带去的裙子都不敢穿了，知道那是“四旧”。仍是歌舞团风头最健，尤其是一班跳舞的，个个苗条匀称脸蛋漂亮，说剪辫子，刷地一下全变成了齐耳短发；说扔香水，刷地站一排比赛投弹似地把花露水瓶往垃圾箱里扔，像集体舞小合唱似地具有观赏性。

对于我，“文革”的峥嵘是从揪斗许团长开始的。当时除了歌、话、舞三个团，省直其他文艺团体都集中在汉口万松园路党校内搞运动，剧团派了两个代表回武汉交流取经。不几天，他们回来了，宛如带来了革命火种，那一夜好些房间灯火通明。第二天一早，触目惊心的标语就出来了：“揪出三反分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许××！”黑森森的墨汁往下淌着。这是洪山中学内头一次出现的针对一个人的攻击性的巨幅标语，气氛顿时紧肃了。曾有人开玩笑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许××就没有话剧团。”无论褒贬，无论形成的原因是否合理，这种不无揶揄的说法都比较客观地描述了“文革”前17年许团长在话剧团的地位。看到标语，歌剧团的演员也不安地交换目光。听老同志说，《洪湖赤卫队》初上舞台效果平平，后来请许团长帮助，从剧本到排演进行全面加工整理，才变得闪光夺目，要不王玉珍怎么那样感念他？

如果说别人这时感到震动，那么我于震动之外还另有惶恐战悚。众所周知我是学员中许团长培养的“修苗”。许多年后我曾记述自己的写作经历，我提到过这位团长。那时我年纪很小，没有戏可演，下乡演出他总是找些事让我做，比如记演出日志，写观察生活笔记、人物素描、读书心得等等，写了给他朱笔批阅。我决没有当作家的高远目标，但团长那带惊叹号的“好”字确实使我获得了自信。为创作一个表现农村知识青年与旧文化斗争的戏，许团长曾带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年轻演员下乡搜集素材，搞艺术的人哪有不游山玩水的呢？在黄州我们游了赤壁，后又上了黄陂木兰山。“许××带着年轻人上木兰山看尼姑！”这是运动初期给人印象很深的一个揭发，至今还有人笑着问我可有其事。

批斗许团长的会上有人不点名地敲打了我和另外两个“修苗”。如芒在背我不敢抬头看人。我在剧团是年龄最小的成员，从来与世无争驯良乖顺没听过一句重话，现在猝然被严重地敲打，很缺乏承受力。一天，那个回武汉取了经的同志找了我说：“怎么还不表态呀！许××对你不错嘛。”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感到政治给人带来的恐惧。并不需要更多的诱劝攻坚我就缴械投降了，因为我本来就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只晓得许团长这一条线一直通到北京，都是坏人，我要不批判他我也成了坏人了。自保的本能加速了我的抉择，一边是党和毛主席，一边是许团长，临大义而灭亲，支撑自己的理由并不缺乏。大会是在晚上召开的，在男寝室，这儿原是教室，南北贴墙搁了两排木床，床上都坐满了人。知道许团长的“修苗”们今晚都要反戈，气氛格外萧杀，日光灯把人们的脸都染成了青蓝色。发热又发抖的感觉我也是第一次

体会，轮到我发言时，感到人都飘起来虚浮在半空了。我记得自己开头的几句话："许××，我一直崇拜你，把你当党的化身，从不怀疑你，你怎么能欺骗我们，你怎么能反党呢？"说到这儿我突然放声大哭，后面说的什么我自己也搞不清了。

搞不清的事情太多了，天天看报纸听广播，天天都有天方夜谭似的事件让人难以置信。大串连？让学生满世界乱跑？老师不带队？坐火车不要钱？每天有长途班车从武汉来，车上走下的人脸上汗尘斑斑神色奇怪，那惊魂甫定的样子，仿佛刚从日寇占领的沦陷区逃出来。人们说，武汉乱极了，北京来了一批学生，在水果湖围攻省委，说湖北省委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还搭台辩论，为首的是人民大学的学生赵桂林。我们几乎众口一词认为赵桂林是反革命。可又奇怪年轻轻的怎么会反革命呢？有人解释说赵桂林是调干生。调干生在社会上混过，年纪大一些也复杂一些，当反革命的可能性也就大了。但还有疑窦：这样明火执仗的反革命行为为什么没人制止呢？警察和解放军哪里去了？中央知不知道湖北的情况？为什么不闻不问？面面相觑的我们亟需人解惑释疑。观察员小徐原来只是个商校学生，他和"文革"前夕才来剧团的新书记像一对双胞胎，坐在一起听会，一个拿着笔记本，另一个也拿着笔记本，一样的只记不发言，一样地一问三不知，围逼急了一样地说："我们原原本本地汇报。"多半句都没有。大家想到张体学省长，可小徐和新书记说张省长不在大洪山。到哪儿去了？在武汉还是在北京？还来不来大洪山？什么时候来？仿佛向无底的深渊投去的石子，提问杳无回音。备受垂青的三个剧团成了孤儿。

人们渐渐疏懒，天气热，半天劳动早已取消。毕竟受党教育多年，尽管有种种不理解，还是各自根据自已的理解进行着革命。许团长已经成了嚼过的甘蔗，没了滋味儿，老书记又成了批判的重点。批一个扔一个，都没批深批透。原因可能跟生活枯燥有关，批判对象不变化不是更单调乏味了？还隐约听说外面有什么战斗队，于是大家也懵懂地仿照。有一个神经兮兮除了爱情什么都不关心的女演员突然拽着几位舞台装置工人成立了一个战斗组，嘻嘻哈哈的，走到一起的原因是他们都自称出身工人，不是按成份划线么？我当时被划入了保书记的保守派。老书记与许团长一样，也是学生出身，抗日时投身革命的五师干部。用现在的观点看，他们都比较开明，廉洁公正，重业务爱人才，可在运动时这恰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罪状。老书记如今已老病衰退，我去看她时，想到当年少不更事好无道理啊，这么好的干部还要斗。现在一班新贵，无论才能还是品德，都比过去低下多了。当年我保书记并非有先见之明，保她的原因是我不喜欢几个斗她最起劲的老演员。我觉得他们为人虚情假意自私自利。老书记以前批评过他们，我执拗地认为他们所谓的革命大批判充满了个人的报复情绪。我怎能与他们为伍？这一时期，对人的品格德性的好恶是我选择政治派别的依据。我们的团支部书记是个比我大几岁的女学生，也是许团长的“修苗”。她戏演得好，人品也好，她也反感那几位老演员，于是我和她站在了一起。六个团员分成了两派，但彼此间尚保持君子礼仪，并不横眉冷对。

在省委的问题上，我们三个剧团全体成了保皇派。

好像革命苏区一样，大洪山当时还在省委的控制之下，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听说南下一小撮反革命要来大洪山，就如同国民党要进犯苏区，院子里群情激昂同仇敌忾，仿佛要打苏区保卫战，摩拳擦掌的。可一小撮迟迟未来，情绪又有些松懈。夏天的午睡长，又无事可做，知了聒噪，醒了也是恹恹的。一天午睡起来突然有人说“学生来了”，语气并不紧张。我好奇地跑去看。男寝室里人们围了一个圈儿。我踮脚向圈里探头，只见中间坐了一个学生模样的男孩子，一件蹭得稀脏的白衬衣是土布做的，一看就是从农村出来上学的。学生抬着眼打量四周密匝匝的人，眼神就像刚从森林里逮来的小熊。话剧团的人年纪到底大一些，也温和，见学生并不青面獠牙，就给倒了杯水喝。问是从哪儿来的。学生一开口，是河南口音。歌舞团和歌剧团那边也去了南下的学生，听说歌剧团的人让一个学生去挑了半天大粪，除此之外没出现什么戏剧性的场面。

为表达对省委的忠诚，三个团曾集合起来去省委“四清”工作团表态，写了大字报举着，一路浩浩荡荡。接待我们的是省委秘书长安东泰，他是这时留守大洪山的最高领导。上下同心意气俱起，我们高呼“誓死保卫湖北省委”、“谁反对湖北省委我们就和他拚到底”等革命口号，仿佛真要用血肉之躯相拼一样的悲壮，歌舞团跳舞的女演员们鼻子眼睛都哭红了。安东泰也很动感情，他是一位瘦弱的矮小老头，中气不足，可还是拚了全力地呼口号，瘦精精的胳膊伸向天上，把脚跟都扯得踮起来。安东泰答应我们把大字报送回武汉，贴到省委门口。我们怀着力挽狂澜的英雄主义的激情，毫不怀疑自己的正义，相信我们的行动一定能鼓起那些软弱的人们的勇气，一呼百应，从而扭转局面，使省委转危

为安。几天后从武汉传来的消息是我们万万想不到的：我们的人一到省委就被围了，人们嘲笑我们是保皇派，贴大字报的人在一片嘘声中狼狈而逃。

山外的世界已然很陌生了。

沈虹光　湖北省话剧团学员，现在武汉工作，作家。

彩　霞

军营生活的回忆

29年前，我们67、68届大学毕业生，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后，被分配到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这里记述的是那段特殊军营生活里发生的真实的故事。

毕业前夕

1968年夏秋之交，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了大中学校，工人阶级占领了教育阵地。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叱咤风云的红卫兵小将们，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满怀革命豪情到农村去，到工矿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正在蓬勃兴起。8月24日，河南省省会郑州召开了欢送首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会，在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声

中，薛喜梅等71名郑州中学生响应毛主席关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奔赴河南省郏县人民公社去“经风雨，见世面，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

上山下乡的浪潮震荡着每个青年学生奋发向上的心。我们67、68届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何去何从？面对去向问题，学校“工宣队”组织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有关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的理论：“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它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我们一次次口诛笔伐，批判“读书做官论”，批判小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我们在毛主席像前表决心、立誓言：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于是，我们别无选择地被分配到解放军农场和农村接受再教育。

1968年9月，我们河南农学院67、68届毕业生200余人和全省其他大专院校及外省分配来的大学生一起，分别奔赴平顶山、安阳、开封、商丘、湖北等解放农场劳动锻炼。

“大班幼儿园”

那是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们一行百余人，高唱革命歌曲，一路欢声笑语从郑州乘车来到了平顶山8221部队解放军农场。一下车，部队首长、战士热情地欢迎我们并忙着安排食宿。一排排平房宿舍收拾得干干净净，给人一种朴素、

舒适的感觉。下午，我们三五成群，熟悉环境。这是个约有500亩地的小型农场，南边是一条人工河（后来知道叫湛河），河水清而深，流动缓慢，岸边垂柳成荫，树荫下长着青草。我们的营房紧靠岸边。田地里没有秋庄稼，只有麦茬还在那里仰着头顽强地挣扎着（也许是等我们去开垦吧！）。朝北望去，平顶山很近，山不雄伟，样子却奇特，突兀顶平，名副其实。好一派田园风光！晚饭后，因为奔波了一天，我们正准备睡个大觉，忽听军号响起来，接着紧急集合。毫无准备的我们，一个个松松垮垮，稀稀拉拉，排好队听连长讲话："从今天起，你们就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了，战士有战士的规矩，一切行动听指挥，今天晚上看电影，不准请假，不准早退。"接着每人发了一个小方凳，我们排着不太整齐的队伍，迈着不太整齐的步伐来到露天电影院——打麦场上。连长喊"放凳子，坐下"，我们几十个20多岁的大学生扑通扑通，下饺子一样坐下来。"站起来，坐下！"排长口令："再站起来，再坐下！"就这样反复几次，仍是不理想，电影开始了……第二天，有人就把第一晚的情景戏称为"大班幼儿园"。接着，我们这些"大班幼儿生"就开始了第一课军事训练。大学生活的后两年，我们停课闹革命，纪律性差，自由散慢，现在一下子紧张起来，真有点不适应。军训是艰苦的，枯燥无味的，只有机械的动作，规范的行动。早晨5点钟，清脆、响亮的起床号声惊醒了我们的好梦，我们一骨碌爬起来，穿衣、洗脸、刷牙，要求在几分钟内完成。开头几天，不是这个衣服穿错了，就是那个鞋穿反了；这个裤带没系好，那个的扣子系错了；这个头发没梳，那个脸没顾上洗，洋相百出。解放军要求很严，立正，

稍息，齐步，跑步，一遍遍地训练，还有真枪实弹的射击训练，光荣传统的思想教育等穿插进行，这时候我们这些自认为经受“文革”锤炼的大学生才感到和解放军比起来真是“大班幼儿生”呢！一个月的军训生活，我们脸晒黑了，体格壮了，队伍整齐了，纪律性强了，“大班幼儿生”真成了不穿军衣的兵了！

思想教育

如果把第一阶段军训比作“大班幼儿园”的话，第二阶段的思想教育就是“升级”了。

我们是怀着各种各样的思想来到解放军农场的。有人认为，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冲锋陷阵，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没有必要接受再教育。有的认为，我们有知识，有文化，哪点不比工农兵强？还有人认为，让我们来这里干原始式的农活，大材小用。针对种种思想，部队领导就大学生要不要接受再教育的问题展开了大学习、大讨论。请军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做报告，请老煤矿工人讲过去，听部队首长讲战争经历，讲革命烈士为国献身的英雄事迹。同时举办“斗私批修”讲用会，采取多种形式让我们在对接受再教育必要性的讨论中接受教育。8221 部队师长蔡铎从小没上过学，是个苦出身，十几岁参军后，扛枪打仗，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身上带着敌人的弹片，打仗空隙学文化、学军事，在给我们讲他的战斗经历时，哪个山头有多高，哪里地形如何，都记得清清楚楚，他的报告很感人，我们很服气。

对于这段思想教育，我在当年的“学习笔记”中这样写道：“通过这一段的军训和思想教育，我明白了一些道理。和解放军相比，我们多喝了几年墨水，我们有知识、有文化，但解放军的纯朴、忠诚、吃苦耐劳、人格高尚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雷锋不就是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培养出的英雄吗？农场的生活苦、农活累，恰恰可以磨炼我的意志，使我亲身体验‘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刻内涵。”这段话现代青年听起来也许是可笑的、不可思议的。但对我却是那样印象深刻，永志不灭，终生难忘。几十年来，我自愿到基层、到农村工作，和工人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在荣誉面前不自满，在困难面前不低头，权力在手时不谋私利，金钱面前不贪婪。我始终是一个平凡普通但问心无愧的人。

“四不准”

大学生到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苛刻要求，也必然会出现一些不近人情的东西，“四不准”就是这种产物。

到农场的第二天，我们在进行编制时，就出现了使人不理解的事，即男女学生分成男生连和女生连。男女连队之间还相隔一段距离。我们除了军事训练、政治学习外，还要从事体力劳动耕田种地，男女学生一起能在农活上互相帮助，为什么要分开呢？部队首长来连队给我们宣布纪律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大学生在劳动锻炼期间要执行四不准：一不准

回家探亲，二不准谈恋爱，三不准结婚，四结了婚的不准过夫妻生活。好一个“四不准”！像王母娘娘的簪子一样划个天河把我们分成男生连、女生连。这样一来，我们女大学生可吃尽了苦头！体力劳动是把旱地改水地的重活，我们像男生一样卷起裤管，赶着水牛在泥里、水里犁地、耙地，然后插秧、管理、收获，完成水稻从种到收的全过程。一天的农活干下来，一个个累得身子骨像散架一样，还得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高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有些体质柔弱的女生只有在被窝里抹眼泪。

学校毕业前夕，有的男女生已经恋爱，双双来到农场。“四不准”使他们饱尝咫尺天涯的相思之苦，于是，远送秋波，传递纸条，鹊桥暗渡之事屡屡发生，当然也因此而屡屡受到连长的训斥。甚至还出现因违犯“四不准”受到党纪处分的事件。有个女大学生，德才兼备，是学生党员，已婚的爱人是现役军人，享受探亲假从遥远的西北来到我们农场。恰逢“四不准”，使他百思不得其解；他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这里住下来。他的妻子，那个女大学生却因此而受到党纪处分。

到了1969年8月，我们来这里已经一个年头。同学们对军营生活已经适应，却对“四不准”始终耿耿于怀。一天，河南省军区政委、省革委主任刘建勋来到我们农场视察。因为我的未婚夫是我校红卫兵头头，省革委常委，他分配到离此30公里的农村劳动锻炼，因“四不准”，我们彼此也不能见面，大家就鼓动我去找刘建勋反映“四不准”问题。于是我去见刘建勋。刘问：“小范呢？”我说：“在叶县插队。”“你想见他吗？”“四不准不敢见。”刘建勋笑了，让

我坐上他的车，在8221部队蔡师长的陪同下到了叶县田庄公社龙潦大队，见到我的爱人后又一起返回平顶山。当我回到农场的时候，农场沸腾了！“啊！刘建勋带头打破了四不准，我们自由了！”从这以后，虽然没有正式宣布解除“四不准”，但这条规矩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到1970年2月锻炼结束时，竟然出现了新的情侣，甚至还有解放军和女大学生恋爱的。看来，“四不准”是挡不住青年人的爱情的，然而因违反“四不准”而受处分的，也就白白冤枉了。

劳改犯？大学生？

我们劳动锻炼的平顶山8221部队农场原是个劳改农场。部队接管后，那里不再有劳改犯。我们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但衣服烂了，可以用旧军装打补丁。一些男同学不知是真的没衣服穿，还是处于对“四不准”的不满，或是故意幽它一默，破衣服补满黄补丁，加上头发不理，胡子不剃，打扮得真有点像劳改犯。一次，几个这种打扮的男同学和解放军战士一起去附近东工人镇买菜，招来镇上群众异样的目光，有的小声问解放军战士，什么时候来劳改犯了？战士笑道，什么劳改犯，是来劳动锻炼的大学生！“啊，大学生！”人们心目中的骄子，竟穿得像劳改犯一样走在大街上，这也是一种抗争啊！

病号饭

解放军是一个团结和睦、互相关怀、互相爱护的大家庭，谁有了病，连、排长问寒问暖，连队还专门设有医务室。我所在的排有30多个女大学生，排长是一个年仅19岁的解放军战士，他既严肃又活泼，背地里我们称他“可爱的小弟弟”。我当时被任命为副排长，主管女同学的一些事务。女同学月经期间不能上早操和干重活，我给排长请假：×××，×××有病了，排长以为真有病了，就发扬雷锋精神，给这些同学端来了“病号饭”，当她们吃着这香喷喷的病号饭时，都咯咯地笑了。时间久了，“怎么每天都有病号？”排长犯了嘀咕，我实在不好意思当面给他解释，只好红着脸去给连长反映，让连长去给这个单纯、可爱的解放军小弟弟解释吧！

欢乐的军营生活

俗话说：“仨女一台戏。”几十个女大学生在一起更是热闹非凡，劳动归来，学习之余，歌声、笑声不断。自编自演节目，自办文艺晚会是经常的事。晚会的内容丰富多采：唱革命歌曲，唱样板戏，唱本连本排的好人好事，唱我们的好排长、好连长；晚会的形式各种各样：京剧、豫剧、曲剧、快板书、三句半，吹拉弹唱，样样俱全。由于有师院艺术系

的学生参加，节目的质量还相当高。

由于营房紧靠湛河，得天独厚，游泳成了我们最喜爱的运动项目之一。在解放军指导下，我们这些北方的旱鸭子大都学会了游泳，还常常举行游泳比赛。这是我一生中仅有的游泳生涯，我至今还保存着当时的游泳衣。

诗朗诵、演讲会是我们大学生的拿手戏，这湛河，这平顶山为我们增光添色。“平顶山下，风展红旗如画”！“湛河两岸尽朝晖”，“平顶山高，没有党的恩情高；湛河水深，没有阶级感情深。”这些充满激情的句子至今记忆犹新。

更有趣的是跟我们的解放军连排长开玩笑。排长是河南信阳人，我们问：“今天吃什么饭?”排长答：“大米饭。”“啥大米饭?”“大米稀饭。”这几句话在排长口中变成了“索法?”“岛米法。”“索岛米法?”“岛米西法。”于是我们为排长的这几句话谱了曲|5　4|13　4|51　34|13　74|。我们的连长是黄河北长垣县人，他的口音甩把 ān（安）读成 āi（哀），有同学给他编了顺口溜：出了门，往正南（nái），腰里塞了三分钱（塞，三读作 sāi，钱读作 qiài），买了三个绿豆丸（丸读作 wāi），光加醋，没加盐（盐读作 yāi），酸甜，酸甜（酸读作 suāi，甜读作 tiǎi）。连长读着顺口溜笑得前仰后合，同学们也笑了，笑声在农场的上空回荡……。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一年的军营生活，锻炼了我们思想，强健了我们身体，却也付出了血的代价。我的同学刘成姣，是河南农学院 68

级农机系学生，她泼辣能干，事事处处不甘落后。1969 年秋打稻子时，不慎将右手绞到脱粒机里，手臂被打成肉糊，当我们把她的胳膊拉出来时，只见两个鲜血淋淋的指头系在筋管上，她很坚强没有哭，虽然立即送到医院，后又转到上海治疗，但仍失去了右手，成了终身残废。

锻炼期间，我们还到平顶山十矿体验煤矿工人的生活。在那里，我亲眼目睹了一个 26 岁叫王清江的矿工受伤的情景。下井前，我们还在一起谈笑，他让我们看他女儿的照片，下井后，由于塌方事故，他的脸被挤压在铁柱子上，造成面部受伤、牙齿全部脱落、锁骨粉碎的重伤。10 天的矿井生活，使我深深地体会到煤矿工人的辛苦与奉献精神。

1970 年 3 月，我们结束了这段特殊的军营生活，重新分配到各地去工作。如今，我们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历经沧桑，回忆往事，有激情、有汗水、有欢乐、有忧郁、有遗憾、有反思，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实实在在地当了一回普通一兵，在苦和累中磨练了自己，去掉了骄娇二气。“经历是财富，苦难是老师”，每当我给孩子们讲起这些故事时，他们总是像听天书一样不能置信，然而，这的确是真真实实的故事。

彩霞　河南农学院学生，“二七公社”成员，现为个体工商业者。

蔡翔

神圣回忆

我的回忆完全因了下面这段文字，我是在图书馆发黄的资料堆里发现它的，想当初完全是漫不经心的一瞥，没有料到这一瞥竟把我尘封已久的记忆重新激活。现在我把这段文字抄录如下：

当广州掀起红卫兵运动之后，纺织厂内也迅即涌起"破旧立新"的"热潮"，厂里的男女织工互相检查有没有属于"四旧"的东西。有一名女工因为亲友自港带回一些衣物给她，其中有一条红色的女三角裤，厂内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便将她的红色三角裤翻了出来，给她扣上了三项罪名：（一）将最神圣的革命色彩——红色用来穿在最肮脏和不适当的部位。红色是代表最进步的颜色，如中国（中共）被命名为"红色的中国"，革命的军队最初被命名为"红军"，以至于现在的红卫兵

也冠上了"红"字头。因此把红色穿在不当的部位未免大大的渎亵。(二)崇尚西方国家的货物，具崇洋思想。(三)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享受，不穿布裤喜穿丝裤。

这名女工结果被拉出去批评，全部洋货拿出来"展览"后一烧而光。我完全不想追究这段文字的资料来源，但是我相信它是真实的。我也不想知道这位女工后来的命运遭遇，是自杀，还是苟活。也许她现在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段被侮辱的生活将构成她全部的悲惨记忆，伴随终生，直至她离开这个亲爱的又是可诅咒的世界。

在我有关那个时代的全部的记忆中，在我所目睹所知道的所有的事实中，这实在是一件很小的小得微不足道的事情。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唯把这段文字铭刻在心，不知道，说不清楚，我只是记住。

我现在看见我遥遥地向我走来。在黑夜中，一个13岁的少年向我走来，我亲切地凝视着这个少年，这个少年赤脚穿着布鞋，乱蓬蓬的头发下，有一双坚定而又略显迷茫的眼睛。我向少年缓缓走去，我看见了那个时代，那个激动人心的红色年代。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不上课了，老师忙于学习、检查和相互揭发。我们走上街头，愤怒地注视着墨镜、长发、尖头皮鞋和雪白的衬衫领子，把这一切都斥之为"阿飞"。我们崇拜保尔·柯察金，模仿着少年保尔的一切。为了锻炼自己的勇敢和意志，轮流着从二楼阳台上往下跳。我们有自己的组织，定期出版自己的报纸。我们半懂不懂地读着毛泽东、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我们真诚地关心和讨论着国家大事，我们相互传说某某的家里又被查抄出多少

多少的黄金和现钞。我们仇恨地注视着社会上一切贫富悬殊的现象，因为我们曾经天真地相信这一切早已被消灭。所有的危机感都在那个时代被激发出来，我们庆幸自己终于又一次赶上了革命。我们把保卫视为自己责无旁贷的神圣职责。我们没有军装，也没有军帽。我至今仍然激烈地认为，这些没有军装和军帽的少年（还有青年），是当时红卫兵中最出色的一群。在这些平民少年中，后来走出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物，影响着时代发展。

我现在慢慢地走向1966年的年尾。那一年的冬天不冷，就像许多的故事一样，我将提到“有一天”。我相信，一个人的改变，乃至影响着他后来整个的思想、性格和命运，完全是因为这个“有一天”的偶然干预。是的，在那一年的年尾，有一天，一个伙伴匆匆地跑来，他向我们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住在我们隔壁楼里的“小皮匠”，刚刚被揭发出来是一个逃亡地主，而且欠着劳动人民的血债。我想在那一瞬间，我们被这个消息惊呆了。我至今仍然能清晰地描述出那个“小皮匠”的外貌，我记得那是一个模样和善的中年人，衣服上打着补钉，见谁都笑容可掬，在马路的拐角处，终日守着他修鞋的挑子。我每次见他，都会有礼貌地喊他一声“伯伯”。我想，我和我的伙伴们的鞋不止一次地被他免费修过。而现在，这个“小皮匠”，这个被我们有礼貌地称呼过“伯伯”的小皮匠，竟然是一个“逃亡地主”，我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脸因为兴奋而涨得通红，我们一致认为他是一个“还乡团”，而且有着不止一条的人命血债，解放前夕趁着混乱潜逃上海。我们还断言他的家里必然藏有驳壳枪、匕首和变天帐。我想提请历史原谅我们，在当时，对于一个

13岁的少年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激动人心的呢？请想一想，一个逃亡地主，竟然化装成小皮匠，潜伏在我们身边，我们将面对一个真实的阶级敌人，所有的小说和电影都在此时向我们展示着它的全部的真实性。正是在那一天的黄昏，我们愤怒地呐喊着向“小皮匠”的家里涌去。

我的记忆在此时突然地变得清晰无比。我看见那一天的黄昏，“小皮匠”的一家正在吃饭。我看见在我们涌进屋子里的时候，那家人个个脸色突然变得苍白。小皮匠被我们围在中间，浑身哆嗦，胡乱点头，语无伦次地回答着我们的种种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在“小皮匠”的点头中得到证实。“揍他”！一个声音愤怒地高叫着，我看见无数的拳头如雨点般落在“小皮匠”的身上。轮到我了。我看见我的拳头高高举起，然后形成一条弧线，慢慢向前划出，可是它突然在中途颤抖了一下。是的，我的手在当时突然颤抖起来，我看见了一个女孩，那么小那么瘦弱的一个女孩，她蜷缩着身子，努力着想消失在她的父亲的身后，她是那么小，小得我们完全忘记了她的存在。是的，在那一瞬间，我看见了一双美丽的大眼睛，一双恐惧的、惊惶的、羞辱的、无助的眼睛，我在当时不知怎么突然想起了动物园受惊的小鹿，那时，我看到的也是这样的一双眼睛。我的记忆突然出现了混乱，我已经完全想不起来后来的情况，我只记得我的拳头最终还是打了出去，然面已经是那样地软弱无力。我不知道我后来是怎样离开那家人的。我痛恨自已，我像保尔·柯察金一样，猛烈地谴责这种可耻的小资产阶级的温情。

我想我那种失魂落魄的神情引起了母亲的注意。母亲很少过问我的事情，从小如此，她总是津津有味地听着我和哥

哥的激烈讨论。她对她的儿子有一种出奇的信赖，她相信她的儿子们正在为正义而战。可是那一天，母亲却敏感地注意到我的反常。母亲不久就弄清了事情的全部真相。她严厉地训斥着我，罚我长跪不起，完全不顾一个红卫兵的高傲和尊严，我从来没有看见母亲发过这样大的脾气。我还知道，母亲后来瞒着我上门赔礼。

我现在想起了母亲，满怀感激地想着母亲。母亲识字不多，但我所有的启蒙都来自母亲默默的关怀。我固执地认为，平民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善良的阶层，他们量人而出，规规矩矩地做人，那些已经被上流社会糟踏得不成模样的道法箴条，却被平民默默地守护着。他们忍受着别人的欺辱，但是他们决不欺辱别人。

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会渐渐淡忘那双美丽的眼睛；也许，如果没有四年后的“有一天”。四年以后，我已经 17 岁了，我们正收拾行装，准备上山下乡。我报名到黑龙江兵团，除了北大荒浪漫传奇的诱惑，还悄悄收藏着我个人的感情依恋。有一天，也是在一个冬日的黄昏，我的班主任和一个工宣队员来到我的家里，他们向我严肃地宣布，因为我父亲的问题，我到黑龙江的申请，不能被批准，因为那里是反修前线。我尴尬地站在那里，接受着对我的命运判决，我的青春浪漫在我的倾听中随风而去。

我仍未死心，我向母亲要了车钱，我想找父亲问问“问题”的实质情况。在我年轻的心里，存有一份侥幸，希望最后的结论只是“人民内部矛盾”，那么所有随风而去的浪漫都会被我重新召回。我从城市的这一头赶到那一头，我看见父亲正在“劳动”，父亲已经很久没有回家。父亲听了我的

话，沉默良久，踌躇良久，然后推出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对我说："走吧。"

我们默默地向公司走去，我们走进一间挂着"政工组"牌子的房间，父亲艰难地向一个女人请求，请求给他一个"结论"，一个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为了他的儿子。我看见父亲付出了他的全部自尊。那个女人漠然地听着，然后冷冷地说："你们等着"，起身向会议室走去。过了一会儿，我想只是一会儿，那个女人出来了，命令式地说："进去！"这时我看见父亲的脸色突然变得苍白，我们向会议室走去，我听见里面响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雄壮歌声。

我和父亲孤零零地站在前面，父亲已经自觉地低下头，我看见屋里坐着许多干部，这个临时节目使得干部们兴奋起来。屋子里乱哄哄的，许许多多的人在那儿愤怒地叫着："翻案"、"复辟"、"反攻倒算"、"打倒"、"坚决不答应"……那时我就知道，语言是一种暴力。我像一棵草，在这愤怒的海里漂荡着、挣扎着。我实际上什么也没听见，我的思想空空洞洞，我只是漠然望着窗外灰色的天空，我看见了那双眼睛，那双美丽的眼睛，我仔仔细细地读着里面的恐惧、惊惶、羞辱和孤立无助。

我的冗长的回忆到此结束。我知道，你们已经开始厌烦，可是如果你们同我一样，有过这样的少年往事，那么我相信，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共同走进那长长的回忆之中。

我决不因为我后来的命运遭遇而推诿我曾经有过的错误，决不会。我甚至没有产生过任何宿命的感觉，我只是想说话，人是不可以被侮辱的，人们所有的尊严都建立在自由

—— 一个多么伟大的字眼——的神圣不可侵犯和剥夺之上。我在 17 岁的那一个黄昏，终于读懂了那双美丽眼睛的全部涵义，尽管它为时已晚。

我想，那个年轻的女工，肯定也有着一双美丽的眼睛。我想，那肯定也是一个冬日的黄昏，那个女工被批评——我不知道记录者为什么使用了这样一个温柔的字眼——的时候，肯定也是孤零零地站在人群中间。我想，她的脸色肯定变得苍白，那双美丽的眼睛恐惧地、惊惶地、羞辱地、无助地望着人群。或者，她根本就没望，只是望着那茫茫的天空。我想，那条红色的三角裤肯定被挂在她的胸前，就像被道德激怒的村民，把破鞋挂在犯戒的女人胸前一样。我可以肯定地说，在那个时代的所有的疯狂行为中，我们都能找出它原初的历史版本。

那双美丽的眼睛一直在默默地注视着我，照耀着我的灵魂，我想我此生再也走不出这双眼睛的美丽凝望。

你们已经发现，我始终没有使用过“忏悔”这个词，而这个词目前是那样地流行，同时流行着的，还有眼泪和唏嘘再三。我可以坦白地说，我不喜欢“忏悔”这个词，一点也不喜欢，不为什么，只是不喜欢。我对词的选择，常常只是凭着一种直觉，一种美的直感。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使用“责任”这个词，我觉得这更重要。

在那双美丽眼睛的凝望中，我为那个 13 岁的少年的行为负责，我不祈求这双眼睛的原谅，我只是在这双眼睛的美丽凝望中，明确了我的责任，我必须终生为自由而战。但是，我只承担我所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不是所有。对于一个 13 岁的少年来说，这不公平。我清楚地看到，站在那个 13

岁的少年的背后的，正是我们的全部“文化”，而谁应该为此负责呢？应该有人负责，可是没有，我至今未读到任何有关这方面的负责文字。在那一代人中间，我真正敬仰的只有顾准一人，那个在个人的屈辱中作着伟大预言的先知。

我拒绝“忏悔”，因为我是那样地热爱这个13岁的少年，就像我至今仍然热爱保尔·柯察金一样。理想是那样地美丽。因为这个美丽，我承担这个13岁少年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我原谅他的错误，因为美丽而犯下的错误。我从那个年代走来，从13岁的少年走来，满怀着对理想和正义的憧憬，走过漫长的艰苦岁月。我知道，“理想”这个词现在已经沦为“滑稽”的同义语，许许多多的聪明人嘲笑它、调侃它；我还知道，知识分子正在深刻地指出“理想杀人”，我相信他们是善良的，善良的知识分子被“杀人”吓坏，转而迁怒于“理想”，迁怒于一切崇高的精神。我更知道，这个严肃的命题正在被那些聪明人利用，为他们的平庸谋夺个人的私利制造了一个深刻的堂皇借口。我在这里同那些知识精英分手，我返身向后，满怀战栗的神圣之感遥遥地望着那个13岁的少年。我不想掩饰自己，掩饰自己日渐地成熟和庸俗，我只有在返身过去的时候，才能重新感觉到那一缕神圣之光的伟大照耀。

神圣，我已经反复警告自己谨慎地使用这个词，我觉得任何对神圣的讨论，都是对这伟大词语的亵渎。神圣是什么？神圣不是什么，神圣就是这个词本身。我对神圣的崇仰，完全是一种对词的崇仰。是的，这个词，这个词是我的家园，是我精神的栖居之地，仅仅是我的，个人的，如此而已。在我身居异乡四处飘荡的岁月里，在我被工厂的纪律压

迫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在我疏离朋友孤独地被灰色生活所包裹的日子中，我默默地守护着这个词，感受着这个词给我的诗意和美丽，我重新获得我所渴望的意义，我展开我的想象，我满怀感激之情，默默地守护着。

神圣，我想那是一种彼岸的荣耀，我们经此召唤踏上家园的归途。是的，我现在只在我个人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我不会再把这个词强加给你们，我所爱的或不爱的人，作为一种要求，一种绝对的指令。请相信我，我不会再像那个13岁的少年，把这个世界看成一个病的世界、罪的世界，有待于我们正义的清扫。每一个人都有他存在的权利，有他的尊严，有他神圣不可剥夺的自由。我可以不喜欢这个世界，但是我不能侵犯这个世界，侵犯这个世界中的每一个人。我在17岁的那个冬日的黄昏，读懂了那双美丽眼睛的全部涵义。我从此恪守着彼岸和此岸的界限，理想和现实的界限，个体和类的界限。我在我的心里默默地守护着我的神圣的家园，但是我却必须在人间终生维持“自由”这个伟大的字眼。在那双眼睛的美丽凝望中，我必须为我的13岁承担起责任。

近30年过去了，所有的轰轰烈烈都已灰飞烟灭。我们走过繁华的大街，再也不会想起头顶上曾经如雪花般漫天飞舞的传单，广场上不再有群众“手臂的森林”，那个激动人心的红色年代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广告牌上金发或者黑发美女的媚眼之中。你只有远离闹市，在那些陈旧的建筑物跟前，在雨水的冲刷之中，你才能仔细地辨别出“打倒”、“万岁”之类的模糊字迹，这时你才依稀想起，这个城市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故事。

我并不为我的 13 岁感到羞耻。相反，我感到我的 13 岁是那样地丰姿多彩，我拥有这样的记忆。这样的记忆伴随我走过漫漫一生。

可是，现在，在我重新回首往事的时候，我却无法回避那双眼睛的美丽凝望。我想起那个青年女工的红色三角裤，我必须为我的 13 岁承担起责任，否则，我心难安。

我们曾经为正义而战，曾经为理想而呐喊，清扫着这个病的世界的角角落落。我们曾经伤害过不少的人，有意或者无意，以神圣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直至我们自己被伤害。不，不仅仅是伤害，我们善良的美丽的愿望。结果帮助摧毁了这个世界的最伟大的原则——自由。

面对我的往事，我想再一次说：神圣是彼岸永远的荣耀，谨此召唤我们踏上家园的归程，它是个人的家园，是我精神的栖居之地；我还想说：我们默默守护着、神圣守护着我的家园我的诗意和美丽，在这灰色日子的层层包围中，我们感受着那一缕神圣之光的伟大照耀。我们严肃地爱和恨，严肃地工作和生活，倾听来自彼岸的神圣召唤；我更想说：神圣是美，神圣绝对不能转化为神圣之物。

物化的神圣便是这个世界的人间崇拜，它以不同的形式出现：革命、国家、理想、民族、正义等等。拜物的疯狂，代替了我们对彼岸的神圣向往。我们被这神圣之物所限制，再也无法展开个人对神圣的彼岸想象。在这物化的神圣感召下，我们从彼岸走向此岸，进行着人间净土化的努力。正是在这种努力中，许许多多的人被伤害，包括我们自己。

神圣之物高踞于我们之上，它是一，是所有，是所有的至高无上，它无情地剥夺了个人的自由和自由意志，我们唯

此为尊，为它而战，为它而呐喊。

可是，什么是神圣之物？凭什么你是，而我不是；他是，而你不是；凭什么？在我30年后的追问中，我看见在那个特殊年代的神圣之物的背后，是权力的阴险笑容。我想，在神圣的物化过程中，便会渐渐产生解读权力的问题。谁有权力，谁就拥有对神圣的解读权利。权力，尤其是在权力成为政治权力的时候，它便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指定着神圣的物的表现形式，它任意阉割神圣，使神圣之物成为一个权力的暴君，剥夺并统治着我们的自由和自由意志。我们把自己整个地奉献出来，奉献给这神圣之物，这个权力的暴虐化身。

为了这个神圣之物的伟大与神秘，这个神圣之物的神圣不可侵犯，权力必须为此指定它的禁忌系统。在红色成为神圣之物，成为神圣之物的禁忌时，我知道，那个青年女工的命运已经不可改变，她已触犯禁忌，她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必须为此忍受侮辱和屈辱，接受神圣之物的审判。

我们为神圣而战，我们实际上是为神圣之物而战。我们曾经为自己是神圣之物的“自己”而真诚地骄傲。我们轻蔑地扫视那些“异己”；那些神圣之物的“异己”。我们觉得我们天生赋有一种神圣使命，为了使这个世界更纯洁，我们必须将这些“异己”清除、打倒，让其永世不得翻身，还要踏上一只脚。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都是人，享有生而平等的人的天赋权利，直至最后我们自己也成为“异己”。

人的自由被无情剥夺，神圣之物领导我们同时展开了一场思想的战争。“异端”被严厉禁止，受到无情的镇压。思想斗争的规则已被抛弃，代之而起的，是一场宗教战争。我

变得犹豫和彷徨，我害怕自己偶有不慎，就会冒犯和危及这个伟大的语词。

我在彼岸和此岸之间彷徨，在类和个体之间犹豫，我带着这颗分裂的灵魂走向我的生命，我难以把握，我遥望星空，星空中闪烁着那双美丽的眼睛，此生再也难以走出。

蔡翔　上海学生，现为《上海文学》编辑，作家，文艺理论家。

黎 若

走出藩笼

文化革命之后，中共中央在1979年宣布取消农村中地主富农成份，就此结束了30年之久以家庭历史为根据划分政治身份的社会状况。这对于那些因家庭出身问题一出生就带上终生都无可变更烙印的人们来说，不啻是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但是这一决定并没有在整个社会中引起巨大震动和特殊反响。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本身已先行发生了转变，这一决定不过是追认已经成为现实的结果。

这一种变化是在历时10年的文化革命中发生的，甚至可以说，在“文革”最初几年里发生的种种事件，已经决定了这种转变的走向。我们对发生在一个中学里的过程做些实录，或可为之作一佐证。

一、“文革”初起

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正在中学读书。这是一所寄宿制学校，有6个年级，大约1000名学生。

“文革”开始前的几年间，学校里的政治气氛已经十分浓重。年轻的中学生们虽然还不足以为社会选择目标，但是在追求他们认定是有价值的目标时，总是表现出比成人更高的热情。青年人对新事物的敏感，可以为我们放大那个时代的特征。

60年代前半期是高扬革命精神的年代。我所在的中学本来是一所以学习成绩为指标、追求高升学率的学校，但是到这时，学习气氛已渐渐淡化，学习成绩退居次要位置。在校期间，每年有两度劳动，去农村参加夏收、秋收，接受思想教育，锻炼品德意志。入团成为极高的荣誉。入团标准中首要的是政治表现。什么是政治表现呢？参加学毛选一类的活动小组，做好人好事，帮助同学，关心集体，在各种会上积极发言，劳动中吃苦耐劳，生活艰苦朴素……这种革命化的政治气氛应当说始自学雷锋运动，在以后的思想革命化、全国大学解放军的运动中进一步强化，到1965年的时候几乎达到白热化程度。

我在班上是好学生。开始因为学习成绩突出，在形势变化后，又成为诸次活动的积极分子。虽然按当时的年龄，我们还不能领会那些政治词语的真正含义，但是诸多政治活动造成了一种心理效果，我们都相信未来是一个更加美好的世

界，并且期望自己在创造这个美好境界时建立英雄业迹。可是在这一片光明之中也有小小的阴影，我的父母是知识分子，按阶级路线划分，属中间派，这是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的事实。我常常为家中有保姆而惴惴不安，对父母的高收入羞于启齿，生怕被同学们看成是资产阶级小姐。为了磨炼自己，我坚持周末走一个多小时步行回家，而不坐公共汽车。我和其他同学一样，喜欢穿带补丁的旧衣服。穿上一件洗得发白、补着整齐补丁的衣服，内心畅快自豪，这与今天的青年人穿上一件时髦流行衫的心情是十分相似的。

就在1965年的时候，学校里从北京转来一位新同学。他父亲是军队高级干部。他的到来，给学校里注入一股新鲜气息。在那个年代，有一本《毛主席语录》就足以自豪，他竟然有一本印制考究的林彪著作，上有林彪像和林彪“四个第一”的手书题辞。常常可以看到他神气地抱着这本书在走廊上阅读，如果谁能借到这本书看，已经成为一种荣誉。这本书几乎成了代表政治运动的一个圣物。这个同学口才绝佳，能滔滔不绝谈几个小时的突出政治和接班人问题，并且常常向大家传递来自北京的各种消息。在他周围很快聚集起一批信奉者、追随者。他成为学生中最有威望的人物。

来自北京的种种消息中，影响最大的是一封关于接班人问题的信。信的大意是：老一辈革命家出生入死打下江山，现在到了年轻一代接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住红色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这封信里充满着激情和鼓动性语言，如“八宝山的骨灰一天天增多，我们还能再坐等下去吗？”这一类很富感染力的话。这封信迅速在同学中传开，很多人都把它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干部子弟们尤为激动，因为他们正

是信中说到的接班人。这之后，他们常常聚集在一起谈论自己的历史使命，充满着神圣而骄傲的神态。阶级路线问题被醒目地提上了日程。

在一次发展团员的会上，一个真实的故事被披露出来。有一位将军在病中把一块从身上取出来的弹片交给自己战友的儿子，并希望用来换取这个青年人的一枚团徽，可是老将军愿望没能实现，抱恨离开了人世，因为这年轻人学习成绩不佳，被拒之于共青团大门之外。自然有人会问，学校执行的是什么路线？究竟是谁家天下？此后不久，这位同学成为当然的团员。在学校里，革命家庭出身变得越来越显要了。

这些活动虽然发自部分学生，但显得很有来头，不久便得到了校方的认可、支持。每个班级由班主任出面召集革命出身的同学开会。所谓革命出身，是指革命干部（1949 年以前参加革命）、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出身。这就是后来所谓的“红五类”。过去受宠的班干部，这次被排除在外，这些人不免生出一种失落感。从与会者会后兴奋不已的神情和脸上的泪痕，不难推想会议的激动场面。在这样的会议召开之后，班内的气氛立即发生了变化，参加会的和没有参加会的同学之间出现了一道清楚的界限。差异一旦形成，就为以后的矛盾埋下了种子。这种情况对于出身不好的人当然是痛苦的，但是谁都没有怀疑这些做法的正确性。它好像是从原来的政治理论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出身不好的就应当与家庭划清界限，应当反省、磨炼自己，来证实自己对革命的真诚。

班干部重新做了调整，几乎全部由革命出身的同学担任，我作为唯一的例外被保留下来，这在当时成了对我最高

未来是充满着何等的魅力啊。

二、做黑五类的日子

平静的日子是短暂的，更大的风雨接着就来临了。运动沿着已经形成的趋向迅速向前推进。在1966年的七八月之交，“文革”运动发展到了狂热的程度。

工作组撤走之后，学校里群龙无首。首先造反的同学自发成立校内的“文革”领导小组。小组成员是清一色的红五类。全校同学都倒向造反派。上级党组织系统处于瘫痪状态，校长孤立无援，成为众矢之的。“文革”小组成了学校的实际领导者。

北京的消息接二连三传来，首先是革干子弟首创成立“红卫兵”，继之而来的有著名的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学校里的阶级路线处于不断的升温之中。除这些消息之外，报刊广播中的社论文章直接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其口吻也在不断升级，为“革命小将”撑腰助阵。造反的洪流冲向各级政权系统，各种社会力量相持着、抗衡着。

在抽象的大口号之下，学校里发生的实际变化就是再次强化阶级路线——根据每人的家庭出身做了“阶级队伍”的划分。同学分为三大等级，第一级是红五类，由他们成立红卫兵，第二级是红外围，第三级是黑五类。黑五类是指那些出身地、富、反、坏、右家庭，以及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家庭的人（其实不止五类，这是一种习惯性叫法）。黑

五类更多的时候被称作狗崽仔。红外围顾名思义是红卫兵的外围组织，是红五类的助手和团结对象。在黑五类内部，根据每个人家长的反动程度，又有进一步的细分，每个人都被划定在一个等级位置上。一个同学的母亲在“四清”中被定为地主分子，纯属敌我矛盾，被放在了最低层。依次上升的是属人民内部矛盾的历史反革命，一般国民党员，摘帽右派，反动学术权威。我的家庭属于最后一类，我也就属于这一等级了。这个排队顺序是十分重要的，每个人对比自己等级高的人应当恭顺，对比自己等级低的人应当严厉，这种态度是每个人革命性的表征，因为它表现着对同志的爱，对敌人的恨。红外围内部也按其家长地位做了排队。

大家都认真地恪守着这一划分，以前的同学关系变成了同志、朋友、敌人。黑五类同学成了斗争的对象之一。这一变化对我来说是突然的，也是剧烈的，虽然在十几个黑五类中我的地位还算高，但都同样属于革命对象。红外围同学如避瘟疫一般，远远地躲避着我们，实在无法回避时，则摆出一副教训的面孔。红五类的态度更加严厉，开始时是板起面孔的训斥，后来逐渐发展到拳脚相加。我的两个好朋友虽然没有挥手打过我（我确信她们也没有打过别人），但是相遇时那冷漠的目光像全然不曾相识，我的心更被这冷淡深深地刺痛。

红卫兵们忙于到校外串联，煽风点火。学校里变得冷冷清清。我们这些入了另册的人，没有资格外出造反，留在学校里进行自我批判。大家都自动地遵守着红卫兵立下的章法，每天早早起床，除一日三餐外，全都坐在教室里学习、反省。等级的划分使大家都不愿同其他同学讲话，每个人的

心里都十分孤独。这是我所经历的最难熬的日子，白天和黑夜同样是那么漫长。坐在教室里，我的思绪如一团乱麻。我从不怀疑这种待遇是否公正，毛主席不能怀疑，共产党不能怀疑，革命不能怀疑，红卫兵受到毛主席支持，当然也不能怀疑。如果自己有什么不满，正好说明了自己在背叛革命。这是触及灵魂的革命，自己的家庭出身必然会产生思想烙印，难道不该受到批判吗？红卫兵的父母们为革命立下功劳，现在由他们的子女继承父业，才能保证江山不变颜色。可是我怎么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上呢？这不是我们的本意啊。然而革命既对我这样裁决了，只能说明自己确实给革命带来危害。可是我真的在危害自己珍爱的革命吗？我能做什么呢？我该做什么呢？我真愿意把我的心剖开，让大家看一看，我对革命是何等的忠诚！如果死能洗刷我的罪责，我会毫不犹豫地去死，可是这又是自绝于人民、背叛革命。我在一个无法解开的套子中胡乱思想着，看不到一线光明。被别人裁定为罪人无疑是十分痛苦的，但如果被自己裁定为罪人，那就如自己在吞噬自己的心了。我们用自己的灵魂在这个思想做成的藩篱中到处冲撞，而从未想到要拆开它，从中走出。

我相信坐在教室里反省的黑五类们大都有着与我相似的思想历程。其实无论红五类黑五类，当时的思想都来自同一个思想母本，这个母本就是十多年来用以教育我们的那套政治原则。它是一些简单而生硬的教条，但对当时的我们来说，除此之外别无所知。到了这时，这套理论已无力再指导我们思考，它已经走到了尽头。然而，新芽还没有从原来的母本中突破而出，这需要一个过程，或者是一个逐渐积蓄的

长期过程，或者是一个激烈撞击的瞬间过程。

1966年8月是文化革命最激荡的岁月。几乎每一天都在发生着不平常的事情。在这中间有两个日子更加不寻常，一是8月8日“十六条”公布，一是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播放“十六条”的那天晚上，全校同学集中在一个大厅里收听，喇叭里传来播音员那沉缓、稳健和略带激昂的声音，座位上一片寂静，麦克风的声音犹如在空无一人的大厅里回荡，激起一阵阵嗡嗡的回声。每个人都屏住呼息倾听着，整个会场的空气紧张得令人窒息。“十六条”内容一条一条相继而过，突然“要文斗，不要武斗”几个字跃入耳中，我的心为之一跳，是啊，是啊；“要文斗，不要武斗”，这突如其来的最高指示，是解除我们肉体痛苦的尚方宝剑，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几个字，泪水从眼睑涌出。我模模糊糊地知道，会后被轰出会场、被批斗，但身心几乎都沉浸在对新生的期待之中，只是机械地听从别人的摆布。

然而现实很快给我大喜过望的心头泼上冷水。“十六条”公布之后，武斗不但没有被制止，反倒比以前程度更甚。在红卫兵身上积蓄起来的革命热情无处释放，已到了快要爆炸的程度，打人似乎成了一种宣泄的渠道。用他们的话来说，要把对无产阶级的爱，对敌人的恨都集中到皮带上。他们有强烈的革命冲动，而又找不到真正的目标，便随意臆造自己的敌人。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这是红五类的盛大节日，他们激动兴奋，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黑五类们集中在教室里收听广播。广播结束，欢腾的气氛还没有完全

退去，红卫兵们推开了教室的门，我们都站起来。随后按红卫兵的指示，把桌椅靠到墙边，在教室中央腾出一个空场。“砰！”一个墨水瓶砸到地上，摔得粉碎，满地是墨水和玻璃片混成的污渍。“跪下去！”几声命令之后，动作慢的人头上已挨了闷棍。我的头被打得嗡嗡作响，几乎跌倒。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皮带棍棒横飞、拳脚交加，有人满脸是血，有人跌倒在地，地面上已是血迹斑斑。最后的一道惩罚是从三楼的教室爬到一楼，鲜血在爬过的地面上留下一条条印迹。这时已过了午夜。在几个小时的挨打中，没有人起而反抗。但反抗的呼声已经积存于心底了。“你们违反十六条！你们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这是我心中始终没有停止过的呼喊。

多年之后，每次回想这场景，我都确信人的本性中有恶的元基。尽管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仇视是一种政治教育的结果，但如若没有这种元基，仅靠培养的力量是不能生出枝株和果实的。马克·吐温曾经有感于人性之中的恶，他认为人是比任何一种野兽都更残忍的动物，猛兽杀伤同类或杀伤异类，是为了生存，只有人，是把这作为一种娱乐或目的，以满足精神的需求。我也曾扪心自问，如果对调一下位置，我的行为会像红五类那样吗？我的回答是：基本不会。起码不会像有些红五类那样残忍，但我不能说绝对不会。在当时我对红五类所作所为的理解，表明了我对他们的行为的某种认同。我相信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在施暴时并不掺杂个人报复的因素，他们是在宣泄某种情绪，但在这种情绪背后却深藏着私利——要做这个社会的当然占有者。应当公平地说，在红五类中，每个人激烈的程度也相去甚远，也有人从未动手打人。

红卫兵就是带着这种亢奋心态走向社会，去“破四旧”的。当面对的不是敌人的后代而是敌人本身的时候，仇恨的程度有增无减。手段、方式的残忍成了一个人革命性强弱的度量，人性全然泯灭了。我躺在宿舍床上，听着半夜里从外面归来的红五类兴奋地谈论她们的战果，谈论怎样用残酷的手段整治资本家的时候，所感受的恐怖气氛已到了极点。在那个把恐怖当成了荣耀的年代，有人以“红色恐怖队”作为自己光荣的名称。

“8·18”集体挨打之后，每个黑五类心中都开始萌发出反抗的情绪。我虽然也开始反抗，但远不是最坚决的。在一个星期天晚上，清点黑五类人数时，发现有两人未按时返校。这是第一次出现的违纪现象。然而问题还不仅仅是迟到，一天过去，两天过去，仍未见她们到校。盛怒之下的红卫兵到家中去要人，人不在家中，家长反向学校要人。红卫兵回到学校时的沮丧神态，使我忽然感到他们并非所向无敌。在失去特殊氛围的时候，他们又成了普通的中学生。我羡慕这两位逃跑的同学，也开始在心中酝酿种种逃跑计划。计划最终并未付诸实现，可是已经有了某种自信的念头，不再一味地自我谴责、无限上纲地自我批判，也不再视红卫兵为绝对神圣了。

三、自己解放自己

坐在教室里，有充足的时间回忆“文革”来的一幕幕场景。我开始用社论精神来对照红五类的行为，疑问在心里不

断地聚集起来，我的问题到底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呢？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即使有严重错误，也不能用武斗方式来对待我；如果是敌我矛盾，那班上几乎一半同学都成了敌人，这与团结大多数原则又是相违背的。文化革命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社论不是明确指出要斗党内走资派吗？你们的父母成了走资派，说明他们背叛了革命，这样说来，你们不也成了黑五类了吗？按照种种可能的逻辑，我在为自己寻找反抗的理由。

9月份到来时，红卫兵几乎都去外地串联了。外出之前，他们决定由红外围把我们押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背起行李，步行几十里来到大山脚下。离开沉闷的学校，心里感到一丝轻松，艰苦的劳动暂时冲淡了精神上的压抑。我们作为家庭有问题的劳动改造者，由红外围向农民公布，可是农民不像城里人那样对政治敏感，非但没有表现出歧视的态度，相反倒是看不惯红外围的指手画脚、游手好闲。他们对“学生”一视同仁。第三评判者更增加了我们心中的自信。

我们住在农民家里，我与另一黑五类分到一起。开始时我们仍像在学校里一样沉默着，互相保持距离。一天晚上，那个同学试探着问我对运动的看法，我说出自己心中的疑问。我的话引起了她强烈的共鸣，两颗孤独的心开始互相靠近，那些在心底里压抑了很久的话全都倾吐出来。一次次的深夜长谈中，我们完全摆脱了有罪的感觉，开始评判红卫兵种种作为是否正当。这种人格的自我恢复使我的精神状态完全改观，有时遇到其他黑五类，看见他们仍然阴沉的脸色，我真想把心里的话告诉他们。我始终没有这样做，因为也许会有人报告红外围而招致麻烦。

红外围们常常回城里去，带回红卫兵的指示，也带回运动发展的消息。红外围的态度开始缓和起来，一种日渐宽松的气氛使我们感到头上的磐石正在挪开。最后，红外围也去串联了，山庄里只留下我们这些人，处在无人管束的状态。到了10月底，黑五类们也开始陆续返城了。

回到学校，情况大变，真所谓“山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我们心里自发产生的怀疑和反抗，远远落在形势后面。据说血统论对联已被中央文革点名批判，前一段整出身不好的同学是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本来看去是无法撼动的庞然大物，会这样轻易地烟消云散，真使人感到一种被捉弄的委屈。这突如其来的形势转变不仅让我兴奋，也让我受到巨大震动。我大病了一场。到11月中旬病愈，便登上了去北京串联的火车。

12月底从北京归来，学校里已有了两大组织，基本上以家庭出身为分垒。我很自然地选择了那个翻身黑五类占多数的组织，从此就站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之下。1967年元旦社论发表，社论指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是封建思想残余，这是中央第一次公开批判血统论。这种来自最高权威的裁决，使我们这一派组织更加信心十足。但这时的红卫兵也不再是从前的红卫兵，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不再听凭上面的摆布。接着有“联动”成立的消息传来，红卫兵们并没有忏悔，他们坚持着自己血统的高贵，只是这时由过去的众星捧月，变成孤芳自赏罢了。

在两大派别组织形成之后，虽然还有派别的对峙和争斗，但是由阶级出身形成的压力已基本消失，思想气氛变得

相当自由了。每一派的领导人物——“头头”，通常由群众推举，群众不满时也可以撤换他们。中央的精神直接与群众组织见面，越过了“文革”前的各级中间组织。中央精神只是一些大原则，[illegible]实质的解释，灵活性很大，在联系实际问题上，各派大都各取所需。

在那时，我最崇赏的一句话是“怀疑一切”，这是马克思回答他女儿游戏提问时，对座右铭所做的回答。不管实际上是不是“怀疑一切”，这个信条表现出对过去“服从一切”的反抗。人是教育的产物，教育既来自当权者有意的宣传，也来自社会生活的熏染。没有一种完全独立于社会群体之外的思维方式。而教育加之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是对于共产党毛泽东的无限信任，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只有信任，没有怀疑。文化革命到来，除了对毛泽东这个最高权威的信任还保留着而外，其他各级领导，以及各种思想上的权威都突然消失了，甚至成了反面形象。信仰之中的大部分突然坍塌。内心所经历的这种变动会留下永久的印迹。

我常常在心里向自己发问：如果没有中央的批“资反路线”，会不会反抗，甚至没有“十六条”，会不会反抗？回答依然是“会的”，这种反抗会因外部条件的差异而来得迟早不同，但是那种明显矛盾的理论是无法长久被人的理性所接受的，否则就不成其为人了。矛盾的显现有一个过程，尤其心理被那层教育做成的硬壳包围起来时，突破就更加不易。

四、何必要当红卫兵

在1967到1968年的时间里，文化革命处在群众组织的互相争斗之中，整个社会分成两大派别。我们学校中的两派与社会上两派联系甚小，基本是以对血统论的态度作为派别划分的界限。1967年的夏天，学校里进驻解放军，开始军训。军训的主要内容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中央精神，搞大联合。以背诵“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搞忆苦思甜、“三忠于”活动来化解派别情绪。无论是派别之争，还是搞军训，在这一时期里，“文革”并无太大的实质性进展。原来的各级领导，早已成为大大小小的“走资派”被打倒了。批判会、游街都不再新鲜。尽管中央和群众都在追寻种种新的胜利，但是“文革”这只大船似乎失去了新的具体目标，在原地徘徊着，自我消耗着。学校里的逍遥派一天天多起来，政治术语的魅力正在渐渐消失。

即使在这时，红卫兵也依然是一个令人向往的身份。在社会中充满否定因素之时，人的本性之中，追求正面肯定性的倾向，成为一种强烈的需求。红卫兵不仅是革命造反派的标记，而且还显示出一种特殊的纯正革命派的身份。不过这时的红卫兵已经相当驳杂了，任何人都可自立山头，自封红卫兵。在一些较大的群众组织里，红卫兵还部分保留着它原来的含义，作为一种正规组织，加入时要履行正式手续，不像群众组织那样进出随便。我们这个组织也建立了自己的红卫兵，首批红卫兵的人数不多，只有头头和出身革命家庭的

同学，以后则按班级进行组织发展。按家庭出身排队，我算是比较靠前的，但这条发展中的重要原则对于我却有了某种例外。大概因我不会背诵“老三篇”，也常常不参加军训早操等活动，一顶“阶级感情不深”的帽子被扣在头上，还有它的同义语“对毛主席不忠”。这些评语在当时的份量都不轻。不过在这时，我已开始步人新的思想历程，在向着认识的真实境界走去的时候，心中充满的愉悦，会使人不忍离它而去。我再不愿回到那空洞政治口号所构筑的自我约束之中了。我一直拒绝对自己的行为向新红卫兵做出检讨，因之，我永远失去了做一个红卫兵的机会。

我拒绝忏悔的态度，有点激怒了新红卫兵们。这种行为似乎是向红卫兵权威性的一种挑战。但是他们又无可奈何，这使我的内心里有一种“恶作剧”成功之后的快意。何必要当红卫兵！何必要当红卫兵！这时在思想上所感受到的那种自由和轻松，甚至是在“文革”结束后再也没有遇到过的。成人之后，为着生活要追求各种功利性的目标，常常有求于别人，也常常投别人所好，纵然在内心深处还可能保持着自己微弱的独立性格，但是在行为的表面上，它已微弱到难以辨认了。

其后的“文革”路还有很长，我沿着已经开始的独立思索之路走下去。在林彪事件之前，我和同伴们已经从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拜中走出。在后来，这种思想发展成对“四人帮”的怀疑。因而，我确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路，这是许许多多中国人的路，它在“四五”时汇成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众力量。

尽管历史是没有“如果”的，但我还是禁不住地想，如

果没有“文革”，我将是什么样子呢？“文革”改变了中国社会运行的方向，使得每个中国人的命运都至少有部分地改变。它割断了中国文化传统的血脉，它还隔绝了中国与大部分世界的文化交流，阻绝了同承袭着古希腊文明传统的西方世界的交流。我们生活在如此简单的国度之中，从少年时代起就被挤压成畸型。在这单调、刻板、狭小的藩篱之中，我们全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藩篱打破之时，我们雏形已成，残缺的肢体虽有部分恢复，完全自由的生长已不可能。但是，在这个丰富的世界面前，我们至少获得重新认识自己的能力。历史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打上它深深的烙印，或许可以从另一方面给我们以补偿。我们个体的生命是那样短暂，由于历史的存在，我们才可以徜徉于人类千年的文明历程之中，我们才感受到与祖辈、与后代那种生生不息的接续关系，于是我们个体的生命才融入到人类这一丰富的概念之中，使我们的生存得以升华，使我们的视野得以拓展。可是历史是什么呢？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化石之中的骨殖，是龟甲、竹帛之上的文字，是历史教科书中的事件，然而，在“文革”那些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似乎感受到历史脉搏的跳动。当历史从我们的身边走过，聆听着历史的足音，使个体的生命获得了一种超越。

黎若　西安某中学高中生，现为陕西某大学教师。

秦　晖

沉重的浪漫

——我的红卫兵时代

“文革”开始那年（1966年）夏，我在南宁民生路小学毕业，进入南宁四中初一，当时还不满13岁。从那时直到1969年下乡插队，我的三年“初中”生涯都在“革命”以至内战的混乱中度过，没上过一天正式的课，甚至于除小学同学、同组织的战友以及后来一起插队的伙伴外，其他的“同班同学”我当时就认不得几个。不过三年下来，作为跟在高年级学生后边“造反”的年纪最小的一届红卫兵成员，我无论在认识社会与人生方面，还是在从编印小报、写论战文章等活动中所受的“文化训练”方面，都“收获”不小。套用当时官方的话说，也算经历了“革命锻炼”吧。与这三年中惊心动魄、血火交融的许多事情相比，我的经历是平淡无奇的，但它将永远影响我的一生。

一

我是怀着寻找“革命”的热望踏进中学的，这一点许多小伙伴也许曾觉得奇怪。因为眼疾之故，我从小内向、喜静。但我并不冷漠。我父母作为老民盟曾积极投身于建国前的反蒋学运，这对我或许有潜在的影响；生活在学历史的知识分子家庭中，使我对“文革”前夕被批判的《海端罢官》和“三家村”作品中涉及的许多历史典故似曾相识，为此在小学末期曾常有小伙伴向我“请教”，使我在得意之余更对“革命”来了兴趣；最后，小学临毕业时已兴起了学生给老师贴大字报之风，我也参与了，并从中感到“革命”蛮好玩的。于是一进中学，就急着要投奔“革命”。除此以外，我那时已经有了“信仰”，尤其是10岁那年炽热化的反修“公开论战”给我以强烈的感染。我至今记得全家坐在收音机前听《九评》的情景，当时我虽然似懂非懂，但播音员那义正辞严的语调使我感到了“真理”的力量，并为之激动不已。很长一个时期，我能对“九评”及以前的公开论战文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中的篇目倒背如流，对某些段落记忆犹新，如“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互登对方批评自己的文章。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你们敢这样做吗？好样的，就敢；心虚理亏，色厉内荏，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那你们就不敢。我们断定你们是不敢的，是不是这样呢？请回答吧！”每念及此，一股要与人辩论以捍卫真理的欲望便油然而生。

我那时对这些论战文章谈不上有什么深刻了解，但“九评”中关于“特权阶层”的说法我是懂的，我想全国许多人也是如此。当“文革”开始时，包括我在内的人们立即把“特权阶层”与“走资派”的概念等而为一，而“九评”中列举的苏联“特权阶层”种种欺民恶行也立即被人拿来对照现实。今天看来，“九评”所列举的那些恶行不仅确有其事，而且比那更严重得多的恶行在苏联也有的是（“否则安能有今日之“剧变”?）。然而所谓“特权阶层”究竟与“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何关系？“特权阶层”者，权贵也。权贵欺民，古已有之，何待乎“资本主义”？而欺民之权贵所忌所惧者，不正是那时的人们所急于“撕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吗？“撕掉”了这一中国本就未必有过的“遮羞布”，又继之以“限制”公平竞争的市民权利，再把本就对权贵未必有多少约束力的儒家仁爱之说也给“彻底决裂”掉，唯有“法、术、势”独尊于神州，权贵不就更可以畅其所欲、肆无忌惮了吗？

然而今天看来如此浅显的道理，那时的人们却似乎一无所知，更不用说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了。今天想来这恐怕也不光是个“奉旨造反”的问题，甚至不光是个特定意识形态的问题。君不见就连华侨出身大仁大智的孙中山先生也曾认为中国之弊在于“自由太多”了吗？今天有论者把“文革”中之造反（而不是“保皇”）比之于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可能就极个别的人而言这一比较有些道理（但我在造反派队伍中未遇到过这样的人），然而就“运动”而言此比较未免不伦不类。这倒不是因为“文革”中的造反本就打着反修防变的旗号，而东欧的异见分子却是“修”、“变”的产

物，也不全因为“奉旨造反”（与当年的义和团一样，“文革”中的造反并不全是“奉旨”行事，“抗旨”之举也是有的，我所在的广西“四·二二”就有不少这类行为）。而是因为……打个比方说吧，一则俄国寓言曰：有一富人从不知“饿”的滋味，光听说“饿”是肚子里不舒服的一种感觉。一日他饱食腹胀，颇感不适，遂悟曰：“饿矣”，于是又复进食以疗“饥”，结果愈食愈胀，愈胀愈以为“饿”，于是愈食，终于活活胀死。

“文革”时期那种把“特权阶层”当作“走资”之过来反的造反运动，不管是否出于“奉旨”，不都有似于上述寓言中主人公的所为吗？

这是今天的看法了，当时我自然不会这么想。然而我进校不久便遇上了“不准革命”的苦恼。当1966年9月前后红卫兵在南宁初兴之时，四中基本上是以革干子弟为主体的“南宁市红卫兵联合司令部”（俗称“盾牌兵”，以其徽记为一嵌有五角星的盾牌故也）的一统天下。当时这一组织奉行“成份”至上原则，只有“红五类子弟”才可加入，不红不黑的只能经过成份高贵者挑选后吸收进附庸组织“红外围”，而“黑五类子弟”则是“狗崽子”，求为“外围”而不可得。我父母今日虽因40年代反蒋而被列为“离休”干部，但那时民盟反蒋不被认为是“革命”，盟员身份反招来了麻烦，更兼身涉“教育黑线”，只待“下放”了。我因此不但不得列入“革干”出身，险些连忝居不红不黑也悬乎（其实就是那些出身“不红不黑”的，也没有几个不为戴着那低人一等的“红外围”袖章而感到有伤自尊的。）就凭这一点，我当时对“盾牌兵”就没有好感。这也是我后来一直倾向“造反

派”而反感“保皇派”的原因之一。

当时我们这些“不准革命”的低年级新生被安排去接待住校的首都红卫兵南下串联队队员，这些北京来的“小将”在我这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眼里真是少年豪杰，令人钦羡。其中有个家住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某大院，名叫“赤烽”的高中红卫兵与我很谈得来，他对“盾牌兵”也颇为不满，鼓励我们参加造反。不久发生“九·九”事件，在自治区党委门前静坐绝食的造反派和支持他们的首都红卫兵串联队与围攻静坐者的“保皇派”（“盾牌兵”、“赤卫队”等）发生冲突，南宁街头到处为此事进行辩论。我也带着支持静坐者的倾向前往凑热闹。不久静坐者受到压制，参与此事的南下串联队头头被“保皇派”通缉捉拿。而这人恰是我父母单位一位老干部阿姨在京读书的儿子，我是同情他的。

随后的数月之内形势大变，“造反”之潮滚滚而来，“盾牌兵”逐渐失势，南宁市数不清的红卫兵组织纷纷在四中招兵买马，校园内一时山头林立。当时影响最大、进校发展最早的一些组织尽管是“造反派”，也未能脱“成份论”之俗，总是优先拉成份好的人伙，而且在年龄上又是尽可能找高年级学生，对我们这些只能当拉拉队的初一“小朋友”不大在意。而一些后起的、影响较小的二三流组织即俗称的“杂牌军”红卫兵因进入学校较晚，成份好的、高年级的学生大都已各有其主，于是才不得不注意发展我们这些“小朋友”。这样约在11月间我便成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主义兵”）四中分部的成员，如愿以偿地戴起了红袖章。

“主义兵”是由位于南宁老市区（贫民区）的七中的一批高中生搞起来的，进入我们这个位于机关区的四中比较

晚。它在当时属二流组织，不像一些“大户”那样有独门独院的“总部”。“主义兵”的总部与其他一批“杂牌军”一起设在南宁市中心一座专门拨出的“朝阳三号楼”（“文革”期间一直叫“红卫兵大楼”）内。而我们四中“分部”就只有我们一起进入四中的几个小学同学（中学的“同学”那时尚都不知姓甚名谁），倒也没有“官兵”之分。虽属“杂牌军”，毕竟也是一个山头，校方照例拨给我们“办公”用房、油印机及纸张油墨等物，还有少量经费。我们这几个孩子还是第一次主了事儿，那“革命热情”就不知有多高了。那些日子我们日夜都泡在“分部”里，几张课桌一拼就睡，附近小吃店里来碗粉就算一顿。虽然家离学校不远，几天不归却是常事。成天价衣服上弄的是浆糊、墨汁或油墨。上街时不进商店，只往大字报棚跟前凑。

那时总部的活动不多，“勤务员”们（头头，即今所谓常委，当时都声称是“人民的勤务员”，故名。）主要关注“主义兵”势力较大、高年级成员较多的学校，对我们这个“小朋友”组成的分部不甚在意。然而我们却很不甘寂寞，当时不管市里运动中出了什么“事件”，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都要根据自己的“独立思考”，未经总部的指示就发表意见，写成文章以大字报或传单、小报的形式公诸于世。到后来居然出了一份“主义兵四中分部”的“机关报”——“伏虎战报”，每期油印数百份，沿街张贴，或夹在校际交换资料中散发各校。一次总部看到这份“战报”上对好几件事情都赫然发表了不同于总部的观点，大为震惊，立即召开了勤务员与各分部的联席会议。头头们一方面称赞了我们的积极性，在总部尚没有报纸的情况下，几个初一新

生组成的分部便并起一个"伏虎战报编辑部"，扩大了本组织的影响，并号召各分部向四中分部学习。另一方面也批评我们自行其是，不与总部商量便乱发表意见。我虽然在会上作了检讨，心里却甚为得意。

二

这样的"革命"生活到1967年1月夺权之后便结束了。1966年冬蜂起的群众组织，到夺权时便进行了"大联合"。当时"盾牌兵"之类的"老保"已经崩溃，"造反派"的大批组织联合成立了"广西革命造反大军"。然而"造反大军"夺权之后立即发生内讧，"广西红卫兵"、"南宁八·三一"等联合"工总"内部的反对派在军区支持下砸烂了"工总"，并引起了其他一批造反派组织的强烈反对。与此同时，以原各"老保"组织成员为基础成立了被称为"新保"的联合组织"无联"。接着由于军队介入、领导干部各受一派支持而"站出来"造反，局势更加复杂。"大联合"很快变成了"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并最后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两大对立阵营。这期间，"造反派"内部在工总问题上的分歧得到弥合，而他们与军区的关系却急剧恶化；被称为"保皇"的"无联"由于得不到军区的支持，不久便被冲垮、但其中的主要力量很快又在与"造反派"关系恶化的军区支持下重新联合起来。到了1967年四五月间，以《广西日报》社事件为契机、"广西四·二二"（基本上以原"造反大军"的力量为主）与"广西联指"（以原"无联"的主要力量加上在军

区支持下由“造反大军”中分离出去的部分力量联合组成）这两大派对立的局面最终形成。

这时“杂牌军”大多已不复存在。一是因为“夺权”以后的掌权者已不像那见人矮三分的原校领导那样是个山头就认，他们以反对“经济主义”为由，对不附己者不给房子和物资经费；二是在各主要组织分别参与发起组建两派阵营之后，被抛在一边的“杂牌军”迅速发生分化，由于不是成“建制”地发起加盟，他们中甲亲此派，乙亲彼派，意见难于一致，很快趋于瓦解。南宁四中的无数个组织到4月间便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广西两大派在四中的基层组织：“广西联指”的四中“三·七”战斗团与广西“四·二二”的四中革联。对“特权阶层”抱有反感，又没有高贵血统的我，便成了四中革联的一般成员。

这个时期我的“革命”生活起了很大变化。我不再能与几个“小朋友”一起以小山头的名义自主地说话了，四中革联这个大组织自然是高年级学生说了算的。何况作为广西“四·二二”的基层组织，他们本身也要受总部领导——随着武斗的不断升级，两派总部与基层的关系都逐渐严密化、制度化乃至军事化了，再不能像“主义兵”那样任凭“四中分部”发出与总部不同的声音。

但我的“革命热情”却并未减少，因为这时虽已没有了自立山头办“报”的乐趣，却多了另一种刺激：随着“派战”的日益升级，“革命”日益显得悲壮起来。如果说我对“主义兵”的热情主要出于好玩的话，那末我对四中革命的热情则更多地有了“正义冲动”的成分。南宁四中位于“联指”力量占绝对优势的行政机关区，四中本身又是军区两个

中学军训试点之一，而军训团完全支持我们的对立派四中“三·七”的。因此如果说在南宁全市“四·二二”居于劣势的话，那末在四中，“革联”就处于更严重的压力之下。武斗一起，我们就无法在校园容身，不得不走向社会，到“四·二二”控制下的所谓“解放区”参加各种活动。因此，如果说在“主义兵”时代我们日夜在校园里“革命”的话，那末到了这时我们就更多地接触了社会，许多意想不到的感触滚滚而来。

我最大的感触是市民“造反”与我们这些学生的“造反”截然不同。当时，长期在野，一直承受很大压力的“四·二二”一派在南宁控制的地方，除广西大学等高校与因历史原因（由于紧挨《广西日报》社而在“4·22”报社事件中成为“火线指挥部”）而成为“四·二二”总部所在地的孤立据点区展览馆以外，连片的“解放区”基本上是南宁市下层市民集中居住的老市区，如解放路、新华街、上国街、西关路等处。这里房屋老旧，好的是古老的“骑楼”，差的则为砖木结构陋房乃至棚户区，其居民原来多从事传统行业，三教九流，历来被上流社会视为“情况复杂”之人。“造反”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这里明显地淡化。在我们校园里，指斥“走资派”及本派对立面一般都是列举其离经叛道（或者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三反”言行，并以本本上的叙述为依据而力证其非。然而在上述“解放区”里，居民对意识形态并不感兴趣，满街的大字报多是指斥“权贵欺民”的具体事例，而且作者多为当事人或与当事人有关。诸如某某领导欺男霸女，某某官员挟私陷害，某某小民冤案莫伸，某某百姓负屈莫诉等等。而他们的群体要求则多有十分明显的利益指

向；临时工、合同工要求转正，下乡知青要求返城等等。[1]

“解放区”的社会、经济状况也出乎我的想象。一般都认为“造反派”是极左的教条主义者，然而在“造反派”控制的这片地区，正规计划经济色彩十分淡漠，“江湖经济”则熙熙攘攘，十分热闹。“解放区”的中心“水塔脚”地区赫然一片在工棚式临时建筑中开业的私营餐馆，号曰“南疆饭店”，邻近街巷中摆小摊的、江湖卖药行医的、兜售各种自印奇方秘诀的、甚至算命的与赌博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后来军区、区革筹与“联指”大举摧毁“解放区”时提出的“理由”之一，就是说那里隐藏着亲台湾的“反共救国军”组织，到1983年“处遗”[2] 时这个案子已查明为冤案。其实现在想来，政治性的“反共”组织固然莫须有，但在那种情况下存在着不认同现体制的江湖黑社会团体却是有可能的。

当然，在“解放区”里也存在着强大的计划经济产业大军的象征，这主要是“广西四·二二”最有战斗力的工人组织“航运工总”。该组织在南宁航运分局占绝对优势，邕江上的主要船队，包括当时广西内河最大的客轮“桂宏号”等在内，都控制在航运工总成员手中。当武斗初起，工总在航运分局的陆上据点被攻占后，该组织便“全军”转移到船上，开到“解放区”濒临的邕江大桥至朝阳沟口江段，锚泊

---

① 南宁市在“文革”前就安排过不少知青到农村，主要是到农场。这些人“文革”中纷纷诉说他们在乡下受到种种欺侮，其中有不少问题（如奸污女知青等）在“文革”后的大规模“上山下乡”中曾发展得更为严重。我当时对这些诉说颇不以为然，认为他们逃避艰苦是不够“革命”的，算什么“革命造反”？后来我自己成了下乡知青，对这些控诉才有了全然不同的看法。

② 这是个广西特有的政治词汇，指“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其主要内容是纠正“联指”一派掌权后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与派性问题。

江心。入夜后江心的船队灯火璀璨，绵延数里，蔚为壮观。有了这支“海军”，“四·二二”在一段时间内便拥有了“制江权”。在武斗处于冷兵器为主的阶段时，航运工总进可派出“陆战队”上岸作战，退可避至江心使“敌军”徒唤奈何，“联指”对此十分头痛。但热兵器大战开始后，毫无掩蔽地暴露在江心的船队便成了“联指”岸上炮火的靶子，几乎全部被毁，而建国前后几十年积累起来的邕江航运力量也就在战火中几乎荡然无存了。

在尊崇“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风气下，南宁航运工人几乎一边倒地向着“四·二二”。这一点曾颇为鼓舞我们的士气。“四·二二”的工人力量当然不止航运工总这一支，在广西铁路的枢纽、路局所在地柳州，“柳铁工机联”的力量就不亚于“航运工总”。不过柳州远在天边，南宁的大工厂又多分散在城郊，在市内“解放区”能感到的产业工人支持主要来自航运工总。但“联指”的人却有种解释，说南宁的水上航运业是自传统的个体船主群经公私合营与合作化改造而来，不像工厂工人是正牌的产业无产者。邕江上的航运工人因而有个体船业与疍民[①]色彩，言下之意是得到他们的支持算不得“四·二二”的光荣。我参加过“四·二二”学生组织与航运工总的联欢，在交谈中感到他们与“解放区”的居民一样，对“造反”持有与学生不太一样的、比较非意识形态化的理解。

事实上，当时一般老百姓的确不像今天有些说法那样充

① 两广地旧时以船为家的水上居民社会群，有独特的价值体系、习俗与群体认同，构成一种亚文化群，传统上受陆上居民的歧视，过去甚至有人把他们视为汉族之外的一个“民族”。

满意识形态狂热，只有学生是比较狂热的。而学生中又恐怕以中学生更狂热些．用当时“四·二二”中人们私下议论的话说：大学生“滑得很”，哪有我们中学生这么卖命？那时的宣传品上的确充斥着某某人“鼓吹”什么谬论、或是“闭口不谈”什么真理的指责，然而对南宁市民的情绪真正有影响的是另外的事情：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是一份关于 1959 年“环江事件”的长达上百张的大字报，系统地讲述了当时因“反瞒产”造成的惨绝人寰的灾难。今天人们都知道那几年大量饿死人的事，相比较而言广西死人并不是最多的。然而它的一个特点是进行了残酷的“反瞒产运动”，当“放卫星”招致的高征购无法实现时就说下面“瞒产私分”，并用层层拷问、肉刑相逼的办法逼基层干部与农民交出子虚乌有的“私分”之粮，以致许多人不是被饿死、面是被活活打死、逼死。记得当时观看的人群中一片哽咽之声。而街头出现的流行标语有“×××是屠杀×××万贫下中农的刽子手”之类，它所起的煽动效果是极强的。

无疑，正如 80 年代的“处遗”结论所说，当时的两大派都是“极左”思潮下的“造反派”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区别可以忽略。这仅从双方控制区的分布就可看出：草根阶层聚居的旧市区是“四·二二”的根据地，而机关大院密布的新市区则是“联指”的大本营。设在新市区内的一些教科文单位如文化大院、水电设计院、二中与医学院等地方，“四·二二”成员也居多数，但他们后来都陆续被挤走而“流亡”到所谓的“解放区”去了。

三

市民没有学生那样的意识形态狂热，但决不意味着他们的“造反”劲头不大。恰恰相反，如果说狂热的偶像崇拜引起的“造反”可以由来自偶像的禁令来平息的话，那么不太具有这种狂热的“造反”也就较难以这种禁令来平息。

1968年初开始，“四·二二”的处境日益困难，区革筹与军区支持“联指”的态度日益明显，同情“四·二二”的或中立的驻军如南宁6984部队、桂林6955部队与柳州55军或被调走，或换了负责人，或改变了态度。各地、县对“四·二二”的镇压愈演愈烈，更重要的是中央对广西问题的态度明显改变，从“五次接见”时对“四·二二”较为有利的姿态一变而为完全支持区革筹（实际上也就等于间接地支持“联指”）。这最后一点尤为严峻。以某种崇拜作为“造反”动力的红卫兵在危难时总是吟唱着“革命方知北京近”、“抬头望见北斗星”。如今“北京”越来越远，“北斗星”在对方头上闪烁，而自己本身又似乎并没有什么实际利益需要以“革命”的名义来维护，他们能从“奉旨造反”转向“抗旨造反”吗？

因此，这个时期“四·二二”的内部危机十分严重。许多为“主义”而造反的红卫兵一来觉得被自己“誓死捍卫”的对象所抛弃实在没意思，二来又对不很在乎“主义”的造反者在自己组织中的作用日渐增加深感不安。

当时尤其在“解放区”里，草根型的造反者如“四·二

二野战军”、“广西四·二二保卫处”、“草上飞”、“飞将军”、“邕江风雷”、“雄鹰”、“新工群”、“青年近卫军”等日趋活跃。之所以说它们是“草根型”，并不是因为它们的成员都是下层市民（相反，其中很多是学生，而且是中学生，但大学生也有，如“野战军”的首领黄达升就是医学院学生，我们四中也有多人参加了这些组织），而是因为这些组织反映的主要是当时“解放区”内的市民情绪，并受到市民的强烈支持。这些组织是在1967年的战斗中因“作战”需要打乱原来的单位归属而在保卫者中建立的临时队伍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们完全突破了“四·二二”原来按系统按单位形成的基层组织体系（如四中“革联”、二中“红革会”、一中“指点江山”、西大“革联”、医学院“闯”等），由在“解放区”活动的各单位勇敢分子组成。他们以“解放区”为根，受那里的气氛感染，已经与原来的基层组织关系疏远。面对“上面”的压力，他们采取了激进的反抗立场，而这种激进一出自某种“正义冲动”，二出自“解放区”市民身家性命实际利益的驱动，与“主义”并无太多的关系，更不完全受“北京”和“北斗星”的制约。这是与我们这些为“主义”而造反，奉“北京”为偶像的红卫兵所不同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这些人虽是“奉旨造反”，毕竟有个“主义”的基础，与那些纯为个人目的而投机、见风使舵、毫无信仰，今天“奉旨造反”明天就可以“奉旨保皇”的人全然不同。“主义”使我们在“特权阶层”与革命阶层之间倾向于后者（但老实说至少就我本人而言，也并不真正理解他们），而“主义”的象征却传来了对当时在我们看来属于前者的力量有利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既不愿（当然从内

心来说也还有些“不敢”）由“奉旨造反”转为“抗旨造反”，又不愿转向“奉旨保皇”，就成了必然的倾向。我们一方面不愿与“北京”支持的区革筹、军区公然对抗，另一方面又存有“奸臣当道，蒙蔽圣聪”之念，希图以有节制的抗争唤醒“圣聪”，使“北京”改变态度。

这样的心情在“四·二二”红卫兵中是普遍的，至少“四中革联”就是如此。当时总部组织好几次到区革筹、军区抗议请愿（用对方的说法是“冲击”）的活动，四中革联都参加了，但很多人心里十分勉强。记得那次“请愿”到深夜，队伍在军区大院内一棵大榕树下休息时，“革联”的负责人俞崇东一声接一声地叹气，末了对我们说：“总部完全听他们那伙人（指“草根型”造反者）的，这样搞下去我看危险。”众皆默然。我和几个初一生说：“你到总部说去嘛。”他只摇头不言。

俞崇东今天若活着，他大概不会记得我这个小卒，然而我却永远记得他这个头头。他是个面孔白净、温文尔雅的典型书生，完全不像今天一些文革小说中的“革命小将”那种气宇轩昂目空一切的样子。他父亲是“文革”前玉林专区负责人（专员还是地委书记我忘了），就是说也属“革干子弟”，而且据说当时他父亲的态度是亲“联指”的。俞本人在“文革”前是品学兼优的高中生，“文革”初官办的“校文革”与后来的军训团都曾重视他、争取他，但他为某种信念所推动，断然走上了“造反”的路。他虽然文质彬彬，却并不优柔寡断，虽然书卷气浓，却并非不谙世事。当时北京的蒯大富、韩爱晶等造反学生领袖已经垮台，他曾忧心忡忡地谈到过这件事，显然不会没有想到过这种鸟尽弓藏的

事，何况“四·二二”还根本没有得到过蒯、韩等曾一度得到的那些荣耀，一直就处在烹狗藏弓的恶境中呢！

显然，这时的俞崇东决不是“四·二二”中的激进派，他是倾向于妥协的，而且对“四·二二”中的草根势力很有看法。然而后来当“内战”结束，我从外地避难归来时却惊愕地听说他已在“解放区”陷落时战死，并且是死在草根激进派的核心之一“四·二二保卫处”大楼的保卫战中，也就是与“他们那伙人”在一个战壕里死去的。面对满校园“打倒现行反革命俞崇钦”（俞的原名，“文革”时他为了表示忠于领袖而改名崇东，但在敌对派看来他是不配享有这个名字的）的标语，我真是感慨万千！关于他的死，原革联成员后来有种种说法，有的说他是高呼“毛主席万岁”而昂首遇难，有的说他是在负重伤后被拖去枪毙的。但总是被俘后遭处决则无疑。80年代“处遗”后，他们这些死难者被摘掉“反革命”帽子而作为一般性死亡处理了。但他的亡灵能因此得到多少告慰呢？

实际上，在1968年3月末，“四·二二”最后分裂为“新四·二二”与“老四·二二”时，四中“革联”与“四·二二”的几乎全部基层组织都站到了以草根势力为中坚的激进派“新四·二二”一边，而主张顺从“区革筹”和军区、向“联指”靠拢的“老四·二二”只有原总部的部分头头等极少数人。以至于后来人们很少提起“新”“老”之分，不管是“四·二二”一边还是“联指”一边的人都径呼“新”派为“广西四·二二”，而“老”派则已被人们遗忘了。

为什么这些为“主义”而造反的红卫兵会站到原来自己颇看不惯的草根型激进派一边并与他们一起走上了“抗旨造

反”之路，而俞崇东这样的人还与“他们那伙人”血洒一处？现在看来，直接的原因是当时“区革筹”与军区实在逼人太甚，使“四·二二”中那些本来愿意妥协的人无路可退，只得与激进派一起作困兽之斗。只有那些甘冒“卖身投靠”之恶名的很少几个人愿意不惜“名誉”地在对方控制下谋个一官半职。

但从根本上说，这样的结果是不是也可以反映“主义”之争在那场浩劫中实际上并没有那样重要，而实际的利益和矛盾更具有实质性呢？

记得我初次看到“解放区”内那种“江湖经济”的“混乱”情况时很是愕然，当即与另一伙伴一起以“四·二二战士”的名义投书“造反楼”广播站，建议整顿那里的秩序，以免给“联指”抓到把柄。结果无人理睬。后来我渐渐明白了：即使在最狂热的意识形态口号下，人们的行为也往往具有现实的利益动机。“四·二二”如果仅以一副冷冰冰的意识形态面孔对着市民，怎能指望他们的支持？

正是这种非意识形态的成分使今天的一些论者认为它有“持不同政见”的性质。然而我却感到它更有点像“阿Q革命”。如果说出于意识形态（“极左思潮”）狂热的造反是可悲的，那末那种“非意识形态的”阿Q式造反至少是同样可悲。

当时在“解放区”内有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即“广西四·二二保卫部”，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它贴出的布告。这个机构在“四·二二”活动的后期权势日益增大，从巡逻、“抓赌”、“收税”、清洗内部、参与总部决策直到上阵参战，无所不为。在“四·二二”内部，尤其是在较为具有“理想主

义"的学生们中，对这个机构的人员素质、品行、行为方式及其可能的发展当时就有不少议论。如今人们已经无权更多地指责他们，因为据说它的成员在1968年那个血腥的夏天已全部死于不公正的镇压。但若是"革命"成功了又会如何呢？

在广西两大派中，"联指"做的错事和坏事要远较"四·二二"为多，而后者曾长期成为不公正的牺牲品。曾是"四·二二"成员的笔者如今这样说应该不会被指责为有"派性"之嫌，因为这是1983——1985年"处遗"结束后政府正式公布的材料[①]证明了的。但今天我还想说，这样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四·二二"没有掌权。倘若"四·二二"大权在握又当如何？历史没有给"四·二二"以展示其"革命"前景的机会，但我们从其他省"造反派"掌权时的情景可以推知，也可以从广西境内"四·二二"局部地或暂时地掌过权的地方印证，如果这一派完全掌权，情况会是怎么样。1967年冬我因事到桂林，住在一位"老多"成员的家里，当时桂林是"四·二二"一派的"老多"掌权，并得到驻军支持。然而与南宁相反，这里的"草根阶层"却普遍同情"联指"，而且"联指"也在"草根阶层"聚居区开辟基地，如同南宁的"四·二二"一般。我问为何如此？这位"老多"成员叹口气说："得势不饶人哪，我们把他们（联指）欺侮得狠了，老百姓是同情弱者的。"

看来，无论哪一派都有这个"得势不饶人"的弊病，而无论在桂林还是在南宁，老百姓都把同情给了弱者。

① 参见：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编写小组编：《广西"文革"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但“弱者”一旦掌了权，他们会善待老百姓么？想想未庄的阿Q，想想中国历史上一次次重演的“农民起义”导致王朝更迭的话剧，委实难以让人乐观。

四

1967年《广西日报》社“5·25”事件时我就随队伍在报社院内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这是我第一次卷入武斗。此后类似的场合只要“组织召唤”，我都随队前往。当然像我这样十三四岁的孩子不能充当“战斗”的主力，只能助威壮势或作些“战地”服务工作。每次去，心理都挺矛盾，一方面有一种为“革命”而战的悲壮感与自豪感，另一方面又着实害怕。如果某次人家忘了或来不及招呼我，我会在懊恼之余又有些庆幸。

家里对我如此“好事”极为担心，多次劝阻无效。到这年8月武斗由冷兵器发展为热兵器，家里慌了，提出由妈妈带我和妹妹去看外婆（当时在贵州），我明知父母的用意，但自己对愈演愈烈的武斗的确越发怵头了，于是便借台阶下楼，离开枪声四起的南宁而当了“逃兵”。直到10月间才回来，又重新参加了四中“革联”的活动。当时第一次武斗高潮已过。“四·二二”在“五次接见”后一度在政治上处于上风，虽未能成为掌权派，但毕竟扬眉吐气了一阵子。战友相见，大家都很高兴，然而我内心却很为自己当了“逃兵”而感到惭愧。

这种局面很快就告终了。进入1968年后，“四·二二”

面临的形势又严峻起来。到 4 月间“新四·二二”成立后，一场新的更为残酷的内战又在酝酿之中，小规模的冲突已日益频繁。我们当时已预感到会有大变，却以为未必会超过上一年 8 月内战的水平。就在这时，家里决定妈妈带我再去外婆家探望，并把妹妹接回来（上次返回时妹妹留在了外婆家）。于是我又于 5 月间离开南宁到了浙江宁波（外婆已于此前从贵州迁居于此）。这次离邕心里倒是没什么“逃跑”的感觉，然而到宁波后不久广西即局势大乱，铁路中断，甚至连通信也不正常了。那些天，我们全家常为等不到留在南宁的父亲的来信而焦急万分，度日如年。到七八月间，我才从报纸上关于《七·三布告》的报道和宁波街头的“文革”小报上隐约地感到：“四·二二”完了。

8 月间我们收到父亲的信，催我们速返。后来才知道这是大镇压结束后、自治区革委员成立前各单位要进行清点，尤其是“四·二二”成员，清点不到恐怕要被当成“逃亡分子”，所以父亲这么着急。

8 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们乘坐的列车在晚点很长时间后到达南宁站。下车后的景象令我终生难忘：当时历经一个月来激烈巷战后的南宁又遭邕江特大洪水袭击，全城大部分被淹，断垣残壁间成为鱼虾遨游之所，尤其是原“四·二二”控制的所谓“解放区”位于滨江一带，被淹尤惨。不少退入地道中坚持抵抗的“四·二二”残余人员惨遭灭顶，一些群众包括原自治区副主席、民革成员李任仁先生在内也被淹死，当时称为“水火之灾”。

我们摸出漆黑的车站，一下台阶即陷入及腰的水中。当时全城停电，交通断绝，已成河状的朝阳路两旁的大楼寥无

人迹，茫茫夜空中只听得几处高音喇叭在宣布“……歼灭伍匪的伟大胜利……”一同下车的旅客们手拉着手，摸黑在水中探索前进，不时传来一阵异味，立即有人惊呼“死人!”原来是一具尸体随水漂至……

第二天赶到学校，只见满校园除了“打倒”、“枪毙”“革联”坏头头（名单好长一串）的标语之外，就是原“革联”战士写的“退出革联，反戈一击”的声明。一个伙伴告诉我；人人都得写，你也写一份吧……但我终于没写。倒不是我特别“勇敢”，而是我发现对方当时正沉浸在全胜之后的亢奋之中，忙着收拾本校从“解放区”押回来的俘虏、开斗争会、成立红卫兵团、筹备革委会成立事宜，根本顾不上对我们这号初一生进行清点（当然，倘若我不是个初一的无名小卒而是高年级学生或骨干分子，那是溜不过去的），同时“革联”既没留下什么档案，“反戈一击”的声明又实在太多，彼此覆盖，谁也闹不清“革联”到底有多少人，是否都写了这种声明。

当然，“革联”已不存在了，我写与不写，还有什么意义呢?

之后很快成立了各级革委会，学校建立了“红卫兵团”——这个“红卫兵团”已不是原来那种群众组织，而是官办性质的“优秀学生”组织，其地位类似当时尚未恢复的共青团。我们的对立派四中“三·七”的成员都自动转为红卫兵团员，其他人则须像过去申请入团那样，“争取加人组织”。……

一年后我们“初中毕业”了。这一年没有实行“一片红”（即全部下乡），而是进厂、升学、下乡皆有。进厂当工

人要看成份及“政治表现”——后者在当时实际上就是指你是否属于掌权一派的战友，我显然不会有份。但升学的名单有我，因为我属“班”上年龄最小之列，当时规定满16岁可去插队，不满者可继续读高中，我符合这一条。

但是我不愿升学，要求去插队。“班主任”杨老师颇感意外，几次要我慎重考虑，还到过我家去征求家长意见——为此我敬重他。因为他不属于那种千方百计地“哄”人下乡以显示自己工作有方的人，而这种人当时是太多了。当证实了我确已下了决心并且家长也同意之后，杨老师又劝我写一份《决心书》以便校方对此宣扬一番，同时还劝我写申请加入红卫兵团——相当于入共青团。当时学校的确有几位积极要求下乡而“火线入团”的同学。但是，我还是两者都谢绝了。因为我虽然仍有理想与信仰，但已不愿再做“红卫兵”。我虽然也相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大道理，但我要求下乡部分地也是出于一个“小九九”：我不相信再读两年（当时高中为二年制）后我的分配前景会比现在好，而且我父母当时已待“下放”农村，如果我再读书，到时也会随家转学而离开南宁。与其到那时下乡，还不如现在下，能保持个“南宁市知青”的身份，并且可以与我的伙伴们——他们都在下乡之列——继续在一起。

1969年9月，我终于以“非红卫兵”的身份离开了母校，到“广阔天地”去寻找新的生活，沉重的浪漫结束了，浪漫的沉重又摆在了我这个15岁少年的面前。

秦晖　南宁市“小红卫兵”，现为清华大学教授。

陈家琪

执著与迷惘

——作为一种个人思想与情感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转眼快过去30年了。

30年是个什么时间概念？也许3年前，也许5年前，总之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我就开始偷偷地拿自己与“文革”开始时父母、师长的年龄比，想象着那个时候的他们是在什么意义上被称之为“大人”的，或者干脆理解为“老”，总之有一种“成熟”。而当我也这么“老”了时，为什么却感觉不到那种“成熟”？自己感觉不到，同龄人感觉不到，连自己的子女也感觉不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由自己父母当时的年龄想到那些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掐着指头算一算他们的年龄，又会发现自己已比他们“叱咤风云”时老得多；学历比他们高，知识比他们多（这两点几乎可以肯定），但为什么一想到那个时候的他们，自己无形中就觉得矮了一截，仿佛并没有那么大年龄似的。

由此想到经历和机会。一个人的阅历可能很丰富，但并

不一定就能成为个人的“经历”，正如活了那么长时间，也许始终未碰上过或抓住过“机会”一样。严格来说，经历与机会是总在眼下，就在手头的，并不一定非与叱咤风云的年代或事件有关不可。当然，我今天之所以能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自己确实有了一把年纪，而且，也确确实实地从一个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都堪称叱咤风云的年代与事件中走了过来。就如吃不着葡萄的狐狸就没有资格说葡萄酸的道理一样，也许真理的平凡性恰恰存在于一种从岁月的惊涛骇浪中过滤下来的日常生活之中。当我觉得我已经比较有资格这样说了时，我同时也知道，当我们还很年轻时，也正是想获得这种说的权利才渴望投身于惊涛骇浪之中的。

但愿这样说的权利也如真理的平凡性一样，在日常生活中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近在眼下和就在手头的经历与机会。

文化大革命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陕西省华县度过的，同时又往来于西安至华县之间，与这两地的同学都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其间所建立起的信赖与友谊也一直延续到今日。

我保留着“文革”时的大部分日记，有几本在武斗时被烧掉了；而那些经自己的手写成的各类大字报的底稿和以后曾广为散发的传单却是自己烧掉的，因为真的有些怕了。“怕”这种感觉也很怪，武斗时脚下就是死人，头顶上的子弹打在后面的墙上发出“噗噗”的声音，但那时不怕，怕在以后的回想之中；而当某一级政权机关来几个人找你谈上几句话，却有了一种真的怕，当然以后回想时又会觉得可笑。问题在于这种对谈话的回想总使人有一种仿佛又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怕”也就总也挥之不去，尽管每每伴随的又是

可笑。

比如此刻，当我写下这几行字时，依然有怕，也有可笑。我相信对比我们年长的那代人来说，“怕”可能更多一些，而“可笑”则少一些，或者说没有；对比我们年轻得多的那代人来说，我们在他们眼中也许只剩下“可笑”。

是不是只要我们还在怕与可笑之中，我们就总也长不大？

是不是只要在怕与可笑的纠缠中还残存有几分执著与迷惘，我们就仍活在“文革”那个年代之中？

是不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还在拼命想问题，就是因为依旧笼罩着（哪怕只是自我感觉）怕与可笑的阴影（光环）？当那些与我们一同走过来的朋友已不再有怕与可笑的感觉时，往往是因为生活的环境发生了太大的变化，比如飘零到了海外，比如当了高官，比如电影《活着》中的男女主人公，他们把怕与可笑留给了别人，为的是使活着就是活着，既不可怕，也不可笑。

我与我的母亲是1966年5月16日这天从西安市搬迁到华县的。离开西安市四中（我的母校）时，全班同学开了欢送会，同学们留给了我许多纪念品，班主任送给我的是一支笔，班长给我的是一本《毛主席语录》，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1964年5月1日编印的小册子，当时这种语录本还很少见，也很珍贵。还有一位女同学送给我一本小说，好像是《红与黑》，不过这书名也许真的只是自己的想象，因为在随之到来的岁月中，红与黑这两个字曾使得所有的人都不得不进入那可怕而又可笑的怪圈之中。

到华县后，读的是咸林中学。这所学校号称“陕东学

府”，始创于民国八年（1919）春，创办人是我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杨钟健的父亲杨松轩。我报到后没几天，文化大革命就正式拉开了序幕，所以我对新班里的同学多不相识，以后熟悉的，就只有自己这一派的战友了。但我还是立即感受到了西安母校与咸林中学在环境、气氛、师资力量、学生状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给我的一个震撼就是当时农村的极端贫困与农家子弟的刻苦认真。当然，这种刻苦认真也与限制着他们精神生活的客观环境有关。当我最初很想从城市转学到县城时，心中多少受了些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以为乡下另有一种质朴与纯真，就像普希金笔下的达吉亚娜一样。但我得承认，这样一种情怀在我是很真切的，尽管那种贫穷落后，其中也包括着愚昧和封建（此词不当，好在大家都懂，姑且用之）的东西已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但我依旧想在那里找到些什么；而且，只要想找，就总找得到。找到最后，就会发现问题恰恰出在自己的立场或阶级感情上。很难说这样一个过程或这样一种思路是正统意识形态教育的结果。直到今天，我恐怕仍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也很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长大了，或真的已从“文革”那个年代中走了出来。

我这样说，是因为这种情怀本身既可怕又可笑，它可能不顾一切，就像恋爱中的少男少女一样，尽管几十年后回头去看，这种不顾一切确有其可笑的一面。总之那并不是一个只用理性或非理性便可作出裁决的年代，也许理解为思想与情感的个人经历会更恰当一些。

我想从自己所经历的两件事中来说明这一点。不过用“说明”并不恰当，因为一切都很不清晰，只能理解为一种

类似于偶然触发的东西；当然也不纯粹只是偶然触发的，因为其间所执著与困惑着我的，又是一些很重大，重大到性命攸关的理论问题。

1966年下半年，当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西安市的大街小巷一夜之间都在争先恐后地破除“四旧”时，我们原来住家的邻居已开始不断地被抄被打。这时，我原来的班主任（杨桂梅老师）已受尽了各种各样的折磨与虐待，其情其状之惨使我无法诉诸笔墨，不但当时不敢去看她，就是当“文革”过去了10多年后，当我们重逢时，也从无一句话涉及到当时的情况。那位送给我《红与黑》的女同学，也从一位显赫一时的“文革”闯将变成了“黑五类”的子女，听说家也被抄，而且人被打得很惨。与我关系最好的两位同学（一位是送给我《毛主席语录》的班长）也因成份不好而打入另册，每天打扫厕所，课桌的一角贴有对地富狗崽子的警告信。

成份问题是当时最重要的问题。相比较而言，县城中学更看重成份，因为那里的成份界限分明，不是地富就是贫下中农，中农几乎被置之不理。城里学生的成份要复杂得多，而且他们谁是什么成份，几乎从他们现在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上就能看出来，不像农村中的地富之家就其现在的经济状况而言，往往比贫下中农更贫下中农。

但复辟之说是谁都相信的。“文革”开始时，最大的理论问题集中在：这种复辟是“黑五类”自已或他们的子弟在干，还是通过他们在党内、在政权内的代表人物在干？说到党内的代表人物，就不一定是地富出身了；哪怕出身不好，经过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他们的子弟也早已将成份填成了

"革干"，这是当时最耀武扬威、最让人羡慕、也最直接地体现为身居"社会上层"的一种成份。抄那位女同学家的，就是这样一些"革干"子弟。在一个秋天里的黄昏，我去看她。这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因为我的成份也不太好，再说，还有一个男女之间的避讳问题。我当时就隐隐感觉到了那些打抄这位女同学家的同学，对这位女同学（她在我们班上比较出众）也有这样那样的意思（这是一种确实很难说清楚的意思，而且当我这样说时，决无或褒或贬的含意），当这种意思以哪怕只是现象上的阶级仇恨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往往更凶残，更具有一种人格的或肉体上的凌辱性，这是当我一走进她那七零八落，几乎被打得粉碎的家时就立即发现了的。我叫了一声她的名字。她的眼镜被打碎了，看不清是谁，但立即摸索着从床上坐起来，把两只手一齐伸向前方。这一幕永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后来，她在信中告诉我，当她听到一个叫着她的名字的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时，她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已经很久没有人叫过她的名字了。当然，这也是我离开西安母校几乎半年后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她。

说最后一次不大恰当，因为"文革"后期还见过一两次面，但在当时那种特定场景下的一幕却是永远地过去了；而且在人的一生中，不期然而又瞬间发生的一切一旦印人了脑海，也就很难再闪现出相似或近似的画面。当时我们都刚刚20岁左右。后来到知识青年下乡插队时，她曾想下到我插队的地方，这中间通过几次信，也有进一步发展关系的可能或暗示，但那时的我已决心像保尔·柯察金一样献身革命，而她，充其量只是唤醒心中某种情感体验的冬妮娅小姐。

那天从这位同学家中出来又去看了班长。班长正坐在马路上与人下象棋，眼中充满了迷茫。我们就那样静静地在路边坐了很长时间，风卷着大字报的残骸在我们脚边回旋飞舞。我的心很沉，但有一种情绪性的东西正在涌现，那就是对这样一种文化大革命的困惑与厌恶。

我这样说，是想表明哪怕像我们当初投身“文革”那样觉得自己真正做到了无私无畏、赤胆忠心，也无法排除个人在思想与情感上的某些细微因素（比如印在脑海中的一个场景，刚好接触到了谁，那个人又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下等等）所起的作用。

当我重新回到华县时，问题就更明确了。在咸林中学，历史上有问题的或地富家庭出身的子弟依然是被整的对象，但下手的并不是“革干”子弟，而是县上派下来的工作组。很快，原咸林中学的教导主任（梁元武）就上吊自尽了。我并不认识这位梁老师，但我还是去了现场。绳子依旧在房梁上摇晃，梁老师躺在一面床板上，头上蒙着一张白色的床单，四周一片哭声。同学们缓缓地从死者身边走过，个个心里都有一股气，这股气是冲着工作组，冲着派工作组下来的县委（地委、省委……）来的。

一个极其重大的理论问题摆在了每个人面前：到底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是来自“黑五类”及其子女，还是来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问题当然不可能截然分开，比如把“党内走资派”说成是混入党内或冒充为革命者的“黑五类”，说成是“黑五类”的代理人，或被“黑五类”的糖衣炮弹打中的腐化堕落者等等，总之措词上很含混，而用意则是想把这分别来自上下两

个方面的“敌人”统一起来。

但“文革”前的历次运动都是整“黑五类”，尤以“四清运动”为甚，这是我在农村亲身感受到的；唯有这次文化大革命才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这就是“十六条”中所说的：“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这个大背景下，就知道同学们一遍又一遍地流着泪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就太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声音了。正是毛泽东，也只有毛泽东所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才给从日常生活到升学、成家、提干、人党，乃至生老病死等人生的方方面面都感受到社会之不公正的下层小人物提供了一个至少从理论上说，具有某种“正当性”的“斗垮当权派”的可能。

我之所以要把这种“正当性”限定在理论上，是因为这种“斗垮”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几乎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报复”——如果阶级斗争学说成立的话，也不妨说成是“阶级报复”。但这种“报复”是以比看谁更关心国家大事，更关切江山永不变色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这种“学说”，这种“说成”显然很有问题，因为社会之不公正是一回事，把这种不公正说成是天经地义的（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或把某种反抗说成是“阶级报复”却是另一回事。成问题的只在“说成”。可惜直到今天，当我们努力想把自己当初的行为复原为一种只对个人而言的思想与情感的经历时，仍不得不用这样一些词语作这样一种表述，可见历史确已“说成”了那个样子。

最先起来造工作组反的同学们当然知道整个阶级斗争学说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都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但并没有

任何人（哪怕因此学说和理论而长期生活在社会不公正之中）对此学说和理论哪怕表现出丝毫的怀疑或反感，更没有谁把自己率先投人“斗垮走资派”的运动与对这一学说或理论的反叛联系起来。但无论是我在西安还是在华县的同学中，最早领会到毛泽东的意思是要“斗垮走资派”的，多为那些最明显地感受到社会不公正（广义地理解为怀才不遇，狭义地理解为出身不好）的学生。要是抽象地讲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比看谁与毛主席的阶级感情深，“黑五类”及其子女断不敢出头露面；要是具体到这场文化大革命，看谁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体会深，比看谁更切身地感受到了毛主席的拯救与恩情，“黑五类”及其子女却万死不辞。

谈到社会不公，不仅只就“黑五类”及其子女而言，那些出身贫雇农的学生，解放这么多年了，依旧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他们又该何以解释眼前的一切，特别是与城里孩子的巨大差异？咸林中学最先起来造工作组的反，矛头直指县委的造反派头头就是雇农成份。当我看着他们穿的衣服，吃的食物，听着他们说的话，感受到那种不计个人得失而只关心国家的气概时，真仿佛置身于解放后大量文艺作品中所告诉我们的那种贫下中农渴望跟着共产党翻身求解放的气氛之中。但此刻的“共产党”在哪里？工作组吗？县委吗？那真是一个从理论上怎么也说不清楚，但情绪上却是完全“共产党化”或“阶级斗争化”了的时期，谁都觉得自己到了一个临危不惧、冲锋陷阵的历史关口，而且确实站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

在那些日子里，我也曾与几位最好的朋友讨论过什么才

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与农民切身利益最为相关的保留自留地，偷偷搞一点农副业生产被当成了不值一提的小事，而大事，则集中于中央内部的斗争；相对于这种斗争而言，实际上是谁控制了宣传舆论的工具，谁也就获得了群众的支持。没有谁敢对报纸电台表示不信，但也有一两个人在夜深人静时，曾告诉过我“真相”可能另有缘由。但那一切离我们很远，我们能确信的，就是人都有世界观，而自己的世界观应该改造。所以有时候大家宁愿永远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状态之中，因为只有在那种状态下，一切才都是公有的，人与人之间不但有福同享，而且生死与共。

这可能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是与贫下中农的子弟们生活在一起有关（我最好的一位朋友却是地主成份，而且父亲正在服刑，但他在我心目中一直是贫下中农的典型形象）；当我回到西安市，回到我原来的生活环境中去时，感情上又会发生一些变化，觉得生活本该是另一种样子，至少，人应该吃另一种样子的饭，穿另一种质料的衣服。

就这样往来于西安与华县之间，生活于旧有的、不算富裕、但起码过得去的家庭与几乎可以称之为赤贫的农家子弟之间，执著地想改造社会（从打倒特权到消灭贫困），同时又想保持住那种只有在赤贫状态下才可想象的理想与热情（从净化心灵到彻底工农化），慢慢地，就从“文革”初期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中走了出来，开始了社会革命的实践活动。

从理论上说，造反派从反对工作组，夺当权派的权到投身社会革命是一脉相承的，具体到一个县，这种连续性就成为了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当一个县的权力组织投入另一批人手中时，什么叫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什么叫巴黎公社的选

举原则，怎么样发展生产，扶危济困，一下子都变得非常具体、非常实际。在此过程中，理论探讨深化了（我主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而现实的人却表现出越来越少“个人主义”的东西，比如对权力、名次、物质享受、社会地位的暗中角逐。那时的我，越想使自己纯洁就越想改造社会，因为不管是马克思还是毛泽东，都反复告诉我们，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越投入社会改造的实践活动就会越发现纯洁一无所用，只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想象。

这构成我在华县文化大革命中的又一思想和情感经历。当初夺权时，谁都坚信自己会比“走资派”好；这好主要指的是一种道德情操上的纯洁，比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决不贪图享受等等。而当权力到手后，群众组织内部立即发生了分裂，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人与人之间都难以找到一个统一的衡量尺度。县城里的中学生与城市学生的不同之处此时也更明显了。与城里的同学比较起来，这里的朋友更现实，也更懂得怎样用手中的权力来办实事，这实事主要指的是诸如春耕、秋收、抗洪、筑坝之类的事；但于我，却也同时更多地感受到了权谋、利益、私欲对人的左右。

我发现我必须充当一个吹鼓手的角色。不管内心多么困惑，甚至已经有些厌倦，但既然当初为反对“走资派”如此呐喊过，现在也就不得不为新政权的诞生摇旗。问题只在于如何保持住自己始终一贯的形象，并使道理在任何情况下都冠冕堂皇，哪怕面对武斗这样实在想不出道理的事。于是像运动初期那样的独立思考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宣讲诸如“两报一刊”社论之类的东西；也只有到那时，才体会到这一切都不可避免，“走资派们”当初那样，当我们今天到了这一

步时，也不得不这样。唯一可宽慰自己的，似乎只剩下道德情操的纯洁。但这种纯洁已越来越不为更上一级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相信；随着“清理阶级队伍”之类的运动的逐步展开，我终于明白了所谓改造社会的理想，真是一场既可怕又可笑的冒险游戏。当我们拼命造反并开始夺权时，权力仿佛并不存在；而当我们安宁下来，很想为权力做一点实事或继续进行一种理论探讨时，权力却如一只张开大嘴的猛兽一样窥视着你的一举一动。所以我作为一名最初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的红卫兵，是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后，才在生活的日常性中体会到那种哪怕武斗时也不曾有过的可怕的。那时大家都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现在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的最高指示，这一“轮”字特别具有一种宿命的或注定了的味道，于是更多的小将们消沉了下去。

西安市的同学们更早表现出了这种消沉。1968 年初当我回去想和原来的班长谈谈什么才叫“彻底革命”时，他依旧坐在马路上与人下象棋，眼中也依旧充满了迷茫。华县的同学仍顽强固守着最初造反时的初衷，这就是以自己的“红心”作为前进的航标，至少能使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能更多更深地触及到人的灵魂。所以当社会革命的思想越来越不为社会所允许时，最后剩下的就只有世界观的改造了，于是文化大革命也就从一场本来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还原为更为本来的文化革命的意义，即思想革命、灵魂革命、世界观革命。

但改造世界观是一个比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更加含混不清的概念，就连自己最初对贫苦农民的同情心到最后也

自感为一种可怕而又可笑的愚蠢。1968年春在华县爆发的大规模武斗，尽管使人无法理解，但精神却为之一振，因为又有了一个可以用自己奋不顾身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勇品质来最后为文化大革命增辉（献身）的机会。当然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尽相同，当开始决定谁上战场时，我那位最好的朋友坚持不要我去，理由是独子不上战场，于是有了拥抱、话别和争先恐后的感人场面。而武斗后，当政权真的如以前所想象的那样是用许多人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时，大家却发现这一政权是根本不值得去换的。于是有了更深一层意义上的消沉。当然与这一消沉有关的因素还可以举出许多，比如参加“三结合”的军人远不似以前想象中的亲人解放军那样完美，有些人的蛮横与霸道已如魔鬼一样用来吓唬哭闹的小孩；与其让他们掌权，还不如让被打倒了的“走资派”掌权，这是大家的普遍感觉；还有那些在武斗中窜红了的农民英雄，此时更让人感到理想的破灭。这种破灭，如果指的是与初衷相去甚远的话，也应该包括着自己，比如身边更多的朋友开始了恋爱生活，造反只是提供了一个使彼此相识、敬佩的舞台。有的已开始通过参军等渠道来设法改变自己的农村户口，而像我这样本来就是城市户口且家境还算宽裕的知识青年，更使人在无可奈何中有了几分沾沾自喜。

一切又都恢复为原状，甚至比以前更坏，其中可能包括着世界观；但意识到这一点，已是在农村插队，更准确地说，是在林彪事件之后的事了。

陈家琪　陕西华县高中三年级学生，现为海南大学教授。

朱学勤

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治思想史者，多半有翻案癖，希望在自己的笔下为某一个思想人物洗出一段清白，或是为某一类思想事件洗出一段光彩。我自进入思想史这一行当，始终有一个古怪的寻踪癖，想寻找一群还活着的人，20年前他们有过一段思想踪迹，似可载入当代大陆思想史。我曾希望这群人能以活着的姿态，站着进入思想史，或许能改变一个百年不变甚至千年难变的沉闷格局——思想史上都是一些横躺着的先逝者。有一段时间，我感觉自己之所以进入思想史，而不是历史学的其他门类，就是为了寻找这批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为了寻踪他们而来。

1968年前后，在上海，我曾与一些重点中学的高中生有过交往。他们与现在电视、电影、小说中描述的红卫兵很不一样，至少不是打砸抢一类，而是较早发生对文化革命的

怀疑，由此怀疑又开始思考一系列有关中国前途的社会政治问题，这种思考发展为半公开的思潮辩论，曾遭到“文革”当局的注意与迫害。我把这群人称之为“思想型红卫兵”，或者更中性一点，称之为“六八年人”。

那时我自己还很幼稚。小学才毕业，只能守在弄堂口等候两个在重点中学的大年龄伙伴黄昏回家，给我讲述当天在他们校园内发生的思潮辩论，或者是那些有思辨色彩无具体派性的大字报。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发生了后来我那种对思辨生活的偏好。自己中学毕业后，选择插队落户地点，拒绝与同年龄的同学同行，而是一个人选择了没有国家分配名额的河南省兰考县。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当时已经有 9 个上海重点中学的高中生自愿组成了一个集体户，在那里开辟了一个边劳动边读书边思考的生活格局。我认定这些人有精神追求，能够形成一种超脱世俗局限的精神生活，能够满足我那种对思想的执著偏好。故而没有过多考虑那里的生活状况，而是不顾家庭阻力，只身去了豫东平原。我很看重在此后农村度过的两年多集体户生活，尽管后期也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1972 年进工厂，这群人和另外一个更富思想反叛气息的集体户汇拢在一起，一锅端，被端到 300 里外的另一个县城。于是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精神小气候，用我后来的体悟，是出现了一个从都市移植到山沟的“精神飞地”，或可称“民间思想村落”：一群中学生在下班以后，过着一种贫困而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与他们卑微的社会身份不相称，也与周围那种小县城氛围不协调；他们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有时竟会争得面红耳赤，通宵达旦；被他们吵醒的工

友邻舍，时常用奇怪的眼神打量着这群白天还在一起干活的钳工、管工、搬运工，怎么一到晚上竟会争论起史学、哲学、政治学，争论那样大而无当的问题?

今天想来，当时是以旺盛的体力、贫弱的学力沉浸于那些激情有余理智不足的争论，而且还属于业余性质、半地下状态，既觉得可笑，也留有一分怀念。我开始熟悉黑格尔、别林斯基的名字，不是在大学讲堂，竟是在那种时候，肯定有浅陋误读之处。然而，事后回忆虽然有点可笑，当时那种业余状态的精神生活，却有一个今日专业状态下难以产生的可贵素质——毫无功利目的。你不可能指望那样的讨论结果能换算为学术成果，更不可能指望在这样的思想炼狱中能获得什么教授、副教授职称。能不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就算不错了。

我把那几年度过的思想生活称之为“我的大学”，至今不自惭形秽。现在知识界出现“为学术而学术”、“为知识而知识”的倾向，是个进步。但是有些人把它当做新口号来喊，标榜自己毫无功利目的，我总是将信将疑。真正没有功利目的的精神生活，就我亲历所及，只在早年那些学院大墙外的“民间村落”里看到过。1982 年我直接考入研究生，进入魂梦牵绕的大学校门，进校以后却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适应。我发现某些从本科考上来的科班出身者，比我那些尚在工厂的业余思想家伙伴并不高出多少，一度非常惊讶。后来才明白，如果他们多出些什么，除了多出一些知识上的系统整理，恐怕更多的是对新科举制阶梯上功名利禄的一级级盘算。相形之下，我自然为我那些尚在墙外徘徊的孤魂野鬼叫屈，对那些已进科班却只有大量知识没有等量胆识的新科

进士、举人看不上眼。有一次，一个楼层上的硕士、博士们发生争论，我对一个自视清高骨子里却充满市侩气息的的历史系研究生班长，平素就有看法，争论一起，脱口而出："你白读了一场研究生，你的视野与境界，比一个重点中学的高中生都不如！"这句话对他刺激很深，据说他至今还记恨着这句话。10年后想来，自己少年气盛，出言不逊，这一点应该致歉。除此之外，基本观点却难改变，至今还认为某些科班出身的学士、硕士、博士，一脸的匠气、俗气、市侩气，确实不如当年的"六八年人"。

从"民间思想村落"出来后，我始终摆脱不了当年那些业余状态下的精神记忆。这些记忆成为某种剩余意识，难以被学院生活完全吸收。学院生活对我的训练，就好像进人一道四则运算，思想意识大多被整合归位，源流有序，井井有条，这一点应该致谢。但是最后还有一些因素，通过最后一道除法，怎么也除不尽，成了一些除不尽的余数，无法归位。它们成了大墙内的"孤魂野鬼"，时时作祟。这是我的烦恼，但也留下一些别样的情怀。我坚信两点，当年那种业余状态的思想生活必须淘洗，于此同时，也有一些宝贵的东西不必抛弃。知识与思想的传承是必须尊重的，轻易否定自己的前人，不管是什么样的前人，哪怕是半截子前人，既愚蠢，也不道德。我所经历的"六八年人"的"民间思想村落"，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转瞬即逝，也不该美化。但是有一教育史的发展趋势却可以注意，并不限于哪一年代哪一国度：在近代知识体制取代从前那种民间性私人传授方式以后，大学垄断了高级知识的传承渠道，一方面是有效，它能大规模传授知识，批量化复制知识；另一方面是有害，它

在大规模复制知识的同时，也在大规模腐蚀、阉割知识的个性灵魂。特别是大陆的学院生活，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就是大学体制集中释放它体制性毒素的时候。每年的这个时候，稍有性情者，无论是在哪所院校，都会感到是生活在“三闾大学”，“一地鸡毛”。大学环境里，在充分尊重知识传承的同时，如果没有另一份同样充分的对知识体制化毒素的警惕与抵制，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恐怕很难均衡地、健康地发展。能够与这种教育趋势多多少少拉开一点内心距离，我相信，是得益于那些“民间思想村落”留下的精神记忆。

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以后我在学术领域生活 10 年，自己也没有寻找到当年那些不计功名纯对思想发生兴趣的同道。他们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似乎集体失踪，一下子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再也找不到了。1991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邀集一批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老三届写稿，出版《苦难与风流》一书。我把自己那篇回忆老三届的文章写成了一篇“寻人启事”——

> 我始终在寻找他们，该不会烟飞灰灭？我读《枫》，枫说他们已去；我读《伤痕》，伤痕里没有他们的印迹；我读《磋跎岁月》，那里面只有漂浮的枝叶。我还是贴一张寻人启事吧，或许他们中会有人路过，能够辨认出自己昔日的足迹？
>
> ——你们大多毕业于重点中学，那时一所重点中学的熏染，胜过今天的研究生毕业。从此你们关心精神事件，胜过关心生活事件。即使在 1968 年发烧，别人手里是红小书、绿藤帽，你们手里是康德，是别林斯基。

那一年你们卷入思潮辩论，辩论延续至农场，延续至集体户。你们是自愿离城，不是被迫离城，因此不会说这是“伤痕”，那是“蹉跎岁月”。后来你们被打散，后来你们又相遇，相逢何必曾相识？一开口，只需问对方精神阅读史，原来还是“六八年人”，还是在同一年度阅读同一类读物。头一年读《震撼世界的十天》，后两年读《落角》，在1975年以前，各自都读过《选择的必要》。次年春天好大雪，你们私下传阅《天安门诗抄》。1977年恢复高考，你们大多选择了文科院校——

后来呢？被专业吸干了？被功名掏空了？还是被某一档职称腌制在某一层书橱里？

早在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以前，他们已经农思考通常是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即使农获得这一身份之后，你们选择的课题也应与早年的问题相距不远。你们是问题中人，不是学术中人。这是你们的命运，注定你们不可能雷同上下两代人。前十年你们有问题，却苦无学理；后十年你们学会摆弄学理，却可能遗忘了问题，更遗忘了勇气。你们有了身份，不能失去自己。学院里的学理，不应该是用来换取学位的，那是同辈牺牲近百人才换来你一个人的思考机会与发言权力。

“寻人启事”寄托了我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寻找那些游弋于体制内外尚未除尽的“余数”，却苦寻不遇的心结。他们理应还活着，之所以隐匿不现，是不是也因为功名利禄的腐蚀，才就此失踪了呢？“民间思想村落”移植进大学，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与正规的研究条件，这是天大的幸运。但

是，一旦获得知识分子身份，就直奔学术身份的前程，在接受知识传承的同时，精神灵魂被知识的体制化毒素吞噬，被高高低低的职称“腌制”在高高低低的书橱里——如果真是这样，灵魂被除尽，一点“余数”都未留下，那岂不是一代人买椟还珠的悲剧？

没有一个人来揭下这份“寻人启事”。不过，内心对“六八年人”的感谢与期待还是没有熄灭。我既对他们失望，又对他们怀有旧情，甚至有一种欠债感。“身在曹营心在汉”，如果说我进入学术生活以后，在近代思想史专业领域内还能做点工作，我首先要感谢的就是当年那些游荡在学院大墙外的孤魂野鬼。在我给大学生讲述书本上的思想史之前，是那些“六八年人”——业余思想家，他们以热血书写的思想而不是在纸面上罗列的讲义，给我上了一堂真正的思想史课程。从血管里出来的是血，从喷泉里出来的是水。尽管那时那些年轻的血管是生长在一块巨石下，由此而挣扎得虬曲变形。然而，即使是在虬曲的血管里，跳动着的是虬曲变形的思想，也要比那些后来从大学自来水管里笔直流淌出来的廉价白水，更有价值。从此，他们使我能从血肉中感觉得到现实生活里思想史脉搏的跳动，能从纸页背后捕捉真正的思想史事件，与此同时，则大致能辨别哪些是三流教授们为换取职称而编制的印刷垃圾。

负债感一直延伸到1993年我的博士论文出版。我打破那类出版物序言的写作惯例，写完向导师致谢的一节后，又另辟一节，向读者交代我的这一论文的最早“灵感”来源，是在进入学院生活以前的那段业余性质半地下状态的思想经历——十几年前“六八年人”对我的那场思想启蒙：

从精神履历上说，我属于1949年出生的大陆第三代人。这一代人的精神觉醒，大致可以1968年为界。那一年正是他们以各种纸张书写他们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的年代，也是他们卷入思潮辨论的年代。这种辨论后来延续到农场，延续到集体户。我清楚记得，当年上山下乡的背囊中，不少人带有一本马迪厄《法国革命史》的汉译本。从此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难摆脱这样一个精神特征：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思考知识分子的问题。用梁漱溟总结他那一代人的话来说，1968年的这一代人是"问题中人"，不是"学术中人"。尽管他们中间后来有人获得知识分子身份，但是1968年产生的那些问题始终左右着他们的思考，甚至决定着他们的思想命运。就我而言，1968年问题中最令人困惑的焦点，也就是延续至本书写作时还在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法国革命与中国的文化革命如此相近？

历史实在残酷。"六八年人"中的大多数后来是被牺牲了，或者说是被消耗了，只留下少数几个幸运者能够进入学术环境，以学理言路继续思考"六八年"问题。也许我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然而可能也因为这一点，我的思考显得格外拖累：既要延续"六八"年的思考，又要避免对法国革命的穿凿附会；既要尽可能客观清理从启蒙到革命这一段历史的思潮源流，又要为我下一步研究把重心移到中国留下足够的发展脉络；既要坚持法国大革命中高昂的价值理性，又要批判这一价值理性越位逾格所造成的负面灾祸。这三层拖累，尤其是

最后一层拖累，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六八年人”来说，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心理代价。在本书写作最困苦、最动感情、又最需要克制感情的日子里，我给友人写信说：“我哪里是在批判卢梭？我是在我自己和同代人的心里剥离出一个卢梭。”

……… ………

可怜荒陇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历史无情，埋没多少先我而知者？天网有疏，间漏一二如我后知者。先知觉后知，是为启蒙；后知续先知，勉为继承。谨以我绵薄之作，敬献顾准先生在天之灵；同时，亦以此敬献我同时代人中的启蒙者、牺牲者，也算是一份迟到多年的报答。

这样写序言，当然有点犯忌。幸运的是，我碰上的两个先生都是在当今知识界并不多见的好人。念博士时因受众所周知的那场风波牵连，差一点被逐出复旦校门，多亏导师仗义执言，四处奔走，恢复了我的学籍。做这篇论文时，因观点有悖正统教义，被认为是右翼保守观点，又惹出风波，后经答辩主持人给予我关键时刻的关键支持，方才逢凶化吉，顺利过关。现在，论文出版时，序言应该说些皆大欢喜的话才算识趣，怎么还要添上这么一段吃力不讨好而又极易引起误解的话呢？我的论文答辩主持人在看到这一序言后，果然说要我去面谈一次。那次谈话开始时，我还有点忐忑不安。不料老人开口竟说，我关于“六八年人”的记述打动了他，使他知道了当初在牛棚里尚无法知道的情况——当年外面还有那样一群年轻人，在那样封闭的条件下，在坚持那样可贵

的思想探索！听完老人的那一席话，当时我极感意外。这些年来，在“文革”中历经磨难的老一辈学者是很难接受关于那一代青年的另一种说法的。与此相反，我的答辩主持人不仅宽容了这一说法，而且还那么认真地思考了一场。看着老人那样诚挚的面容，我内心自觉惭愧。我们自己敝帚不珍，就在上一代人好不容易开始理解我们当年的思想经历时，“六八年人”自己却正在走向消失。珍惜这一经历的当事人一个一个少下去，理解这一经历的老一辈学者却可能一个一个多起来。这不也是思想史，而且是以现在进行时态在当下发生着的活生生的思想史吗？

就在我几乎对自己这一代人失望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有戏剧性的真实故事。1994 年春节，上海邀请发起全国灯谜大赛，电视台录相向全市转播。荧屏一闪，突然出现一个我一直在打听，打听了 12 年也不知下落的朋友的面容。不错，就是他！我赶紧掷笔，去那个比赛地点找人，一问，却道是已经离去，刚走一天。我枯坐在那座公园里，颓然无语，茫然若失。几天后，我把这场寻友不遇的感受，写在上海《文汇报》的“笔会”版上：

自从离开那个黄土弥漫的省份，最后还值得怀念的也就是他了。十多年前我们有过一次长谈，分手在灰暗的铁路铁轨边。他有过那样辉煌的思想经历，在当时的思想棋局中，可算得业余八段。他怎么会摆弄起灯谜，而且是大陆唯一的职业谜手？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能放弃那种思想棋手的颠簸生涯吗？这也是一个谜，而且是更大的谜。

我自以为我所有的写作就是为了我的同代人，但是我的同代人大都离我而去。我只能放弃希望，放弃寻找。

这件事结束，我是真正绝望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沉下去，还是浮上来，他们要么是失语，要么是失去记忆，都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少数真正的思想棋手，被紧紧踩在社会的最底层；另一些浮上来的学术明星，并无多少思想可言；这些年越炒越热的"知青热"、"老三届热"遮蔽了当年那一批人的精神追求；某些参加过"六八年思潮"的人，竟也参与了这种实际上是在篡改他们精神轨迹的庸俗合唱；一些成功的"六八年人"，在"一地鸡毛"的伴奏下，满脸油汗地高唱着自己的"劫后辉煌"，却把当年真正可贵的"六八年精神"置之脑后——所有这些，构成了一副破碎而又扭曲的图画；面对这幅丑恶不堪的图画，我只能背过脸去。

今年春节，我又被拖着参加了几次当年插队落户人的聚会。内心的隔阂日盛一日，最后是能躲则躲，实在躲不过，只好以沉默度过那种热闹而又空洞的聚会。这一段时期，我正赶写《随想录》，几乎每天都写一点。我对自己这一代人的辩护在本代人中也许是最为漫长也最为顽强的。因此，在写出《随想录·这一代的事》这一章节题目时，我还想挣扎，最后为自己这一代辩护一次。但是，底气越来越弱，声音越来越轻，终于被内心另一种声音压下去了：

我相信，有两场"文革"交织在一起。前一场"文

革”是自上而下，后一场“文革”是自下而上。前者激发了后者，也利用了后者，后者也一度支持过前者。不久，后者背叛了前者，成为“地火在运行”，使前者坐立不安。因此，1968年以后的上山下乡，既有解决城市多余劳力的技术性考虑，也有驱散思想火种的非技术性谋略。那样的思想火种，留在城市太危险。在后一意义上说，那场席卷两千万人口的大迁徙，有点类似俄罗斯驱散十二月党人，“广阔天地”成了“广阔的西伯利亚”。而绝大多数平平常常的中学生，被哄赶下乡，哭哭啼啼，到老都未必明白他们是那一小批人那一小批危险思想的无辜陪送者。这样的历史安排当然是不公正的。“六八年人”永远欠着他们同代人的这笔历史债务。

10年后，我们的“西伯利亚人”得以回城，甚至进了大学，不料思想史上以“一九六八”命名的那一页精采记录，亦以离城始，返城终，逐渐受潮瘫软，发黄变质。时至今日，它已经像一张废弃的陈旧日历，飘进了一个硕大无比的废纸篓——灰色城市。

大多数人在这座灰色的混凝土森林里，变成了灰色的小官吏、小职员，正在抱怨生活的不公，要求生活给予补偿。当年的精神追求没有升华为超意识形态追求，即随意识形态的破灭而破灭，坠落为一堆叽叽喳喳的抱怨；

少数杰出者正在向等级序列的更高一层冲刺，成了托尔斯泰笔下卡列宁式的人物，只是还缺少俄罗斯式的贵族教养。意识形态已经淡出，社会结构的转型期已经

开始，但是，半新半旧、半阴半阳的过度状态还会拖延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具备底层生活经验，洞察社会政治结构及其组织细胞的各种缝隙，内心深处又解除了意识形态虚假道德束缚，“六八年人”将游刃有余地穿插于各种结构的间隙，从中渔利。新一代社会中坚也许就会这样形成。

新一代社会中坚是灰色的，我把这种颜色命名为“中国灰”。这是因为“六八年人”的内心世界有过一场灰质化裂变，那场裂变无法确定是在哪一天发生，但却可以看见那股“中国灰”一天天从里向外泛出来。当年的思辨能力很少转化为思想史上的精神资源，而是转化为在世俗层面上夺取权力资源与生活资源的经验。在反对传统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的同时，或在此之前，被反对的这两种毒素已经渗入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伤疤累累，已经结痂成茧，外伤变为内伤，很不透明，甚至难以射进阳光。当年“西伯利亚”的广袤土壤只收获了几个卡列宁，不会有普希金，不会有车尔尼雪夫斯基，更不会有别林斯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大限。这一代充其量只能清洗这块土地的外部毒素，其内部毒素大概只能留待后人清洗。我们这代人已走到历史尽头，大限就在这里。

“六八年人”的精神生命如此短暂，是否已经死亡？

赋予我们精神生命的那块思想文化土壤，是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给予最善意的估价，只有17年积累，太贫乏，太浅薄。尽管我们当时读了一点黑格尔、别林斯

基，这种非主流读物能起的作用毕竟有限。更何况德国哲学、俄罗斯文学与17年政治文化在某一个方面是同属一脉，后者是前者的遥远的后裔。因此，这一代人精神短命的内在原因，还在于当年我们吞咽的精神面包既有营养也有毒素，我们只坚持其营养一面，拒绝反刍其有害的一面。

在当时的阅读氛围中，读黑格尔、别林斯基是有启蒙作用。然而另一方面，则有可能在一个更深刻的层面上接受并捍卫正在迫害我们的意识形态。迫害者与被迫害者在精神血缘上是同一血型，二者之间的差别，可能仅在于同一血脉里上源与下流的差别。因此，“六八年人”当时的思想反叛，是在一种精神樊篱内的游击活动，并未跳出如来佛手心。我们与当时迫害我们的东西，有一种相反相成的内在生命联系。故而我们能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兴旺期，长出一片精神小草，但不可能长出独立的参天大树，甚至连灌木丛都难长出。那一片小草，只有一个生命周期——伴随意识形态的生命周期，一荣皆荣，一损皆损。一旦意识形态结束，调用毛泽东语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沼泽地里的小草迅速枯萎了。

对这一代精神生命的否定，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向下突破，返归世俗的沼泽地里打滚，这一代人中已有不少人这样做了。这是一种个人选择，你只能尊重。还有一种是向上突破，脱胎换骨，掏洗原来意识形态的底色，更换精神血型，走出另一种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向上突破太艰难，到目前为止，我只在一个人的作品里

看到有后一希望，那就是张承志。他欲以笔为旗，只身面对当今虚无主义思潮的十面埋伏。这样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同时亦担心他拒绝掏洗昔日的精神资源，恐难有效抗拒虚无主义？如果笔管里流动的是“六八年人”的旧式理想，这样以笔为旗，那么下一代可能会以调侃的语气问出一个问题，令我们哭笑不得。这一问题是：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我敬重张承志的孤胆英雄气。我以目相送，看着他在荒芜英雄路上逐渐远去。

正在消逝的1968年思想群落，后来据我了解，当年在北京有过更为自觉的思考。在内地其他省会级城市，也有过零零散散的村落。与此相应，1968年的大陆，还出现过一些半地下的文学群落，如以食指为代表以北岛、芒克等人为主将的白洋淀村落。白洋淀畔那些半地下半业余的诗歌活动，构成了这一代文学生命的“根”，至少是“根”之一，比来自西方的“符号根”更有泥土气息。文学群落比思想群落幸运，从白洋淀村落到朦胧诗，从朦胧诗到崛起的诗群，再到今日之先锋作家，这条线索始终未断，而且顽强发展，结成了正果。近年来一部分文学史家正在紧紧追踪这一线索；一些冠之以“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的出版物正在公开发行；大学课堂已经开始讲授有关这一现象的文学史篇章；不定哪一个文学博士会以此课题很严肃地幸到一个很滑稽的博士学位，那时食指和他的伙伴们肯定还活着，听到这一新闻，一定会觉得啼笑皆非。相形之下，1968年民间思想界

的"食指群"则令人感慨。也许是"思想食指"比"文学食指"所需要的外界环境更为宽松?也许是"思想食指"必须先指向自己，对其内部精神生命的掏洗要求特别苛严?总之，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或许是所有的环节都出了问题，一群"思想食指"刚刚拱出大地，一阵暴风雨袭来，很快就夭折了。他们没有结成正果，他们成为一根根被掰断的食指，至今还处在失踪状态……

我含恨怀念我们的"食指群"。恨意难消，却还是想追赠他们一个集体知识分子的职称。不管当年是高中生，还是初中生，也不管现在是局长，还是街头修车摊主，当年那种业余状态下的精神生活，相比新科举制下现在那些功名在身吞吞吐吐的青年教授，他们不是知识分子，却又比知识分子更像知识分子。只是这一类知识分子如其他类型其他辈份的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在精神生命上，也是短命的一代。大多数人未老先衰，提前进入暮年状态。就外部环境之恶劣，人们应该原谅，说一声："可惜"；就内心状态之残破，后人再厚道，至少也能说一声："可悲"。有人说，历史的苦难总是能换来历史的巨大进步为补偿，我现在则十分气短，越来越没有底气说这句大话。更多的可能是，历史苦难积累起来的思想史资源，在起飞之前就已经坠落，进入了一种令人难堪的流产状态。

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习惯性流产史。罗曼·罗兰说，30岁——有人才开始，有人已经死了，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我们恐怕又得为一代新人送葬。中国有的是人，而且是代有新人。然而，在代与代之间，你却难以看到一条代代相连的思想史连线，一环一环向

上螺旋发展，向上突破成功。你能看到的是思想史资源的一次次浪费，一代代重复，最后是一次次掉头下行，宣告失败。你还想再看看？不必了，俱往矣。数风流人物，不看今朝！

与历史学其他部类一样，思想史从来是也只能是文字记载的历史。它历来势利，只认文字，而且是变成铅字的文字。除此之外，它又聋又瞎，听不见也看不见旷野里的呼唤。所谓思想史的长河，只不过是一条狭长的小溪。在这条小溪的两边，是望不见尽头的无字黑暗。一代思想者失踪，迷失在思想史这一边或者那一边的黑暗里，不会引起思想史长河的一声叹息。它连一个涟漪都不会泛起，不动声色地、熟视无睹地继续向前滑淌。思想史上大规模、小规模、集体性、个人性的失踪事件，几乎每一代都发生过，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以致我时常怀疑我所操持的这一行当，究竟是思想的保存者，还是思想的暗杀者？被它暗杀的思想，也许比被它保存的思想还要多。它整合了多少整数，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又暗杀过多少除不尽的“余数”？它既然能暗杀像顾准那样大的“余数”——拆下自己的肋骨当火炬点燃，那就不难暗杀散翻在民间村落更为幼小的零散余数。“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曾鼓荡过多少人读史之后的胆气？然而我怕读也恨读的，就是这一熟句、俗句。是无边落木，陪衬着不尽长江？还是不尽长江，流淌着无边落木？两边来回读，怎么读都令人黯然神伤。还是翻过来读，才像一个暗杀者每天都在逃离作案现场，慌不择路，夜奔前程的连续记录！你追寻这串脚印，不由得迎风撒泪，青衫长湿，还要追问：难道思想史只能这样流淌？

不是别人，正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逝者如斯夫？逝者如斯夫……。
歌德诗云：

> 我曾领略一种高尚的情怀，
> 我至今不能忘却，
> 这是我的烦恼。

是的，这是我的烦恼。

1995年5月10日　雪窦寺下山后
为回应“知青热”、“老三届热”而作

朱学勤　文革期间进入中学的“小红卫兵”，现为上海大学教授。

编者附言

我于1994年底受上海某出版社委托，策划并组稿，计划于1995年推出此书。由于种种原因，此书在经历了多家出版社后，至今才得以面世。

除一篇文章外，本书全部文章都是作者应约而写的专稿。但在漫长而无望的争取出版的过程中，可能有个别文章已在某些刊物上登载，这是编者理解并同意的。安文江先生热情支持本书选编工作，答应赐稿，但因太忙而未果，后由编者选其已发表的文章一篇，摘录于本书中。

在编辑过程中，得到很多热心人的支持和帮助，他们有的排除顾虑、克服困难，毅然写稿，有的花费大量时间在海内外为本书组稿，有的千方百计争取本书的出版，我在此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我希望本书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抛砖引玉之作，由它激活一代人的记忆，为记录和反思历史留下第一手资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中国新文艺大系参考书系 １９９６我们那一代的回忆
作者＝
页数＝３３９
ＳＳ号＝１０１７７７８６
出版日期＝